

周恩来与张治中

舒风 著

ZHOENLAI YU ZHANGZHIZHONG



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华文出版社

J102737

K8277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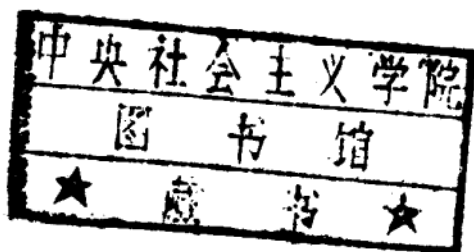


201027370

周恩来与张治中

舒 风 著

DJ11/25



华 文 出 版 社

7875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与张治中/舒风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8. 6

ISBN 7-5075-0750-5

I. 周… II. 舒… III. ①周恩来-生平事迹②张治中-生平事迹 N.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12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科 普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56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23.00 元

《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总序

王光美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光辉历程,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看中华民族众多的爱国人士的报国情怀和卓著业绩,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和必然发展趋势,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史学工作者和统战部门的关注,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项目。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丛书通过反映我党领导人与著名爱国人士的交往与友谊、团结与合作,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助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爱国主义在现代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结论的真理性。丛书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崇高的品格,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胸怀以及深厚的文化素养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并将会成为感染和激励读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有益精神食粮。丛书还通过对著名爱国人士与我党领导人交往过程的记叙,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必将进一步调动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实践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实践必将继续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没有一个包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促进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相信《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的出版,将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八月

前 言

周恩来与张治中一生的友谊与交往，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典范。

周恩来与张治中初识于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担任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继而，两人都调到入伍生总队，周恩来任党代表，张治中当总队副。自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俩分别在武汉、长沙、重庆为国共合作而辛勤奔波；抗日战争胜利后，两个人又分别代表国共两党进行过无数次的谈判，谈判中他们或争论得面红耳赤，或促膝恳谈，周恩来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殚精竭虑，费尽心血；张治中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竭尽全力。一九四六年四月，周恩来在重庆与文化界名人话别的茶会上感慨地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国共团结谈判而奔走重庆、延安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张治中在延安的欢迎晚上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先生一起来迎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次是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啊。”周恩来与张治中为实现国内和平，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真是呕心沥血，备受艰辛。

张治中将军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他一生曾五次统兵打仗，其中两次是抗击日寇，没有

一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过战。这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是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九五四年，在一次会议休息时间，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张治中说：“他这人专做好事，一生做了许多好事。”

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下野。四月一日，张治中率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谈判。当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张治中将军要回南京复命。周恩来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轻易放过张治中将军的，便诚恳相劝：“为安全计，请您留下来。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您这位姓张的朋友了。”周恩来说的那位姓张的朋友就是张学良。张治中被周恩来的忠告所感动，便决定留在北平。此时周恩来正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把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和子女接到北平。张治中将军和代表团所有成员，无不被周恩来对国民党朋友的真诚相待、关怀备至而感动。党内的同志都称赞周恩来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张治中将军是个有主见的人，从不随波逐流。他曾说：“人在政治上要有远见定见，二三其往，阳奉阴违，模棱两可或朝秦暮楚是不行的。”

张治中将军在他的《七十回忆录》中最后说：“由近望到远，我已接受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路线的领导，我当然以无限的真诚跟着共产党走，走向建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的大道。我虽年已七十，似不敢妄自菲薄，自当更加努力，不愧做一个红色老人，不愧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好朋友！”

张治中将军的一生言行，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一生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主张民主政治，热爱祖国。他为人襟怀坦白，

光明磊落。童小鹏在《深切怀念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一文中说：“许多党内外同志都称赞文白先生为国民党内的正派人和爱国将军，他是当之无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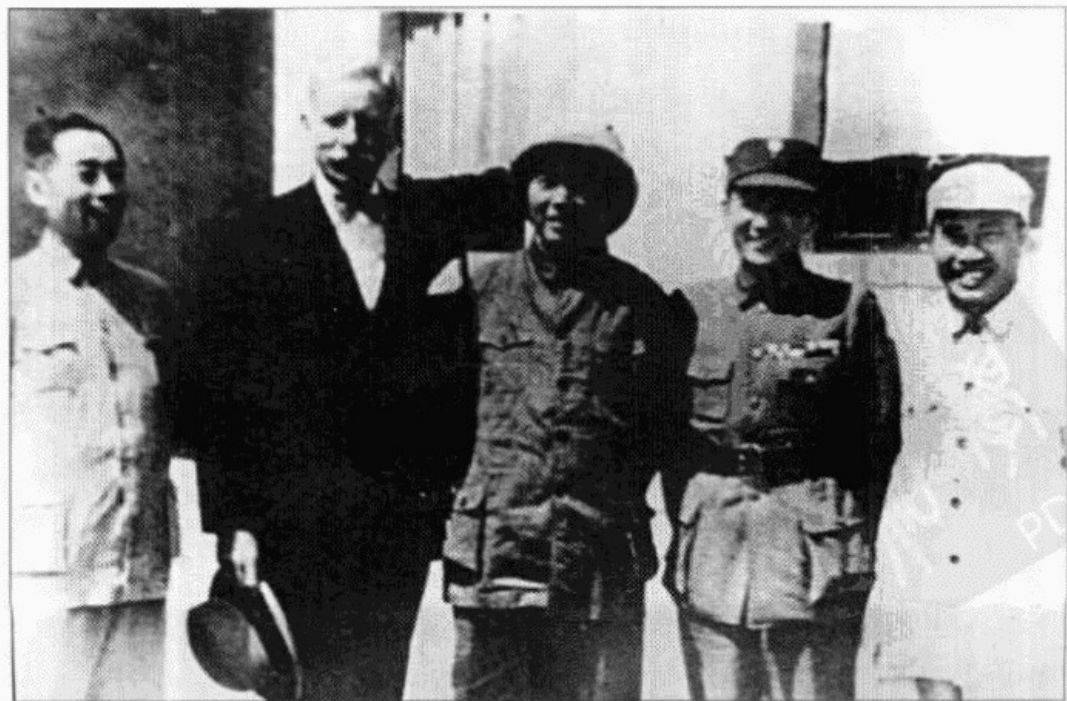
习仲勋同志在“张治中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张治中将军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他“对国共合作，对民族，对民主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国家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诚如邓颖超在《张治中回忆录》的序言中所说：“他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对我党直言不讳，肝胆相照。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文白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代代中国人民所纪念。”

周恩来与张治中将军一生的友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精神。

周恩来与张治中既是挚友、密友，又是诤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张治中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第二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代理总队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延安留影。左起：周恩来、赫尔利、毛泽东、张治中、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延安机场。右起：王若飞、周恩来、赫尔利、毛泽东、张治中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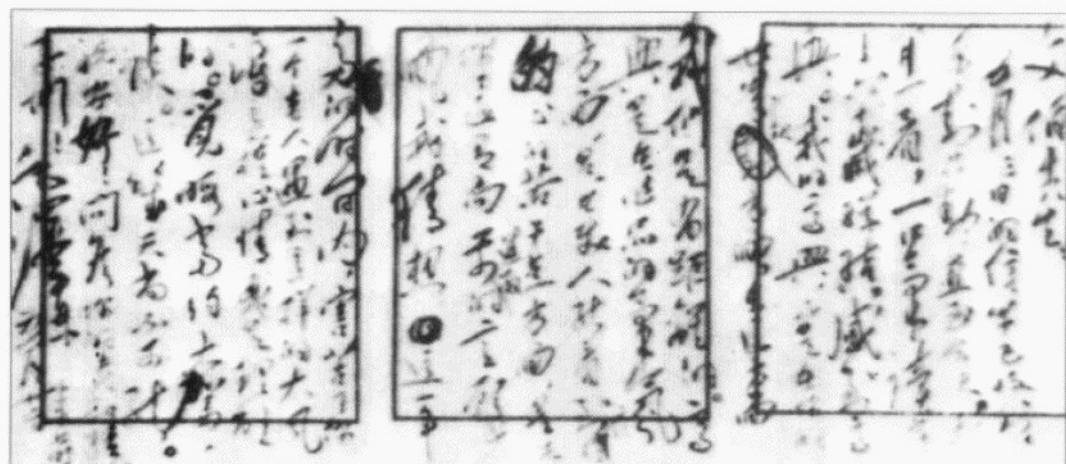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人小组”在北平军调部门前（即今天协和医院）留影。第一排左起：张治中、郑介民、马歇尔、周恩来、第三排左一为叶剑英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左起：刘斐、章士钊、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周恩来与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右二）、屈武（右一）在一起





文伯（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据《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文伯”应为“文白”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第一章 黄埔军校结成至交
1	一、革命军人的摇篮
5	二、最佳人选
8	三、军队政工制度的奠基者
13	四、一见如故
18	五、“东征”与“平叛”
23	六、“红色教官”
28	七、申请加入中共
33	八、张治中婚宴“发难”
38	九、廖仲恺被刺与中山舰事件
48	十、张治中力荐周恩来
	第二章 抗战时期携手御侮
55	一、两个人的共同朋友
62	二“你们不要，我们要”
69	三、千古奇冤

82 四、张治中登上国共和谈舞台

93 五、赫尔利调停失败

第三章 重庆谈判历尽艰险

101 一、蒋介石三发邀请电

111 二、张治中一到延安

115 三、毛泽东抵达重庆

120 四、蒋介石留客林园

123 五、桂园的政治旋风

130 六、险象环生的鸡尾酒会

135 七、签订“双十协定”

140 八、张治中二到延安

第四章 整军谈判友谊加深

149 一、两党谈判举步维艰

153 二、军事“三人小组”

159 三、“共产党的代表”

166 四、三将军飞抵塞外

172 五、戳穿了王耀武的假戏

177 六、三将军解决“水”“电”之争

179 七、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

181 八、“和谐”的傅作义

185 九、张治中三到延安

190 十、“真是奇文!”

193 十一、谈判破裂

第五章 北平和谈走向光明

200 一、蒋介石三召张治中

- 208 二、张治中成了“风眼”
213 三、劝蒋介石下野
220 四、筹备“和谈”一波三折
224 五、张治中一到溪口
229 六、紧锣密鼓准备“和谈”
233 七、张治中二到溪口
237 八、周恩来怒斥假和谈
242 九、“骑墙是不行的”
246 十、“百万雄师过大江”
253 十一、张治中留居北平

第六章 肝胆相照参政建国

- 261 一、“共产党欢迎你”
264 二、和毛泽东讨论国家大事
269 三、风雨夜纪念“八·一三”
273 四、为新疆和平解放奔波
278 五、“当副手，委屈了”
282 六、张治中新疆吐真情
286 七、“有幸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291 八、“他这人专做好事”

第七章 朝思暮想谋求统一

- 301 一、“准备第三次合作”
306 二、周公将有重托
311 三、“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317 四、张治中接受采访，周恩来东兴楼宴客
322 五、“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

- 327 六、局促东隅，不归何待
332 七、效力祖国统一，期盼台湾回归
340 八“拜托拜托”

第八章 友谊长驻情结如故

- 348 一、关于“兄弟”的辩解
354 二、张治中家里的常客
360 三、“不能夸大到如此地步”
368 四、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
373 五、在史无前例的风暴中
381 六、晚年的友情

388 后 记

第一章 黄埔军校结成至交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风暴迭起。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多年，始终不能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政权，原因就在于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

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联的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苏联同志对蒋介石等人说：“搞革命就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蒋介石回国后向孙中山做了汇报。孙中山回顾多年的经验教训，也深深感到什么滇军、湘军、桂军、鄂军等等，没有一支军队是靠得住的。这些旧军队不只是政治上不可靠，军事素质也极差，没有战斗力。孙中山下决心先办军事学校，以培育大批军事人才。他将办军校的地点选在了广州的黄埔岛。

一、革命军人的摇篮

黄埔岛座落在珠江主河道南侧。珠江的入海口原是一个多岛屿的古海湾，这里岛屿星罗棋布，周围山地与丘陵环绕。由于岛屿错落散布，河道纵横交错，水系纷杂，形成了稠密的河网。所以这一带水路交通十分方便。

黄埔岛上一年四季树木葱茏，花草茂盛。岛上山峦起伏，地势由北而南渐渐倾斜下去，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和海港。解放后，黄埔港经过改建，可停泊远洋海轮。这里有航线通往我国沿海各大城市及世界各地，成为广州的海上门户。

黄埔军校设在原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的旧址上，经过修缮而成。

当初，孙中山选中这里作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就是看中这里四面环水，与外界隔绝，不受社会上的干扰，学生容易管理；且岛上地形、地物复杂，也便于军事操练。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上午，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天一早，孙中山穿着崭新的白色制服，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黄埔岛，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以及总教育长何应钦、训练部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等人陪同孙中山大元帅夫妇，先巡视了学生的教室和宿舍，又察看了新修葺好的校园。最后孙中山在众人的陪同下进了大礼堂，面对五百多新生发表了生动、精辟的演说：

“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孙中山越讲越慷慨激昂，也许由于天热，也许是病体虚弱，脸上的汗珠渗出来了。孙中山掏出手绢，轻轻擦拭了一下面部，继续讲：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说到这里，声音忽然提高，一字一顿地说：“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

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①。

孙中山讲完话，校长蒋介石接着讲话。他首先强调了纪律性，接着他大谈学员应努力完成任务，“无论你的工作如何，你必须尽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它，不要逃避工作。”最后蒋介石把孙中山先生推崇的“不怕死”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你必须以死为荣，为了国家牺牲性命，乃是一项荣耀，因此不可怕死。只有懦夫才怕死。”等等。

孙中山的讲话对学生鼓舞极大，许多学生把孙先生的讲话毕生当成座右铭。

孙中山等讲完话之后，又来到操场，登上临时搭的高台，检阅学生军队伍。孙中山看着朝气蓬勃的学生穿着新制做的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肩上扛着刚发下的步枪，在教官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检阅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孙中山在讲话中提出“亲爱精诚”四字为校训，典礼之后又手书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黄埔军校初期的组织领导，孙中山任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军校下设教授部、政治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军校的课程也很多，政治、军事课每天都排得满满的。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②。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理论和马克思

^① 《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90—298页。

^② 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第4页。

主义理论都列入军校的正课。军事课的授课内容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以及《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等等。学生们在掌握军事理论的基础上，按照实践要求，从单兵作战的训练到排连营协同动作，以及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都依次循序进行操练。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四百七十人。开始分四个队，后来湖南讲武堂来了部分学员，又增编了两个队。军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安排得非常紧凑，要求也极为严格。学生兵每天凌晨五时准时起床出操，不得拖拉。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学员照样出操。学员不得吸烟，不得随意出校门。

军校开学后，廖仲恺依然忙于筹款筹粮，为日常杂务辛勤奔走，劝慰他人安心教学，一切事务性的工作由他承办。学生们尊他为“黄埔之母”。蒋介石这时也全身心投入军校的建设工作。当时军校有两个校歌，歌词大意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蒋介石亲自教唱校歌，亲自检查防疫卫生工作。他每天凌晨五时准时起床，起床的号音一落，他立即出现在学生宿舍前，严厉地喊醒仍在蒙头大睡的学生。蒋介石坚持与学生在食堂一起吃饭，他不举箸，学生不准动筷子，每餐只准添一碗饭。蒋介石在对学生训话时曾说：“本校长自己做学生在军队的时候，一餐只吃一碗饭，三块萝卜，或是一块咸鱼。打仗的时候，更是苦了，有时带上一块面包，一壶水，要打几天的仗……”

蒋介石为了把学生训练成忠于他的未来军官，他十分注意在思想上训练学生们绝对服从的意识。他坚持每天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蒋介石讲解“三民主义”，同时又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强调对“三民主义”要绝对信仰，绝对服从。蒋介石说，凡是“怀疑三民主义或批评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①。蒋介石还坚持每天与几个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与他单独会过面，谈过心。所有的学生都敬畏他，无论在什么地方，碰到蒋介石都必须立正敬礼。学生每天坚持操练，即使珠江口涨潮，操场上的水漫过了脚，学员踏着泥水也照样训练，而且必须穿草鞋。这时的蒋介石严肃认真，励精图治。

二、最佳人选

在黄埔军校设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职务，是学习苏联红军部队的建制和红军军事院校的经验，由中国共产党人提议，孙中山认可的。目的在于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改变旧军队的军阀独裁、军纪涣散的状况。如何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当时在中国谁也没有经验。所以，政治部主任一开始就难产，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最初廖仲恺、蒋介石请吴敬恒出任。吴敬恒最初任南洋公学校长，后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回国后又创办《中华新报》。一九二一年又率学生一百余人赴法国，在里昂任中法大学校长。吴敬恒又名吴稚晖，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的密友。廖仲恺请他出任政治部主任，开始他满口答应，后来知道政治部里有共产党员，便坚决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与共产党合作共事。”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七册，第七编。

廖仲恺和蒋介石又请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他早年主编过《天铎报》，很受一些人的赏识。后来他又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与蒋介石结拜为把兄弟。廖仲恺一谈，戴季陶就痛快地答应了。但他没几天就辞职不干了。原因是他对学员讲话都是讲些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陈腐道理，学员们听了极为反感。他在上面讲，学生在下边起哄。再者戴季陶当时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的朋友圈里谈到共产党，他不能不表示支持。因此，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甚至当面遭到谩骂。有次张继在邹鲁家里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是“共产党的走狗！”他感到两面受气，左右不是人。蒋介石又不理解他，于是一气之下就坚决辞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蒋介石拗不过他，就说：“你不干可以，但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吧！”

戴季陶眨了一下眼睛说：“谁干都可以。”说完又觉得不妥，马上补充说：“你要记住，千万不能让共产党员来当政治部主任。否则，国民党非垮台不可。”

蒋介石听后不动声色地微微笑了一下。戴季陶不放心的说：“你若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就让我的副手邵元冲来接吧。”

蒋介石真的采纳了戴季陶的意见，让邵元冲暂时代理政治部主任职务。

邵元冲是个封建意识很浓的官僚，他虽然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却根本不懂得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邵元冲真的把政治部主任当官做，他住在广州，每周来军校一两趟，看看文件，有课就上，无课就走，他本来口才就不好，又不认真备课，只是干巴巴地照本宣科。只要他上课，学生就趴在桌子上打呼噜睡觉，被学生们戏称“催眠教官”。邵元冲既不与学生接触也不和

其它教官来往。他和廖仲恺、蒋介石也没有几句话好说，和苏联顾问加伦的关系就更僵了。邵元冲干了一两个月，把个政治部搞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军校学员都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

廖仲恺找到蒋介石说：“邵先生实在不能胜任政治部的工作啊！”

蒋介石摇摇头生气地说：“没想到邵公如此无能！”

沉默了片刻，蒋介石想到邵元冲要陪孙中山北上，便说：“邵公要随孙先生北上，这是撤换他的好机会。”

廖仲恺说：“我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商量过，可否在中共政治教官中选一个人来担任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一听，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蒋介石想到此便马上说：“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官周恩来，听说颇受学员欢迎。许多人反映周恩来讲课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听他的课，学生课堂气氛特别活跃。”

廖仲恺也插嘴说：“对。我也听说他人缘特别好，不管是中共学员还是国民党学员，他都能团结在自己身边。”

蒋介石说：“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曾向我介绍过，说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就是学生领袖，担任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在华工和留法学生中经常演说，活动能力很强。”

廖仲恺说：“我们再和加伦将军商量一下，他若没有意见就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初由法国回国的。他到达广州后住在彭湃在贤思街的住所，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

围不只是广东一省，还要负责厦门、香港、广西等地的党的工作。所以当时又称两广区委。与此同时，经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

十一月初，由于邵元冲陪孙中山先生北上，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职务。

三、军队政工制度的奠基者

黄埔军校最初的政治部机构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副主任及几个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担子无疑是沉重的，但二十六岁的周恩来经过四年的旅欧学习与实际锻炼，这时他已是对马列主义有深刻研究的共产主义战士，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革命者了，当他接受这一任命时，他表示他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

在周恩来正式就任政治部主任之前，他曾找到苏联顾问团的鲍罗廷询问蒋介石的有关情况。鲍罗廷身高六英尺有余，身材魁梧，腰板结实，蓄着八字胡，气色很好。他礼貌地把周恩来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这时他那年轻漂亮的美国妻子端上了两杯咖啡，一杯递给周恩来，一杯留给了鲍罗廷。鲍罗廷猛地吸了几口烟斗，烟斗里的烟丝吱吱直响，然后长长地喷出一口白烟，他眯着眼睛慢慢地说：“Mr. 周，您很有才华，在法国搞学生运动、华工运动很有办法，文章也写得漂亮，口才又好，干政治部主任绝没有问题。蒋介石也很器重您，不过您要注意和他搞好关系，注意国共两党的合作，不要制造摩擦，吵吵嚷嚷。”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搞革命没有革命的军队不成，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革

命也不会取得胜利。”周恩来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评胡适的“努力”》这篇文章中就写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所以，周恩来归国不久，经中央同意，广东区委批准就到黄埔军校兼职政治教官，现在又愉快地接任政治部主任。

鲍罗廷听了周恩来的议论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吱吱地叼着烟斗抽烟。当周恩来告别出来时，他只是慢吞吞地说：“不要太性急。”

周恩来从鲍罗廷的住处出来，想起前天刚刚向孙中山大元帅汇报请示成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事。那天上午，周恩来按广东区委的指示，与几位区委领导一起来到元帅府，直接向孙中山请示建立“铁甲车队”事宜。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筹备情况和“车队”建制等问题。最后周恩来说：“如果大元帅府有一支直接控制的铁甲车队，像十月十日发生的商团叛乱，平息就十分容易，反动分子对革命政权也不敢轻举妄动。”孙中山听完周恩来的请示汇报，沉默了一会，说：“可以。车队的全称应该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我很快就要北上，筹建铁甲车队的事，经费可找廖仲恺，人员可找蒋介石解决。他们都是我党最忠诚、最有觉悟的党员。”

周恩来听孙中山谈到北上，就把广东区委的意见和自己心里的话和盘托出：“我们广东区委，我们共产党支持大元帅北上。我们相信大元帅到了北京，定能将革命推向北方发展，使国民革命运动扩大到全国。”这年十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曹锟，通电欢迎孙中山总理北上。当时有许多人反对孙中山北上，担心孙中山离开广州会削弱南方的革命力量，给反动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历史证明孙中山北上是正确的。

孙中山听了周恩来的话，心里十分高兴地说：“我北上的决心已定。大家知道我去北京会有危险，但为了南北统一，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冒险去北京，促进召开国民会议是值得的。你们都是爱国青年，应该做我的坚强后盾。”

周恩来和其它区委领导站起来频频点头，向孙中山握手告别。

周恩来接到任命书当天晚上就去拜会廖仲恺。一进门碰到廖承志，这年他才十六岁，正在读书，长得胖乎乎的，父母都昵称他“肥仔”。廖承志站在父亲背后仔细打量进来的客人：只见他身穿笔挺的白色布西服，足登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浓浓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两唇紧闭，嘴角微微上翘，脸上总挂着笑意；他身材匀称，站得笔直，刚毅中透着儒雅，既像威武的战将，又似渊博的学者。廖承志悄声问爸爸：“这是谁？”

廖仲恺爽朗地哈哈大笑：“你怎么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先生，军校新任政治部主任。”廖梦醒听见“周恩来”三个字也忙从屋里跑出来迎接，兄妹俩忙点头示敬说：“欢迎周主任，请进，请进。”周恩来忙上前拉住他们的手说：“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不要称主任，就喊阿哥吧。”廖梦醒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看着爸爸，不知称呼什么好。廖仲恺笑吟吟地说：“他让你们喊什么，就喊什么吧！”

廖承志非常机灵，拉着姐姐的手说：“周阿哥，您和爸爸谈话吧。我俩出去玩会，再见。”

周恩来把手一扬说：“小廖，再见。”从此，周恩来总是称廖承志为“小廖”，直到廖承志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个称呼也从未改变过。

周恩来和廖仲恺畅快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廖仲恺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放手大胆地去干吧，不要有所

顾虑。”

第二天，周恩来穿着崭新的军官制服，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脚穿乌黑锃亮的高筒皮靴，精神抖擞地来到政治部办公室，政治部的军官和士兵都站起来向他敬礼。周恩来还礼后，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然后和大家一起研究政治部的工作。

周恩来上任后，没几天就以突出的才华和惊人的工作效率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明确各股的职责范围、任务，制定了工作细则。从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

没过几天，政治部就出版了《士兵之友》油印小报。小报每天一期，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政治问答”、“问题讨论”等栏目深受士兵和学员的欢迎。诸如“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军人为什么守纪律？”等等问题的解答与讨论都说到士兵的心坎里了。

政治部为了加强学员的思想教育，每周组织一两次对学生的政治演讲会，或由本校教官讲，或请知名的活动家讲。集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即为什么要革命，怎样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二是进行卫国救民，加强军民关系的教育。邓演达、恽代英、肖楚女等人都作过讲演。

政治部还在军校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并且定期购买大批进步书报、刊物发到各班排，供士兵和学员阅读、学习。

政治部还制定了各种调查表和统计表，定期检查学员读了那些书报，有什么心得体会，有什么疑难问题，统计各连队的学习成绩，出勤情况，并定期公布。军校学员的精神面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大大改观。

这时的周恩来把满腔的政治热情化作一团烈火，把周围所有人的激情都点燃起来，带动起来。大家群情振奋，积极向上。

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加强了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他选拔了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到各连当国民党的党代表。他亲自为教导团制定了政治训练计划。经过周恩来的整顿，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①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又着手筹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联合会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地联系广州军事学校已毕业和未毕业的青年军人，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阵线，为革命积蓄力量。当时广州除黄埔军官学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等。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号召年轻的军人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拯救苦难的中国。大会发表了宣言，革命军人“为救国救民救自己计”，联合工、农、学、商各界民众，“拥护全民的利益及幸福”。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是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后来加入联合会的还有铁甲车队和海军三舰的军人，到一九二五年四月时，会员达两千多人。联合会由共

① 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

产党员蒋先云负责领导，并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团结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解散。

四、一见如故

一九二三年底，张治中应桂军伍肖岩的邀请到了广州，并协助他建立桂军军官学校。

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时，蒋介石又聘张治中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希望他正式在黄埔军校工作。但张治中觉得自己到广州来是伍肖岩邀请的，没有工作几天就转到黄埔军校，在面子上对不住伍肖岩。一九二五年一月初，张治中结束了桂军军官学校的任职，才正式转入黄埔军校，任第三期入伍生队总队副。一九二五年二月，革命军东征时，张治中代理总队长职务，因为总队长王懋功要东征讨陈。这时张治中还兼任第二师参谋长和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他一到黄埔军校，军衔就定为上校，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器重张治中？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张治中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蒋介石也毕业于保定军校。二人是同校同学。蒋介石一生只重用“三缘”人物，即“学缘”、“血缘”、“地缘”。其它人在蒋介石眼中都是“杂牌”，或排斥，或不重用，或用而不信；二是蒋介石从保定军校毕业生中得知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当时与张治中关系极好的王懋功、陆福廷都在黄埔任职；三是廖仲恺同时也兼任桂军军官学校党代表，他就很欣赏张治中的才干。但考虑到桂军军官学

校也需要优秀军官管理，没有同意张治中立即转入黄埔军校，只聘其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但张治中积极参加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会议，献计献策，发表许多创造性意见，很得蒋介石的赏识。

黄埔军校成立初期的军事教官，有一批来自保定军校毕业生，这些人和张治中是前后校友。曾有人做过统计，一九二六年前任职的六十六名军事教官中，有二十一人来自保定军校。另外，军校的政治教官中多为中共党员，这些人又多在上海大学工作过或学习过。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间，张治中与夫人、孩子闲居上海时，在上海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的新型学校，于右任当校长，设中文、外文、社会系等。社会系的主任就是中共著名理论家、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上海大学实际上是为国家培养干部的摇篮。当年许多名声赫赫的共产党人，诸如邓中夏、肖楚女、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等都曾在这所大学先后工作过，张治中就是在这里学习时，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朋友，他与这些共产党员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友谊，接受了新思潮，受到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一月初，张治中正式到黄埔军校任职，环境是新的，但许多人并不生疏。

有天早晨，军校学员操练完毕，张治中对第三期入伍生训话说：“平时训练就是培养组织性、纪律性和吃苦的精神。平时训练不怕苦，战场上才不怕死。平时连一点苦都吃不消，在战场上怎么能为国捐躯。”张治中发现学员队伍旁边有一年轻军官穿着整齐的军装，始终两腿并拢立正，目不转睛地听他训话，其专注精神超过了所有学员。张治中训完话，解散了队伍便向这位军官走过来。这位年轻的军官也大步向他迎过来，举手敬礼，然后伸出手

来紧紧握着张治中的右手自我介绍说：“您好，张先生。我是周恩来。”张治中听完介绍，心中惊喜，他紧握着周恩来的右手说：“久闻大名，我一到学校就想拜会您，向您讨教政治教育的经验。”

周恩来说：“您太谦虚了，您的经验比我多，我应该向您好好学习。”两个人边说边朝餐厅走去。周恩来又说：“刚才您对学员讲的吃苦精神很好。自己没有受过严格地训练，没有吃过苦，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有经验、有教养的军官仅仅在课堂里是培养不出来的。”

张治中停住脚步，沉思了片刻说：“周主任，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让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终生不要忘记。青年人只有尝尽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张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许多年轻军官就缺少这方面的教育。”周恩来说着就走到餐厅门口，他把右手一伸对张治中说：“请。”张治中忙说：“您请。”边说着边推着周恩来进了餐厅。

周恩来说：“您比我长八岁，是我的老大哥，对小弟今后不要这么客气。”说完两个人同时爽朗的大笑起来，笑得其它军官都莫名其妙。

多年后，张治中把慈母的这句遗教，请于右任先生写了一块横匾，挂在他安徽故里坟庄的墙壁上，作为永久的纪念。张治中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慈亲的遗训，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①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8页。

自此，周恩来与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来往甚密。张治中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①

有天晚上，张治中到周恩来的寝室聊天。谈到蒋介石的用人原则，张治中说：“蒋介石先生对浙江籍的同僚特别注重。周主任的故土哪里？”

周恩来笑笑说：“我的家在江苏淮安，祖上是浙江绍兴。张先生祖籍哪里？”

张治中说：“我的家乡是安徽巢县。据祖上先人讲，大概是明朝末期从江西迁移到巢县，落户在西乡。当时是四大房姓张的，张家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我们是四大房的长房，靠着黄山山脉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叫做‘靠山张’。我家这一支后来又移到一个叫洪家疃的村子。”

张治中热爱自己的家乡。他经常向朋友夸耀自己的家乡美。当周恩来问起他的故里时，就又勾起他思念家乡的情愫。

张治中的故乡洪家疃离县城九十里，又叫“清水塘洪”。这是因为村子旁边有口大塘，塘的旁边是多数姓洪的聚族而居。这口塘的水终年是清的，除非久旱，水才减少乃至枯竭；平时满塘碧清的水明镜一般。张治中认为家乡的池塘比杭州西湖玉泉寺的池塘大多了，但水是一样碧清可爱。洪家疃在黄山南麓。这里的黄山不是皖南那天下驰名的黄山。但在张治中的嘴里或笔下从不称其为“小黄山”，因为他认为家乡的黄山与皖南的黄山一样美，一样招人喜爱。张治中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家乡的黄山的：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63页。

这山上常有云彩飘荡着，尽管它不很高，林木不很葱郁，却经常地保持一种碧清色和淡白色，不像一般山的黄赤色。它的品格，由它的姿态、色调表现出来，最端正，最淡雅，最秀丽。看了这山，使人产生和平、冲淡等柔美的感觉。李白的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敬亭山在安徽宣城，也不高，却很秀；我们村子的屏障者——黄山，不但不会令人看厌，而且使你越看越爱。

环洪家疃侧面皆山，黄山是群山的主峰。黄山像一只凤凰，张开美丽的两翼，让百鸟和鸣而飞舞；又像一位老人，端坐华贵的广庭，让儿孙绕膝而团拜。它的左翼是“靠山张”，右翼是“山尾洪”，两翼相距不到五里，像一座玉屏风，屹立在我村的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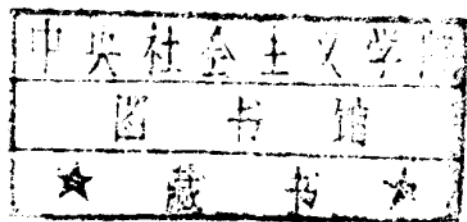
登黄山，望巢湖，那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巢湖，波澜壮阔的巢湖，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水，点缀着风帆沙鸟，站在山巅，浩荡的天风，可以开拓你的心怀，恢弘你的壮志，激荡你的豪情。你可以尽你的目力远望环湖及湖心的山。姥山上那一座我们叫做“锥子”的尖塔也可以看得清楚。固然，从我们村子附近的岗上向南望，也可以望见巢湖，然而总没有像站在黄山山顶远望的壮观和气魄。^①

张治中为自己的家乡美所陶醉，周恩来为张治中的叙述而神往，动情地说：“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洪家疃看看。”

这时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喊：“报告！”周恩来忙说：“请进。”

进来的是位传令兵，他立正敬礼后说：“报告周主任，蒋校长请您明天到他的办公室议事。”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1—2页



周恩来说：“好。”传令兵又举手敬礼，转身走出寝室。

周恩来看张治中说：“蒋校长不知有何新指示？”

张治中思忖了一下说：“您出任政治部主任以来，整个军校充满了团结、紧张、革命热情高涨的气氛，每个学员和士兵都有一种快乐、活泼、积极向上的精神。我来的时间不长，每天黎明即起，把学生带出去跑步、操练，一天到晚忙不完，尽管累一些，但心里痛快。我的感受恐怕也是大家的感受。我想蒋校长对您的工作也会满意的。至于新的指示，我估计不外是讨伐陈炯明。”

张治中告辞之后，周恩来又翻了近日的报纸和文件，对广东和全国的形势思考了一番之后才上床休息。

五、“东征”与“平叛”

这天凌晨，起床号没有吹响之前周恩来就醒了。他昨夜看了最近的文件和剪报，大量消息报道表明，国民革命的死敌陈炯明，自认为孙中山北上在北京卧病不起，广州政府群龙无首；革命军谭延闿所率湘军、朱培德所率滇军刚在江西吃了败仗；而广州的滇桂联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陈炯明认为这正是他篡夺革命政权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又收编了东江一带的土匪，号称拥兵十万，自封“救粤军总司令”。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下午下令反攻广州，向虎门要塞偷偷袭来。这时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暗中支持陈炯明的反革命行动。

广州革命政府于一月十五日就决定讨伐陈炯明，并发布东征命令。由粤、桂、滇、湘、鄂、豫各军组成东征联军。联军分左、中、右三路作战。黄埔军校随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参加作战。

蒋介石接到这个命令后，即召集部分军校教官研究东征计划，

并让张治中起草一个“作战方案”。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东征总指挥。

张治中很快拿出“作战方案”，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研讨后呈报蒋介石。蒋介石审阅后十分满意，只改了一个字，把某处的“死”守，改为“坚”守，张治中向周恩来谈起此事颇为高兴和得意。自此，蒋介石更加赏识张治中的才华。

上午，周恩来准时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与陈洁如的新居在一起。这是刚修葺一新的老楼，只有两层，两翼颇长，作为讲堂和办公室用。营房在这座楼的后面。蒋介石的居室在正楼的二楼，从窗户可俯视通往军校大门的庭院。居室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位于右侧的大会议室；一部分是左侧的起居室。起居室又分卧室、书房和餐厅。两部分中间有门相通。

大会议室窗明几净，宽敞通风。周恩来刚迈进会议室的门槛，蒋介石就从他的起居室走进来。会议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和二十四把高背硬椅。正面墙上交叉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挂有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图上插着绿、红、蓝色小旗，表示敌我双方军队的位置和重要阵地、关卡。蒋介石礼貌地把右手一伸说：“请坐。”两个人分别坐在长桌的两边。蒋介石右手伸进口袋摸出一个小的精致笔记本，习惯地翻了几页，看了几眼便说：“恩来先生，我和廖仲恺兄等研究决定，请你以政治部主任身分负责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东江的敌情和友军的态势、状况你是清楚的，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找你想商量的就是黄埔校军东征誓师的有关事宜。”

周恩来心想果然不出所料。中共广东区委对此早就有所准备。在周恩来赴上海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考虑到他要随军东征，就安排他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主要任务

是领导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由周恩来负责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愉快地答应下来。两个人又谈了一些其它的事情周恩来便告辞出来。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上午，蒋介石在军校举行东征军总指挥就职仪式，在会上对各处及教导团、入伍生队官长讲了讨伐陈炯明的意义。

黄埔军校入伍生在正式入校前要接受三至四个月的入伍教育，入伍教育结业后才能加入校军教导团。因为入伍生不参加东征，张治中就留下来代理总队长职务、负责第三期入伍生一千二百余人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散会后，周恩来与张治中并肩漫步在操场上，周恩来说：“文白兄，您留在学校担子更重了，带好一千多人的军纪、风纪，严格管理好这些人的生活，很不易。”

张治中谨慎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做，请周主任放心。”

周恩来说：“黄埔岛尽管四面环水，但它并没有和社会隔绝。这一带很复杂，风气也不好。要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学生不得随便外出，更不得在外过夜，严禁嫖娼、赌博、吸鸦片的事情发生。蒋校长对此向来注意。”

张治中说：“我一定对各大队、中队的队长严加管束，责其带好学生兵。”

一月三十一日，黄埔军校两教导团官兵及入伍生队、学生队全体集合在大操场，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蒋介石发布命令：“本校全部决定于二月三日在虎门寨附近集结，待命出发。”

出发前政治部领导的“血花剧社”在大操场演出新编剧《革命军》。演员的演技技巧虽差，但感情真挚，战士、学员都认真专

心地看。看完演出之后，许多战士情不自禁地喊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有的学员还反复念着剧中的台词：“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蒋介石看了演出也十分高兴，他把所有演员召集到一起大加赞赏，表扬了演员之后，又扭头对周恩来说：“周主任真是个导演人才！这出戏编得好，演得也好。我看血花剧社的牌子可以打出去，将来有机会可到广州去演，到武汉、上海去演，到东征所到之处去演。”蒋介石越说越高兴，周恩来趁机说：“政治部还准备成立一支宣传队，随军出征，一路宣传党军口号和政策。”

蒋介石满意地说：“好啊。你们要把所有的宣传手段运用起来，使我们革命军的宗旨家喻户晓，把陈炯明彻底孤立起来。”

二月三日，周恩来率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军东征。蒋介石命令各部官长严束所部：“如遇有不肖士兵在外骚扰情事，除将该犯兵带部惩罚外，各该主管官长亦不得辞其咎。”^① 政治部也颁布了严明的纪律：不强拉夫役，不得用军用票购物等。黄埔校军从学校出发，是乘船分批运到虎门附近集结。二月四日，蒋介石视察虎门寨东驻守炮队，并下诫勉将士令：“国家存亡，主义成败，在此一举，望各将士万众一命，协力同心，奋勇前进，歼灭叛逆，以副我大元帅之期望。”^②

军校校军与粤军联合作战，当日攻克东莞，革命军士气大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到处贴标语，撒传单，到人群中讲演，很快得到群众的支持。老百姓看到东征军队从蒋介石到士兵，脖子上都系着鲜艳的红巾，胸前所佩符号背面都印着“爱国家，爱人民，不

①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78页。

②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78页。

贪财，不怕死”的誓言。战斗间隙，战士们高唱《爱民歌》：“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

由于军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所到之处，群众很快就把东征军看成是人民自己的队伍。部队转移时，过河，老百姓找来木船；夜间行军，老百姓把竹子扎成火把用桐油点着送给战士。沿路群众烧好开水，煮了番薯摆在路边供战士食用。战士即使只吃一个番薯也要留下一两个铜板，军民成了一家人。

二月二十七日，东征军攻克海丰。二十八日，周恩来率政治部工作人员进驻海丰，领导并重建了海丰县的共青团组织，推荐了海丰县的县长，并与彭湃研究组建中共海丰党组织。

二月底，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并授权他在东征军收复的地区着手组织国民党党部。

三月份，东征军攻克揭阳、潮安、汕头、兴宁、梅县等地。这期间，孙中山积劳成疾，不幸早逝，霎时，举国上下同悲。三月三十日，黄埔校军在兴宁城北门外，举行隆重的追悼孙中山及阵亡将士大会。会场庄严肃穆挽联上写着：“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横额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挽阵亡将士联是：“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世尽惊。”蒋介石主祭，宣读了孙中山的遗嘱，然后周恩来宣读《祭总理文》。

四月上旬，周恩来被任命为军法处处长。

正当东征军节节胜利，五月末，按兵不动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在广州叛乱。六月四日，滇桂军占领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等机关，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多跑到黄埔岛上避难。国民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

六月十二日，周恩来率东征军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立即向

叛军发起攻击。周恩来同时指示留守在广州的铁甲车队配合作战，攻击城内的叛军。留在黄埔军校内上课训练的第三期入伍生，也按照指示由张治中指挥加入了平叛战斗。

张治中所率第三期入伍生团的任务是渡过珠江，从背后偷袭滇军杨希闵部。三期入伍生团在张治中的带领下，经过半年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张治中对自己的指挥才能也有信心。他回忆说：“我自信对于作战也有相当的经验，但是带一团人，要渡过很宽的江，在敌前登陆，却是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①

第三期入伍生，尽管没有实战经验，但经过张治中和其他军官的半年教育和训练，都非常勇敢。滇军杨希闵委任他的师长赵成梁为前敌总指挥，司令部就设在广九铁路的石牌车站。六月十一日拂晓，张治中率入伍生团从黄埔上游的猎德炮台附近偷渡成功。渡江时，学生军异常勇猛。宋希濂回忆：“入伍生学生总队第一队少校队长王声聪在渡江攻击时，亲持手枪立于船头，行将登陆之际，被敌军击中，英勇牺牲”。^②

入伍生团仅有一门山炮，他们首先向石牌火车站轰击，当时并不知道是敌人的司令部。一炮击中车站，没想到炸死了滇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和几个参谋。滇军没想到后路被抄，司令阵亡，群魔无首，阵地大乱。军校入伍生团在张治中指挥下穷追不舍，配合东征军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六月十五日，杨希闵、刘震寰两支叛军，在东征军和黄埔军校入伍生团的夹击下，被迫缴械投降。广州政府转危为安。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4页。

^② 宋希濂：《鹰犬将军》，第39页。

六、“红色教官”

七月一日，第三期入伍生毕业并升入军校。这天举行了开学典礼。蒋介石和周恩来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革命军人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指出遵守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希望大家“虚心求学”，“努力研究主义”，并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①

第三期入伍生升入军校后，张治中继续担任第四期入伍生团一团团长，并兼航空学校校长、党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几个月里，张治中“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往来广州与黄埔，忙到连午饭、晚饭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吃，常常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记起吃晚饭”。^②直到一九二六年初，张治中才辞掉各项兼职，回到黄埔专任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之职。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从筹建时起，两党就有斗争；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两党在军校内部的斗争就更为激烈。

国民党内部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代表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国民党内派代表是蒋介石，担任军校校长；右派代表是戴季陶，建校初担任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十几年后写文章回顾这段历史说：“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八九——一九四九），第78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57页。

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①周恩来还说：“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②

毛泽东同志曾说，蒋介石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此时羽毛未丰，他既不站在右派的立场上露骨地反对共产党，也不站在共产党一边批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一开始就明白，只有办好黄埔军校才可以牢牢抓住未来的军权，有了军权也就抓住了国民党的党权，继而也就控制了国民政府的政权。因此，蒋介石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手段，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从担任校长之日起，蒋介石就把军校视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于是蒋介石就以军校为根据地，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张治中，除了他曾是保定军校毕业外，还看中他有才华，勇猛善战。张治中则对蒋介石无限忠诚。因为张治中从军校毕业后，经过七八年的奔波，始终不得志，只有到了黄埔军校后才步步高升，脱颖而出。张治中对蒋介石的忠心效力是出自传统的知恩图报的朴实情感，“士为知己者死”。蒋介石看到张治中对其忠心不二，更是越发信任、重用。两者互为因果，张治中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从黄埔军校就这样奠定了。从此，张治中便开始忠心耿耿地服务于国民党。

在黄埔军校，张治中除了与蒋介石等人关系好之外，他还与中共党员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人关系极为密切；与左派邓演达的友谊也非常人相比。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页。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首先是在政治素养、革命品德方面。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政策，对他联共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国共两党斗争了几十年，张治中始终对中共采取温和的、友好的态度，和这时他对中共的了解不无关系。周恩来的学识渊博，风度文雅，对张治中也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时两个人结成的友谊，终其一生都未改变。

在周恩来与张治中的深厚友谊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蒋介石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很注意团结、拉拢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才，为自己实现其政治野心积蓄力量。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认为：“凡是同蒋介石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他都设法拉拢。他对周恩来非常礼貌，他同周恩来认同乡，他要邵力子、张文白多接近周恩来”。^① 后来国共两党不断起摩擦，闹矛盾，两党关系时好时坏，蒋介石很需要张治中在国共两党间起一个缓冲作用，以及沟通信息的媒介作用。张治中与中共的关系、与周恩来的友谊，对蒋介石的政治需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蒋介石对张治中与周恩来的友谊，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的态度。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成立。这是左派军人的组织。于是蒋介石就鼓动戴季陶在军校大讲“孙文主义”，贩卖他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的反动思想。戴季陶表面声称继承、发扬了孙中山的学说，实际上是把孙中山学说中的革命精髓全部抽空，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在戴季陶的鼓吹、煽动下，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233页。

“孙文主义学会”。这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牵制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成立的反动组织。其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等人。

当时黄埔军校左右两派的斗争，国共两党的矛盾摩擦都是通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的。两个组织经常请外边的名人来校做报告。军人联合会多请共产党人来讲革命学说，如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人；孙文主义学会则请戴季陶、邵元冲、胡汉民、张继等来校演讲。左派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演出革命戏剧，揭露北洋军阀；右派学生则组织了“白花剧社”。有时两个剧社同时在操场上演戏，互相攻击。由于国民党右派不断挑衅和进行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以至由辩论发展到破口对骂，甚至撕扭对打之事时有发生，从校内发展到校外，事情越演越烈。

一九二五年春夏之交，戴季陶、沈定一到黄埔军校召开座谈会，发表反动言论，攻击共产党，遭到左派学员的质问、围攻。戴季陶被质问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脱身不得。这时张治中出来解围，左说右劝把左派学生劝走，右派学生支开。戴季陶对张治中千恩万谢，夹着皮包灰溜溜地走了。张治中对此回忆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它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到过他们对我有任何的抨击了。”^①

当时，张治中认为，国民革命刚开始，黄埔军校从教官到学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64页。

员，一切言行都应以三大政策为准绳，摩擦、斗争都与孙中山的教导不符。左右两派的斗争，张治中从原则上是不同意的，从感情上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张治中回忆说：“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①张治中希望两派都不得罪，结果两派对他都不满意。右派看不惯他对中共的态度，视其为“红色教官”，左派则不满意他和稀泥，指责他对右派太温情。处于左右两派尖锐斗争之中，张治中的心情也极为不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形势的发展，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到一九二五年夏天，张治中由中间偏左发展到完全同情共产党，甚至站在共产党这边。这时的张治中思想左倾，言行也越来越激烈，以至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和怀疑。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在汕头曾问王懋功：“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员？”

张治中这时并未加入中共，但他正在考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申请加入中共

国民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是允许的，跨党是常见的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蒋介石在潮州行营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职员以及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时曾提出：“军校内国民党员如有愿加入共产党者，须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②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64页。

②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100页。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张治中被选为军校党部的执行委员。张治中回忆说：“党部的执委，是由两派事先协商的；我之当选，乃是中共方面所提出。中共对我这时已有了解了。”^①张治中此时的心情是兴奋的，一是为当上党部执委高兴；二是为自己被中共所了解高兴。

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春，张治中更加靠拢中国共产党，他的言论和态度都为国民党右派所看不惯，背后攻击他为“赤色分子”、“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后来又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喊作“黄埔四凶”。就在这时，张治中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有天散了会，张治中和周恩来一起步出会议室，并肩漫步在校园里。张治中抬头看了看西落的太阳和满天的彩云，心里特别兴奋地对周恩来说：“周先生，我很想加入贵党，不知我够不够条件？”周恩来站下来兴奋地说：“我当然欢迎您加入中共。不过，我得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您答复。这事不是由我个人说了算的。”

这时张治中郑重提出加入中共，从他的出身与经历是可以理解的。张治中对共产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理论也知之不多。他对中共和党员有好感、同情，并愿加入中共和他们一起工作，大多基于个人感情与感性认识，并不意味着他已具备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张治中在与共产党人接触中，只是觉得共产党人可敬、可亲、可信、可爱。此时，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密切的。

张治中出身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他在《六十岁总结》中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5页。

说：“我生长在贫苦的农工家庭里。我的祖父是农人，一个半自耕农，幼时念过书，喜欢看小说，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封神榜》。勤苦一生，活到八十三岁。我的父亲是篾匠——手工业者，也念过书，会记账。他的手工是竹器工作。拿竹子破开削成篾片，编造各种农具或用具，如稻箩、菜篮、挑东西的扁担、扒草的扒子、凉床、筷箸等等。他在安徽合肥县所属丰乐镇开了一个篾器店，除了自己工作外，也曾雇用几个长工。他的收入，也很难维持一家生活，经常要借债度日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女儿，没读过书；自小身体不大好，还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炎，常常咳嗽哮喘，很痛苦的。她养了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他们俩也是过了一辈子穷苦的日子。由于生活的煎熬，母亲四十九岁上死了，父亲也只活到五十五岁。”^①

张治中的经历又是怎样呢？他在《六十岁总结》中曾简要地叙述过。他从六岁开始就在私塾读书，整整读了十年线装书。老师们认为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颇堪造就。他的父母，虽然生活困难，但抱着望子成龙的思想，也竭尽全力支持他的学业。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回忆：夜静更深，我还没有放学，我的母亲不放心，体念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一个清瘦的小孩子。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从壁缝里、门缝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等我放学出门时，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慈母之泪，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另一件难忘的事是“有一次我被罚不吃饭，我的可敬可怜的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受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心里更发难过，她买了两个‘粑粑’偷偷地送给我吃。我到底是一个小孩子，回

^①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88页。

家时，我哭了，母亲又以慈爱的心情来安慰我。”^①

张治中到老都怀念慈爱、忠厚的母亲对他的培养和教育。他说：“母亲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譬如我今天有一点成就，最初的一步是由于当年不安于丰乐河学徒生活而毅然出走，到安庆考陆军小学。按当时的环境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要迈开这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首先我的父亲就不赞同，只有我的母亲，仁慈的母亲，她独立地赞助我，密切地注意儿子的前途。她费尽心力，七拼八凑给我筹了二十四元的旅费，鼓励我求学，远行。她常看着儿子的大处远处，教戒我，提掖我。”^②

张治中在丰乐河镇上的杂货店当学徒时，每天都要早起洒扫，收拾店铺，抹擦桌子，洗茶杯，泡茶照应顾客，除了没给老板、管事铺床、倒便壶外，他什么活都干过。他认为“学生意，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不是他的理想出路。凭空放弃做生意的生活，这在一般人眼里有点奇怪，首先父亲就反对。只有母亲关心他的生活，更关心他的前途。张治中说，“同情我的、了解我的、赞助我的，只有我的母亲”。“如今既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儿子见到了，怎好轻易放过。她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东拼西凑，替她的儿子凑了二十四元做盘费，到安庆省城去投考。这是毕生难忘的二十四元，这不是钱，是母爱，伟大的光辉的慈母之爱。”^③

到安庆考“陆军小学”，因为名额限制，巢县仅录取一名，被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人占了。于是，他开始了六年的流浪生活，先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9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7页。

③ 《张治中回忆录》，第15页。

是在唐公馆作陪读，后又到了扬州等地，当了缉私候补兵、预备警察、正式警察，艰苦备尝。

张治中在扬州十二圩当“候补兵”的生活是极可怜的。“首先是‘住’的问题。名义上是住在营内。而实际上没有一定的铺位，遇着哪一个铺位有空，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叫你睡不成了。我记得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到处找地方睡，清早又抱起这床被离开这地方。”“睡觉的问题虽艰苦，还不要自己贴钱。备补兵根本没有饷，不像正额兵每月有四两二钱银子。”“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伙食圈子’。我哪里去找钱呢？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当铺。十五里外的仪征县城的‘当铺’是我这个穷备补兵的‘银行’。为着维持‘食’的需要，最初是当衣服，当其他零碎东西，后来当光了，没有东西可当，就当汗褂子。有一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才当了四毛钱，维持那无情‘伙食圈子’。”^①

张治中在扬州当警察时，生活比当“候补兵”好些，因为这时不发愁吃饭了，而且还有点饷钱。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就到上海参加了学生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陆军部入伍生团。南北统一后，又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毕业后先分配到安徽“安武军”里见习，后又离开安徽到广东，在川粤之间奔波了八年之久，在云南护国军、四川护国军、靖国桂军当过连长、营长、参谋、旅参谋长、师参谋长等职。这是张治中参加黄埔军校前的主要经历。

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还谈了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他在流浪生涯和军校生活中，“从报章上、从新书里，开始知道了世界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17页。

的大势和中国的危机。譬如这时看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看到了他的维新言论和他与革命派的政见论战，不禁由忧国的心意发展为爱国的观念，由爱国的观念发展为英雄的思想。进了军校以后，更喜读中外英雄传记，更喜论国家大事，更喜谈个人志趣和抱负。常常羡慕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远征西域的班超、张骞。”^①张治中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思想起了很大的波动，他“一方面看到北洋军阀的飞扬跋扈，贪污腐败；另方面看到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喧宾夺主、气势凌人。这时候，心头觉得特别沉重。如何打倒北洋军阀，如何打倒帝国主义，是我脑子里经常在打转的问题。这是我思想演变里的一个重要关键，我的思想已日益演进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思想了。”^②

一九二四年后，张治中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工作，和众多的共产党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尼拉女士也来往密切。由于受到这些同志的影响，尽管张治中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但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拯救中国却是一致的。因此，他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毫不奇怪了。

当苏联顾问尼拉女士听说张治中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高兴地对他说：“以后我们不但是朋友，更是同志了。”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特意找到张治中，先问了他的身体和工作状况，最后才和蔼、亲切、严肃地说：“文白兄，我们中共非常欢迎您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您入党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

①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93—94页。

②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94页。

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①

张治中回忆说：“这时期我的思想虽然左倾，而阶级斗争的意识还是很模糊。这大概是因为我虽有着革命的热情，还缺少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和理解。至于中共的朋友们当时是否还有其它的原因要考虑，我自然是不得而知的。”^②

八、张治中婚宴“发难”

童小鹏同志在《风雨四十年》一书中有段回忆：一九六〇年，有一次周恩来和张治中同机飞广州。张治中浮想联翩，想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周恩来在一起的一些往事。尽管过了三十五年，有些事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张治中忽然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三十五年前您和颖超在广州结婚，是在太平餐室举行的结婚仪式。这次来广州，您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恩来听了会心地笑了笑说：“好呵，好呵。”后来周恩来在繁忙的公务中果然抽时间请张治中和一些当年的老朋友在“太平餐室聚会了一次，吃的是当年结婚时吃的烤乳鸽。”^③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一九二三年春天，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员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觉邮》第二

①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95页。

②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95页。

③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134页。

期上又发表了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言》。

周恩来旅欧四年中，收到邓颖超的信最多。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张若名、马骏、郭隆真等学生领袖，组织了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学生运动，上街演讲、游行、演现代文明戏等等。

这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学习北京的经验，把两个群众组织合并起来，挑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了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并出版不定期会刊——《觉悟》。在这些革命活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纪念大会。会后群众又拥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没料到游行队伍遭到保安队和警察的拦阻、殴打。游行群众有十一人受重伤，邓颖超被打得吐了血。于是游行队伍直逼警察厅，大家推举周恩来等四人为代表，向警方提出质问。十月十三日，天津市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停课宣言》。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学联在商店检查日货、抵制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立即激起群众公愤，推举代表向省公署请愿。军警又殴打学生，并逮捕了各界代表马骏、马千里等二十多人。一月二十九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他们又遭到军警的殴打，周恩来等二十多人被捕入狱。四月五日，入狱两个多月的周恩来等人，既不被“审讯”，又不释放。于是邓颖超等二十四人到警察厅要求代替被捕的二十四位代表坐牢。经过斗争，七月十七日周恩来等人被释放出来。

周恩来出狱后，他和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活动更加频繁、活

跃，由天津发展到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群众社团联合举行活动。同时周恩来也在积极地准备赴欧洲勤工俭学。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前去欧洲求学。这时周恩来与邓颖超由朝夕相处变得相距万里，只有靠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认识和学习心得。周恩来闲下来时脑海里总浮现出邓颖超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的那样热情、勇敢、坚韧不拔的影子，他读着邓颖超的信，就好像感觉到邓颖超就在自己面前倾吐心声。人虽然相隔万里之遥，两颗心却觉得挨得很近。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两个人就这样靠鸿雁传书确定了爱情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自一九二〇年分别后，近四年没有见面，思念之情不言而喻。周恩来在离开巴黎前就写信告诉邓颖超他要回国工作，连着写了两封信均无回音。周恩来到了广州之后立即又往天津发了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周恩来感到非常奇怪。过去每发出一封信，不久就收到回信，近半年音信皆无，会有什么意外呢？

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周恩来以留法组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在会上周恩来结识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高君宇。两人一见如故，一谈就到深夜。高君宇性格直爽、热情、待人诚恳，把他正在与作家石评梅恋爱的事也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也把自己与邓颖超的恋爱关系告诉了高君宇。周恩来不无忧虑地说：“我连着给她去了好几封信，一封回信也不来，不知会出什么问题？”

高君宇爽快地说：“好办。我回北京时到天津下车，到她那里去看看。”

周恩来说：“好，就这么办。我写封信，您亲自交给她。”

高君宇返京时在天津下车，找到邓颖超，把周恩来的信交给她。邓颖超看完信后吃惊地说：“恩来说给我写了好多封信，我怎么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高君宇想了一下说：“记得恩来同志说信是寄给马千里校长，请他转交您的。您可以去问问马校长。”

邓颖超兴奋地说：“真是太谢谢您了，没有您我们真的就失去了联系。”

邓颖超送走高君宇之后，立即就去找马千里校长：“听说您那里有许多要转交我的信？”

马千里由于校内外的工作太忙，太累，收到信后就往抽屉里一塞，说过后交邓颖超，但转身就忘。经邓颖超一提醒，他一拍脑门，说：“噢，好像有这回事。”说着就拉开抽屉乱翻，一连找出十几封信，忙说：“真对不起，事情一多，什么事都忘记了，误了您的事吧？”

邓颖超接过信，心里怦怦跳着说：“不碍事，不碍事。”把信贴在心窝里扭头跑回自己的宿舍。

一九二五年八月，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已从黄埔军校移至广州。这时陈赓做了周恩来的秘书。他们住在一座三层楼内，里面住着几十户居民。周恩来的居室十分简朴，楼上是起居室，写字台摆在屋子中央，一个书架和一张床铺、几张靠背椅子；楼下是会客室，中间一张大长方台，几张藤椅和圆木凳子。周恩来常在这里会客或召开小型会议。

一天午后，天气炎热，骄阳似火，周恩来送走客人后对陈赓说：“我这里还有个会离不开，请你代我到码头上接一位从天津来的客人。”说着从军装左上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她叫邓颖超，你就叫她小超好了。”

陈赓接过照片后就急忙跑到码头上接人。由于出来得匆忙，忘带近视眼镜，看人都是模糊的。从天津来的客轮一靠岸，陈赓就挤到码头的出口处，睁大了两眼，盯着每一位下船的人。船上的人都走光了，却没有接到要接的客人。

陈赓懊丧地回到周恩来处，他正发愁这事怎么交待时，只见周恩来满面笑容地从会客室走出来，指着他说：“陈赓啊，你还是有名的智谋过人，机警出众，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你说该打你多少板子？”

陈赓不好意思地说：“我拿着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对，愣是对不上号。也许客人改乘下趟客轮吧。”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说：“刚才的任务没有完成好，现在再给你个新任务。要接的客人已经来了，您可要招待好。我马上要去开会。”说着便把端坐在藤椅上的邓颖超介绍给陈赓。

邓颖超忙站起来微微笑着说：“你们工作忙，这么热的天气，何必还去接我呢。您忙去吧，我也不需要招待。”

周恩来与邓颖超近五年没有见面，虽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各自都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没有在通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过对方。直到邓颖超来到他的住所，才告诉他这次来广州是党组织的安排。原来邓颖超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一九二五年初转为共产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这次是党组织调她来广州工作，分配她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负责妇女运动。

直到晚上八点钟，周恩来才匆匆回来。他一跨进门槛就说：“还没吃晚饭吧？饿不饿？”说着拉住她的手就往外走：“离这不远有家老字号——‘太平餐室’，做得西式的烤乳鸽和牛尾汤很不错。咱就到那里吃饭去，一来给你接风，二来也算是咱们的婚礼吧。”

邓颖超紧抿着嘴微笑着跟着周恩来走出了客厅。

第二天，同事们都知道周恩来结婚了。首先是张治中、恽代英过来“发难”：“恩来先生，结婚不请客，说不过去。”恽代英则说：“今天补办婚礼，没别的好讲。”紧接着高语罕、钱大钧、何应钦许多人都来了。周恩来说：“好，好。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请大家聚餐。”

当天下午，陈赓、蒋先云等人自告奋勇，全力操办。晚七时，在客厅里摆了两桌，花钱不多，菜还算丰盛。李富春、蔡畅刚到广州，知道周恩来结婚，也匆匆赶来祝贺。

由于邓颖超不会喝酒，所有敬给新娘的酒都由新郎代劳。张治中、陈赓轮番敬酒、劝酒。周恩来不知喝了多少白兰地，最后醉倒了。李富春抱着周恩来喊：“恩来，恩来，我扶你上楼休息吧。”周恩来只是嘴里咕噜着，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李富春责怪张治中、陈赓太胡闹。蔡畅打来一盆凉水，让邓颖超拿湿毛巾给周恩来擦擦脸，然后敷在额头上。邓颖超微微呶着嘴，轻轻叹着气。

几十年之后，邓大姐在张治中家里对他的大女儿张素我说：“你爸爸可真有意思了。我和恩来在广州结婚时，他一定要我站在小凳上讲几句话，学学在街头演讲的样子。”

九、廖仲恺被刺与中山舰事件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早上，九点多，周恩来刚要出门去开会，陈赓气喘吁吁跑过来说：“报告周主任，廖党代表刚才在中央党部门口被歹徒刺杀了，现已送往东山医院。”

周恩来立即脸色煞白，匆匆奔向医院。

这时廖仲恺的遗体已经收拾干净，安详地躺在病榻上，盖着白色的床单。周恩来到了床边，轻轻掀开床单，只见廖先生面目如生，两眼微闭，眉心里中了一枪，枪眼很小，可以看出凶器是一只很小的手枪。看到前辈竟然遭此毒手，周恩来悲愤交加，怒火中烧，两行热泪滚滚落下。他用手绢擦干了眼泪，抬眼一看，只见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哭得成了泪人。周恩来上前紧紧握住廖夫人的手说：“请多保重，我们一定要严惩凶手！”廖夫人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地哭诉事情的经过：

八月二十日早晨，就有人不断向廖先生请示公事。因为这几天廖仲恺正忙于为军校筹集经费，待廖先生把公事交待完毕，差不多就快九点了。廖仲恺这时还没顾上吃早餐。因为事先接到通知，上午九点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何香凝便催他说：“快吃早饭吧，开会的时间马上就到。”廖先生端起碗匆匆吃了几口，就和廖夫人一起上了汽车。

汽车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到陈秋霖先生，他正要去廖仲恺先生的寓所商量事情。廖先生一看见他就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问：“你是要找我吗？”

陈秋霖说：“是的。”

廖先生说：“那就请上车，咱们一块到中央党部再谈吧。”

汽车在中央党部门前停下，大家先后下车。何香凝刚一下汽车，看到认识的一位女士，就止住脚步对她说：“过会我就到妇女部，有事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两人正在说话，忽听见“叭叭！叭叭叭！”的几声枪响。何香凝吃惊地一转脸，看见廖仲恺已倒在地上，头部流着血。陈秋霖也趑趄着身子倒下去了。身边的卫兵也中弹躺倒在地。何香凝这时才意识到有人行刺。她一面大喊“捉凶手”，一面俯身去扶廖仲恺。这时又是一阵枪声，子弹从她

的头上嗖嗖地飞过。如果不是俯着身子，贴近地面，何香凝也会中弹。她把廖先生扶起来，廖先生已不能说话了，只见血从伤口中汨汨地往外流，满地都是殷红的血。

汽车还没到医院，廖先生就停止了呼吸。

廖仲恺被刺身亡，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群情义愤，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彻底查清事件真相，严惩凶手。

事件发生之前，周恩来曾有预感，也曾多次提醒廖先生注意安全。廖仲恺的革命活动已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恨，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就骂过廖左得出奇。他甚至在电话里曾气势汹汹地责骂廖仲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你办军校，搞工会，搞农民运动都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做法。你应该停止替苏俄做宣传，替共产党说话。你更不能迫使我党干部搞什么工运、农运。工运、农运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口号。今后你不能再把钱花在共产党的事上。”廖仲恺当然不理睬胡汉民的指责，照样与中共密切合作。胡汉民等右派头子对廖仲恺更为仇视，多次威胁要给廖仲恺一点颜色看看。廖仲恺对此虽有耳闻，但没放在心上。何香凝曾提醒廖仲恺：“还是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好。”廖仲恺却说：“他们若想害你，防备也无用。”不久，凶杀果然发生了。

廖仲恺被刺后，周恩来两天两夜没回家。他从医院出来就到广东区委找陈延年、邓中夏、鲍罗廷等人研究对策。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仲恺送殡。

包惠僧赶到周恩来处，谈到廖仲恺被刺，愤怒地直拍桌子：“我要有权，非把国民党右派全抓起来不可。对他们严加审讯，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周恩来沉思多会说：“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是国共两党合

作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国民党右派不会只干此一桩事，以后还会有别的故事发生。你要保持警惕，常住在部队里，好好掌握第三团。”

张治中遇到周恩来，只是摇头叹气：“这是党国的不幸。廖先生是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失去廖先生，革命事业会受到极大损失。我们今后要加强团结，但愿不要再出现不幸的事情。”张治中的心情是激愤的、忧虑的。

陈赓则不离周恩来的左右，他焦躁地说：“周主任，你把捉拿凶手的任务交给我吧。”

周恩来答应了：“好。你马上布置人去搜捕凶手，同时注意保护廖家所有人的安全，每天把情况向我报告一次。”

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成立了“廖案审判委员会”，由蒋介石、周恩来、杨匏安、李章达任委员。陈赓带领士兵对出事地点的街道做了全面搜查。审讯开始了，凶手叫陈顺，他是行刺时被卫兵打伤头部抓获的。他供出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周恩来、陈赓等人连夜搜捕、审讯、对质、核对文件，从中获得了大量有关谋杀集团的内幕和行动计划，不难看出，国民党右派谋杀廖仲恺是早有预谋的。上海有家报纸在廖仲恺遇刺前一天（八月十九日）就刊登了关于廖仲恺死讯的电文。据凶手的同伙交待：谋杀廖仲恺这天，一路跟踪廖的雇佣杀手有四十余人。他们散布在整条街上，躲在巷子里。听到中央党部门前枪声之后，便立即四散逃跑。

最后查清，这次暗杀事件的主谋是国民党极右分子胡汉民、胡毅生兄弟，同时还有他们的同党朱卓文、邹鲁、吴铁城、许崇智等多人。

几天几夜，周恩来、陈赓等人都不得休息。当廖案有了一些头绪之后回家时，周恩来身上穿着的仅有的一套灰色西装染满了

血迹。邓颖超还以为周恩来在缉捕凶手时沾上的，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搜捕凶手时曾遇到过一次危险。有天他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可戒严却比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口令也改了。周恩来驱车赶到司令部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司机没有应答对，警卫便立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即倒下。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到他的背上。他立即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停止了射击。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出席黄埔军校召开的廖仲恺追悼大会。他同何应钦联合撰写祭文说：“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任劳任怨，不避艰险，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

在追悼大会后刊印的《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上，周恩来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忠实的信徒”。文章还指出：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当时本应处决胡汉民这些右派，但汪精卫大哭大闹，只把这些右派驱逐出广州了事。蒋介石却窃取了肃清右派后的胜利果实，乘机篡取了党政大权。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周恩来所预料，一九二六年三月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三月十八日，蒋介石的亲信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向海军局转达蒋介石的命令：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

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禱。

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驻省办事处启

共产党员、海军局局长李之龙立即派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三月十九日早晨，中山、宝璧二舰冲破浓雾前往黄埔，停泊在军校大门前的水面上，升火待命。下午，苏联军事顾问团要检阅舰队，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得到允许，又将中山、宝璧二舰调回。

三月十九日晚上，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陈肇英、贺衷寒来到蒋介石处报告：“共产党阴谋暴乱，要推翻国民政府，唆使李之龙派中山舰开赴黄埔，升起火炮，企图炮轰军校，与邓演达一起劫走蒋校长，送往海参崴，然后转送莫斯科……”而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被坏人栽了“赃”，自己还蒙在鼓里。他先看望了住在市区里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深夜返回黄埔军校。当晚他睡在蒋校长办公室。办公室副官季方向他报告：海军局来电话，说蒋校长要宝璧、中山二舰来黄埔报到。邓演达还立即要他查明真相。

三月十九日深夜，就在邓演达睡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蒋介石却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命令全城实行戒严，派武装警察包围了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共产党机关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安局长还以“保护”的名义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军警还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命令贺衷寒等人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全部扣押起来。

正在睡梦中的李之龙，从被窝里被这些人拖出来，严刑拷打。妄想李之龙被屈打成招，没料到李是条好汉，宁死不屈。

三月二十日凌晨，广州全城戒严，被捕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关押在广东造币厂，由第六团特务连监管。周恩来带着四个卫士赶到造币厂，荷枪实弹的门岗尽管认得他，却要看他的证件。当周恩来跨进造币厂主管的办公室时，他的卫士已被缴了械，关进一间小屋。周恩来立即警觉起来，对他们说：“我要见蒋总指挥，你们请他出来。”这些人哼哼哈哈，推说：“工厂不介入政事”，“不知蒋总指挥在哪”为由，一个个神色慌张地退出办公室。

周恩来走到工厂大门处，门岗拦住他说：“总指挥命令，凡进入造币厂的人一律不准出去。”

周恩来问：“蒋总指挥何时说的？”

“刚才。”

“那么，蒋总指挥就在造币厂了？”

“不，不知道。”门岗发觉自己说露了嘴，把脸转向一边，不敢再看周恩来了。

周恩来转身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就说：“给我接蒋总指挥。”

周恩来拿着听筒等了多会里边才传来蒋介石的声音：“嗯，周主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周恩来说：“很遗憾，有人在两党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地解决这件事。”

蒋介石近在咫尺，就是不肯露面，只是在电话里哼哼哈哈，说“中山舰事件”是误会，许多事情都是“谣言”，“不可信”。但周恩来却在造币厂被软禁了一天，直到晚上，他才被放出来，四个卫士的枪械才归还。

就在周恩来被软禁在广东造币厂之际，李济深乘汽艇赶到黄埔军校找到邓演达说：“昨天夜里蒋校长派军队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地，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你看怎么办？”

邓演达听后说：“校长疯了。他竟然集结部队如临大敌，把苏联顾问都监视起来。其中必有误会，我要去见校长弄清真相。”

两个人商量好以后，一起赶到广州。蒋介石见到邓演达大吃一惊：“你怎么来了？”

邓演达自然不知背后的事，反问蒋介石：“校长，你这样大规模调兵遣将，抓人、关人是为了什么？”

蒋介石把脸转向一边说：“集结部队以防不测嘛？”

邓演达说：“有何不测？国共两党应该很好地合作，即使有误会，也应该首先耐心地了解实情，查明真相，绝不应该诉诸武力。”

蒋介石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好了，好了！你回黄埔执行戒严任务吧。”

邓演达无奈，叹了口气，只好回黄埔军校。

邓演达回黄埔军校不久，欧阳格已代任中山舰舰长，把中山舰开到黄埔，请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高语罕上舰议事。邓演达满不在乎地说：“我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招数。”还是张治中多留了个心眼，把他劝住了，给舰上回话说：“有要务处理，暂不能离校。”后来张治中回忆：“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邀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①

事后几天，蒋介石假惺惺地自责，并递上“辞呈”。他回到黄埔军校后，显得十分沮丧。邓演达见状还同情地对季方说：“你要当心蒋校长，怕他自杀，因为这样的事很难交待。”邓演达竟如此揣测蒋介石，未免也太天真了。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64页。

张治中对中山舰事件极为气愤。蒋介石回到黄埔，住在长洲要塞时，张治中与邓演达一起去看蒋介石。张治中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激动地责问蒋介石：“校长这种作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蒋介石听了后，看了看张治中的态度，还是很温和地对他俩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他们告辞出来后，邓演达对张治中说：“你真冒失，真胆大。”张治中之所以慷慨激昂地责问蒋介石，就是因为他“听到这样一个事变的警号，非常愤慨。我不明白，党代表为什么会被捕？我更不明白，我们同抱着一个远大的目的，为什么内部发生出来这么重大的裂痕？为什么忽然发生这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这一个严重的处置？我的部下官生，就有很多是共产党，如陈赓、许继慎等，他们是不服的。”^①他认为，蒋介石这样做会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是十分不利的。

张治中的“态度虽激昂，但也不过是始于激昂，止于激昂”。他始终“自信：我的一切言论、态度都是为着爱护革命而出发的。我觉得国民党在当时，既通过了‘联俄联共’的政策，最好是大家团结，以求革命的发展；如果还没有做出一点事，自己的组织先分裂，自己的肢体先就支离，则革命如何可以完成。”^②

蒋介石只是装模作样了几天，很快又泰然自若了，并不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四月二日，蒋介石由虎门返广州。邓演达这时已初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嘴脸，不再同情他了。邓演达找到广州东山蒋的公馆里，尖锐地指出蒋介石：“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5—76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75页。

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①蒋介石气得双唇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起来走到窗子边上怒目看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邓演达进而说：“此举破坏了孙中山的政策，破坏了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革命。”^②

事件之后，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等人的意见是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大家联合起来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予以痛击。但党中央的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不同意，批评周恩来是过激情绪，对蒋介石要联合，要团结。张国焘竟说：“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是反革命。”

十、张治中力荐周恩来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迅行出师北伐、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被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指挥各军。

六月六日，蒋介石组建总司令部时，任命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负责北伐军的人事、编制、事务。在一次便宴上蒋介石对张治中说：“文白兄，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说完掏出白手帕捂着嘴轻轻咳了两下：“你看可以吗？”

张治中放下手中的筷子说：“好。不过我还有个建议，不知可否？”

①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110页。

② 谭元亨、李景秋：《邓演达》，第125页。

蒋介石说：“你说，你说。”

张治中说：“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以弥补由于‘中山舰事件’造成的……”蒋介石似乎很不愿听到“中山舰事件”几个字，没等张治中把话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两党关系有什么裂痕？目前合作的不是很好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嘛，我已定下由邓演达担任。周恩来可否出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张治中略微思忖了一下说：“邓演达可以带兵打仗，周恩来做政治宣传工作很有才华，任政治部主任最合适。”

蒋介石用拿着筷子的右手一挥说：“这个我已考虑过了，已经定下来的事就不要再议。你可以先和周恩来通通气，看他有何意见。”

张治中就不好再说什么的了，只好低头吃饭。

蒋介石在重大行动之前总是设宴待客。北伐之前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招待亲朋友好，他让周恩来、恽代英、张治中和自己一桌。几杯酒后，蒋介石话多起来，他接过女侍递过来洒了香水的湿毛巾，擦了一把汗滋滋的脸，兴奋地说：“各位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与我共过事的，一起出生入死打过仗的，我都视为知己。这次北伐，不比东征讨伐陈炯明，任重道远，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我尤其希望恩来兄仍能鼎力相助。”

周恩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轻轻放下，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蒋介石问：“你是说当财经主任的事？”蒋介石的头似点未点，只是两眼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因为喝过酒，脸上泛着红润，爽朗地说：“文白兄曾给我谈过此事。近来我党务工作繁重，脱不开身，再说我也不会拨拉算盘珠子……”

蒋介石又拿起湿毛巾拭去额头上的汗，轻咳了两声说：“文白先生谈过你的意思。我想你不愿做财经主任，可以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嘛。只要你愿意与我一起北伐，职务的事好解决。”

周恩来仍然推辞说：“我的弟弟恩寿已在北伐军中，我就不必参加了。”

蒋介石仰面哈哈一乐说：“这不是理由，择生（邓演达的字）兄任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哥哥竞生不一样在四军任参谋长吗？北伐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还望恩来兄再次合作。”

周恩来只好推说：“这事只能由中央裁定，我个人不能择决。”

蒋介石也只得难为情地摇摇头说：“好吧，等北伐胜利班师，你再回黄埔当政治部主任。”

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几十年后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当时极不以蒋的态度为然。同时我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而且也是促成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①

邓演达为这事也曾找过蒋介石。邓演达认为，不论是军事指挥才能、组织领导艺术、宣传鼓动能力，还是在国共两党及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周恩来都是难得的人才。北伐不该少了周恩来，邓演达把自己的意见向蒋介石陈述后，蒋介石皱了皱眉头说：“我有意给他一个任命，并请文白转告，可他不肯接受。”

邓演达说：“你让他搞财经显然不合适啊。”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65页。

蒋介石说：“干别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仍然不答应。我总不能让你们两人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吧？”

邓演达说：“我可以把政治部主任的职位让给他。”

蒋介石一听火了：“胡扯！已经定下来的事，已经公布的任命，怎么可以随意更改！这么严肃的事你当成了儿戏！”

邓演达也不好再说什么。

六月十八日，邓演达以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身份，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改组后，总政治部首先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期政治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挑选了三百名黄埔生前往受训，作为政治工作的骨干。同时吸收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如孙炳文、章伯钧、郭沫若等人。除此之外，还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人，给特别训练班讲课。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出席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战时工作会议”，并被推举为宣传员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虽然没有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但仍积极帮助邓演达展开工作。六七月间曾多次与邓演达商讨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为总政治部推荐干部。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在广州的东校场上举行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大会。北伐军由广东迅速向北推进。自此，张治中便到北伐军副官处工作，脱离了黄埔军校，终日不离蒋介石的左右，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紧密，政治态度也有所变化，开始向中间派以致中间偏右发展，至少不会偏左了。即使如此，张治中在工作中还是尽力促使两党合作，仍然注意保持与个别共产党员的友谊。

北伐军攻下了长沙之后，有天晚上张治中送蒋介石去长沙。上船后，蒋介石在头等舱的客厅里刚刚坐定，侍卫便送上茶水和毛

中。张坐在蒋介石的旁边，摘掉手上的白手套，把面前的茶杯往蒋的面前轻轻送了送，慢慢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请您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蒋介石抿着茶，放下茶杯后连嘴也没张，看着船外的景色连着“嗯”了几声，没有回答。

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两党的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更趋激烈。有天蒋介石在汉口宴请北伐军的将领和各界人士。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意又很锋利的讲话。张治中听了更为两党合作的前途担忧。

一九二七年四月，张治中辞去武汉黄埔分校教育长的职务，去了上海。张治中在离开武汉前，有一天陈赓秘密找他，想借点旅费去上海。陈赓在黄埔时曾是张治中所辖军官团的连长，一年多未曾见面，本来私交就好，乍一见面觉得异常亲热。张治中如数给了陈赓旅费，并留他在武汉多住几天。陈赓说：“我到上海有急务要办，不敢逗留。”张治中又问：“周先生在哪里？”陈赓说：“周主任已到了上海。”临别时，张治中一再嘱咐陈赓：“路上小心。到了上海，见到周先生代我问候，请他事事谨慎，行动注意安全。”这时，张治中对未来时局的剧变已有预感。

四月中旬，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交给他到南京筹备大本营军事训练处的任务。

这年七月九日，北伐誓师一周年，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大会。蒋介石亲临主持，并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在会上作报告。当时是反共高潮时期，而张在长篇报告中，只谈一年来的军事发展与成就，一字不提两党分裂，也无一语涉及中共。在场者无不议论纷纷。张治中的行动完全像他自己说的：“既不愿意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两

党之间，挤在夹缝里。”^①

周恩来与张治中自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分手后，中断联系达十几年之久。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是有益的。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 667 页。

第二章 抗战时期携手御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宛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我军民奋起反击，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北平，天津先后沦陷；八月十三日，万余日军向上海闸北进犯，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从此，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国共两党代表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说：“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终于使对立了十年的国共两党又第二次合作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

周恩来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国共两党第二次

合作的实现与巩固，历经千辛万苦，呕心沥血，其功绩永不可没。

在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残酷地进行了十年“剿共”。张治中却办了十年军事教育，置身于事件之外。这期间，他虽曾五次统率大军，指挥过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抗击日寇的战争，但始终避免与中共军队作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没参与反共战争的少有的一人。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张治中在十年内战中与周恩来中断的关系又联络上了，从此未断。

一、两个人的共同朋友

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是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的挚友。几十年来，两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以相同的真情关怀着这位蒙难的朋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晨，由于蒋介石不抗日，积极“剿共”，被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临潼捉住，押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扣押了住在西安城内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十几位“剿共”干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二日晨五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总目标是“逼蒋抗日”，决定采取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

叶剑英到西安去做工作。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反应最快的是亲日派何应钦。他既不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也不是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只是一个军政部长，获知蒋介石被扣之后，在十二日下午三时就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制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舆论。国民党老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也以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尽管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人主张先了解情况，再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但寡不敌众，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

何应钦在自己公馆内成立了临时办公处，筹划统军进攻西安，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最终置蒋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十六日，国民党中常委又决定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

“西安事变”对张治中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突接何应钦电话，声称有“军事要务”相商，请张速回南京。张治中到了南京，立即奔赴何应钦公馆。何的办公室有许多人出出进进。张治中从人们三言两语的谈吐中，已感到火药味很浓了。何应钦把张治中请到一间小会客室里，单独对他说：“请你来不为别的，就是请你来研究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军事部署问题。我拟兵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刘峙、顾祝同二人已分别担任东西路集团军总指挥。我希望你能担任中路方面军的总指挥。”

张治中听了何应钦的话沉默了一下说：“最近报上登的各方面的消息我都看了，也认真研究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通电。他们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并不过分。我们这时如果分兵‘讨逆’无疑置蒋委员长以死地。”

何应钦搓了搓手，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两眼盯着张治中问：“局势有那么严重吗？”

张治中说：“局势这不明摆着吗？自‘九·一八’之后，日本步步紧逼。假如我们‘讨逆’，且不说蒋委员长死活难定，内战必然爆发。我们国内一乱，正好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灭亡中国的一个大好机会。”张治中看了一下何应钦的反应，又说：“我看中共的政治主张就很好。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较一党一派的私见和私利，主张释放委员长，两党合作，团结抗日。”何应钦自然听不进张治中的话，不欢而散。

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亲英、美派势力，坚决反对出兵西安。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这时，周恩来很快做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蒋介石在宋子文兄妹的劝告下，也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条件，并保证不再“剿共”，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张学良答应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也对周恩来说：“我回去后，你可以去南京直接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亲日派的阴谋没有得逞。历史证明，中共的决策是英明的，张治中对时局的估计是正确的。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治中之所以拒绝“讨逆”，除了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有深厚的友情之外，主要是由于他俩有共同的政治观点。张治中和张学良都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学良为实现两党联合抗日，亲赴陕北会晤周恩来，商讨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大计。当时张治中任京沪杭警备区司令，他正在苏州率领一个工作班子，指挥沪宁一带军队的布防和修筑工

事等事宜，准备随时迎击日寇的侵犯。他们二人默默在南北配合，目的都是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立即被囚禁在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张治中闻讯后，立即驱车前去探访。张学良向张治中再三表示：“日寇大兵压境，我真放不下西安的工作。”“我想很快返回西安，迎接抗日战争的洗礼。”张治中听了张学良的话，心里异常痛楚。临别时，张学良还再三请求张治中在蒋委员长面前说些好话。当时张治中已从有关方面知道，蒋介石不会放张学良回西安了，但又不便对他明言，内心就更加悲伤。一位热血爱国的将领，要立志抗日报国，在大敌当前，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多年后张治中谈起这次会见还十分难过：“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介石面前落井下石的人外，平日和汉卿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更不敢去看望安慰他。我每想起那次会见，心中就倍感内疚。”

张学良非常忠厚老实，当蒋介石派人劝他应有认错请罪的表现时，他毫不犹豫地去信，承认自己“鲁莽粗野”、“违犯纪律”、“请处以应得之罪”。还说：“凡有利于国家者，学良万死不辞！”这真是热血男儿的肺腑之言，表现了他为国忘身的崇高品质。

然而，张学良没有看准蒋介石，上当受骗了。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南京途经洛阳时，蒋介石就发表了颠倒黑白的《对张、杨的训词》，把革命势力称为“反动派”。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就驳斥了《对张、杨训词》中的谬论，指出蒋介石是接受了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介石认真地实行诺言。

蒋介石不但不执行诺言，反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又过了四

次，次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又指示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长期监禁，剥夺了一切自由。张治中对蒋介石处置张学良的办法既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气愤。但他无力回天，只能生气而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治中被任为湖南省主席。这时，张学良被囚在湖南沅陵。一九三八年夏，张治中出巡湘西，专程看望了张学良一次。两个人恳谈中，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言辞激动感人：“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哪去了？’”最后张学良一再恳请张治中，向蒋介石转达自己的愿望，使他能参加抗日，只要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张治中满口答应：“汉卿，你给委员长写一封信。我一定转呈上去。”张学良当即铺纸挥笔，书就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函。张治中回到长沙，随即派专人送去，但如石沉大海，永无回音。不久，长沙大火，张治中自顾不暇，就再也没有向蒋提及张学良一事。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把张学良押解到台湾，囚禁在新竹县井上温泉。一九四七年秋，张治中见国内战争仍然频繁，自己无能为力，便请假携带家眷到苏、杭一带旅游。十月中旬，张治中又从上海乘船去了台湾。在台湾游了台中、台南、基隆、台北等地之后，张治中向台湾省警备司令彭孟緝提出想拜访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彭孟緝不好拒绝，只好答应。当时张治中将军的随从参谋张立钧在回忆中，对这次拜访曾做了如下描述：行车不到三小时，远望两山对峙的山谷中，一湾清溪绕过的旁边，有一座竹篱笆围绕、日式青瓦的平房院落。院落建立溪畔，略高于溪流，四

围墙基用大卵石码砌。院有小门，台阶数级。院内有小温泉游泳池、网球场；院外后侧有小平房，供警卫和工勤人员住。我们车抵门前时，只见张学良将军身着灰色西服，身体还颇为健壮，站在他身旁的赵四小姐，着浅蓝色旗袍，足登便鞋，早已在院门前迎候我们。车停后，他俩立即趋前双手握着张老夫妇的手。张学良将军高兴地对张老说。“昨天听说你要来看我，高兴得一夜未睡好，写了一首不成体的诗，聊以表达我的心情。”说着便从西服上衣口袋中取出用便笺墨笔写的四句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谈到日常生活情况，张学良将军说：“生活必需品每年蒋夫人都派专人送来。平时能看到的报纸只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除了钻研明史，还游泳、打网球等。”以后两位张将军便进屋促膝长谈。后来，张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看他很难过，只得勉强安慰他：‘我相信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将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现在看来，这话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早知道这样，我不应该说这种话。……日落偏西的时候，两位将军紧拉着双手，互道珍重而别。车行后还远远地望见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立在院门前，频频招手呢？

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张素我在《游台日记》中也记了两位将军的见面和惜别时的情景：“是下山的时候了……于是和张先生及赵四小姐握手告辞。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一幕。”^①张素我还给两位将军拍了一张合影。这是两位将军留下的最后会面时的照片，也是唯一的一张合影，是非常宝贵的。

^① 张素我：《游台日记》，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八辑，第63页。

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一次周恩来见到了宋子文，他质问宋说：“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与安全，为什么没有做到？”宋子文无可奈何地说：“其它事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表示了歉意。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其中必有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平和谈。周恩来知道张治中在一九四七年去台湾看过张学良，会谈期间他曾向张治中详细打听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和健康情况。张治中拿出张学良赠他的亲笔题诗，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反复吟诵，似乎张学良就在眼前和他恳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满含深情地讲话说：“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又说，张汉卿在被扣后，“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周恩来还对许多人说，蒋介石一直追问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否受中共指使的？张先生始终如实地说：“没有。”张先生是敢做敢当的英雄好汉。

一九六〇年，周恩来趁友人去台湾有可能见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小姐时，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十六个字，托友人秘密带到台湾相机转交。这位友人到了台湾，利用张学良和赵一荻小姐到教堂做礼拜时，以巧妙的方式交到赵小姐的手里。张学良读完字条，望着字迹，自然就心照不宣了。后来，张学良也通过友人给周恩来捎过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周恩来为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他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及夫人，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

二十余人举行座谈并设便宴。周恩来重申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并表达了对张、杨两将军的怀念之情。席间，张学思谈到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时，感情特别激动，向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了泪，并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周恩来与张学良这两位中国伟大的政治家，自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陕北肤施天主教堂秘密结识以后，抗日救国之心就紧紧地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然嘱咐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这“老朋友”中，张学良的名字在周恩来的头脑里是占着首位的。

二、“你们不要，我们要”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办公；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到了重庆。

一九三九年九月，张治中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这个机构是在南京政府撤退武汉时恢复设置的。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之前，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政治部的，只有政训处。当时武汉委员长行营中有个第六处（即政训处）负责政治宣传工作。政治部是在第六处的基础上改组、扩大成立的。下设四个厅：总务厅，管行政；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工作。蒋介石任命陈诚当部长，他为了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

还要陈诚亲自登门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恩来领导中共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住在武汉。这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也看中了周恩来的才华和组织能力，他让副院长张群出面邀请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当时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研究后，认为只他一个人到行政院或政治部任职，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给国民党装门面。因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都没解决，所以就婉言拒绝了。但蒋介石坚决让周恩来做政治部副部长。蒋亲自与周面谈。表示不要怕摩擦，可以避免摩擦；副部长的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都未定，还可以商量；康译（特务头子，已定为二厅厅长）可以共事，不致捣乱。中共代表团研究后，致电党中央说：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可以去任职。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就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一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邀请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张治中担任政治部部长时，周恩来已离开政治部，郭沫若仍任三厅厅长。这时第三厅的人员减少了，生活、工作条件更加艰苦。但他们仍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深入前线 and 后方，努力开展宣传工作。三厅的宣传方针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总之，和国民党提出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是针锋相对的。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便对三厅的活动进行限制。国民党当局对深入各地的演出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想方设法进行迫害。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当局曾三次强迫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都遭到了郭沫若等人的抵制。到了八月份，蒋介石竟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三厅的中共组

织代表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

周恩来听完汇报立即打电话找到张治中：“文白先生，我有个事想找你谈谈。”张治中问：“是什么事？”周恩来说：“在电话上谈不清。”于是周恩来便来到张治中的办公室。

张治中请周恩来坐下，公务人员端来茶水，这时才问：“周先生有何指教？”周恩来诙谐地说：“想请您提供几部汽车，把贵部第三厅的工作人员送到延安去。”张治中吃惊地问：“为什么？”周恩来笑笑说：“因为你们不要这些人，我们共产党要他们。”周恩来过了会又说：“今年以来，你们几次让他们加入国民党。被他们拒绝后，委员长又下令：不加入国民党者退出第三厅。他们退出第三厅到哪里去？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了抗日才到大后方来的。你们不让他们抗日，我们只好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张治中说：“这件事我还不太清楚，让我请示委员长后再答复您好吗？”张治中送走周恩来后，立即去见蒋介石。

过了几天，蒋介石便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谈话。蒋介石说：“我们在政治部里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其宗旨和任务就是对文化进行研究。你们从三厅出来，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还是留在了政治部。”蒋介石的目的很清楚，一是把这些文化人笼络住，不至于跑到抗日根据地，也落一个好的名声；另一方面也用研究任务束缚住这些人的手脚，不让他们到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们吧。蒋介石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可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更容易开展我们的工作。”这时在延安的同志捎信，希望这些文化工作者去延安，到各个抗

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周恩来见到这些同志总是耐心地解释：“大后方也需要干部。”“蒋介石反共，逼迫我们。我们不能害怕困难，撤出阵地。我们一定要在大后方站住脚和他们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迭起的情况下，周恩来指示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组织：“每个党员及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除了必要的少数人，一般的党员不能依靠党生活，要让党员在社会上为生活而斗争”，“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而且要更深入社会。”周恩来还指示：党员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巧妙地实现党的政策，但不要随便发动斗争”，“要多交朋友”。后来把这些指示概括成“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周恩来要求南方局的所有党员都要搞好本身的业务工作；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广泛地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能取得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好；所有党员的言论、行动要同本身的职业和地位相称，反对急性和暴露。比如，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读书；荣高棠在电力公司当抄表员；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到一个差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广大文化工作者以郭沫若为首组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于当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团结了大批文化工作者。它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包容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有著名作家茅盾、老舍、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文学家胡风。还有大批记者、诗人、演员、电影明星、音乐家等。

张治中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对郭沫若开玩笑地说：“成立这个工作委员会，是为我们左翼朋友建立了一个租界。”他在大会上还正式讲了话。给这些文化工作者以安慰，有些问题做了解释，

并与郭沫若约定，每两周和他谈话一次。大家都感到满意。

周恩来虽然不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了，但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经常进行指导。他多次对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说：“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部所属机构的合法地位进行工作，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给我们地盘，站住了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情吗？”“我们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深入研究，要用研究成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同时也要与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推动抗日民主事业。”

在一个座谈会上，周恩来鼓励大家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想写点什么赶快把它写出来。”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更忙了，你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的这些话，使大家受到启迪，心胸豁然开朗，觉得在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下照样可以干许多事。于是，大家安下心来，埋头从事研究工作和著述。这些文化工作者，很快取得了许多成果。

在历史学方面，一九四一年吕振羽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二年，邓初民写出了《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写出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王昆仑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蔡仪完成了他的《新美学》，文学家巴金写了《寒夜》，老舍写了《四世同堂》，茅盾写了《腐蚀》，沙汀写了《淘金记》等等。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进步人士，除了埋头著述研究之外，还举办各种讲座和演讲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方式联系群众，推动民主运动。

当时影响很大的是郭沫若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深刻总结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在《新华日报》连载后，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进行攻击，中共中央却把此文作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印发全党。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郭沫若鼓励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不久，张治中即接到国民党“某方报告”，说文化工作委员会“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他们认为“会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其事实是“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②等等。张治中接到这些报告，觉得这些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文工会”是他为左翼文化人设的“租界”，任其随便罢了。

“皖南事变”后，重庆空气处于低气压中。有一次张治中到文工会讲话，为蒋介石辩护，称“皖南事变”是“政令军令”问题，“内战并不存在”。他还说，“社会上有人说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个租界，国民政府管不了。”“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拥护三民主义，但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就不参加。”重提要大家加入国民党的旧话。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676页。

郭沫若也不客气，当即反驳说：“谁发动内战，谁就要受到制裁。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有租界，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如果张部长认为文工会是租界，就请收回吧。个人行动重在实际行动，不在形式入党不入党。”最后郭沫若还幽默地说：“信佛法不一定非做和尚。”^①郭沫若的话使张治中很受刺激，感到很尴尬。

稍后一些时，文工会一位工作人员为新四军死难者的家属募捐，被政治部的特务连抓走。郭沫若找到张治中质问：“他募捐犯了什么罪？要关就关我，责任在我。”张治中随后下令释放了这个人。

在抗日战争中期，重庆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都有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②张治中为此曾专门邀请文化界左翼朋友吃饭。在席间张治中表示：“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并且说香港、南洋也不是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安心待下去，结果又遭到郭沫若的文章讥刺。张治中当时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③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复了张治中一封信，略作解释，不过从此以后，他俩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抗战期间，张治中在重庆的几年中，他和文化界的人士经常保持联系。每年他都要举办一两次大规模的集会，参加人数常有四五百人之多。聚餐后，或举行戏剧、音乐晚会，或者举办盛大的舞会。张治中举办这些集会的目的，主要是和文化界的朋友联络感情，缓和左翼文化友人和重庆国民党政府间的对立情绪，使

①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68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676页。

③ 《张治中回忆录》，第677页。

国共两党更好地合作。

一九四四年末，中共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等领导人建议文工会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响应这一主张。一九四五年二月，由郭沫若执笔写就，三百多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进言”提出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废除限制自由的法令、释放政治犯、枪口一致对外、惩治贪官等六项主张。蒋介石对此大为恼怒，命令张治中以“机构重复”为由，于三月三十日解散了文工会。四月一日，文工会宣布结束，因为七年前的四月一日，第三厅在武汉成立，正好是同一天，所以，郭沫若在纪念晚会上写下了“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的字句。

对于张治中来说，撤销了文工会，“是件有始鲜终，为德不卒的事，心里至今犹引为遗憾。”^①“感到懊悔，感到自己太冲动，太草率，内心很不安，总觉得对不起左翼文化界的朋友们。”^②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张治中到了上海，郭沫若也在上海。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张治中特意请郭沫若和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如田汉、洪深等在酒馆吃了一顿饭。虽然在宴席间没有谈到时局和往事，但在张治中的内心是在表达他过去对郭沫若等朋友的歉疚之情。

三、千古奇冤

一九三九年二月，张治中处理完“长沙大火”的善后之事，拖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 677 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 278—279 页。

着疲倦的身体，从湖南来到了重庆。他一见到蒋介石就说：“身体疲惫不堪，想休息一段。”蒋介石揣测张治中，身体疲乏，工作劳累是实情，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情绪，精神没有振作起来。想到此，蒋介石便鼓励张治中：“可以短时间休息一下，还是要做工作。我这里有许多事等着你办。”又过了三天，蒋介石请张治中吃饭。蒋介石请了二十几位高级军政长官，还特别排了座位。蒋介石请张治中坐了首席。蒋介石端起酒杯说：“文白先生风尘仆仆，由长沙刚来重庆，今天特意为他接风……”。宴会之后，客人们都走了，蒋介石又把张治中留下来，对他说：“关于工作的事与你商量一下，你是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呢，还是愿意担任侍从室主任？你考虑，愿意哪样都成。”张治中毫不犹豫地：“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到侍从室服务。”蒋介石听了十分高兴，连说几句：“那很好，很好。”张治中又提出：“我实在疲惫，还是先休息一段。”蒋介石痛快地说：“好。休息一两个礼拜。”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张治中正式接任上班，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第一处的任务是协调军委会各部的关系，对下是向各战区传达统帅命令和意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他干得有声有色。一九四〇年九月，张治中调任军委政治部出任部长并兼任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到国民党中央工作后，他接触了大量国共两党关系的材料，更进一步了解了国共两党矛盾的症结，因此，他也就产生了自己新的想法。

当时国内形势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九三八年冬，蒋介石以国共合作的名义千方百计想取消共产党。蒋介石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口号，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称为“溶共政策”。十二

月初，周恩来由湖南到了桂林，对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进行指导。六日晚上，蒋介石邀见周恩来，正式提出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主张。蒋介石提了三条：一、不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跨党合作，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二、如果同意此项，则邀请毛泽东面谈；三、中共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①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周恩来表示：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以采用其它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周恩来的答复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便快快地说：“如果你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②

蒋介石溶共的思想并没有停止。十二月十二日，他在重庆又约见王明、博古、董必武等人谈了他的主张：“我的责任就是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并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③这次谈了五六个小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十二月二十九日，逃亡到河内的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降日本。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蒋介石又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谈两党合并事。周恩来又断然拒绝说：“不可能。”蒋介石仍然让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请示。中共中央于

① ③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269—270页。

② 金冲及：《周恩来传》，第434页。

十二月二十四日拍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电报说：“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它任何政党。”金冲及：《周恩来传》，第435页。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明白通过所谓两党合并来取消共产党的办法行不通。于是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公开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对中共是要斗争的”，“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全会依据蒋的报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据此，指示张治中致电各战区司令长官：“切实制定严防异党部队对我军之进攻，与不时之袭击，以及其各种宣传兵运暗算挑拨等恶劣手段。”^①

这时，周恩来和张治中都认识到国民党自五届五中全会后，重心已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注视前线和沦陷区转向注视共产党的后方。他们的一切工作都重在如何限制共产党，防备共产党，乃至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以期造成国民党独霸中国的局面。

一九四〇年六月初，周恩来回到重庆，立即约见蒋介石。周恩来表示：中共“诚意抗战”，拥护蒋委员长，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的政策”，这只能有利于日、伪。周恩来说：“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纯属谣言。”最后蒋介石表示：国共关系问题，可以商谈。于是，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第一次谈判。

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何应钦、白崇禧。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三），第10页。

谈判的内容核心是军队和边区政权问题。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认为国内外形势对他十分有利，便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事端。他们在这臭名昭著的“皓电”中指责中共：“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①并用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蒋介石还命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让他俩离开重庆。这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十分紧张，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当新四军苏北问题发生后，张治中每逢出席军委会议“即感觉有异样空气”。^②有一次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③蒋听了不作声，却在背后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对新四军暗暗采取包围措施。后来，张治中又把同样的意见向参谋总长何应钦陈述过。何应钦根本就不理会这些劝告。

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提出：“根据各种迹象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明了国方决心”。^④周恩来认为，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是决不能同意的，但是也不能置之不理。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81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682页。

③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第40页。

④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219页。

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并采纳了他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的第一方案。十一月九日用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名义，给蒋介石以及何、白发了封电报，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佳电”。“佳电”一是驳斥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二是表明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命北移”，“对于江北部队暂时拟请免调”。^①

此时，周恩来日夜奔波，他在重庆会见了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等民主人士，也走访了国民党元老派冯玉祥、于右任等人。与此同时，他还与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主持正义，制止内战的发生。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也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获释的四周年纪念日。晚上，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吃晚饭。周恩来一走进客厅，蒋介石就主动迎上来，双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异常激动地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

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之后，一边喝酒，一边谈新四军的问题。周恩来根据白天收到毛泽东来电的内容，直接向蒋介石交涉：“今天收到项英来电，说顾祝同忽然命令新四军改道繁昌、铜陵渡江，而李品仙部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又有部队在暗中包围。新四军要渡江，国军就不得包围，不能阻碍交通。另外，弹药和开拔费也请委员长尽快发下。”

蒋介石放下手中的杯子，用手帕擦了一下嘴说：“你们一定要

^① 董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221页。

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去，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蒋介石又怕谈僵了，话锋一转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顾全大局，将江南正规部队北移，至于江北的部队，还是拟请免调。”

蒋介石威胁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定失败。如果调到河北，你们的作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定成功。”说到这里，蒋介石放低声音说：“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过，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

周恩来说：“如果八路军全部调往河北，新四军又调防河北，在那么贫瘠的小地方，部队生活下来是十分困难的……”

蒋介石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说：“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是为你们着想，现在新四军在皖南的驻地太小了，也很贫困。你们开到河北去，按照划定的区域是很大的。在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发展，可以实施你们的抱负。现在你们分兵四出，指挥训练不好，河北也没弄好，如果集中起来，对内对外都可做得好。”

周恩来沉思着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蒋介石却说：“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都好解决。”蒋介石的态度忽然变得温和亲切地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的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垮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打，一面也很难过。”

宴席临结束时，蒋介石深情地说：“我们是患难朋友，让我们为和平友谊干杯！”

周恩来夜里回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他在发往延安给党中央的电报结尾处说：“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①周恩来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早把他看透了。蒋介石表面上说的那么好，是灌迷魂汤，实际上他早就决心动用武力把八路军、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去。

蒋介石宴请周恩来，许下“诺言”之后不到十天，便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余人，从皖南云岭等地，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北上，当六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

一月十一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报社举行纪念活动，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忽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位同志交给周恩来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特急电报。周恩来看着电报，拿着电报的手在微微颤动。他读完电报后，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这时，会场上电灯突然熄灭，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可是周恩来却异常坚定沉着，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更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这时电灯又亮了，周恩来继续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

^① 董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223页。

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①

这天直到深夜，周恩来还给张冲写信，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张冲速报蒋介石，要他立即下令制止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的暴行，撤围让路。蒋介石在一月十三日通过刘斐答复说：“关于茂林方面不要继续打的问题，我昨夜（十二日夜）已由贺（耀组）下了命令，此事不成问题。”^②

蒋介石说归说，做归做，历来如此。到一月十三日，被迫还击的新四军，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七千人大部壮烈牺牲或负伤，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只有傅秋涛率领二千人突围成功。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何应钦在其办公室召开临时会议，研究“皖南事变”后的处置办法。当时军令部提了两个方案：一是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二是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再作处置。张治中赞成第二个方案，白崇禧则主张把第一方案呈请蒋介石裁决。两个人在会上争执许久。张治中说：“吾辈高级幕僚对统帅陈述意见，不妨同时列举多案，俾统帅有所抉择。”白崇禧不服，坚持呈报“甲案”。张治中说：“如照甲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国共两党决裂，此时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应加考虑。”白崇禧立即大怒，厉声斥责张治中：“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③并骂张治中简直是“洪承畴”。张治中也颇为生气，但见白崇禧感情冲动到极点，有点失去理智，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224页。

② 尹家民：《历史漩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第288—289页。

③ ③《张治中回忆录》，第683页。

便悻悻退出会场，乘车回家。

本来下午张治中应该与何、白等人一起去蒋介石官邸汇报，但他“又虑在钧座之前，发生争执，诸多不便”，^③于是张治中便找了个借口，说下午政治部召开政工会议，须他亲自主持，避开了汇报会。

蒋介石终于采取了甲案。一月十七日晚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命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公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获知这一消息，义愤填膺，立即打电话给何应钦，斥责他说：“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说完，随即驱车赶到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并要求他转告蒋介石。

周恩来回到红岩办事处，夜已很深，他又布置了对国民党的防范工作，以备不测。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来汇报：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了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不准刊登。他们还不放心，坐等着十八号的样报。周恩来听完汇报略有所思说：“用别的消息补，印少量的报纸送检，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黎明前，周恩来愤笔挥就“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举世闻名的诗篇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天刚亮，勇敢的报童和报社工作人员就把印有周恩来题词和诗篇的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后，报纸已传遍山城的大街小巷。

张治中在“皖南事变”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做法表示反对，但终以孤掌难鸣，未能挽回。于是在三月二日，又向蒋递交了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尤其皖南事件，他认为是招

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现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诤即发生若干毫无取义之动作，如本会办公厅正式以奉谕名义通报，谓此后应改称异党为“奸党”。此种通报，共党方面自不难探悉。又如《新华日报》事件之发生。凡此似皆无关宏旨，徒益增问题解决之困难，实为冲动表现之一斑。尤可骇怪者，某日正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时，某同志提出报告，谓周恩来将于明日与居里会见，当时即有人提议，设法将周关闭一日，勿令其与居里会见。杂辞讨论，纷纭一堂。职在会议中本不拟再表示意见，惟见此种情形，不能再忍，因起谓：“此事尚未明了主动者为周抑为居里，但委员长必已闻悉，现委员长并未交付会议讨论；且此种处置，殊不高明，恐徒然引起居里方面之误会”，始将此议打消。月前职曾向钧座陈述，吾人今日必须把握此局面，不宜听任其继续作毫无约束的发展，致将来发生非所预期之结果，瞻顾当前局势，此种顾虑，似非杞忧而已。^①

居里，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在居里来华之前，周恩来曾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他向卡尔详细介绍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战争和国共合作的具体情况。后来卡尔不仅告诫蒋介石要停止国内冲突，还要英国政府对蒋施加压力。所以居里来华，顽固派十分害怕周恩来与他会见。但是，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如期会见了居里。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详细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大规模中国内战，无法抗击日本的侵略。居里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83页。

日本侵华。”随后，居里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告诫他“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国际、国内的舆论都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遭到了空前的孤立。正如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所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①

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②

蒋介石万般无奈，只好指派张治中与张冲去找周恩来谈判，解决两党纠纷。

当时，周恩来住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宅桂园甚近。张治中接蒋介石指示后，立即去周恩来住所拜会。周恩来严肃而有礼貌地请张治中坐了上座，并亲自为张沏茶。张治中说了几句客套之后，便单刀直入说：“此次‘皖南事件’，只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希望能和平解决，不要影响两党团结与和平大业。”周恩来一听火了：“这是蒋介石的意见，不代表你的看法吧！事件的性质很清楚，绝对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是问题很简单，事件也很普通的整顿军纪的局部问题，少数人的过激行为’，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一次大暴露，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搞突然袭击，问题十分严重，怎能不影响两党关系！”

张治中仍然态度和缓地说：“事已至此，总得设法和平解决为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232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684页。

好，希望中共还是以全局为重，以抗战大业为重。”

周恩来说：“我们中共向来以抗战大业为重，以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为重，但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的阴谋必须揭露，对其反共行为必须斗争、反击。”

第一次谈判毫无结果，不几天，张治中又来见周恩来，首先表示歉意：“他们做的这件事大失人心。于右任先生对我说，何应钦欺骗了他，他对这件事十分气愤。”周恩来说：“冯玉祥将军也大骂何应钦搞阴谋，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这些人的反共行为有目共睹。我们必须号召全国人民，制止他们的反共行动，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反复商谈多次，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十二条善后解决办法交给张冲、张治中，并请他们抄报蒋介石：

-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
- 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 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
-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 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 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①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八九——一九四九），第489页。

蒋介石对这十二条置之不理，后来又让张冲、张治中出面找周恩来，表示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周恩来说：“不实行十二条，无谈判可能。”

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拍来电报称：“你们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四、张治中登上国共和谈舞台

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前，国共之间的接触、谈判主要是在周恩来与张冲之间进行。八月十一日，张冲突然病逝。张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过去曾担任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是策划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的主谋者。但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即派张冲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因为这时张冲的思想有所改变，积极地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周恩来就不计前嫌与个人恩怨，积极地团结张冲，争取他在国共谈判中密切合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五年国共和谈中，张冲能及时地把中共的意见向国民党蒋介石反映，在沟通两党关系中起了积极作用。“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冲很气愤，曾对人说：“这使我没有脸见人。”张冲因病去世，周恩来送去挽联：“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后又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文中说：“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返，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

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①周恩来这种诚恳的态度，善于团结各种朋友共事的朴实作风，为广大民主人士所敬仰。

张冲去世后，国共两党间的联系渠道不固定了。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刘斐等人都有过接触。这样的方式，双方都感到有些不便。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美、苏、英三大国都希望中国内部稳定，不同意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国内，自“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失去民心，而且党内矛盾分歧日益加剧。再加上连年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日益恶化，危机四伏。蒋介石对内政策需要加以调整，以便稳定政局。中国共产党面对华北日军的侵略，也不愿意经常与国民党兵戎相见，希望两党团结对外。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表宣言，根据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国际形势，提出十条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宣言再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及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这年的夏天，雾都重庆，天气特别闷热。六月下旬，周恩来因积劳过度，住进歌乐山中央医院，必须动手术。七月二日，毛泽东拍给董必武的电报说：“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②万没想到七月十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因病逝世。红岩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十分悲痛，但不敢告诉周恩来。大家知道周恩来一向对父亲特别敬重，十分关心。他一旦知道老人过世，肯定十分悲痛，这对他养病十

① 《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91页。

分不利。七月十三日，周恩来出院，回到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已去世三天，悲恸欲绝，当夜为父亲守灵至拂晓。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①周恩来与毛泽东及政治局同志们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办完父亲的丧事，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蒋介石也深知周恩来十分孝敬自己的父亲，七月十七日上午特派张治中代表他前去吊唁。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接见了张治中。张治中礼貌性的慰唁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把话题转到国共合作上来：“文白先生，我党的纪念‘七七’事变五周年宣言你看到了。我们是诚心诚意与贵党合作，坚持抗战的。”

张治中也说：“蒋委员长派我代表他前来吊唁尊翁，也有意改善两党关系。”

周恩来说：“前些日子，我党主席毛润之先生在接见贵军联络参谋时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党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张治中说：“我回去后一定把你的意见和贵党的主张转告委员长。”

周恩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自从张淮南先生去世后，贵党就没有一位固定的代表与我们接触，有些问题持续较久，前后变化如不了解，谈起来也不方便，贵党能固定一两位代表是否更有利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八九至一九四九），第537页。

于商谈。另外，我很想见见蒋委员长，当面谈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治中答应下来，起身告辞。周恩来送到大门外。张治中抬眼看看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绿树，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想：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偏安一隅怎么得了。国共两党再也不能闹摩擦了。蒋介石再要反共、剿共，将把民心丧尽。于是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感慨地说：“请节哀、节劳。我想经过我们的努力，两党会合作得更好。”

张治中回到桂园，坐在书房里又想了许多。一九三二年二月初，爆发“一·二八”抗战事件后，他主动请战。二月十五日深夜，鸡鸣之前他起床端坐桌前写下遗书：“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第二天就统率新编第五军奔赴上海前线。他亲自指挥了“庙行战斗”和“浏河战斗”，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苏州追悼阵亡将士的大会上，他诵读祭文的朗朗声音犹回响在耳：“呜呼！蠢彼岛夷，狼子野心，陷我东北，窥我沪滨。赖我将士，挹伐用申，迭歼顽敌，固我名城。贼来愈众，我志益坚，奋勇杀敌，一以当千。声震陵谷，气壮河山，撼山岳易，撼我军难。月黑庙镇，风紧江湾，剑光射斗，敌胆皆寒”，“敌弹如雨，敌机翔空，唯我将士，猛勇精忠，出生入死，成仁成功”。^①

张治中还想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的情景。当时他担任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已做好先发制人的战略计划，队伍已开进上海市区，但蒋介石三次命令不得向敌人出击，以致导致由主动而被动。八月十三日下午，日军忽以重炮轰击上海闸北，彻夜炮声不绝于耳，居民损失奇重。我军才被迫还击。八月十四日，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109—110页。

张治中发表了一个谈话，其中有“现日方又大举以海陆空进攻，我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御侮救亡，义无反顾”。^①八月十五日张治中又发了一个通电，电文中有：“治中奉命统率所部”，“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②张治中至今想到这些都热血沸腾，深为蒋介石的指挥无术，媚外误国所气恼。今天他所能做到的，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效力，为搞好国共关系尽职尽责。

张治中第二天去见蒋介石，把周恩来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蒋介石沉默了片刻说：“好，我早就想让你和刘斐负责与中共谈判事宜。你可以先找刘斐议一下此事。”从此，张治中正式登上了国共和谈的舞台。

七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先表示歉意：“本来应该早几天约见，但事情太多，抽不开身。”谈到张治中转达的意见，蒋介石说：“我已指定张治中、刘斐二人负责与贵党联系。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们商谈。”蒋介石还表示，虽然有代表负责谈判，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还可继续去延安。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一见面就说：“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些实质问题。”周恩来说：“我将和张治中、刘斐二位先生商量一下解决那些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蒋介石说：“好，可以商量。”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一个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先生见一面，请你转告延安。”周恩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122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123—124页。

来答应下来。

当晚，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周恩来分析：从蒋介石的态度看，约见毛泽东没有什么恶意；但两次见面蒋都不谈实质性问题，目的又不可测。几经电报来往，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毛泽东还是不到西安会见蒋介石。决定先派林彪来重庆与蒋介石见面，转换一下气氛，待具体谈判问题有了眉目，毛泽东再直接会见蒋介石。

十月七日晚，林彪等人才到达重庆。当晚林彪、董必武随周恩来住在曾家岩五十号。

十月十三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林彪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见到蒋介石，先以弟子礼问候了蒋校长，蒋介石颇为高兴。林彪又说：“毛泽东主席很愿意与委员长会见商谈国家大事。但不巧，这几天毛主席患了感冒，不宜出远门，未来。”蒋介石也礼貌性的问候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好。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团结统一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对这些话还很感兴趣，边听边点头。待林彪谈到两党争论的问题时，蒋介石就开始皱眉头了。林彪也不管这些，继而谈到内战危险，批评国民党有些人总想挑起事端时，蒋介石则一再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下去，谈话就此中止。

十月十六日，周恩来、林彪二人到张治中的住所桂园会谈。张治中客气地提醒周恩来、林彪说：“委员长对这次会谈是有诚意的。你们尽量把问题提出来与他商量。委员长不愿听的话最好不提或者少提。比如新四军等问题。这样才能缓和谈判空气。”周恩来不客气地说：“如果不提新四军问题，不提释放政治犯问题，怎能改善国共关系？”林彪也接着说：“就目前国内形势，最急需解决的是‘三停、三发、两编’。具体说就是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

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中共军人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虽然对共产党一向持友好态度，和周恩来私谊也很好，但他作为国民党代表，只能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说话、办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张治中见林彪说起来没完没了，便不客气地打断林彪的话说：“你别总提这些老问题。你们如果真想缓和气氛，最好多谈一些原则问题，不要涉及具体问题。如果你们真想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能片面地要求国民党让步。”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两手抱肘说：“我们如果不想解决问题，今天也不会来到桂园；林彪同志也不会从延安长途跋涉来到重庆。”

张治中笑了笑，婉转地说：“当然，我们双方都是有诚意要解决问题的。我建议林彪先生先和各方面接触一下，多方谈谈，然后咱们再谈。”

过后周恩来、林彪约刘斐会谈。刘斐很机智，表示任何问题都可以谈；但具体问题他一个也不谈。林彪一涉及具体问题，他就把话转过去。最后他建议说：“你们二位同文白先生谈吧。”

国民党方面就是这样踢皮球。针对这个局面周恩来分析蒋介石的心理：想用政治方法解决与中共的分歧，不想军事冲突。但又不急于解决，想尽量拖时间，企图把中共拖垮，使中共就范、让步。周恩来通过电报与毛泽东商量出对策：下次林彪见蒋介石时，只谈原则问题，不谈具体问题；一切不宜在当时提的问题，均不提。即使如此，这次会谈也完成了两项任务：一是缓和了两党的关系；二是重新扣开了谈判大门。

谈判停顿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内，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中全会，全会通过的文件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

要今后不违犯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到陕甘宁边区发放救济款。周恩来与毛泽东对这些变化非常重视，认为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决议，不再是内战危机的扩大，是由军事解决转变为政治解决的开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方面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并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国民党大有希望，郑延卓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郑转交。信中说：“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轅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安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①

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信，自然高兴。于十二月十六日再次约见林彪。林彪去之前，周恩来嘱咐了谈话的要点。这次会见蒋介石仍然由张治中陪着。林彪一见面就表示说：“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有新精神，我们是拥护的。”蒋介石似点头未点头，微笑着不动声色。林彪看蒋介石的样子，又是不先开口，便说：“要改善两党的关系，首先要做到‘三停三发两编’。这个我前次会见校长时已解释过。这也是我党的一贯要求。”蒋介石一听要“三停三发两编”，就在椅子上挪了一下屁股，示意林彪诸位喝茶，然后清了一下嗓子，慢慢说：“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有诚意的。”然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26页。

后又提高声音：“这绝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正团结。大家在统一的政令、军令下工作。”蒋介石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林彪以为蒋介石不再往下说了，便说：“委员长，这个……”蒋介石站起来右手往下一压，说：“你听我说。为解决两党关系，各个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当然包括国共两党。”蒋介石背着手在客厅里踱了几步，转过身来说：“那时所有问题都应解决，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拉拉零敲碎打地解决。你说的什么三停三发啊，都是小问题。大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林彪说：“委员长，这些小问题、具体问题不解决，大问题也难以解决啊。”

蒋介石坐下来用手指着林彪说：“你啊，你啊。只要我活在世界上，绝对不会让中共吃亏。这个请你放心，也请中共的领导人放心。中共是爱国的，是有思想、有头脑、有主张的。你们都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

林彪见蒋介石总是笼统地谈“解决问题”，就是不谈具体办法和措施。林彪就提出新四军应恢复番号，释放叶挺同志。这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马上制止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我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在讲话里、文件上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你们今后再不要提新四军了。”蒋介石说着站起来，走到林彪面前，俯下身子、亲切地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

这次会见就是这样扯来扯去，没有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蒋介石的态度和语气还是缓和的。

以后是周恩来和林彪到张治中的公馆桂园会谈。断断续续，谈谈歇歇。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林彪再次与张治中会谈，郑重提出四条意见：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也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做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①

周恩来一字一句念给张治中听，张治中一字一句抄录下来，抄完后又念给周恩来、林彪二人听，审核完毕，双方认为无误，由张治中呈报蒋介石。张治中认为这四条国民党可以接受。中共确实做了很大的让步，表现了合作抗日的诚意。张治中对此十分高兴。周恩来对张治中说：“委员长认为这些条件可谈，林彪就继续留下来谈判；如果认为相差太远，请蒋委员长提出具体条件，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

张治中满口答应下来。

蒋介石接到报告立即召开了一个临时的军事会议。蒋介石不置一词，只是问大家有何意见。到会者大部分人表示不能接受。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编到四军十二个师办不到；对第三条，认为应由政府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糊不清，应以“皓电”规定，先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张治中在会上一再解释，但一个人拗不过大家。蒋介石既不说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临散会，蒋介石只是说：“好吧，以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84—685页。

后再议!”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与林彪，正式通知说：“贵党提的四项条件，与国民党希望的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及‘中央提示案’的精神也相距甚远。”

周恩来说：“所提四条与‘皓电’精神并无根本不合处，差距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上。”

谈判就这样搁置下来。一九四三年三月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声称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他将把“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军阀”全部铲除，矛头直指中共。接着军事摩擦再度频繁。

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蒋介石估计中共将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更无意与共产党谈判，指示张治中于六月四日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至此，这次谈判便停止下来。

六月七日，蒋介石忽然约见周恩来、林彪。寒暄几句之后说：“你们二人可以离开重庆回延安了。至于谈判嘛，以后伺机再说。”周、林二人告辞后，立即准备回延安汇报工作。这是自“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允许周恩来回延安。

六月中旬，不知什么东西触动了蒋介石的神经，他忽然又动了与毛泽东会谈的念头。他立即召见张治中。待张治中坐定之后，蒋劈头就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了心里特别高兴，这正是他所盼望的，立即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① 蒋介石当即提笔挥毫，修书一封：“兹乘周、林二同志回延之机，特奉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85页。

渝惠晤，尤为欣慰，未尽之意，已嘱周、林二同志面达，恕不赘述。”^① 蒋介石把信封好之后交给张治中说：“交给林彪，请他转呈。”

第二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设便宴为林彪饯行。席间张治中对林彪说：“昨天委员长给毛润之先生写了封信，想邀请毛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来重庆一晤。特请你回延安后代为转呈。”

林彪当即收下这封信，并说：“一定转达。”此后谁也没有听到中共方面对蒋介石的邀请有何表示。蒋介石也没再提这件事。不过，这却为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埋下了伏笔。

五、赫尔利调停失败

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蒋在开幕式上致词说：“现在最后胜利已在望”，“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将来抗战结束之后，立刻可以付诸实施。”^② 全会强调对中共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

会后国民党主动向中共提出建议，希望在重庆继续谈判。这样谈判的大门又再次打开。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和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中共代表为林伯渠。这次谈判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到十一月，达半年之久，互相争执不让，没有任何进展。于是，美国人想插手其间，便有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五年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70页。

^②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301页。

夏天的赫尔利调停。

美国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如果两党军队团结，可以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缓解太平洋战场上对它的压力。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他对蒋介石说：“国共息争，恢复团结，即可增强战力，扭转军事之颓势。”他还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见：“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到达重庆。

九月七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接见赫尔利。赫尔利说：“罗斯福总统派我来的目的就是帮助贵国早日打败日本，巩固国民政府，拥护委员长当中国的领袖。”蒋介石一听十分高兴，对赫尔利说：“我们十分欢迎你，相信你的帮助是会解决中国困难的。”然后又批评了史迪威不听从蒋的意见，脾气执拗等。^②

十月十一日，蒋介石接见杜建时。杜建时呈交抄来的赫尔利致罗斯福的电报。内容有三个意思：一是蒋委员长是一位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能施加压力。如果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二是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援助，他能实心与美国合作。如通过史迪威以维持中国作战，必趋于失败。正如蒋介石所说：有史迪威在，中美即不能合作；三是请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蒋介石读完后十分高兴，嘱咐杜建时说：“你要好好照顾赫尔利，常和他闲谈，

① 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台北一九八五年版），第43—44页。

②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305页。

用良好的私人感情，换取政治上的方便。”

十月初，赫尔利按照蒋介石的提议，开始介入国共谈判。他先与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接触后，中共也认可了赫尔利的调停人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美国人加入了和谈，国民党方面提高了谈判规格，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出面参加和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赫尔利乘飞机抵达延安。周恩来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看到一位身穿考究军服，佩带大量勋章的美国将军走下飞机，这时包瑞德对周恩来说：“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周恩来便立即请来了毛泽东。没想到这时赫尔利兴奋地大声喊起来：“呀呀！呀呀！”他活像战士练刺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接着赫尔利又跳了几下印地安人的“练兵舞”。据说赫尔利是牧羊娃出身，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生活过，学过这种方言。他一高兴就这样喊呀、跳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后来称他为“小丑”。

十一月八日开始会谈。中共方面出席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美国方面出席的是赫尔利、包瑞德、一名译员、一名秘书。

会谈一开始，赫尔利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然后赫尔利把经过蒋介石修改审定的《协议基础》交给中共方面研究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这个“协议基础”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说：“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是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赫尔利愣了，听了半天说：“文件不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吗？”毛泽东说：“仅这一点是不够的。文件根本没有谈到成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是必要的；另

外，应该改组的军队，绝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的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和一打就散的军队。”

经过三天的争论，赫尔利最后也同意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政治人物和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定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①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39—340页。

签了字，同时还留下让蒋介石签字的地方。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派周恩来同志和你同去重庆，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委员长会有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重庆，准备与蒋介石继续会谈。第二天赫尔利一早就到了蒋介石官邸。他与蒋介石客套之后说：“共产党实在不好对付。好在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争了三天，总算与毛泽东达成五点协议。”

旁边的宋美龄说：“我记得你去延安时说过，你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怎么与他们又订起协议来了？”

蒋介石心急火燎想知道协议的内容。赫尔利边让秘书念，边解释。当蒋介石一听到要成立联合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时，便沉不住气了，气乎乎地说：“你同延安订的这五条太宽了。”赫尔利第一次尝到了史迪威在中国遭遇的“滋味”。赫尔利本来想这五条中共满意，自己满意，蒋介石一签字认可，他的调停工作就大功告成，没想到一回来就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赫尔利尴尬地说：“你说太宽了，共产党还嫌不公平。周恩来也到了重庆，你可以和他再谈。”

蒋介石没好气地说：“共产党没有满足的时候，和他们有什么好谈的，要谈，只有一条，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这是蒋介石的真心话，也是多年来国共谈判的症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可以创造一切。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没有革命的政权，共产党怎么能交出军队呢？共产党不交出军队，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不放心，所以国共永远谈不拢。

蒋介石又找来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三人商量，几经琢磨，弄出一个文件。于十八、十九日两天，蒋介石又单独找赫尔利长谈两次，最后拟定了另外一个“协定草案”，共三条。让赫尔利交

给周恩来带回延安。这个“协定草案”的主要精神是：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中共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中共派将领参加军事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赫尔利约见周恩来，递交了蒋介石的三条“协定草案”。周恩来看完后说：“对于国民党建议我们参加军事委员会做委员这件事，我有两条意见：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和李济深就是例子。而且我自己做过政治部的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只要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你知道，蒋委员长一切以命令行事，我们仍不能参加决策。”

赫尔利沉默了片刻，眼珠子转了几下说：“委员长告诉我说，他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建议上。再说，你们不参加政府，不等于没有实权，事在人为，我们国家的议会议员，有的人就能控制议会或政府。”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是外国人，你不清楚蒋介石的做法，我们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上他的当还少吗？你想，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就交出军队，我们连命也难保啊。”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周恩来又和董必武一起到赫尔利寓所，有宋子文、王世杰在场。王世杰表示，国民党无意放弃一党专政。周恩来则说：“你们提的‘协定草案’我们无法接受。一定要改组旧政府，成立新的联合政府。我们可以从双方的协议草案中找出共同的地方，为成立联合政府做准备该可以吧。”

当天，周恩来又与董必武一起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先是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当面谈些事情。周恩来表示：毛泽东同志很愿意来重庆，但来这里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辩论而来。紧接着周恩来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仍然坚持，并愿为

它奋斗到底。”周恩来讲活也留有余地，又说，“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

蒋介石忙接过去说：“好，你说的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了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求我这样做，那样做，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退让，立即驳斥说：“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国家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就应该改组，官员不称职，就应撤换。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如果不能向政府提出要求，那就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蒋介石只是微有愠色，嘴唇没有大动地说了两声：“是的，是的。”

当晚蒋介石宴请部分国民参政员，大家正高兴地谈着别的话，蒋介石忽然把酒杯在桌子上重重一放说：“中共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绝对不能接受。因为我还不是波兰流亡政府。”这突如其来的话，搞得大家都莫名其妙。可见蒋介石虽然身在宴会上，但他头脑里仍然萦绕着白天与周恩来的谈话。

这时周恩来正出席赫尔利为他饯行的宴会。赫尔利首先举杯祝贺：“祝愿中国从此走向统一。”周恩来也举杯答贺说：“谢谢赫尔利先生的盛情。”赫尔利又欲与王世杰握手祝贺，王世杰笑着说：“不急。还是等周恩来先生从延安回来再祝贺为好。”王世杰还是了解中国的情况和老于世故的。原来周恩来计划十一月二十三日乘飞机回延安，在延安逗留二三天即返重庆。由于飞机技师有病，重庆天气又不好，结果又在重庆滞留了十来天，于十二月七日始返延安。

十二月八日，周恩来即致函赫尔利，说明不回重庆的理由。后来赫尔利一再来函来电催，希望周恩来返重庆继续谈判。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才乘飞机去重庆。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及“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对方出席的人有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

经过几天的反复商榷、争议，会谈毫无进展。二月十三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开始时还客气，说：“你在三月二日送我们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我看了。你提的办法行不通，我们无法接受。”接着话锋一转：“你们所主张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国民政府。这怎么行?!”周恩来也十分生气：“中国必须结束党治，实行民主，才有前途。”针对蒋介石的话、逐一驳斥，最后不欢而散。

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屈武、黄炎培、谭平山、陶行知等几十位民主人士。周恩来向他们报告了最近国共谈判的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坚决实行党治、反对民主的本质。最后表示，由于蒋介石的顽固态度，谈判无法继续下去。

二月十五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谴责王世杰十四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不坦白，不公正。说明这次谈判由于国民政府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坚决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飞返延安。赫尔利的调停宣告失败。

第三章 重庆谈判历尽艰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美、英、中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广播了天皇的“结束战争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城乡，经过八年抗战之苦的城乡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延安城锣鼓喧天，人们扭着秧歌上了街；广大解放区的偏僻农村，老百姓通过高房喊话的形式，使男女老少都知道了这一重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连成一片，大后方的山城重庆以及广大城乡，处处张灯结彩，群情激奋。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望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但和平建设的日子是否能顺利到来，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出现什么变化，国共两党的关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如何？这是中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蒋介石三发邀请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他用马列主义阶级

分析的方法，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人民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的危险。毛泽东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①“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③

八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一号通令，指定蒋介石为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权力的人。根据此通令，中共便无权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中国共产党不管这一套。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④十日这天，周恩来起草了用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限期接受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敌伪投降，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应予坚决消灭。

蒋介石消极抗战八年，这时却极其活跃，为了垄断受降，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八月十一日，同时发出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而令共产党部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23—11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27页。

④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51页。

自行动”。八月十二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中国战区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对日本侵华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有地之秩序与交通。”^①

美国和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情是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等到蒋介石的队伍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制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②

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目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是看得十分清楚的。八月二十三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就揭露得十分彻底。评论说：“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③

在国民党内部一些高层领导人中，也有一些反对内战、拥护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52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五年一月版，第70—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38页。

和平、热爱祖国的有志之士，看清了当时的国内局势，意识到国内仍然存在着内战危机，他们忧心忡忡。张治中就是这样一位爱国将领。当时大家都十分活跃地外出庆祝抗战胜利，而他却独自一人苦闷地待在家里。因为这时国共和谈早已停止，而两党正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和他的愿望完全违背，所以他极度苦闷和不安。张治中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他联合一些意见相同者，旧事重提，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会谈，以便彻底解决两党问题，实现国内和平，让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正当此时，赫尔利也向蒋介石献策：“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

蒋介石在中共接二连三的评论和无情的揭露面前，正无计可施，听了赫尔利的话，骤然茅塞顿开。政学系吴鼎昌等人也劝蒋介石“假戏真做”。于是他便决定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电。他认为，这样做一是可以满足像张治中这部分真正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使苏、美、英等盟国满意，因为这些国家也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的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因为蒋介石的正规军大部分在西南几省，要运到东北、华北、华东诸省，对解放区展开攻势，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办不到的。即使中共拒绝，或谈判破裂，也就应了赫尔利的话：推卸发动内战的责任，转移国内外公众的视线。蒋介石想到这里，心里格外高兴。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拟了一份措辞殷切、诚恳的电报发往了

延安：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望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八月十六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公布了这封电报，摆出一副强烈追求和平的姿态。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了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的电报，再次指出蒋介石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时为止。”^①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评论说：“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46页。

民就知道是蒋介石。”^①

毛泽东在评论中无情地指出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揭露了他几十年的反革命嘴脸之后，才拍发了给蒋介石的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铤

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到重庆谈判。假如毛泽东不到重庆，他就可以宣称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真的到重庆会谈，他就可以利用谈判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欺骗舆论，作内战准备。尽管蒋介石听了延安广播的评论，读了朱德总司令的电报，仍然厚着脸皮把“假戏”做下去，在八月二十日给毛泽东拍了第二个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49页。

有严守纪律，恪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愿惠诺为感。

蒋中正 郅

蒋介石在第二封电报里除了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又进一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言辞显得是那么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蒋介石是多么热爱和平、信守诺言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八月二十一日刊登了蒋介石的第二个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当晚《中央日报》几位负责人在分析国内形势时，总编辑陈训念说：“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呢”社长胡健中说：“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总主笔陶希圣说：“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①

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② 经中

① 王轮植：《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第419、420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八—一九四九），第615页。

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同日由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了复蒋介石的第二个电报：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望接洽，为愿。

毛泽东未养

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同志拍发了第三个邀请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梗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不到十天内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三封邀请电报，而且飞机已经备好，马上就来迎接。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负责同志，连续几天开会研究这一问题。毛泽东的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总是彻夜灯火通明。毛泽东在会前、会后总是手夹着香烟在枣园的树林里来回踱步，思考去重庆会谈的利与弊。23日收到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后，当晚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

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做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①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②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③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10—11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15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10—11页。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复蒋介石第三次邀请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八月二十五日，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又给毛泽东来电报，邀请他赴渝会谈，并保证他的安全。

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部分成员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当晚毛泽东给魏德迈复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①

这天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他们临去机场时，毛泽东对他俩说：“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②

八月二十六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发言说：“我去重

^① ^②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下卷，第13页。

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面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①

二、张治中一到延安

八月二十五日深夜，周恩来散了会，立即给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了“AAAA”急电。告诉他们：毛泽东同志要到重庆谈判，对毛主席的安全、警卫、住房、饮食等等都做了具体布置，连要给毛主席准备好洗漱用具，以及毛主席的生活习惯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知道毛主席要来，都为自己能够直接为毛主席的工作、生活服务而感到高兴，同时又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

蒋介石原来估计毛泽东不会到重庆来谈判。等接到毛泽东的第三封电报时，也只好被动地把“假戏”做到底。于是他备了专机，派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张治中和赫尔利乘坐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延安东郊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亲往机场接客。这是张治中初次到达延安，也是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问候，互致敬意。

张治中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进城。从机场到枣园的路是土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下卷，第14页。

路，高低不平，尤其是夏秋季被雨水一浇，道路就更难走了。汽车出了机场，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慢慢穿行，行至一个拐弯处，前边有一队驮庄稼的毛驴挡住了路，汽车只好减速慢行。张治中只见一个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少年，手挥着小皮鞭，一边轰毛驴，一边仰着脸高唱：

谁种的庄稼谁收割，
谁栽的果树谁得果。
我们坚持抗战八年多，
胜利果实谁也不能夺。

这个少年唱完第一段之后又反复唱。坐在张治中身边的周恩来听到歌声，也动情地轻轻哼起来，两只手同时随着歌曲的节奏轻轻拍打。张治中听了孩子的歌声，又看到周恩来的神态，心里不由为之一动：“解放区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真是深入人心啊。”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也是想象不到的。

晚上，赫尔利由交际处的同志陪着和毛泽东谈了些有关重庆的情况。周恩来与张治中却在另外一个窑洞里谈话。周恩来和张治中在谈判桌上是代表两党的谈判对手，离开谈判桌，两个人又是交情很深的朋友。这时，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对张治中说：“毛主席去重庆，我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张治中说：“苏、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对蒋委员长做了工作，他们都保证毛先生来去自由，绝对安全。我看不会有问题。”周恩来谨慎地说：“文白兄，他们担保是担保，但我们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张治中说：“毛先生住别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桂园腾出来，让毛先生住。”周恩来说：“住在您的官邸当然好。桂园在上清寺，这里距我的住处曾家岩五十号很近，离红岩新村也不远，位置适中，又在马路边上，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只是苦了你一家人，让嫂夫

人和孩子们住哪儿？”张治中笑了：“那好办，重庆那么大，在哪找不到一处房子。”周恩来说：“保卫人员也须可靠，否则也很麻烦。”张治中说：“保卫人员不成问题。平时我的桂园就驻有政治部警卫营一个手枪排，这些人都是我的家乡子弟兵。一个排不够用，可以再调人来。”周恩来听了略作沉思，说：“这样当然放心，但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您想过没有，万一出了问题，发生任何一点事故，责任都是您张治中的。我建议，您把保卫的责任推给宪兵司令张镇。您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两个人还就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在赴重庆前十分繁忙，没有与张治中多谈什么。他在八月二十七日这天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的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①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②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艳阳高照。在陕北，这时正是金风送爽的秋收季节。黄土高原上的高粱红了，谷子沉甸甸的大穗低着头，随风摇摆。延安城内城外中央直属机关和边区机关的干部们，三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下卷，第16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9页。

五成群脚步匆匆地沿着大道，向东门外新建的飞机场走去。他们要欢送自己的领袖亲入虎穴去谈判，去争取和平。尽管是欢送，但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气氛是凝重的，态度是严肃的。人们手里没有鲜花，脸上没有笑容。

不久，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人们纷纷翘首向大路望去，只见两辆草绿色军用吉普车驶进了机场。大家热烈鼓掌欢迎，第一辆汽车上跳下来的是周恩来和王若飞，还有佩着短剑的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和王若飞立即走到人群中间和干部们握手话别。随后一辆带篷的中型汽车也驶入机场。车门一开，在雷鸣般掌声中，毛泽东和送行的中央首长以及胡乔木、陈龙等人走下车来。

人们站在远处，只看见毛泽东与送行的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人握手说话，然后又与周恩来、张治中说了些话，这时周恩来把他头上戴的巴拿马盔式帽子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向机场上的上千名送行的干部、军民热情地挥了挥手，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了飞机。当他站在机舱门口时，又回过身来摘下头上的盔式帽子，朝欢送的群众有力地往上挥动了几下，就走进机舱里去了。

赫尔利最后一个爬上舷梯登机，当他一只脚踏上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只见他双手把住门框，头往后仰，怪声怪气地大吼：“哎！噢！呀！”然后钻进机舱，“嘭”的一声关好舱门。他这一声怪叫引起在场的群众极度的不满、气愤和疑虑。难怪毛泽东说赫尔利是个“小丑”呢！

周恩来听到这声怪叫，平静地笑了笑。张治中心中则想：“一个大国的驻外使节怎么这样粗野！”

这时飞机平稳地滑过跑道，驾驶员拉起了机头，飞机斜刺着飞向天空。陈龙瞥了一眼舷窗外的延河和宝塔山，心中默念了一

声：“再见吧，延安。”便转头把注意力放在赫尔利和在机舱中不停走动的美军机组人员身上。

三、毛泽东抵达重庆

八月的重庆正是酷热的季节。重庆本来多雾，但这一天晴空万里，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样洁净。

午后两点多，重庆九龙坡机场的候机室内外就聚集了许多人。

下午三点四十分，北边天空传来了飞机的隆隆声，紧接着从山头上出现了一架草绿色双引擎军用飞机。飞机在天空盘旋了一周后，徐徐降落下来。三点四十五分，飞机平稳地滑行到停机坪前。机场工作人员还没有把舷梯架好，等待迎接客人的人群便围拢过来。

飞机的舱门打开了，第一个出现的是周恩来，紧跟着毛泽东手挥着盔式帽子也站在舷梯上。这时欢迎的人群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中外记者都举起了照相机，“噼噼啪啪”抢拍下这一历史场面。

毛泽东和周恩来走下飞机舷梯，立即被欢迎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些人中，除了蒋介石的代表空军司令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邵力子、谭平山、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冷通、郭沫若夫妇，还有大群的中外记者。

周恩来、张治中一个个向毛泽东介绍这些朋友。新老朋友争着伸过手来，使毛泽东应接不暇。一些年轻力壮的中外记者，高举着相机，拼命抢镜头；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挡在了人墙之外，无法与毛泽东靠近。沈钧儒老先生由于年老体弱，高喊着，“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意思是希望记者们让开一点，让

他挤进包围圈，使尽了力气，几经努力都没达到目的。周恩来一见这种场面，便立即从一位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个纸包，高举在头顶上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还真管用，一下子就把大批记者吸引到他的身边。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在《新华日报》社的乔冠华陪同下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从容交谈、留影，他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们一一分发“礼物”。纸包里原来是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记者们一拿到手就贪婪地读起来：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①

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委员长给您安排的下榻地方是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环境好，设备齐全。”毛泽东笑笑，幽默地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周至柔说：“另外还安排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由你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周恩来拉了一下张治中，张治中说：“刚下飞机，润之先生先到我家里休息一下，喝杯茶。”于是，毛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16页。

泽东、周恩来、张治中与赫尔利同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王若飞、胡乔木、陈龙等人则乘蒋介石拨给毛泽东专用的汽车驶向了曾家岩的张治中公馆——桂园。

桂园原来是曾任财政部长的关吉玉的产业。一九三八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诚就租做官邸。一九三九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临近蒋的侍从室，张治中与陈诚商量后立即转租过来。从此，张治中一直住到迁都南京。

桂园的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家十来口人，住着也够拥挤的。楼南边是个院子，院子里种了些杂树、花草之类。院子东边是大门，门边是传达室和汽车房；院子西边是警卫人员的宿舍，经常住着一个手枪排；楼房北边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的住房。院子四周是竹子编成的篱笆，颇有田园风味。

桂园的客厅是一间约二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房间。周围摆着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面是遮阳的百叶窗，里面是玻璃窗。墙角是两三盆花草，没有摆放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南墙上悬挂着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横幅；东墙挂着蒋介石书写的戚继光的一句话：“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挂的是《秦淮夜泊图》，这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
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
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环境布置，体现了房子主人的身份和当时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这里就很好嘛！”

张治中的家人头天已经搬到复兴关的梅园暂住，张夫人迁往山洞乡下。张治中最小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纯和素久）都在附近求精小学读书，没有搬走，临时与工勤人员一起住在平房。在服务人员方面，除了从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调来一位厨师，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

为了安全和可靠，张治中还把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宗族晚辈张家惠，调来桂园负责接待任务。张家惠当时在政治部任上校部附，人很机敏。

四川的习惯待客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王若飞、赫尔利等，围坐在周围的沙发上谈笑风生。服务员何守源双手捧着茶碗向毛泽东敬茶，由于心理紧张，把手里的茶碗弄翻了，撒了一地毯水，茶几上也是水。这时许多记者正举着相机拍照。张家惠很机灵地走过来，挡住了记者的镜头，让服务人员收拾好茶具，擦干了茶几，然后才闪在一边，请记者拍照。使个别别有用心记者没有拍下这个场面。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极为深刻。解放后，毛泽东在张治中面前还夸奖张家惠“挺机敏能干啊”。

张治中和周恩来在毛泽东未到重庆之前就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担任保卫工作的朱友学、伍全奎调到了桂园，以八路军副官的身份提前开展了工作。桂园周围原来担任执勤的警卫排已全部撤换成了宪兵。宪兵司令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周恩来、张治中有师生之谊。张治中把保卫毛泽东的绝对安全的意思对张镇一说，张镇欣然从命，立即落实各项工作。

毛泽东在桂园稍事休息，就立即会见刚从苏联访问回国的郭

沫若夫妇以及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下午五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又乘车到红岩新村，参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中共南方局联合举办的欢迎晚会。

办事处的同志们无比激动，为了表达对领袖的热爱心情，他们把刚刚竣工不久的礼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凳子摆得整整齐齐。电台的同志还特意买了一百一十瓦的大灯泡，把会场照得格外明亮。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从山下下车后，登上一百多个石阶，到达办事处礼堂时，白绸衬衫已经汗湿透了。这时毛泽东仍然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与所有人打招呼，问同志们好。大家热情的鼓掌欢迎，兴奋、欢快心情真是难以言表。紧接着晚会开始了，小乐队演奏了陕西的“郿鄠调”，表演了一些小节目。乐队同志，还用胡琴拉起了秧歌调，女同志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跳了几曲交谊舞。因为晚上毛泽东还要出席蒋介石的欢迎宴会，主持人很快就宣布散会了。

晚七时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陪同下，乘坐蒋介石派来的小汽车，离开了红岩村，沿着嘉陵江边，驶过沙坪坝，又沿着坡道拐来拐去，再穿过一个山洞，便到了蒋介石的官邸——林园。

绿树掩映的林园，戒备森严，除了门岗和院内的巡逻人员之外，差不多隔十来步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宪兵站岗。

晚八点半，林园灯火辉煌。蒋介石为毛泽东设宴“洗尘”。作陪的有：张群、陈诚、吴国桢、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魏德迈。多少年来，在战场上打得难解难分的国共两党领袖，此刻却并肩坐在一起，共同把盏饮酒。蒋介石

石端起酒杯，首先向毛泽东敬酒，并说了几句官场应酬的客套话，毛泽东也端起酒杯简单地答谢了几句。宴会正式开始，同时，也拉开了谈判的序幕。

宴会结束后，天已很晚，蒋介石便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住在了林园。

当晚，重庆的电台广播了毛泽东到达重庆谈判的消息，各大报都于当天出了号外。这是轰动中外的大新闻，这一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传遍了全世界。

四、蒋介石留客林园

八月二十九日清晨，毛泽东起床后洗漱完毕，即走出房外散步。陈龙在旁边陪着，沿着院中小径曲曲折折朝树林走去。龙飞虎、舒光才则在后边，相距十几步远，跟着慢慢走。毛泽东走到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墓前，看了看碑文，沉思了一下又往前走。没走多远，从前边树林中的小径走出几个人来，为首的便是蒋介石。蒋介石也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两个人谁也没有料到会在这样的林间小路上相逢。由于意外的相见，两个人都有瞬间的尴尬和不自然，但很快就为轻松、洒脱的神态所代替，相互向对方伸出了手。陈龙等三人和蒋介石身边的几个卫士都自觉地退到两侧，留神地注视着对方。这些卫士却成了国共两党领袖首次会谈的目击者。

毛泽东与蒋介石先谈天气、都说天气很好，接着又互问对方起居情况，都说昨天晚上睡得很熟。这两个问题，双方观点一致。

然后蒋介石用浙江官话说：“润之先生，今天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上午由张治中出面商谈会谈程序；下午，我率政府谈判代

表与先生进行首次商谈。你看可以吗？”毛泽东则用湖南官话朗声说道：“我看可以嘛！”然后两人擦肩而过，又各自散步去了。

上午，张治中来到林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大致议了一下谈判日程：谈判分两级，一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主要是商定国共两党之间的大的原则分歧问题；一是国共双方代表团商谈，主要是解决具体问题。

商定完谈判议程后，周恩来、王若飞举行茶话会招待各界人士。周恩来在茶话会上坦诚地告诉各界朋友：毛泽东是为和平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实行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公布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下午，毛泽东在林园与蒋介石举行第一次谈判。蒋介石坐下来，待记者照完相之后，即让侍卫人员撵走新闻记者，关上会议室的门，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先轻轻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说：“润之先生，你一再说中国有内战的危险，现在国内哪里有内战？只要中共的军队不向中央军开火，绝不会有内战。中国不存在内战问题。”

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吸一口说：“蒋先生说话不太实事求是。十年内战我就不谈了。只谈最近发生的事。据我了解的情况，别的地区不谈，上党地区就很不平静。前几天史泽波部一万七千多人就攻占了长治及其周围一些县城。这怎么是我们八路军向中央军开火呢？说中国无内战实际是对人民的欺骗。”

蒋介石“嗯”、“嗯”了几声后说：“这是对日本侵略军受降的

问题，不是内战。八路军应该原地驻防。”

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咱们今天就来谈这个问题……”

蒋介石不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挥了一下手，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先生，具体问题今天就不谈了。咱们先把大原则定下来，其它问题就好解决喽。”说到这里蒋介石又把话锋一转说：“我还是愿意听取中共在各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把八月二十五日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主张重申了一遍。蒋介石听完就不再说话了。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就这六项主张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争执不下。最后蒋介石说：“这次会谈应该遵循这样三项原则：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毛泽东看了看表，已近晚饭时间，便说：“晚上再谈吧。”待毛泽东、周恩来走出会议室后，蒋介石又对张群、张治中等人说：“我前些天曾多次说过，和中共谈判，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这些必须切记。”

晚宴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回到自己下榻的房间休息。

不久有人在门外粗声粗气地喊了声：“报告！”毛泽东轻轻挥了一下手，陈龙应了一声：“请进！”

一位全副武装的侍卫官大步走了进来，有力地举手敬了个军礼说：“报告！蒋委员长来看望毛先生。”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报纸，慢慢站起来说：“欢迎。”

几个侍卫官陪着蒋介石走进了毛泽东的房间。蒋介石摘下白手套，把手伸过来说：“打搅了。这里的生活还习惯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几十年风风雨雨，什么生活都习惯。”

蒋介石摆手示意毛泽东坐下，他自己也在侍卫官搬过来的椅子上坐下，慢慢说：“润之先生，我们还是合在一起干吧，你们不要另起炉灶了。”

毛泽东笑了：“如果蒋委员长的锅灶里有人民的饭吃，我们还另立炉灶干嘛！”

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说：“我的锅里当然可以给你们下些米，但你的胃口越来越大就管不起了。”

毛泽东也不让步：“不是我们共产党的胃口越来越大，是你容不得我们。”

蒋介石一听有点上火：“我谁都容得下，但让我承认解放区，绝对办不到。一会我们的代表还要与你们会谈。会谈之后，天也晚了，你就还住在这里好了。”

毛泽东说：“谢谢你的美意。”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一边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边却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他们正用法西斯信条在其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的动员，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继续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等人会谈。双方同意一般性交换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等人仍住在林园。

五、桂园的政治旋风

毛泽东从八月三十日起便住在红岩村，白天在桂园办公、接见客人，晚上再回红岩村休息，周恩来为毛泽东这样安排，一是

起居安全，工作人员便于照顾，更重要的是便于处理与延安党中央的来往电报，能及时指导解放区的工作，部署军事力量，协调各地区的工作，有力地配合重庆谈判。

宁静的桂园，自从毛泽东来了就热闹起来。这里白天晚上车水马龙。来拜会毛泽东的有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国际友人前来拜访，对毛泽东宛如众星捧月一般。

八月三十日上午，到桂园拜访毛泽东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柳亚子、陈铭枢；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

沈钧儒是中共的好朋友，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生怕中共上当受骗，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提出：“要当心骗局。”他对谈判能否成功缺乏信心，而且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担心。但毛泽东却十分风趣而且有耐心地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能够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章程（指一半成功的希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国共谈判犹如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

柳亚子和毛泽东早在一九二六年就结识成好友。当时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柳亚子是国民党监委会委员、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爱国诗人。后来柳亚子因为反对蒋介石搞“皖南事变”而被国民党开除。这天旧友重逢，柳亚子分外高兴，他对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弥天大勇”，深入虎穴谈判，无限敬佩。当即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毛润之老友》，九月二日《新华日报》立即刊登出来。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曾和柳亚子多次会见，并书信往还，互相唱酬。当时柳亚子对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时局和重庆谈判的前途，有些不恰当的估计。十月四日，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并慰问其夫人郑佩宜的病。同时提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两句名言。情意殷殷地期望柳亚子遇事要“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柳亚子收到信后，于十月六日便“以诗代柬”，“感赋二首”呈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毛泽东为了使各方面了解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并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特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的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屈武等八人来到桂园。

在客厅里，毛泽东以手示意说：“请坐，请坐。”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屈武和王昆仑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待大家坐定后，毛泽东说：“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反映的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感谢你们。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

周恩来请王昆仑先谈。王昆仑就介绍了当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王昆仑是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六大”代表。在国民党“六大”会议上，王昆仑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有人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火了。五月十日亲临大会斥责王

昆仑说：“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还像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指其夫人曹孟君）。”全场为之哗然。事后，蒋介石自知失言，曾在中央纪念周上承认语言不当，请同志们不要在意，并派黄少谷向王昆仑道歉，解释误会。于右任先生对此事评论说：“王昆仑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毛泽东听后莞尔一笑说：“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王昆仑又补充说：“我虽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

侯外庐说：“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他三次邀你来重庆谈判，并非出自诚意。和谈很难成功。”毛泽东幽默地说：“国共两党的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说：“我看好像老头子和少女的联姻，好事难成。”毛泽东右手把下巴一抹说：“老头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毛泽东的话刚落音，大家全笑了。众人见毛泽东态度随和，便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有人请毛泽东注意安全，有人请他注意气候变化和身体健康。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详细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最后说：“看来我与民主革命同盟的朋友仍有缘份。我们谈得很投机嘛！”并留这八位朋友共进晚餐。

晚上八时后，毛泽东处理完别的事情，又单独和屈武、王昆仑、许宝驹谈话。毛泽东想听听各方面对这次会谈的反映，他先问屈武：“你是于右任先生的女婿，蒋经国的好友，他们对这次和谈有何看法。”屈武说：“您来重庆会谈，完全出乎国民党元老们的意外，很多人以为您不会亲自来，而是派人来谈。您到重庆后，于右任先生对我说：‘真没想到，毛先生如此顾全大局，可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了。’张治中也说：‘毛先生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于先生对张治中说：‘您陪毛先生来重庆，将来史书

上要记上：秋八月，张治中陪毛公飞渝。’孙科、邵力子也表示：‘毛先生能来重庆，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

王昆仑谈了各方面的反映后说：“在民主人士中，大家企望和平，总希望共产党尽量让步，牺牲人民的利益求得和平。他们没有想过，今天中国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作为人民的后盾，蒋介石是不会让民主人士说半句话的。这种想乞讨民主的想法，我看很天真。所以在民主队伍中，也还要进行宣传，使大家明白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的让步也应有限度。”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谈话后说：“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最后毛泽东还赞扬了于右任先生的诗词和书法：“感谢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九月三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郭沫若看到毛泽东没有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多少年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多次谈起这件事，并且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能叫别人拿去。这块表曾修过几次，表带也换过几次，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

九月十二日上午，在红岩村会见许德珩教授和夫人劳君展。毛泽东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激动地说：“二十多年没见面，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和许德珩回忆起当年在北大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劳君展回顾了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往事。劳君展说：“毛先生您还记得吗？一九二一年我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您约了许多新民学会的人，在半

崧园欢送，并摄影留念的情景。”毛泽东朗声说：“记得，记得。”真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话题又转到延安的生活状况。毛泽东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显著好转了，基本上做到了丰衣足食。我们长征初到陕北，那时相当艰苦。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怀表、火腿和布鞋。”劳君展忙说：“哎呀，这事您还记得！”于是就把买怀表、火腿、布鞋的经过对毛泽东讲了。一九三六年的秋末冬初，徐冰、张晓梅夫妇到许德珩家，谈到延安物资困乏，没有怀表，只穿草鞋。于是劳君展就拿钱买了这些东西，托张晓梅带走。张晓梅问：“要不要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收条？”劳君展和许德珩忙说：“不要，不要。”毛泽东听了说：“啊，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后来又谈到“科学民主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鼓励许德珩说：“既然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毛泽东这么一启发，许德珩等人决定把“科学民主座谈会”改组成“九三学社”，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九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热情招待产业界著名人士。到会的有刘鸿生、范旭东、胡曲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等。毛泽东首先赞扬他们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实现了独立、民主、自由的条件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作敌人的，而是当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

关系。”毛泽东及时地把党的基本政策向民族资产阶级交了底，使他们放心地走向新的时代，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八月的某一天，经周恩来的介绍，毛泽东与著名作家张恨水见了面。毛泽东表扬了他主编的《新民报》副刊在抗战中的贡献，还称赞其小说“比以往的言情小说进了一大步”。临别时赠张恨水一块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毛泽东握着张恨水的手深情地说：“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我们自制的粗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张恨水回到距重庆三十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同家人叙述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并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让全家品尝。张恨水用粗毛呢做了一件中山装，只在集会、待客时才舍得穿。这年十一月初，有人拿毛泽东写的词《沁园春·雪》给张恨水，希望他能和一阕，共同在《新民报》上发表。张恨水觉得《沁园春·雪》写得大气磅礴，非同凡响，没有冒昧应和，遂于十一月十四日在《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上刊载出来，署名“毛润芝”，过了一天，这阕大气恢宏的词在《重庆日报》上转载了，立即轰动了整个山城。

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挤时间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援助中国抗日战争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桂园接见的国际友人中除了驻华使节、外国通讯社、报社的记者外，还有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和夫人，美国来华参加对日作战的飞行员。九月十六日，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带来三位美国飞行员，到红岩村送上一个小包，内有几盒香烟，上面写着：向毛泽东问候，祝贺谈判成功。周恩来热情地接

待了他们。毛泽东知道后，连忙挤出时间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一起畅谈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并设宴招待他们，临别时又合影留念。

毛泽东的“和为贵”的主张，深入中外所有热爱和平人的心里。许多人对谈判的前途持疑虑态度，当路透社记者问：“假如谈判破裂时……”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六、险象环生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中，各党派、各界人士求见、拜会者络绎不绝；公私宴请，每天必有。不管蒋介石的内心多么恨共产党，但他表面对毛泽东的礼遇也是很隆重的。据文献记录，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多次。每逢宴请，两人还相互敬酒，共祝健康。九月十七日中午，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作陪的有张群、王世杰、张治中和赫尔利大使。美国《生活》杂志社的记者还为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三人拍了照。现在出版的许多蒋氏的传记中，随处可见去掉赫尔利之后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双人照。这是两大政治对手在空间上给我们留下的走得最近的记录。毛泽东的谦逊、和蔼、亲切、诚恳给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方面，蒋介石都十分佩服。据多种传记材料记载，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①

^① 《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50页。

十月八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会谈，商定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双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家十分高兴。是晚，张治中邀请了国民党参政员、党政军要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各方知名人士五百多人，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欢送毛泽东主席。

宴会开始前，张治中有个简短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

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张治中讲话之后，毛泽东主席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也答谢致意：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

……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张先生刚才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它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记录稿，未经毛泽东主席核定）！^①

毛泽东讲完话之后，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紧接着宴会开始，宴会之后是京剧晚会。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29—733页。

当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王若飞等人正聚精会神看戏时，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的一个同志匆匆来到礼堂找周恩来。一位副官走到周恩来身边，俯身贴耳对周恩来说了几句话。周恩来立即站起来对毛泽东说了句“有点事，我出去处理一下”就往外走，表情严肃、镇定。

周恩来到了休息室，新华日报社的那位同志才详细说了事情的经过：八日下午柳亚子到曾家岩周公馆了解国共谈判情况，适逢周恩来外出。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当时担任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便热情地接待了柳亚子先生。谈到约五时许，柳亚子要回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出于对柳亚子的尊重，叫了办事处的汽车，亲自陪送柳先生回沙坪坝。回来时，经过红岩村附近，被国民党的士兵开枪击中。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周恩来听完来人的简单报告之后，因事情过于突然而震惊。但他仍然沉着冷静，没有惊动毛泽东和张治中，只是让人把宪兵司令张镇和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找来。周恩来严厉地盯着张镇问：“我刚才接到报告，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乘坐汽车从沙坪坝回曾家岩，在路上被你们的士兵用枪击中了，现送到了市民医院，你知道不知道此事？”张镇听了也大吃一惊，忙说：“我一点都不知道。”周恩来说：“你既然不知道，就请你尽快查明真相，向我报告。”随即带着张镇和钱之光来到市民医院探视李少石。这时，李少石因为子弹穿透肺部，流血过多，已经去世。周恩来沉痛地流下眼泪，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

因为晚会很快就要结束，周恩来对张镇说：“晚会结束后，请你负责保证毛泽东主席的绝对安全，让他乘坐你的汽车。你要亲自把毛泽东主席送到红岩办事处！”张镇立即答应照办。周恩来回

到军委会礼堂，他对陈龙等人布置了保卫工作，就又轻轻回到座位上陪着毛泽东观看京剧。

晚会散场后，周恩来又陪着毛泽东向与会的国民党要员从容告别，然后来到休息室坐下和张治中夫妇又寒暄了一会。周恩来始终没提李少石被击毙一事，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涵养和冷静。待大家都乘车离开礼堂之后，周恩来和张治中才陪同毛泽东坐进张镇的汽车。周恩来关好车门之后，才拉住张治中，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不幸事件。张治中听后也为之大惊。

周恩来回到红岩村后，才把李少石之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这天夜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起床了。他在屋中踱步沉思，片刻，坐在桌前挥毫写了“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的悼文。

周恩来当夜又和王若飞等人研究调查李少石被杀事件的真相。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社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此事正在紧急调查中，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照常工作，不要惊惶。”周恩来又布置工作人员配合张镇派来的宪兵司令部的官员对出事汽车检验照相，到市民医院检验尸体、照相。

张治中回到政治部马上打电话与各方面进行联系，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钟，也没有得到确实的答复。张治中十分紧张，事情发生在“谈判协定”签字前，是误杀还是预谋？是有意破坏国共和谈，还是意外事故？不只人们议论纷纷，他自己的脑子里也日夜搅着这些问题。

李少石事件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又发生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又不知去向。这些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当时甚至谣传说特务本来是要杀周恩来的，因为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他当作周恩来错杀了。周恩

来沉着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交代钱之光、陈龙、龙飞虎等人加强保卫工作，以防万一；一方面催促国民党当局迅速破案。他自己又亲自找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的同志详细询问司机和他们接触的情况，并派人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群众调查。

蒋介石得到报告也很紧张，下令戴笠彻查。重庆卫戍总司令王赞绪、警察局长唐毅也派专人调查。

经过紧张的工作，到十月十日案情已经清楚：李少石乘坐的汽车经过红岩村附近时，有一批新兵正在路边休息，因车行过速，不慎碰伤了一名新兵，他们叫停车，但司机没有听到，仍向前开。新兵排一个班长就举起步枪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汽车后备工具箱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抢救，怕责任重大不敢直接向办事处领导报告，将汽车开回曾家岩车棚，把车钥匙交给报社营业部，要他们赶紧向办事处领导报告，自己便称病逃跑了。

李少石遇难后，许多民主人士更加关心毛泽东的安全，以各种方式劝毛泽东早日离开重庆。有的说：“重庆气候不好，易患感冒，您还是早点返回延安吧。”

毛泽东仍然从容谈判，该干什么干什么。十月九日，他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之邀，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出席作陪。宴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又继续直接会谈。蒋介石仍然要求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婉言拒绝：“这是不可能的。”

七、签订“双十协定”

国共谈判实际上是一九三五年开始的，到一九四五年整整谈

了十年。在这十年谈判中，周恩来是一直唱主角的。因为周恩来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角色。这次重庆谈判是涉及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唱主角的自然又是周恩来。

九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人在桂园进行了一次泛泛的交换意见性质的谈判。九月三日下午，鉴于国民党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周恩来便把中共拟好的十一项方案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由他们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后认为“实无一驳之价值”，便亲拟《对中共谈判要点》，并指定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为国民党政府的正式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

从九月四日到十月五日，国共两党共进行了十二次谈判。在这一个月之内，谈谈停停，基本没有进展。在这十二次谈判中，王世杰没有参加，张治中因为去新疆处理三区问题而缺席三次。张群、邵力子参加所有会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国大”、“政治会议”、“军队”与“解放区”四项。而抗战以来历次国共谈判都未解决的“军队”与“解放区”问题更是争执的焦点。

蒋介石的策略就是边打边谈，以打压谈。借谈判争取时机聚集力量，准备大打。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始终没有停止调遣军队，对解放区不断发动进攻。

九月五日，国民党在广东集中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开始向解放区和游击区发动进攻。

九月十二日，胡宗南、孙连仲的部队，在河南集中二十万人，沿平汉线开始进攻解放区。

在山西上党地区，国民党军队更是肆无忌惮地进攻。九月二日，刘邓大军经过一天激战，夺回襄垣城，歼敌八百余人，首战

告捷，拉开了上党战役的序幕。这时重庆谈判刚刚开始，这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和周恩来。晚宴后蒋介石单独与毛泽东谈判，就军队编制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等问题，逐一讨论。蒋介石仍然坚持“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会谈后他拍电报给困在长治的史泽波，予以嘉奖，鼓舞士气。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宴会桌上可以和你觥筹交错，碰杯把盏；在谈判桌上会气势汹汹地向你施加政治压力，以期获得在战场上获不到的利益；在战场上却杀气腾腾地指挥军队与你兵戎相见。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林园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作陪。宴会后，蒋介石又与毛泽东单独商谈。两个人争执不决的仍然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写信给阎锡山，并附《剿匪手本》两册，指示他进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晋东南刘邓大军以凌厉之势相继攻克屯留、潞城、长子和壶关，使长治守敌陷于孤立。紧接着以胜利之师包围了长治守敌。刘伯承、邓小平用枪炮在战场上批驳了蒋介石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和否定解放区、人民军队存在的谬论。

九月下旬，正当刘邓大军对长治守敌发起强攻的时候，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两万余人，沿白晋线急行南下，企图援助长治史泽波部。这时重庆谈判已进行了二十几天，双方能妥协的已作了妥协；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不能妥协的仍没有妥协。九月二十日，获悉蒋介石密电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

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①

九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周恩来指出：“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这天赫尔利气势汹汹地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他说：“要么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么破裂。”毛泽东则以政治家的恢弘气度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于是谈判陷于僵局，从九月二十二日到九月二十六日，谈判休会五天。

蒋介石也于九月二十七日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西昌，住在邛海边西昌新村特宅做“短期休养”。显而易见，这时蒋介石躲开重庆，对谈判采取“拖”的态度，是在“等待”。“等”什么呢？等待阎锡山的“好消息”，等待彭毓斌发自上党的“胜利消息”。“好消息”一到，再向中共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但是，刘邓大军使蒋介石的希望破灭了。从十月二日起，刘邓大军决定暂缓攻打长治，提出“围城打援”的方案。此方案当即密电重庆毛泽东主席批准。在此前后，刘伯承、邓小平一直与重庆的毛泽东保持着电讯联系。

刘伯承、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于十月三日挥师北上，在老爷岭和磨盘脑一带，与增援长治的彭毓斌部激战数日，到十月八日，全歼援兵近两万余人。敌酋彭毓斌畏罪自杀。蒋介石在西昌等到的就是这样的“好消息”。

十月八日，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同意修改定稿后的“会谈纪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8页。

要”，并预定十月十日签字。这真是像毛泽东后来说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①

十月十日清晨，桂园的工作人员就忙碌起来了。大家把小小的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衣帽架、茶几等擦拭得锃亮，放了茶壶和茶杯、香烟等用品。客厅的中间放着一张条桌，上面铺了洁净的白台布，摆好了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没有让新闻单位来人，所以事后外界没有任何报道。

午后四时许，双方代表几乎同时到达会场，互相致意后，共同审阅了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全文，大家就按名次先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家虽然没有发表激昂的讲话，也没有什么议论，但从脸上的表情看，个个显得极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一个人是在事后补签的。双方商定，“纪要”的全文十二日在报纸上公布。因为“纪要”是在十月十日签订的，所以大家又通称它为“双十协定”。

签字仪式之后，邵力子向双方代表建议说：“这次会谈，所以能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辛劳奔波。我们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泽东下楼和大家一一握手，互致祝贺。

“纪要”签字不久，蒋介石全副武装，身佩短剑来到桂园拜访毛泽东。两个人略事寒暄，互致祝贺，即乘车同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招待会。在酒会上毛泽东向蒋介石祝酒说：“蒋主席万岁！”引起全场中外人士的注目。

近五时半，国庆招待会结束，毛泽东回到桂园休息。六时许，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9页。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到蒋介石的官邸林园辞行。蒋介石设宴招待。宴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又单独商谈军队编制和解放区问题。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毛泽东等人又夜宿林园。

十月十一日晨，早餐毕，蒋介石又抓住去机场前的一段时间，与毛泽东单独会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政府不能再做让步。”毛泽东则说：“周恩来、王若飞将留下来继续谈判这个问题。”

上午九时，由陈诚、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九龙坡机场。

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知名人士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等五百余人。毛泽东与送行的各界代表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他还特意与在桂园保卫的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他在登机前发表简短谈话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八、张治中二到延安

重庆国共谈判的整个过程是尖锐、曲折、紧张、复杂的，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的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四方活动，力图转圜。在四十多天的谈判过程中，张治中真是劳心敝体，有时在室内伫立良久，冥思苦想对策；有时绕室踱步，喃喃自语默述复案；在谈判的紧张时刻，他往往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过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体谈、个别谈，最后以中共让出八个解放区和缩编军队为代价，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签订“纪要”。所以说“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识大体、顾大局的结果。张治中在解放后写的回忆录中说：“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①

尽管中共做了三次重大的让步，但蒋介石仍然不满足，国民党内部阻力也相当大，据邵力子先生说：“照当时的情形，公报几乎仍旧不能发布。”张治中为此四方奔走疏通，“尤其是双十节发表‘会谈纪要’之前的两三天，张先生努力很大”，“纪要”的发表，“很要感谢张文白先生的最后努力”。^②张治中在那几天曾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③国民党的其他代表也愿搞个“纪要”公布。这样好对党内外有个交代。

总之，张治中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劳心费力，功不可没。

重庆谈判时间，蒋介石采取“拖”的战术，妄图以“拖”来赢得时间，“拖”垮共产党，使毛泽东就范。但毛泽东、周恩来连连做出重大的让步，不断地推动着谈判向前发展。蒋介石见“拖”不成，就采取“打”的办法，企图以“打”逼“和”，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但蒋介石设想到上党战场上节节失利，打又打不赢。蒋介石为此一筹莫展。这时有些反动谋士出谋划策，让蒋介石把毛泽东、周恩来软禁起来，扣作人质。有的特务分子更是胆大包天，竟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周恩来得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29页。

② 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3页。

到这些消息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首先全力加强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红岩村的干部全部参加站岗放哨，还从新华日报社抽调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保卫工作。再者就是利用一切情报关系，向蒋介石施加影响，使他尽快打消可能自食苦果的罪恶念头。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向戴笠施加压力，给予警告：一旦出现不利于毛泽东的情况，戴笠和大大小小的特务头子都不会有好下场。另外，还公开地向国民党当局及宪兵司令张镇提出安全要求，责成他们负责到底。除此之外，周恩来还耐心地说服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在报纸上公布“国共和谈”已经取得的成果；向国民党朝野人士表明共产党的和平愿望；向全国人民公布中共在和谈中所做出的重大让步，争取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对蒋介石施加了极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工作，一时间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社会团体、知名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纷纷发表声明，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国家和平统一。举国上下都盼望谈判达成协议，避免内战。这时蒋介石和反动的谋士、特务头子们都有所顾忌，担心谈判破裂向国人无法交待。

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觉得连续两天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有些问题已经达成协议，谈判进入后期，便主动去拜访张治中。

周恩来说：“文白先生，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一个月了，谈判的协议已基本通过。毛主席想早一点回延安，那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协议是否可以早点签字？”

张治中问：“毛先生预定哪一天回延安？”

周恩来说：“预定十月一日走。”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走，我们可不放心啊。”

张治中向来是敢于负责，为人慷慨，立即说：“恩来兄您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十月一日不行。我

的活动很紧张，日程都安排满了。要在十月十日后才成。不过这事我还得向蒋主席报告。”

十月八日上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主席同意毛先生在‘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他的专机‘美龄号’送。但有个新情况，蒋主席要我在‘纪要’签字后立即飞兰州，去新疆解决伊犁地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只派专机，没有政府的人陪送，毛主席的安全还没有保障。您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去新疆呢？”张治中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当即答复说：“可以。不过还要请示蒋主席批准。”当天上午，张治中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先送毛泽东回延安，再飞兰州。周恩来这时才放心了。他除对张治中表示感谢外，还请张转达他对蒋介石的谢意。张治中也以此为荣，所以，他在八日的晚宴上就高兴地向各界客人宣布，他将陪毛先生回延安。

解放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在一起谈起往事时说：“文白先生，当时您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我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十月十一日下午近两点，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乘坐的专机“美龄号”安全地降落在延安东门外机场上。

这时机场上聚集了两万多人，他们是来自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学校的学生，工厂的工人，部队的战士。放羊娃挥着鞭子，铲地的庄稼汉扛着铁锹来到了机场；有的老乡知道毛主席从重庆回来，他们早早吃了午饭从七里堡、十里堡，甚至从三十里以外的山沟里跑来迎接自己的领袖胜利归来。机场上男女老少，群情激奋，口号声不断，锣鼓声震天。扎着白头巾的腰鼓队，整齐地挥动着鼓锤，“咚叭”“咚叭”地敲着花哨的鼓点；秧歌队挥舞着彩绸，踩

着欢快的锣鼓点在扭秧歌。这不仅是张治中从没有见过的场面，也是他想都想不到的壮观。

机场热烈的场景，给张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后，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愚不可及了！”^①

毛泽东和张治中走下飞机后，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走向前，与毛泽东、张治中热烈地握手，互致问候。群众高呼“毛主席好！”“欢迎毛主席胜利归来！”刘少奇请毛泽东讲几句话。毛泽东兴奋地说：“这次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收获，日内要公布一个文件，叫‘双十协定’。这是初步的收获，虽然还有困难，但打开了局面。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感谢前次接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的张治中先生。并把张治中介绍给大家，请他向群众讲几句话。

张治中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本人奉蒋主席之命迎送毛先生，实为一生最大的荣幸。”紧接着他盛赞了谈判的成功，强调中国从此将步入新的和平团结时期。

下午，张治中在王家坪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晚上六点，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的首长，又在杨家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到会七十余人，热烈欢迎张治中部长陪送毛泽东主席返回延安。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33页。

晚上，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张治中部长。在答词中张治中说：“此次欢迎毛先生去重庆，又恭送毛先生回延安，这是我最引以为荣幸的事。”他强调说：“希望中国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团结，一定要民主，一定要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彻底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① 会场上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晚会至夜十二时才散。

十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张治中离开延安乘飞机返重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人又亲赴机场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在车里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们也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工作。”

张治中说：“毛先生过奖了。”

毛泽东又说：“您对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笑笑问：“何以见得？”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个我也调查过。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多人不赞成。第二件事，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释放了许多革命青年。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说得张治中心里热乎乎的，他感到毛泽东对自己十分了解又十分理解。

以后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四五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

^① 《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①

十月十一日上午，张治中陪毛泽东去了延安。这天晚上，周恩来在桂园设便宴招待桂园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毛泽东的热情服务，感谢他们为重庆谈判做出的贡献。周恩来为每一位工作人员敬酒致意。

宴请完毕，人们都走了，周恩来拉住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说：“来，我们谈谈。”

两个人就随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周恩来问：“你在那个小学读书？”

张一纯说：“就在旁边的求精小学。”

“读几年级？”

“五年级。”

“功课很好吧！”

张一纯腼腆地说：“功课不行。”

周恩来问：“什么功课不行？”

“数学不行。”

“那么你有没有行的呢？”

张一纯笑了：“有的。我的语文、作文就很行。国民教育（政治）行，地理常识也行。”

周恩来听了笑笑说：“没关系，你只要有一门功课很好，就可以了。”

张一纯突然问周恩来：“我很想到延安去玩玩，不知能不能去？”周恩来想了一下说：“可以。但现在不成，现在条件很困难，将来我一定请你去。”周恩来又说：“我给你题几个字好不好？”

^①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第162页。

张一纯高兴地说：“当然好了。”赶紧跑去拿了纪念册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打开纪念册，握着自来水笔想了一下，写道：

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一纯世兄

周恩来

卅四年十月十一日

张一纯看了题词，不解地问：“你是我的老伯啊，怎么称我世兄呢？”那年张一纯才十三岁。周恩来拍了拍一纯的肩膀说：“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

张一纯至今仍珍藏着这本纪念册。他深情地对笔者说：“我每忆起此事，就更加发奋工作，不能辜负周总理对我的期望。”

第四章 整军谈判友谊加深

“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的军队就向中共的军队发动了进攻。请看如下事实：

十月十一日，傅作义率部攻占了中共重要城市张家口，继而又占了通辽等地。

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国民党将领发布密令，即“西元密令”称：“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①并命令三、六战区，第十战区向浙西、浙东、长江南岸、皖南、淮北的新四军进攻。

十月上旬，国民党三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四十七军进攻太康；八十五军进攻原武县城。

十月二十三日，何应钦命四十八军进攻北撤的新四军一部；李品仙部武装日本侵略军两个旅团向苏北解放区进攻。

十月十七日，据新华社统计，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夺走中共所辖城市三十一座。

自“双十协定”签订之日到十月三十日晚，蒋介石已命令八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5页。

十万大军向解放区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的谈判能有什么结果呢？

一、两党谈判举步维艰

“双十协定”后的第一次“国共会谈”一直拖到十月二十日才进行。这次会谈内容主要是商谈各方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问题。在周恩来、王若飞的坚持下，二十一日谈判中确定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蒋介石为会议主席。

在二十一日的谈判中，最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又提出来讨论。因为蒋介石说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不再让步，所以这个问题的谈判极为困难。

在一个多月的谈判中，关于“避免内战”、“解放区政权”、“中共受降”、“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一个也没有解决。相反，国民党却利用谈判之机，加紧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阎锡山的部队向解放区推进三百余里，占领了大同；胡宗南的部队从陇海路推进石家庄；李延年部进军泰安；李品仙部进军津浦路南段；傅作义部进军平地泉；孙连仲部进犯河北。

十一月十七日，是最后一次谈判。这时东北问题已日益暴露，国民党军队在美军支援下，已于十六日攻占了被八路军接受的山海关，并继续向锦州推进。事实充分证明，正如党中央在十一月八日致周恩来、王若飞的电报中所说的：“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飞返延安。他一到延安就立即着手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到十二月五日，他写成了《关于国共谈判》向中央的书面报告。报告叙述了七周的谈判情况，指出反内战、求和平的方针深得人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候现在还看不出来。美国在抗战时是扶蒋用共，现在是扶蒋压共。要蒋介石放弃灭共企图不可能，但目前下讨伐决心，也不可能，国共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斗争是严重的复杂的。报告提出今后谈判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们提案为基本价钱，进行‘也谈也打’的谈判。”^①

十二月八日，周恩来在向延安的干部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时说，国共谈判可以分两个阶段，前五十天，毛主席在重庆，国民党偏向于和；后五十天，国民党偏向于战。它沿铁路线前进，分割华北、华中解放区，“清剿”华中、华南解放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边打边谈”。我们的方针仍是：团结、和平、民主、统一，用自卫力量挡住他的军事进攻，用和平力量向他做政治进攻。美国是扶蒋压共。我们的对策是使美国知难而退。对美国的批评要有区别。第一，把政府和人民分开；第二，把他们正确的地方与错误的地方分开；第三，把统治者中的进步分子和反动分子区分开；第四，把今天美国的政策和将来可变的政策区分开。

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运用唯物辩证法准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尤其是四个区分对待，更是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

“双十协定”签订后，张治中就去了新疆。这七周的国共谈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八九——一九四九），第629页。

判都是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张治中于十月十二日由延安返回重庆，十三日晨就乘飞机去了新疆，一到迪化就立即忙于处理“伊宁事件”。他的人虽在西北边疆，而他的心却时时系着内地的局势。

十一月九日至十六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发表讲话，诬称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猖狂地提出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首先控制皖北、苏北、山东，打通津浦线，然后再集结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最后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

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并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号召所有国民党军官在进攻解放区的问题上，要“建立必胜信心”。^①

张治中获知军事会议的内容，于是寝食不安，立即写了一封“万言书”，托驻迪化第八战区的副长官郭寄嶠带给蒋介石。他在“万言书”中力言对中共问题应采取政治方式解决，这是唯一的途径，希望蒋介石坚持这一方针。现节录其中一些段落。

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

^①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319页。

目前国际情形，以常识判断，现在国际关系，虽然复杂，若干问题虽未获得解决，但无论何国，似均不愿于此发生时发生战争。我国如欲凭借任何一国之力量，企图促使国内问题之解决，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国经历八年余之苦斗，始获今日之国际地位，如于抗战甫告胜利结束之今日，内部再有战争，且为一时不易结束之战争，国际友人对我国之观感如何，不难想象。如是则我国现在之国际地位与钧座在国际间之声望，恐均不易保持。

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沦陷区人民饱受敌伪之压迫摧残与多方剥削，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即大后方民众，亦以物价过高，负担过重，一般生活，备感痛苦，徒以大敌当前，不能不尽最大之坚忍，以期待胜利之来临；今强敌投降，战争结束，举国人民所欢欣仰望日夜祈求者，厥为迅速恢复秩序，俾在和平状态之下，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处在革命政府之立场，于心实有所不忍。故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可不待烦言而喻者。

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①

周恩来与张治中都看出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心不死。所以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34—736页。

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爆发早晚的问题。周恩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面对蒋介石要打内战，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的形势，主张“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用自卫力量挡住他的军事进攻”。即以革命的人民战争，制止反革命的内战，以实现国内和平。同时也不排除“用和平力量”向蒋介石“做政治进攻”。张治中则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从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出发，苦劝蒋介石不要发动“一时不易结束之战争”，以免失去军心、民心，危及蒋的个人专制，继而在国际上也将威信扫地。蒋介石也看透了张治中的心思，所以，只要他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鬼把戏时，总要打出张治中这张牌。

十二月二十日，蒋经国奉派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向张治中传达蒋介石的旨意说：“希望早日结束新疆和谈，返回重庆。”

十二月三十日，蒋介石急电张治中：“此间有要事待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①

到底有何要事呢？此时连张治中也估摸不透。

二、军事“三人小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他在信中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赫尔利在驻华使馆里与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矛盾很深。从赫尔利上任那天起，他就与使馆

^① 余湛邦：《张治中生平大事记》，《文史资料选辑》总一百二十三辑，第209页。

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与赫尔利争执最多的是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并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走你！”但谢伟思仍无视赫尔利的警告，很快便把他召回华盛顿。不久谢伟思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

约翰·戴维斯曾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建议美国终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对共产党部队的进攻。他也被赫尔利赶回了美国。

赫尔利在辞呈中还说，有些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人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作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作，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马歇尔曾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在天津的美国步兵十三团服务过。他虽然不是中国通，但对中国也有一定了解。马歇尔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使盟军得以获胜的主要功臣，被晋升为“五星上将”。他性格沉稳，举止文雅，为人正直；他的聪明才智比赫尔利更胜一筹，但他对明争暗斗、错综复杂的中国政坛并不比赫尔利谙熟。

马歇尔在来中国前的半个月里，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

阶段的对华政策。政策基本没变，马歇尔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即使马歇尔的努力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造成的，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个决定对外是保密的。

美国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在华北、东北建立军事力量，表面的理由是为了遣返日军，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军事对抗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声明中说：如果马歇尔能完成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使命，中国将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

马歇尔带着三项任务来到重庆：一、努力促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停止敌对行动；二、完成按比例将共产党的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三、召集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其它团体参加的全国政治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为杜鲁门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也都欢迎他，都认为对自己有利。

马歇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本来不必到南京迎接，但他为了讨好美国，还是降低身份到南京迎候马歇尔，并作短暂的晤谈。

马歇尔这年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但他仍然气宇轩昂，精神抖擞。他在美国国内有很高的威望。他来华调解国共矛盾，不仅中美两国人民注意，在世界许多国家也是引人瞩目的事。

十二月二十二日，马歇尔到重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二十三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拜访了马歇尔。周恩来介绍了中国一些情况，对马歇尔说：“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抗战整整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

再有内战了。”

马歇尔说：“我这次来中国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解贵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制止内战。”

周恩来又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召开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联合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成为实行宪政的国家。”

马歇尔说：“听说政治协商会议很快就要召开，改组政府也就很快了。”他对中国的形势估计太乐观了，把中国的政坛看得太简单了。这点与赫尔利有点相似。

最后周恩来说：“美国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世界各地都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摆脱恐惧即反侵略的自由）；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富有政治经验的马歇尔在南京听了蒋介石对中共的恶意攻击和诬蔑，今天又听了周恩来对中共主张的解释，明白了国共两党分歧的实质是：国民党主张统编中共军队应在联合政府建立之前；中共则坚持必须先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他们在这个政府里有真正的发言权，这是统编中共军队的先决条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决条件就是停止内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33页。

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与王世杰谈判时，王世杰就向周恩来递交了国民党的复文。该文件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同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

从复文上看好像可以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杜聿明部在十二月中旬从葫芦岛登陆后立即向西侵犯冀热辽解放区，企图侵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赤峰和多伦；津浦线的徐州至济南段也打得十分激烈；在沈阳设立了“东北行营”后，蒋介石决定再运兵五个军到东北，目的在于扩大战争。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说：“贵党如果接受政府方面昨天提的三方会谈的提议，我想建议：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

周恩来对这个建议是赞成的，但没有立即明确表示意见，只是说：“我们欢迎外来友谊，但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周恩来向延安请示后于一月三日再次与马歇尔会谈时说：“中共中央欢迎您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

马歇尔见中共同意自己的意见，就又提了新的建议：“有了三人委员会，可以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周恩来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见。

一月五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同张群、王世

杰、邵力子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随后又与马歇尔会谈，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条文。

蒋介石为什么急着让张治中返回重庆呢？就是因为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要成立“军事三人小组”，蒋介石拟让张治中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但新疆远在千里之外，不可能立即返回重庆，而且他还有伊宁问题，得告一段落。蒋介石就先派张群为代表，暂时代理张治中。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张治中先把“伊宁商谈”双方已达成的协议部分签字，其余部分留待以后再谈。一月三日便匆匆乘飞机往重庆赶。由于气候恶劣，他在酒泉、兰州都耽搁一天，一月六日才到重庆。张群一见张治中回到重庆，马上找张治中说：“这事本来是你的，我是暂代。你回来了，我可以马上交待。”张治中说：“我刚到重庆，那不行。你们都谈了一半，有些情况我又不了解，怎能半路插手？等你们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

就这样，一月七日“三人小组”开第一次会议，由张群出席，张治中没有参加。

第一次会议，国共双方分歧很大。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又提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理由是“政府要接受主权”。赤峰和多伦早已被八路军占领，周恩来坚决反对张群的提议。马歇尔见国共双方为东北、华北问题争执不下，只好说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谈判桌上不讨论，但底下照样各打各的。

“三人小组”连着开了两天的会议，毫无结果。九日上午，周恩来邀见马歇尔，表示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无理要求，这时马歇尔也着急了。他心想，明天上午十点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如果停战令不能下达，会就开不成，即使开了会，也会在

会上会下吵个不停。马歇尔气势汹汹地找到蒋介石说：“如果不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就开不成。下一步就是三国出面干涉。你可要好好考虑其后果！”蒋介石也怕落到这步天地，便软下来答应撤回接受赤峰、多伦的要求。

九日晚上，马歇尔通知周恩来：“周先生，明天上午八时整，准时在我的住处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协定。”

十日上午八时，周恩来乘车准时赶到重庆牛角沱。张群也准时来到马歇尔的会客室。因为所有的文件都是早已准备好的，只是把国民党的不合理要求删掉就成了，所以没有用多长时间，周恩来与张群就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下列文件上签了字：《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等。命令规定：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起，“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国民党军队向东北的调动除外。签完字，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等一起到门口照相留念。

签字仪式之后，周恩来与马歇尔、张群握手告别，即乘车返回代表团驻地，准备参加上午十时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

十日当天，毛泽东给各级党委、政府、部队发出电报，命令：“停战协定”必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国民党也由中央社发表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下达的停战命令。

国内战争暂时停止了。

三、“共产党的代表”

一月十日上午，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致词说：政府准备“接受会议一切决议，只要这些决议有利于国家建设，有

裨益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他还提出四项诺言：人民有人身、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自一九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兵戎相见达十年之久，后来虽有第二次合作，但摩擦不断。今天国共两党的代表和社会贤达、民主党派的代表能坐在一起开“政治协商会议”，这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历史上还是一个创举。周恩来百感交集，在致词时说：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中共代表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他还说，我们“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①

历时二十二天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月三十一日举行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五个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随即举行闭幕式。周恩来致词对政治协商会议予以高度评价：“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②周恩来最后说：尽管这些协议与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主张有距离，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护这些协议，并为这些协议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①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36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412页。

当天晚些时候，周恩来拜访了马歇尔，首先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停止内战所做的努力，希望他再促使东北停止内战。周恩来说：“您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合作。”

马歇尔也说：“美国政府也希望国共合作，中国不再有内战。”

周恩来又说：“我们中共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目前不打算将它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中国能实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从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马歇尔最后表示要说服蒋介石，使他解除对中共动机的疑惧。

二月一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蒋介石则正式通知周恩来，“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今后就只张治中一人出席“三人小组”会议。

张治中自元月六日到重庆后，就一直为“整军谈判”做准备。政治协商会议一闭幕，“整军谈判”就遵照政协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立即开始。

二月一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初次会谈。马歇尔建议国共军队双方混编，中共军队主要驻在华北，一部分可驻在东北、华南。周恩来希望“三人小组”能尽快到各地视察，这样既可以调查停战和恢复交通的情况，又可就整编问题同各地将领交换意见。关于军队编制，张治中不同意中共军队整编分二十个师，主张按七分之一的比例整编中共军队。

正式的“整军谈判”从二月十四日开始。在此之前，马歇尔起草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马歇尔在起草过程中没有与周恩来、蒋介石商量过，草成后，也没有交周恩来看过。因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没有提到一点有关这个草案的内容。

马歇尔在这个方案中至关重要的有三点：一、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共领导；二、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三、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也不少于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方案只有少数人知道，并未公布于众。按照马歇尔的方案，整编后的陆军，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比为一比二。不是过去会谈中争议的一比七或一比五。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在过去历次谈判中，中共向来未提过要求，现在凭空各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这是蒋介石意想不到的，也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蒋介石看到这个方案时，脸上勃然变色，青筋暴露，两手发抖，呼吸短促，几乎要破口大骂。从大革命开始，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向来是“限共、溶共、灭共”，他怎能容忍共产党拥有这么大的兵力。但他当时正投靠美国，仰人鼻息，怎敢翻脸。只好派人把马歇尔请来，强压怒火，陪着笑脸，请其修改。马歇尔耐着性子修改后提出的方案，中共与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改为一比五，海空军两项全部删去。

整军谈判的时间并不长，从二月十四日到二月二十五日共十一天。但谈判中存在四大难题：一、整编后中共军队的数字问题；二、伪军问题，实质是国民党的军队问题。因为伪军中有许多是原国民党军队投降过去的；三、后勤补给问题；四、双方军队的配置和驻地问题，这实际是解放区问题、根据地问题。所以“整军谈判”也是艰巨的拉锯战。会上谈判，会外协商，个别交谈，紧张地进行了十一天。

有几天为了中共军队整编后的数字不断争吵。最初提出保留四十八个师，蒋介石不同意；后来周恩来又让步为二十四个师，最

后到十个师也可以。张治中认为中共原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多万民兵，现在要整编为十个师每个师才一万四千人。到这个程度，可以考虑接受了。他便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很不以为然。张治中仍然争辩说：“整编后中共只有陆军十个师，政府军保留了五十个陆军师，另外还有海军、空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

蒋介石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海军和空军嘛！”

张治中坚持要把话说完：“政府军在陆军中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防空兵、宪兵、防化兵等等兵种，这也是中共所没有或很少有的。在整个兵力上，我们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理应早日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

蒋介石一听更火了：“你是代表国民党去与共产党谈判，还是代表共产党与我谈判？”

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马歇尔在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兼翻译皮宗敢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马歇尔看见张治中满脸通红，蒋介石板着面孔，怒气未消，不禁愕然，问道：“委员长，发生了什么事？”

蒋介石忿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

张治中急忙向皮宗敢示意：“万万不可直译。”

皮宗敢是个聪明人，立即转了话题，掺杂了些其它内容译给了马歇尔。马歇尔听后松了一口气说：“噢，原来是为了这事争论。”

人称张治中是和平将军，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有张治中这种看法和想法的人不多，即使有也不敢直接面陈蒋介石。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张治中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主张是比较公允的。

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的意见相距很大，但是国内外要求

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呼声很高。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做了极大的让步和斗争，才使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得以结束，双方签订了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的一间老式会议室里举行了签字仪式。这间会议室不大，约有五十平米，正面是一排长桌，桌上摊开了“整军方案”的中英文本。事先请来了中外新闻记者参加。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先后在“方案”上签了字。签字后，三个人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张治中的致词说：

.....

众所周知，政府与中共对立达十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为中共问题、内战问题，不知牺牲多少人才，消耗国家多少元气与耽搁多少建设！今日此一方案之签订，可谓结束了十八年之纠纷与对立，吾人今后一定抛弃以武器作为斗争之工具，而进入新的和平时代，我全国人民所期望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之国家，将可实现，且在此文件上，已获得保障。

.....

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使达成逐步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此次会议，能有如此良好结果，愿郑重提出归功于伟大之友人马歇尔将军。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称马将军为和平、团结、统一之接生婆者，有称为各党派尤其是政府与中共合作之媒人者，亦有谓马氏为美国政府与人民派来中国之和平使者，此等说法，马将军均可当之而无愧……

周恩来紧接着讲话：

.....

今天是一伟大成功的日子，因为在今天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的基本方案。各位朋友记得，在今年虽然是很短促的时间中，但做了很多的事情。一月十日在马歇尔将军寓所签订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一月三十一日在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五项决议。这次在免庐，又签订了这一方案。这些，又说明了许多重大的事情，在短期内都已奠定了基础。从此有了方案，有了决议，就能够如张部长所说，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步走了。

在现在开步走的时候，也就是当一切协定和决议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是会遇到若干困难和阻碍的。但是我敢信，困难是会被克服，阻碍是会被扫除的。只要政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此一方案，相信任何困难阻碍都不能妨害此方案之实施的。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中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括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我们相信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使十八年来武装纷争的局面为之改变，将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将使中国走上近代化工业化国家的道路。

我同样想，这次的成功，正如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之成功一样，应感谢马歇尔将军之协助与努力。我个人也很光荣，能与一个世界战略家共同工作，完成此计划。同样，我也感谢二十年来曾经多次合作的张部长，张部长对此方案之努力，有他的很大功劳。

马歇尔的致词极为简短：

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①

马歇尔的致词虽然只寥寥数语，但刺激性甚大。他在讲话中所谓的“顽固分子”，肯定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了若干不利于和平、统一的消息。

无论是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还是“整军方案”的规定，都是国民党占了绝对优势。比如，整编后的军队，国民党的陆军为中共陆军的五倍，中共还不拥有海军与空军。为什么共产党会同意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已经做了回答：

……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②

四、三将军飞抵塞外

停战协议签订了，停战命令下达了，但问题仍然不断发生。二月二十八日，“军事三人小组”的三位将军：马歇尔、周恩来、张

① 三个人的致词见《张治中回忆录》第746—7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54页。

治中，乘专机到华北、华中巡视，了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和整编军队中的问题。

“三人小组”第一站先到北平。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北平的天气很好，无风，无云，碧空万里。不一会，在西苑机场蓝湛湛的天空上出现了一架银灰色飞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引擎的隆隆声也由弱而强，机身也由小变大。欢迎的人群中有人轻轻发出“来了”、“来了”的声音。

这是一架巨型 C54 飞机，机头漆着五个红五星，标志着马歇尔是位五星上将，元帅级的将军。飞机慢慢降落下来，滑行到停机坪前。这时欢迎三位将军的三方要员便走到飞机的舷梯前。他们是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从东北赶来的熊式辉，以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这三位是一月十三日先期到达北平落实停战协议，执行调处工作的。

机舱门打开，首先出现的是瘦高个，身披皮领浅棕色呢大衣的马歇尔，紧接着是张治中和周恩来。三位和平使者和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后便乘车进城。机场通往城里的道路两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车队一直驶往协和医院南门。这个建筑群一律红柱灰墙飞檐，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大门口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上书“军事调处执行部”七个大楷书字。

一到驻地，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周而复就想采访马歇尔。但马歇尔与美方人员已锁上门开会，名片都递不进去，更不要说人进去了。周而复想挤时间采访“和平将军”张治中，随从秘书张立钧告诉他：“张将军晕机，在飞机上没有吃午饭。车队经过南河沿时，张将军便下车找地方去吃点心去了。”周而复一听，颇为失望。正要下楼，这时全副武装的二级上将回来了。周而复在重庆时就

认识张将军，见面后用不着别人介绍，两人便随便谈起来，他俩边谈边走进张治中的办公室。张将军客气地说：“很抱歉，等会要开会，只能谈十分钟。”周而复说：“十分钟也好，您先谈谈来北平的印象。”

张治中稍微想了一下说：“大约一九三二年来过北平。十几年没有再来过，北平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十分萧条，破旧衰败。不如重庆，也不如从前。”这时周而复脑际立即出现来时经过的街道，行人很少，买卖家不多，道路坑洼不平的景象。万牲园（即今动物园）的围墙破烂不堪，就是天安门城楼上也是杂草丛生，还长着一人多高的小树。汽车过后，尘土飞扬。张治中忽然话锋一转：“但从沿途行人对我们的欢迎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和平的渴求，对我们三人小组寄予很大的希望。”

周而复说：“东北国共军队不断冲突。在广东，政府军队也对东江纵队开火。张将军，这次三人小组是否还去广东巡视？”

张治中说：“我们三人到北平来，时间很紧。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明天开幕。我们必须在闭幕前返回重庆。这次巡视，广东就不能去了。不过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准备去重庆，将和周恩来将军面商广东停战问题。”张将军的话还没说完，国民党代表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走了进来，请张部长去开会。张治中抬手看了一下表，站起来说：“对不起，只谈了七分钟，还有三分钟没谈，下次再补吧。”

周而复紧接着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他和周恩来更熟了，进门坐下就请周恩来谈谈感想。周恩来微笑着说：“感想很多，我离开北平已有二十六年了，这二十六年北平变化很大。我年轻时在北平，只是在地面上做肤浅的观察，记忆中的北平相当美好。这一次是在飞机上俯看北平，觉得并不像记忆中那样美好、壮丽。当

然这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八年有关。不过一切都在前进，将来北平会变得更美好。”

这时又有几位记者也推门进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聊起来。有位记者问：“最近公布的整军方案，为什么要迟至十八个月才能完毕？”

周恩来笑笑说：“这个问题本来很大，国军有数百万，怎么能在短期内复员和整编完毕呢？只要大家根据‘双十协定’办事，具有和平的诚意，整编和复员的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是次要的。中共希望尽快地实现和平，这是首要的。”

周恩来匆匆谈完后就去参加执行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

晚上六点半钟，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欢迎三位将军。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举行的第一次盛大的鸡尾酒会。酒会会场设在跳舞厅里。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等人已提前到了。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也忙着准备欢迎客人。身穿白大褂的服务员，站在门口的两旁，手里捧着托盘，盘里满放着盛着鸡尾酒的高脚玻璃杯。当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出现在酒会的门口时，会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为了应付场面，身穿绿呢军装，佩戴上将领章，外罩黄呢大衣。意气风发，精神抖擞。他这身军官服还是临行前在重庆赶制的。

马歇尔端着酒杯走向大家，一下子就被记者包围了。大家向他提出各种问题。马歇尔不慌不急地说：“我一九二七年离开北平，已经有十九年没有来了。这次是我第四次到北平，旧地重游，十分高兴。至于选择巡视的城市嘛，只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当地有较好的机场；二是执行小组的问题比较复杂，急需解决。”

记者越来越多，把马歇尔团团围住。记者们提出了许多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有的问：“停战协议为什么不包括东北？”有一

记者问：“东北整军是在苏联撤军以前还是撤军以后？”马歇尔见形势不妙，马上机智幽默地说：“这是鸡尾酒会，不是记者招待会。对不起，我要敬酒去了。”他冲出记者的包围圈，端着酒杯便向李宗仁、熊式辉走去。

记者们又包围了周恩来将军。周恩来老练地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边谈边走，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

三月一日早晨，太阳刚刚露脸，三位将军就吃了早饭，准备去西苑机场登机到张家口和集宁视察。

飞机起飞没多会，就越过了蜿蜒起伏、雄伟壮观的长城。三位将军谈笑间就飞到了张家口上空。机头俯冲下来，平稳地降落在张家口郊外的机场上。将军们一下飞机就受到聂荣臻、贺龙等将领的热情欢迎，并检阅了解放军的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律穿着从日军缴获的战利品黄色长统皮靴，军容威武雄壮。三位将军见了非常惊喜，检阅之后备加称赞。然后将军们在聂荣臻、贺龙、肖克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听取张家口执行小组的汇报。将军们听完报告，对三方代表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执行小组再接再厉，努力工作，完成更加艰巨的整编、统编任务。

中午十二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司令部后院举行宴会欢迎马歇尔等三位将军。贺龙、肖克将军作陪。这几位将军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共祝和平早日实现。马歇尔和张治中还询问了晋察冀边区有多大面积，人口有多少，以及军队的数量和装备如何，甚至连司令部的房子原来是敌人什么机关都议论到了。

午宴后，三位将军在机场再次检阅了仪仗队，旋即与聂荣臻告别，登机，直飞集宁。

在集宁的机场上，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以及集宁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克瑞格上校、蔡文献上校、孙志远少将等早已在伫立等候了。

塞外的天气寒冷。三月初，在内地已是杨柳返青，杏花吐芳了，而塞外的集宁却冬雪未消，阵阵寒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一样疼痛。狂风乍起真是飞沙走石。小沙粒被风卷起摔在机身上“唰唰”作响。庞大的机身在狂风中不停地颤动。为防止飞机被风吹得滑跑，不得不把飞机的轮架用粗绳系住，拴在地上的铁桩子上。机场周围，沙石起伏，满目荒凉，放眼极望，不见人烟。真如唐代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写：“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由于时间仓促，三位将军下了飞机和欢迎的将领们一一握手后就回到工作人员乘坐的专机上听汇报。听完汇报，马歇尔强调说：“今天不研究谁是谁非的问题，我们应该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张治中和周恩来也分别训话、指示，充分肯定了集宁小组的工作，又指出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当三位将军在飞机上听汇报时，贺龙将军没有参加。他独自一人在飞机坪前散步。记者们看见了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立即围拢过来采访。贺龙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从容不迫，坦率地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他说：晋绥军区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七万正规部队。现在正贯彻“三人小组”的指示。部队正在准备复员，战士将解甲回家务农，政府还要发给一定的补贴，作为生产资金。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一般都提高了一些，自己生产，种棉花织布，做到自给自足，自己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新解放区的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

贺龙同志正在与记者们交谈时，周恩来将军从会场出来请他参加中共方面的会议去了。张治中将军也召集国民党方面的人开

会。这时，只见马歇尔将军和罗伯逊、伯劳德、克瑞格等美方人员，平行背风而走，他们边走边说着什么，神态轻松、安详。

三时四十五分，飞机从集宁起飞，五时整即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

晚上，李宗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宴会欢迎三位将军。天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回到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他没有休息就立即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分析当前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将军讲话，条理极为清楚，速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

开完会，夜已很深。周恩来就住在了翠明庄。

五、戳穿了王耀武的假戏

三月二日上午，“三人小组”的专机降到了济南机场。车队开出机场大门，沿途不见一个行人，路两边相距不远就有一个哨兵，所有的哨兵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背朝马路。每隔数十米远还有一挺机枪和数名哨兵群。可见郊区实行了特别戒严。车队一进入市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大街上空悬挂着横幅标语：“欢迎马歇尔元帅！”“欢迎和平使者！”大路两边站满了群众。每个人手中拿着一面纸旗。在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的车来到时，忽然从欢迎行列里跳出四个彪形大汉带头高呼反动口号，应声者寥寥。绝大多数市民对“三人小组”来调停内战，处理国共纠纷持欢迎态度。国内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市民们的眼里流露出一对和平使者们的殷切期盼。

进步的记者们一下就看出这是国民党搞的阴谋活动，假借民意诬陷共产党。一方面欢迎和平使者，一方面又谩骂共产党的和平使者；一方面高喊要和平，一方面又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

是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自我暴露。许多记者对国民党搞的这一套毫无兴趣。

陈毅将军先期赶到了济南，他也到机场迎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的到来。他和王耀武陪同马歇尔等三将军检阅了仪仗队，便和王耀武一起乘第二部汽车进城。这两位在职场上厮杀了几年的对手，今天同乘一辆车，在车中谈笑风生，先是谈天气，继而谈昨天晚上的酒不错。待到汽车进了城，陈毅看到马路两边有的地方张贴着诬蔑共产党的口号，嘴里喃喃地说了句：“这是搞的啥子鬼名堂噢！”从此再也不说话了，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三位将军被车拉到国民党省党部，在一个颇为讲究的会议室里听济南执行小组美国代表雷克上校的汇报。报告完毕后，张治中首先代表国民政府对小组成员的努力深表谢意。他说：“山东目前最困难、最迫切的是粮食问题，人民没有粮食无法生活，我们政府方面应首先考虑解决。”

周恩来将军接着讲话作指示：山东地区特别大，问题特别多，情况特别严重。他对小组的工作和已解决的问题表示满意，对小组成员的努力、勤奋，表示感谢。周恩来说，山东除了粮食问题以外，目前最重要的是伪军问题。因为大部分伪军被国民党政府加委，摇身一变，成为国军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起来十分困难。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解决，不能敌我不分，是非不明。粮食困难问题是过去抗日战争中，城市与乡村处于对立状态造成的，一时还难以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努力加速改变。还有交通问题，因为在战争时期分割成数段，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解决好的，要努力妥善解决。解决问题要互相联系起来看，不要孤立地看。希望济南小组对问题要实地考察，就地解决，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成为模范小组。

最后马歇尔讲话，他表示美国是双方的评判员，只是评判，不能执行。他说美国政府应中国国民政府的邀请，派代表来中国参与其事，好像干涉别人家庭内部的事务。做得不好，会引起批评。打棒球的时候，双方都不喜欢裁判，但没有裁判又打不起球来。所以希望双方认真执行裁判员的裁判。马歇尔将军在这里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裁判员是否公正无私，他虽然不直接打棒球，但可以暗中支持、偏袒一方。这是问题的关键。

省党部的会议室里在开会，省党部大门的院子里却在上演“和平”闹剧。这是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一手导演成的。院子里聚集了许多群众，有山东医科专门学校、济南市立中学、培才中学、济南中学、鲁西南十六县民众代表请愿团……等等。这时有个活跃的中年人，胸前挂着济南各界欢迎马歇尔元帅筹备会出入证，跑到学生队伍前面面授机宜：“你们一定要求周恩来出来讲话。你们一定要呼喊我告诉你们的那些口号，表面要和缓，态度要诚恳，口气要强硬，提的内容一定要尖锐。”这位先生转身一走，有的医专学生就嚷嚷：“我们是学生，又不是国民党员，别的事不管，我们只要求回家。”

这时有个叫张肇才的中学生，穿着一身崭新的制服，特别引人注意，据说他是济南中学的学生。他跑到学生队伍前面动员说：“我们就要求周恩来谈三个问题：一、流亡在外没饭吃怎么办？二、许多同学家乡沦陷，要求回家；三是讲讲东北现状。”学生队伍中有人喊：“你的意见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张肇才听到有人不赞成他的意见，便急忙转过身来笑嘻嘻地说：“请大家原谅我这小弟弟。你们都是老大哥，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多指教。”但这位代表不经“老大哥指教”，却贸然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去找三位将军了。

马歇尔听张肇才说他是民众请愿团的代表，请愿群众想让他

们出去讲讲话。马歇尔不知深浅便说：“可以，可以。”张治中将军扶了一下眼镜说：“事情太忙，今天就不讲了吧。”周恩来则说：“我们是三人小组，是一个整体，我们都是在一起接见群众。只要张治中部长出面讲话，我一定去讲。”

这位张肇才转身出来，颠倒黑白，对“请愿团”的学生、群众说：“周恩来不愿意出来给我们讲话，他叫我们回去，你们同意不同意？”

许多人齐声高喊：“不同意！”张肇才继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学生们情绪十分激动，七嘴八舌地乱喊：“请周恩来出来讲话！”“不讲话我们不走！”新华社记者周而复在前院看得清清楚楚，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恩来的英文秘书黄华。黄华亲耳听到周恩来怎么回答的，他觉得问题复杂、严重，立即去找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黄华希望何先生能出面对群众解释一下。何思源走出来对学生们说：“张将军、周将军都十分忙，一会还要去徐州，没有多少时间，不能讲话了。大家回去吧。”

黄华见何思源说得含糊些，立即又源源本本地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立即把张肇才的谎言戳穿了。群众和学生们听课后便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歇尔从会议室出来，走到群众面前说：“现在是中国最严重的时期，我刚到中国就看出来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你们，青年们，尽你们的力量为此而努力吧。我们来这里，一会还要到其它地方去，就是为了实现和平。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努力，要争取一个和平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谢谢你们。”

张治中将军虽然忙，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出来讲话：“对你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远东的和平，也才能保证世界的

和平。山东是最有文化、最优越的省份。中央关怀山东的父老兄弟姊妹的幸福。山东的父老兄弟姊妹一定能得到和平安乐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央和中共的共同意见。”

周恩来穿着将军级的黄呢子镶红边的军大衣，英姿勃勃地站在群众面前的花坛上，他热情地向聚集在院子里的群众频频点头致意，然后说：“……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要和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马歇尔、张治中两位将军，不断努力的，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八年抗战中，山东人民在敌人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在来慰问诸位。乡村和城市现在不应该再隔绝了，应该恢复往来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们应该保证供应。刚才我看见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两位将军握手，可以保证实现山东的和平。这次我们三人来，诸位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一定要实现的。”

周恩来的话句句说到了群众的心坎里，不断为群众的掌声所打断。群众们满意地走了。这一幕戏，没有按照导演们的计划演出，那些幕后先生们不免有些失望。

餐厅相当暗，虽然是中午却要开灯。在淡黄色的灯光照耀下，一张长方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台布上用苍绿的松针拼写了一行英文字：“欢迎马歇尔。”

首席坐着马歇尔，旁边是王耀武将军。他的斜对面就是曾经交过手、刚刚又握过手的陈毅将军。陈将军邻座是何思源，坐在何先生斜对面的是共产党山东省主席黎玉。张治中和周恩来在两头落座。这些人曾经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干过，今天却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碰杯，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谈笑。

马歇尔吃完最后一道菜，站起来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感谢王耀武、陈毅两位将军为和平做出的努力。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使

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生活。前面困难还很多，但只要按照‘整军方案’去做，一定能办好。军费可以减少，人民生活可以改善……谁是谁非问题，可以放下。我们现在要做应该做的事情，当地小纠纷一钱不值。”最后马歇尔举起酒杯说：“让我们为中国的光明、幸福的前途干杯吧！”

六、三将军解决水电之争

三月二日下午，马歇尔等三位将军的专机从济南往南飞临徐州上空。飞机在盘旋下降时，看到徐州的四野是一片湿润的土地。大地覆盖着斑驳的薄雪。从济南到徐州，仅飞行了七十五分钟，飞机就降落在机场上了。

前来迎接三位将军的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顾祝同。顾祝同现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他极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处处学习蒋介石的工作作风和为人处世的方法。顾祝同对蒋介石的话绝对听从，蒋介石调动他的工作，从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绝不讨价还价。所以何应钦赞扬他说：“顾墨三对委员长是百依百顺。”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特意委派他控制战略要地——徐州。

顾祝同的头发有点发白了。他身穿军装，腰板挺直伫立在停机坪前。当三位将军走下飞机时，顾祝同满面堆笑走向前去，举手行礼，然后握手问好。

三位将军在顾祝同的陪同下来到绥靖公署。顾祝同半个多月前在徐州就成立了“徐州各界欢迎马歇尔元帅筹备会”，筹备会借欢迎之名，敛款办了一些装点门面的工作，比如，洗刷大街上的墙壁，清扫街道，张贴标语，印制宣传品等等。但实质性的工作

却很糟糕，就连去机场迎接的车辆都准备不足。记者们住哪里，都没有事先安排好。只是把三位将军分别安排在花园饭店、广寒宫等处。

本来已到了三月初，又是在江苏省的北部，按理说，不应该冷，但人们却感到寒气袭人。

顾祝同在中央准备银行设了丰盛的酒席招待三位将军。宴会后又是开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交通和枣庄的问题。陈毅将军是随三位将军一起乘机来到徐州的。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第四师副师长韦国清等在这之前就来了。

这里的交通困难问题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建筑了比日伪时期还要多的堡垒工事。既然国民党要和平，建筑这么多的战备工事意图何在？工事不拆除，交通就无法恢复。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双方都同意立即恢复交通。经过会谈协商，确定由执行小组沿铁路线视察，凡属交通线上不需要的工事，一律拆除。

枣庄是出煤和用水的问题。枣庄共有三口井，国民党占了一口，共产党占了两口；电在国民党手里，水在中共手里，双方都不能出煤，双方又都需要煤。经过三位将军的协调，决定双方军队都撤退，共同经营这里的煤矿生产，美方担任顾问，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会谈后，记者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写新闻报道、发稿。这次出巡的新闻报道，中外记者都有，明争暗斗，相当激烈。新闻要求真实、迅速。善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比新华社条件优越得多。他们在各地有分社，通讯条件又好。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采访，他们更是如鱼得水，可以随便找任何人采访他们所需要的消息，甚至还可以制造假“民意”、假新闻。每巡视完一地，一上飞机，美联社、合众社、中央社的记者有的

用打字机“嘀嘀嗒嗒”“写”稿，有的埋头用笔疾书。飞机降落到另一个城市，他们立即把稿子交给当地有关人去发；而新华社在国统区没有分社，也没有可靠的熟人。当周而复在飞机上写好稿子，下一站才能到电报局发稿。这样就比其它通讯社晚了一大步。

为了改变这个落后状况，周而复动脑子想办法，终于找到一条解决发稿困难的路子：他充分利用三方会谈和三方代表与当地省长、市长谈话的间隙，或在事件发生时，就当场疾书，一挥而就，待会谈或宴会一完，他的新闻稿也就写好了。这样，在离开当地以前，周而复就把新闻稿送到电报局发出去了，既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又注意了时效性。当国内外广大读者看到新华社的消息早于美联社和中央社时，无不感到惊奇。

七、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

阎锡山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的家庭，自幼养成了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思想意识。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提出“无条件存在”主义，高喊“一切为了存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这位山西土皇帝，既抗日又准备降日；既反蒋又拥蒋；既联共又时时反共。用阎锡山的话说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一九四一年八月，阎锡山与日寇签订“汾阳协定”，阎、日取消军事行动，要共同“防共”；阎锡山通电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给阎锡山装备了一百个团，并将华北政权交给了阎锡山。一九四二年四月，阎锡山又开始抗日拥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鸡蛋”被击碎了。阎锡山就只能在国共两党的“鸡蛋”上跳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

他命令所部向上党地区的八路军发起进攻，很快被刘邓指挥的军队歼灭了。副总司令彭毓斌自杀，军长史泽波被俘。当地有人讽刺阎锡山说：“上党一战，实力损失过半。”这就是他“拥蒋反共”的结果。但他仍然反共之心不死，他吸收地主、富农组成“还乡团”，实行“自清”、“自卫”、“自治”的“三自”政策。胡说什么：“处置人越是残无人道，越残忍，越能解救人，因为大家看了害怕，便不敢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三人小组”于三月三日下午由新乡乘飞机抵达太原市。阎锡山是以欢迎军委政治部张治中部长为主，不像济南王耀武主要欢迎马歇尔。车队从机场出来，沿途看到的标语是“欢迎张治中部长视察”、“张治中部长是青年的导师”（张治中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欢迎张部长指示军队政治工作”等等。阎锡山借讨好张治中向蒋介石暗送秋波。阎锡山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他不希望国共团结，实现国内和平。

三位将军下榻于复兴饭店，就是原先法国修建的铁路饭店。“三人小组”一住下，马上就召开三方代表的汇报会。

阎锡山虽然是上将，又是战区司令长官、省长，却穿了袍子马褂迎接客人，俨然一副地主绅士的模样。他嘴边翘着八字胡，文质彬彬，似笑非笑，和他这独立王国的“国王”身份十分吻合。他热情地招待三位将军，只是虚以应付，不打算解决什么具体问题。

这天晚上阎锡山在他那古老幽深的大宅院里举行宴会。大院房屋很多，院落结构别致。后院之旁还有侧院和广场。侧院还住了许多日本战俘。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命令日伪军队就地待命，为扩充自己的实力，改编伪军三万七千多人，编成五个省防军。并以“志愿”的形式，留用日本军技术人员五千名，担任情报和各种技术工作。阎锡山有自己的长远打算，他想借日本人的技术、知

识提高他的军队的素质，增强战斗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不管是反共还是反蒋，这些都是用得着的。

山西对全国封锁，太原对全省也是严密封锁。出入太原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百姓要呈验居民证，经过严格检查才能出入。三方执行小组的代表最初也不允许进城。后来经协商放宽了，允许进城，但要佩戴执行部臂章，还要由交际处陪同，否则仍然不许进城。1946年的太原城并不大，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小城市，古老的平房，古老的街道，建筑设备也极为古老。城门口围着密密的铁丝网，岗哨林立，老百姓总是排着长队等待检查证件方可进出，一派闭关锁国的景象。

阎锡山妄图依靠八年抗战积蓄的力量，投靠蒋介石，从山西发展到华北五省，恢复当年的辉煌事业。他决心以人民为敌，表面热情接待三位将军，骨子里早下了大打内战的决心。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了一切协议，全面发动内战时，阎锡山立即调动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结果他输得最惨，到一九四六年底，晋南、晋西大部分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到了一九四八年七月，阎锡山就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他发动内战的老本已经赔光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便逃往南京。四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在山西的三十八年的反动统治至此全部结束。十二月十八日大陆全部解放前夕，阎锡山逃往台湾。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病死于台湾。

八、“和谐”的傅作义

三月四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三位将军乘飞机抵达归绥，受

到绥远省政府主席、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热情欢迎。他与王耀武、阎锡山不同，他欢迎三位将军不以谁为主，三位一体，不分彼此。

傅作义英勇善战，热爱祖国，抗日坚决。一九三六年，他就出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在察哈尔、绥远多次与日寇交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率军击溃日军，收复了百灵庙，震动中外，全国军民为之振奋。为此，国民政府授予傅作义一级勋章。抗日战争爆发后，娘子关失守，太原危急。在阎锡山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上，无人敢承担防务，傅作义挺身而出：“太原城我守！”并且写了信给家人：“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他果敢地率十六个团的兵力，孤守太原，指挥若定。一九四〇年初，他率军攻克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中将等三千四百多人，俘获日军三百余人，这一战役，为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第一次收复失地。日本投降后，他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打内战也不手软。“停战协议”签订后，他曾率部袭占集宁，八路军反攻，歼灭其官兵二千余人。傅作义撤出了集宁，但并不甘心，使集宁成了两军争夺的战场和国共谈判的会场。这次三将军飞到归绥来，就是为了解决集宁的问题。

“三人小组”一到归绥，就到绥远省政府会议厅举行会谈。因为归绥执行小组已经撤销，所以傅作义既代表政府，又代表军方，直接与三位将军会谈。

会议厅里横放着拼起的特大长桌，桌上铺着白台布，中间插了中、苏、英、美四大国国旗。三方代表围坐在四周。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坐在上首席位。傅作义坐在下首席位，正对着马歇尔。傅的两旁坐着马占山将军和绥远省政府委员、厅长等。

傅作义首先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致欢迎辞。他说，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需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次三人小组努力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绥远人民非常高兴。他还说：“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遵守三项原则：合作、真诚、民主。”他表示愿意和绥蒙军区互派联络组，调处争议地区，避免冲突。

张治中将军说：“感谢傅作义将军谈话的和平态度。世界要和平，中国要和平，有了和平才能建设，才能谋幸福，满足人民的愿望。从‘停战协定’到‘整军方案’的颁布，一切问题就有了法律的坚实基础，实现和平就有了保障。”

周恩来将军站起来说：“很高兴能在绥远和各位见面。今年的确是中国的和平年，一二月内，中国有了张治中将军所说的这些协定，和平民主有了可靠的基础。协定是定下来了。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一切协定真正地完全实行。中共保证百分之百地实行。过去的幸冲突、对立，有十八年之久。现在做起来，一定有曲折，有困难。双方负责人要克服困难。这次来是为了这个目的。首先在自己方面做起，克服困难，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我非常同意傅将军所说的要合作，就要忘记过去，坚持和谐友谊的态度。这才能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停战，恢复交通，整军等等，按照人民所希望的那样去做。”

周恩来的讲话，语惊四座。他特别强调百分之百地去做，去“实行”，反对空谈，反对述而不作，说谎骗人。他字斟句酌地讲，听到翻译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就立即指出改正。周恩来讲完话博得热烈的掌声。

马歇尔最后站起来说：“刚才两位同事已经谈得很详细了。我几乎没有再说的必要，但还想说两句。在重庆产生了许多决定，在北平成立了执行部，执行决定。每件事都有中立人参加。现在已

进入新阶段，有新的任务，立刻要和平统一，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在华美国军官应该努力帮助去做。中国朋友也许认为太快，可是不能等待，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在世界各国之中，才能保卫自己。”

马歇尔讲的重点是整编军队，恢复交通，目的是为了调动军队，统一整编，帮助蒋介石把军队抓到手里，同时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但他没有明说罢了。

会谈在掌声中结束。傅作义将军立即请大家到餐厅入席。一共两桌，首席是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等；另一桌是马占山、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等人。

张治中身体不太舒服，担心伤风感冒，进了餐厅又不好不脱军帽，旋即又戴上一顶蓝色毡帽，衬得他圆圆的“童子面”越发红润了。张治中将军指着第一客座的位子对马歇尔说：“Please sit down!”马歇尔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因为这是第一次听他说英语。马歇尔便和张治中开玩笑说：“你只会讲这一句罢了。”张治中立即向翻译学了一句，转过身来对马歇尔又说：“Have one more!”马歇尔伸出大拇指说：“不简单。”傅作义忙着为马歇尔敬菜。马歇尔对中国的菜赞不绝口，他幽默地说：“这次出来吃了这么多好东西，回到重庆可以好多天不吃饭了，就是碰上饥荒也不在乎了。”

张治中一听，马上给马歇尔敬酒。马歇尔立即改口说：“这次到中国来，吃菜吃得少，酒喝得太多了。不仅回到重庆，就是回到美国也不能再喝酒了，否则要酒精中毒的。”周恩来也端起酒杯给马歇尔敬酒说：“这白兰地不错，保险不会酒精中毒，可以放心地大喝。”他们两人干了一杯。

周恩来又举着酒杯对傅作义说：“来，我们干一杯！”

宴会一结束，傅作义即派专车送三位将军和工作人员、三方

代表、新闻记者去机场，因为他们还要在下午赶到延安。

九、张治中三到延安

四引擎专机在延安东门外上空绕了一圈，看见机场上用红布搭了一座牌楼，顶部插了中美两国国旗，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上空飘扬，十分引人注目。

当飞机降落、滑行停稳后，马歇尔穿着那件淡棕色皮领呢大衣走下飞机，周恩来给他介绍前来欢迎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人。马歇尔看到那么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将领来欢迎他，十分惊喜。他早就知道这些著名人物，也略知他们的事迹，但他没有料到在延安会同时见到。他惊异中共这些政治、军事领袖的卓越才能。这是一个拥有惊人能量的强大群体，马歇尔认为这是战争中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马歇尔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说：“欢迎您！”马歇尔说：“谢谢，谢谢。”

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然后走向机场旁边长长的汽车队，车上挂着中美国旗。三位将军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坐进汽车，汽车在上万的欢迎群众面前缓缓驶过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云天：

“欢迎马歇尔元帅！”

“欢迎张治中将军！”

“欢迎周恩来将军！”

沿街的墙壁上，张贴的也是欢迎马、张、周三位和平使者的红红绿绿的标语。

三位将军在众人的陪同下，先到了王家坪朱德将军的住处。毛泽东在这里举行了茶会。新打的窑洞宽敞明亮，里面摆放着整齐干净的木质沙发椅和茶几。沙发上铺垫的是稻草或麦秸，外边用淡蓝色的布包着，除缺乏弹力和坐时有“沙沙”响声外，外观还是很漂亮的，坐着也满舒服。茶几上摆着延安的特产红枣、花生，还有自己生产的糕点。勤务兵端来粗瓷茶杯，给每个人面前沏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我们条件差，没有更好的茶来招待各位，大家随便吧。”

张治中说：“老朋友，不必客气。”

然后是大家互致问候，谈吃，谈住，谈各地的风土人情，谈观感。

马歇尔坐了会便告辞说：“我先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去看看。然后再拜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说完便彬彬有礼地和大家握手，走出窑洞，乘吉普车去了。

晚上，中共中央设晚宴招待马歇尔一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坐首席；第二席是罗伯逊、郑介民、叶剑英。毛泽东首先端着陕北自己酿造的酒站起来祝酒说：“今天我们欢迎三位将军和各位和平使者的到来。大家都知道，三位将军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谢各位的努力，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接着毛泽东高呼：“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最后毛泽东建议：“让我们为杜鲁门总统、蒋主席、马歇尔、张治中将军和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干杯！”这时毛泽东离开座位，端着酒杯和客人们一一碰杯。

事后张治中的机要参谋张立钧回忆说：虽然上桌的是土制粗瓷碗盆，但肉蛋俱全。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囊形包围下，中共待客上还能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晚宴之后，就是文娱晚会。文娱节目开始之前，各方代表都有一个简短的讲话。

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三人小组的协定，中共都愿忠实地实行，彻底实现。我们坚信，国共合作，国际团结，中国定能成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幸福、强盛的中国。”

马歇尔接着讲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停战，实在使人高兴。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致力于恢复交通，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主席已保证，中共将尽其能力恢复中国人民正常的生活状况。我们这次巡视各地，目的是看何处有困难，如何设法解决。我们美方代表和美国政府绝对处于中立地位，协助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中国。”

最后是张治中将军讲话，他十分风趣也十分激动。他走上台子说：“……黑暗已过，光明在望；破坏已过，建设要来；‘整军方案’十分重要，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和平事业的完成要感谢盟邦美国的协助与蒋主席、毛主席的领导。让我们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高呼万岁吧。”于是他带领大家高呼“新中国万岁”的口号。接着张治中将军话锋一转，以爽朗、乐观、幽默的语气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先生一起来迎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次是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啊。”这句话立即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来。他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林伯渠握着他的手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胜利者，是成功的。”张治中则说：“在我的脑子里中共永远是胜利者。”

张治中回到座位上，毛泽东侧过头，笑着对张治中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到延安，为什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的。延安这地方不会有再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再到南京去。”

张治中讲完话之后，文娱节目就开始了。三月初，陕北高原还是比较冷的。大家都穿上了棉大衣或棉袄坐在礼堂里看演出。马歇尔穿了呢大衣，斜躺在靠背椅子上，腿上还盖了一条毛毯。

当秧歌剧《兄妹开荒》拉开幕时，头扎白毛巾的哥哥，肩扛镐头高声唱着：

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

叫得太阳红又红。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怎么能躺在炕上当啊懒虫。

边区，边区，好呀好地方，

好呀么好风光，

吃得饱来，穿得暖来伊呀嗨

.....

这时马歇尔被这高昂、激扬的音乐和歌词所打动，他不再斜躺着，挺直了腰板认真地听着译员的翻译。

当歌咏队演唱《欢迎马歇尔将军之歌》时，马歇尔更是兴奋

不已。有首歌还专门歌颂了张治中将军为和平辛勤奔走所作出的贡献，周恩来带头鼓掌，全场立即回应，观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三月五日早晨，太阳还没露出地面，张治中的随从参谋张立钧醒得早，就起来在院子里散步，不久，叶剑英也走过来问：“张将军昨晚睡好了吗？”张立钧回答说：“张部长到现在还没睡醒，肯定睡得很好。”叶剑英又与张立钧聊了一会长征时的艰苦故事。叶剑英走后，张立钧一个人就继续散步。他看见一个小院，门口挂着“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木牌子，没有站岗的哨兵，只见两三个小战士正弯腰在地上用树枝写字、认字。

吃过早饭，三位将军就准备登机去武汉了。这时江青身穿粗呢列宁装，外披一件美军大衣，身高过膝。她的这一着装，在当时延安是很特殊的了。她来到马歇尔身边，示意想参观一下他的专机。马歇尔当即表示欢迎。机组人员打开舱门，江青登上舷梯，一蹬一蹬上去。只见全部机舱都铺着地毯，窗帘帷幕都是浅蓝色的天鹅绒做成的，使人一踏入机舱就有宁静的感觉。机舱前段有一些软卧铺；中间座舱的座椅都是弹簧沙发椅，可以随便调节方向、角度，以至于仰卧。这架专机是由C54型飞机精工装制成的，机头漆有马歇尔军级的五星标志，四引擎，名为“空中霸王号”。虽然不能与今天的波音707、747相比，但在那时却是最庞大完美的客机了。每次登机前，马歇尔都亲自拿着名单，站在舷梯口，一个一个的点名，一丝不苟，等点名完毕，他自己最后登机、撤梯、关门、起飞。

这时，太阳从桥儿沟后山坡升得很高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领导人陪着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站在机场跑道边上话别。张治中热情地对毛泽东主席说：“欢迎您早日到南京去。”

这时一位记者从旁插问：“请问毛主席，准备什么时候到南京去？”毛泽东环顾了一下群山说：“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他又转过身去对马歇尔说：“我再说一遍，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

马歇尔最后一个登上舷梯，在未进入机舱前又再次挥手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送行的中共领导人告别。

机场上红布搭的牌楼上中美两国的国旗仍然迎风招展。

载着和平使者的专机斜刺冲上蓝天。

十、“真是奇文！”

由延安到汉口，飞机只飞行了两小时零四十分钟，中午前就到了。

马歇尔住杨森花园旁边的“大成路三号”。这是一套花园式别墅，风景秀丽，建筑别致。张治中将军一行住璇宫饭店。周恩来等人住四民街德明饭店。从湖北宣化店来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和郑位三、吴德峰等早来到武汉，住在德明饭店等候。

中午，李先念、郑位三等人就向周恩来汇报宣化店方面的情况。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郑位三部在抗战期间，一直活跃在鄂豫皖边境大别山地区，并发展到平汉路以西。抗战胜利后，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和王树声所部与李先念部会合后组成中原军区。国民党对这支抗战有功的部队视为眼中钉，非得把它拔除而后快。由于国民党的包围，中原军区非常困难，缺乏粮食、药品、军费。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就一再提出，中原军区的八路军可以北撤，但国民党军队不要包围，不要进攻，要让路，要提供一定数目的移防费。国民党当局虽然口头答应，但就是不执行诺言。“停战协

定”生效的第二天，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队即进占了鄂豫交界的光山县城。周恩来当即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认为这样有可能引发内战。让刚刚成立的军调部派一个执行小组到武汉负责制止中原战争。

一月中旬，国民党代表宋瑞珂、陈鼎勋，中共代表王震，美方代表福尔德在河南罗山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中共多方忍让，委曲求全，并没有要求国民党军队退出停战协定生效后侵占的地方，只约定双方维护一月十三日的位置。三方达成了协议，但国民党始终没有停止向八路军进攻。而且对平汉路西的中共部队也发起进攻。周恩来对中原军区十分关心，在三人小组会议上一再提出：“我中原部队北撤是双方达成的协议，而且要执行整军方案也非北撤不可。但国军不要包围、不要袭击，要提供移防费。”周恩来甚至提出其中四万部队转移到苏北或华北整编，两万人就地复员的方案。但始终得不到解决。

这次“三人小组”亲临武汉。李先念向周恩来报告了当地情况。

午后，三人小组开会，周恩来向张治中又提起中原军区的问题：“文白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他们处境险恶，北移国军不让路，又不提供移防费。粮食、药品都十分困乏。政府方面曾答应提供的物资，到现在没有兑现。”

张治中思考了片刻，立即提笔写了一个简单的命令，让国民党武汉行营的后勤部门，立即派人迅速给中原军区新四军五师一部分粮食和药品，并适当地拨些军费。

武汉行营的国民党部队负责军需的长官看了张治中的亲笔信说：“这真是奇文！我们正和共产党打仗，恨不得一下子消灭掉他们，反而让我们接济他们粮食、药品、军费？真是笑话。”

张治中知道这个情况后，把这位军需官叫来训斥说：“给新四军提供部分军需有什么奇怪！‘政协决议’通过了！‘整军方案’签订了。今后国共两党还要进一步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统一编制军队，共同建设国家，那时不分什么中央军、八路军、新四军，统一由军委会管，由蒋委员长统率，当然要由政府统一拨军费。这件事你回去马上办。”

这位军需官只得“是、是”连声答应下来。回去后，向上锋请示后，仍然压下来。一直拖到四月初，董必武同志亲自又到武汉，通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正副署长周苍柏、杨显东的关系，争取了美国人沙克诺夫才给中原解放区运去了几批粮食和药品、被服等救济物资。

三月五日晚上，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郭忏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后是歌咏晚会。

三月六日上午十时，大家一道乘车去机场，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返回重庆，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返回北平。

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正值大雨滂沱。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话把马歇尔的专车调到飞机的舷梯口，三位将军坐进汽车，各回住所。

“三人小组”在重庆出发前，马歇尔曾分赠张将军、周将军每人一个皮制的公文包。上面分别烫着“赠张将军”、“赠周将军”的字样。英语拼写的“张”与“周”只差一个字母。因而在紧张繁忙的旅途和工作中，有时张治中的侍从参谋张立钧和周恩来的秘书何谦相互拿错公文包的事也时有发生。及至发现，相互一笑，随手就换过来，从未发生误会和隔阂。两个人七天来出入相随，同乘一架专机，甚至巡视时同乘一辆汽车；同在一桌吃饭，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关照，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这次“三人小组”出巡共七天。飞行十六小时，经历冀、察、绥、鲁、苏、豫、晋、陕、鄂等九省，巡视了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太原、归绥、武汉等城市，行程一万七千华里，对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次出巡中，张治中将军会见了聂荣臻、贺龙、肖克、陈毅、粟裕、刘伯承、陈赓、李先念、郑位三等中共高级将领。除了在东北的中共将领之外，张治中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几乎和所有中共著名的将领有了交往。在国共二十余年的“和”与“战”的交错关系中，张治中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谈判桌上，在会议室里，在推杯换盏的宴席上，谈笑风生之中与如此众多的中共将领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这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确属绝无仅有。

十一、谈判破裂

三月六日张治中回到重庆。这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开得热闹，和张治中出巡之前的政治空气大不一样。二中全会上反共反苏的声浪高涨。“顽固派”认为，在一系列的谈判中对中共让步太多，太软弱了。他们在会上猛烈攻击张群、王世杰、张治中这些“主和派”。蒋介石本来就对政协的决议不满，因此对党内反苏、反共的嚣张气焰采取容忍、纵容的态度。

三月十二日，张治中应蒋介石要求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全国军队整编方案的签订和视察经过”的报告。他看会上的气氛不对，只好抬出蒋介石来做挡箭牌。他说：“此一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最高统帅部处理此项问题，一定不致疏忽，请各位信仰最高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不再提国共两党互谅互让，

而是说：“希望中共亦必须放弃武力，诚意谋求统一团结。”^①张治中在报告结束时说：“希望整军方案能够百分之百的实施，以促进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

CC派的反共分子郑亦同在发言中对张治中的报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质问张治中说：“整军方案怎样才能百分之百的做到？中共方面能百分之百的做到吗？”会场空气骤然紧张，张治中十分生气站起来立即反问郑亦同：“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对整军方案不百分之百地做到，是否打算来个七折八扣呢？”郑亦同语塞，全场哄然大笑。蒋介石仍然端坐在主席台上不动声色，毫无表情。

马歇尔巡视后回到重庆，一直沉醉在自己取得的成绩中。他认为杜鲁门总统交给他的三条任务，大致完成了，即使没有完成，也有了眉目，剩下来的事就是向中国提供贷款和促进美中贸易。于是他便以满怀喜悦的心情，踌躇满志地给杜鲁门发了电报，建议杜鲁门召他回国述职，并研究如何通过财政、经济、贸易的途径来控制中国。

杜鲁门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立即召他回国。马歇尔于三月十一日返回美国，四月十八日才回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三十九天中，中国的局势大为变化。马歇尔对中国的情况实在不太了解。他只知道国民党内部有反动的顽固分子，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以及CC派分子，却不知道这些人的后台正是蒋介石本人。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生力量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对革命力量估计过低。所以中国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马歇尔三月十一日回国，苏军三月十三日撤离沈阳，国民党的军队立即侵入沈阳，随后又进占铁岭、辽阳。

^① 《中央时报》，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继续坚持独裁原则，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三月下旬，苏军决定在四月底全部撤离东北，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军队会在苏军撤走后，沿铁路线北上侵占长春、哈尔滨等地。周恩来于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连续与张治中、美方代表吉伦商谈东北问题。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桂园“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在三月二十九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飞离重庆。从此张治中就离开“三人小组”，由陈诚担任国民党代表。陈诚本是主战派，“三人小组”就更难开展工作。

国民党根本就不讲信义，蒋介石彻底暴露两面派的反动本质。“东北停战”的协议刚刚签字，立即派兵向营口、本溪、四平街大举进攻。四月一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强词夺理地说：“军事冲突的调处，只能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这就说明他对“停战协议”、“调处”等等，均置之不顾。尽管蒋介石在东北挑起内战，中共仍然派出人员参加执行小组。四月二日，耿飚、张经武、许光达等四十余人飞抵沈阳，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借口他们没带执行部护照而非法留难三个小时。同一天，国民党军队进占海城、鞍山，东北内战日益扩大。四月九日，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公开表示：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四月十一日，密令胡宗南用五天时间（五月四日至五月九日）围歼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后因阴谋被揭露，遂未得逞。

马歇尔四月十八日回到重庆，这时东北内战正打得火热。十

九日蒋介石接见马歇尔，蒋介石告诉他：“惟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产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案，则将贻误大计，必致根本失败而后已。”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不愿停战，因此，也不急于与周恩来会谈。直到4月22日，周恩来才与马歇尔会谈。周恩来说：“我们愿意实行三月二十七日的停战协议，而国民党不愿意，反而占了我们七个城市。他们既然不遵守条款，我们便被迫采取自卫行动。”周恩来向马歇尔分析了国民党不愿在东北停战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部队。他们把东北的八路军、抗日联军诬为“土匪”加以讨伐。周恩来说，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就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联军。共产党到了陕北，东渡黄河后，在晋、冀、察、热等省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凭着一双铁脚板，从晋、冀、察、热等地的解放区向东北推进。这比拥有强大的海空运输工具，但远在抗日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要快得多。所以说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处于优势。周恩来最后说：“国民党一定要进攻解放区，我们就要抵抗。但我们仍然愿意停战。”

马歇尔经过几个月与周恩来的接触，了解了周恩来，非常赏识周恩来的才干。这次长谈后，马歇尔对张君勱和罗隆基说：“周恩来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外交家。”

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同马歇尔会谈。他向马歇尔指出。苏军已经撤完，东北不存在主权问题，应无条件停战。马歇尔转告蒋介石的意见，其中一条是“东北境内之长春铁路全线及其两侧三十公里以内之地区，皆应由政府军接受，共军不得妨碍政府军接受。”加上其它停战条件，就是中共把国民党想要侵占的地方全部退让出来才能停战谈判。周恩来表示：先停战，后谈判。双方

坚持不下。

马歇尔在这种情况下表示：“对调停已感到无能为力了。”

由于国民党要返都南京，继续谈判将在南京举行。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南方局的工作人员也要到南京去工作。四月底，代表团迁移南京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就绪了。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应邀出席的有二、三百人之多。周恩来报告了东北的战况，谈了与国民党谈判的艰难，然后无限感慨地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国共团结谈判而奔走重庆、延安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在这样长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近五十岁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艰苦的一段路。”这是发自肺腑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蒋介石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五月五日“凯旋南京”。五月三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五月五日在南京出席“还都典礼”，身穿特级上将制服，发表训词，要求民众“明礼义，知廉耻，明责任，守纪律”。

五月十九日，国民党军队进占了四平街；五月二十二日，又进占了长春市。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飞临沈阳亲自督战。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攻。这时，蒋介石认为内战准备就绪，于是大打出手，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

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把二百七十一艘舰艇赠送给蒋介石。八月二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

马歇尔、司徒雷登大使，鉴于国共双方提出的条件相距很远，难于取得一致意见，于八月十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停战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

八月三十一日，美国把它在西太平洋的原价值八亿多美元的剩余物资，以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低价卖给蒋介石，组成机械化部队。

这时蒋介石陶醉地对陈布雷说：“我自己觉得，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壮士断腕，不惜一战！’我对马歇尔元帅说过，这次正式交战后，用不了一年，可以全部扫平共区。陈诚比我更乐观，他认为用不了半年，他就可以云游四海了！”

十一月十五日，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开场了。

十六日，周恩来访马歇尔，告诉他：“由于伪国大的召开，和谈大门已被国民党关闭了，我不得不返回延安。中共仍然在南京、上海、北平保留一些人，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便于今后一旦重开谈判能够有人出面。”马歇尔也觉得再没有理由挽留周恩来了，只表示他可以为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人员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十七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是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周恩来还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形势图说：“国民党如果进攻延安，那我们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大变动的局面。”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回延安。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几人乘美军专机回延安。邵力子、吴铁城、马歇尔的代表来到机场送行。记者问周恩来：“什么时候回南京？”周恩来说：“总有一天要回来的。”

李维汉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第五章 北平和谈走向光明

周恩来与张治中各自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所进行的国共谈判的第三个高潮，是“北平和谈”。这次和谈是国共两党在军事和政治力量上进行的最后一次较量，也是蒋介石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和、战两手的最后一次表演。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处于全线崩溃之中：东北经过辽沈战役之后，全军覆没；淮海地区，黄百韬、黄维两大兵团被歼，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围，逃生无望；华北的北平、天津成了两座孤城；南京、上海已处于解放大军直接威胁之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本钱此时已输得差不多了。在经济上“金圆券”改革以失败告终，物价如脱缰之马不可控制。这时的蒋家王朝，在军事上兵败如山倒，士气丧尽；在政治上，内部分崩离析，矛盾重重，怨声载道，民心失尽；国库空虚，财政、经济的力量已耗尽。蒋介石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在国际上，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唯一靠山——美国，虽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蒋介石“输血打气”，也已无济于事。这时杜鲁门总统想换掉蒋介石，支持李宗仁上台，同时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去。其它列强如英、法等国在战后也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无法插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又使出反革命的“和谈”伎俩。

一、蒋介石三召张治中

一九四七年一月初，张治中从新疆回到南京，这时马歇尔要回美国，他让皮宗敢（蒋介石的英文翻译）请张治中到他的住处吃晚饭。张治中高兴地说：“很好。我也想去探望他。”当晚，张治中即赴约，晚宴后，马歇尔在谈吐中流露出对调解国共关系的失望情绪。张治中因为处理新疆的民族纠纷，一直在迪化滞留九个多月。他刚到南京，对许多问题并不清楚，就没有表示任何意见，马歇尔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三天后，马歇尔宣告回国，上了飞机才发表谈话，宣布他已调任国务卿。

一月十日，周恩来出席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协会议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评马歇尔离华声明”。指出马歇尔在声明中承认国民党内部的反动集团占优势，但是没有指出蒋介石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针对他所说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指出“没有中共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度是无法取消的，也绝不会成为自由主义政府”。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指出马歇尔及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希望马歇尔回到美国后，为了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检讨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马歇尔走后，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屡屡失利，这时，他又想到了和谈。于是电话召见张治中。蒋介石请张治中落座之后便直说：“文白兄，鉴于目前形势，大家希望你再到延安去一趟。”张治中听了觉得突然，便说：“内战打得这么激烈，能和谈吗？”蒋介石笑笑说：“文白兄说错了，战场上越是白热化，越是需要和谈，越容易进

行和谈。”张治中思忖了一下说：“委员长，恕我直言，参谋总长陈辞修（陈诚）先生曾在军事汇报会上说：‘有人天天在谈和，影响士气，现在的局势就是和谈谈坏的。’咱们党内意见就不一致，怎好与中共谈。”

蒋介石站起来，把手一挥说：“辞修嘛，他就是直筒子，他的话可听可不听。我看通过和谈能解决问题总比打仗好。”

张治中说：“我去延安可以，不过一个人去不大好，能请张岳军、邵力子两位先生同行最好。”

蒋介石说：“你的意见可以考虑。明天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一月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讨论和谈问题。最后决定由张治中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延安谈判。商谈的基础是：就地停战，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公平解决争议地区的行政问题。

一月十六日，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共转达国民党想恢复和谈的意图。当日，司徒雷登即会晤中共首席代表王炳南，告知蒋介石要派张治中去延安“商谈和平”，并说这次是“无条件的商谈”。当天，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就打电报告知中央。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电报：

根据目前形势，蒋介石恢复和谈，只有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和美方在三月莫斯科会议上粉饰太平。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我们“对司徒通知的回答，仍是坚持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与取消蒋宪另开制宪会议两条。”

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对于中共所提两项最低限度要求，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这就证明其所说和谈完全是欺骗。……

张治中氏本人即曾于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是仅仅七天,就被蒋介石撕毁,在东北大打起来。此次再来谈判,试问有何办法证明谈成的任何东西不被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加以撕毁?如果去年一月由蒋介石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由蒋介石撕毁干净,敢于召集非法国大,制造伪宪法,保障独裁,试问有何办法证明现在的所谓和谈有一丝一毫的真实?单以此种种,我们对于现在喧嚷嚷嚷的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任。除非蒋介石取消伪宪、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便无法证明他不是欺骗。”

一月二十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中宣部,发表了一个和平攻势的声明,提出:派代表赴延安,现地停战,解决争执地区之地方政权问题等四条“恢复和平方案”,并拒绝了中共所提两条最低的恢复和谈的先决条件。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四条“和平方案”是用来拒绝真正和谈的先决条件,一切欺骗都是无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去延安和谈根本不可能,因为蒋介石绝对不会取消伪宪和恢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的军事位置。这时国民党主战的顽固分子们则对张治中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打电话给白崇禧说:“前方打得这样紧张,文白还在后方谈和?用不着喽!等我把共匪剿灭了,让他来当参谋总长好了。”当时张治中就坐在白崇禧的旁边。

张治中在和谈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仍然不放弃和谈的主张。他在二月二十四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了政府威信降低的原因,历数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他请蒋介石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

蒋介石沿着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道路越走越快。南京政府于二月二十七日派军警包围了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并限令三月五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还封闭了《新华日报》。

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请阁下以正式公函通知我方驻京代表董必武，须延长撤退期限至三月底。”

同一天蒋介石急电召胡宗南飞南京，部署进攻陕北的军事战略，批准了胡宗南提出的作战计划。命令胡宗南三月十日攻克延安。

三月七日，董必武率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延安，张治中、邵力子到机场送行话别。三月八日，张治中怀着无限伤感的心情飞回新疆。

三月十一日下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十三日拂晓，胡宗南命令董钊、刘戡两个集团军，十五个旅共十四万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起进攻。三月十九日，我解放军经六天激战，歼敌五千余人后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周恩来说：“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说：“中共武装割据，妨碍统一。”“我们不能坐视变乱不加制止”，“只要我们坚贞奋斗，努力不懈，我敢断言，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要与共军“作战到底”。陈诚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败共军主力。但过去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

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可。”

时间很快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月二十二日晨，人民解放军攻克开封城，歼敌四万人，击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连连失利。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三日，飞抵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共军作战机宜。在这时，蒋介石也给张治中发了一个电报，约他到西安一晤。

在此之前，张治中曾拒绝到西安统一指挥五省军队对共作战；继而又拒绝“西北行辕”改称“西北绥靖公署”。张治中认为“绥靖者，剿共之别名也”。这个名称也是他不能接受的。种种原因，促使张治中屡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西北行辕”主任职务，但蒋介石也以种种理由没有答应。所以借这次到西安之行，再次约张治中面谈。

张治中在六月下旬到了西安，停留了七天，每天都和蒋会面谈话，尤以六月二十七日的谈话为重要。张治中事后有个记录，摘录于下：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奉约到王曲常宁宫行辕。总统邀登小亭上，俯瞰一湾流水，两岸碧禾，南山景色，扑人眉宇，如置身大自然怀抱中。坐对元首，畅谈国家大事，历时三小时之久；且在对话中率直痛陈所见，总统并不以为忤，剴切解答。惟看法悬殊，隐忧莫已，特纪其要，借留回忆。

治中附志

蒋：我们来谈谈时局问题。你先说你的意见。

张：当前局势必须有一绝大的政策转变，而这种转变一定要解脱外来的（指美国）挟持，同时要能够阻止党内的分裂趋势，国内的人心涣散；而且即在共产党方面，也能使之折服。这种转变，必须达到这种目标才好。

蒋：那么，怎样转变呢？

张：……先要从对苏联政策和对共党政策去研究解决办法。……对共产党问题，……我们应该主动地放弃戡乱主张，停止战争（继续阐明主动停止战争的利害得失，及目前从事改善中苏关系不必有其它顾虑的理由）。

蒋：……对共产党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停止戡乱。我们即使停战，共产党也不会停战的。同时我们现在站在劣势的地位，自己先主动停战是更不好的。我并没有坚持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到底，但是总要等军事形势好转才能谈得到这一着。……

张：（对总统关于共产党问题的看法表示不能同意）目前局势绝不能再拖下去，军事如此，政治亦如此，经济更如此；要继续拖下去，只有愈拖愈坏，我们应该果断。……

蒋：那还行？假使我们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

张：……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至于士气，现在可以说低落到等于没有了。这些部队东征西调、早已疲于奔命，他们很多人说早已不愿意打仗……现在宣布停战，对士气不但不会瓦解，而且给他们一个喘息机会，相反的会为之加强的。……

蒋：（对上述分析颇为动容）现在党没有什么力量，分裂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把基本的忠实的党员团结起来，改造这个党。至于共产党的看法，并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现在绝不是

停战的时机,还是先把局势弄好转再说。^①

后来两人又谈了对苏、美的政策,谈了行政院的改组,以及某些省份的人事问题。但蒋介石绝对容不得共产党。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被解放军击败。东北已完全解放,华北大部分解放。十一月二日,蒋介石密电召张治中到南京:“行动要保持机密!”

十一月四日,张治中飞抵南京,同日到达的还有傅作义将军。这时北平、天津、张家口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形势非常严峻。当天下午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大家到蒋介石那里吃晚饭,饭后谈平津问题。会上主要是何应钦讲话,他主张:撤退平津兵力,全部南下,或部分撤到察绥,部分南下。其它人默不作声。傅作义始终紧皱眉头,露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气。蒋介石最后问:“宜生将军有何意见?”傅作义连忙说:“很困难,很困难!”此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张治中因为事不关己,更是一言不发。蒋介石一看这种情形便说:“好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议。”

散会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明天上午来谈。”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蒋介石打电话叫张治中到他的官邸。张治中走进办公室,蒋介石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也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形势和我们六月份在西安时相差太远了。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说:“不打怎么办?”

张治中说,“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然后张治中从军事、外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72—775页。

交、经济、民心、士气诸方面去分析，认为“现在应马上放弃戡乱的主张，恢复和谈。”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蒋介石颇为感慨和忧虑地说。

张治中逼进一步说：“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

蒋介石倔强地说：“革命党人不怕失败！”

张治中说：“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我们纵然失败，也要能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代。”

蒋介石生气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

张治中吃惊地问：“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

蒋介石问张治中：“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

张治中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戡乱政策不变，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

蒋介石退了一步说：“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张治中坚决地说：“我绝不能担当这个职务。如果您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蒋介石脸色严肃，十分难看。

这次谈话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十一月八日，蒋介石在纪念总理周上痛斥主和者说：“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响应共匪的谣言攻势，而主张向共匪投降，这不但是他们自己甘做共匪的奴隶，而且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永远做异族的奴隶牛马。”“国军戡乱剿匪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目前一切和谣只是为共匪宣传攻势张目，决不能影响我们政府和军民同胞为国除害的决心。”

从这个谈话，可见蒋介石没有丝毫和谈的心思。

事隔三年，张治中在北京碰到傅作义。这时傅作义已经担任了

水利部部长，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傅作义谈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开会见面时的情况说：“我从那天起，就转变了念头，只想‘和’而不想‘战’，特别是您给我的启示很大。”

张治中说：“那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怎么会给你启示呢？”

傅作义说：“那天进会议室的门口时，您一定让我先进去，并说：‘你们主战的请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从那天晚上起，我就认真考虑‘和’的问题了。”

张治中哈哈大笑说：“我真没想到我的话还有那么大作用。我当时只是在‘和’的上面打主意，对于他们在会上谈的实在有点心不在焉。”

二、张治中成了“风眼”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张治中在国民党内成了焦点人物，是政治旋风的“风眼”，许多人都盯着他，许多人都要找他。蒋介石要与中共和谈，找张治中；处理新疆民族矛盾找张治中；蒋家王朝到了风雨飘摇中，要重新组阁，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也找到了张治中。

主战派陈诚，一九四六年在他发出“三个月内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内解决东北共军”的狂言后，曾到张治中家征求意见。张治中问陈诚：“你有这个把握吗？”陈诚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六个月内消灭不了共产党，那就永远消灭不了啦。”张治中笑笑，诙谐地说：“这不能算做把握吧。”

张治中与陈诚私人友谊很深，早在黄埔军校时两个人就共过

事；上海“八·一三”抗战时，两个人有过来往；张治中主政湖南，陈诚驻长沙也有过从。四十年代到了重庆，张治中在侍从室，陈诚在前方指挥作战，相互间经常打长途电话联系，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竟长达七十分钟，拿电话听筒的手都酸了。

一九四三年，陈诚得了一场大病。张治中针对陈诚的缺点，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善言相劝：

……此次兄在病榻上时间较长，请将二十年来奋斗经过做一回忆，于将来做事及健康方面，必多裨补。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凡无成见之人，无不表示同情。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急；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以致二十年来瞻前顾后，劳瘁特甚，身体与名望皆蒙受影响。……吾兄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改正过去急切而务多之习惯，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则兄未来将有三十年事业之作为，必可持盈保泰，以辅弼领袖，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也！

陈诚读了信，认为张治中“真够朋友”。他对张治中说：“许多朋友看了这封信，都认为你骂我，骂得很公道！”

正因为两个人私谊很深，所以在打内战上观点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事后仍然和好如初，谁也不计较。一九四八年，陈诚在东北打了败仗回到南京，又大病一场，辞掉参谋总长职务，仍然不服输，坚持反共，反对和谈。认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谈和谈坏的”。张治中尽力影响他，而不见效果。

张群这位蒋介石的亲信谋臣，在一九四七年担任行政院长时，也跑到张治中家求教。张治中诚恳地对他说：“你一定要把握住两项政策：对外，改善中苏关系；对内，力图恢复和谈。两大政策实现

了，你就成功了。否则，一定失败。”没隔半年，张群又来征求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直爽地说：“你失败了。你不但没有把握好两项政策，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在你任职期间下了戡乱令。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张群皱着眉头，苦恼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党内风气就是这样。院长职务也辞不掉。”

这一段时间，黄少谷担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社长。他为人谨慎，做事细心，但软弱，魄力不够。在重庆时的几年，张治中负责政治部时，黄少谷直接对张治中负责，报纸的言论倒相当温和。一九四七年后，尤其是“戡乱”命令下达后，《和平日报》的言论特别激烈。邵力子先生有一天对张治中说：“《和平日报》反共的激烈，比《中央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黄少谷与您关系很好，为什么不劝劝他？”有天张治中约了黄少谷在中山陵的山坡树林里谈了几个小时。

张治中说：“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不是用武力可以解决的，尤其是走下坡路的国民党军队，士气涣散，官无斗志，更不能打败共产党，这种趋势你没有看出来？”

黄少谷说：“早就看出来了。国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谁不知道！”

张治中说：“既然如此，《和平日报》的言论为什么不谈和平，主张和谈，却天天讲‘戡乱’、‘剿共’，这样的报纸能受欢迎吗？”

黄少谷说：“我早就不想干，几次辞职，上头不答应啊。”

张治中说：“国民党太腐败了，肯定导致失败。上头是上头的事，你是你的事。”

黄少谷说：“我一定注意。”

黄少谷答应得很好，但以后却越陷越深，以至于不可自拔。

有一次，白崇禧由武汉来南京，找到张治中聊天。张治中拉上

白崇禧乘车到了中山陵。两个人一边拾级而上，一边谈话，走走停停。

张治中说：“你我都是贫苦的农工出身，怎么能为封建、官僚、买办阶级服务、卖命？”

白崇禧不作声。张治中又说：“我看你很少接近进步的年轻人，思想越来越保守，许多进步的东西你都反对。”白崇禧略作解释，对张治中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张治中问他：“你认为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白崇禧抬起头，两眼盯着张治中反问：“你说这场战争结局怎样呢？”

张治中思索了一会说：“事情明摆着，军队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费越来越不足，人民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我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比我清楚。东北辽沈战役我们损兵折将达四十七万余人，廖耀湘将军被俘，卫立煌只身乘飞机逃出了沈阳。目前进行的‘徐蚌会战’，兵团司令黄百韬被击毙，所部七万八千人全部被俘。紧接着黄维兵团也被共军吃掉，黄维被俘。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幸亏南撤速度快，否则也难逃厄运。目前杜聿明所率几十万大军的处境就极危险，我看很难突围。平津地区，傅宜生的命运未必好。在财政上，国民政府完全靠钞票印刷机维持。去年全年总收入十七亿元，而军费开支则达一百亿元。一九四六年七月，印钞票一亿元，到了十二月份，上海印钞厂每日印钞票二百三十余亿元。到今年八月，法币发行量达一千二百万亿元。物价怎能不飞涨，货币能不贬值吗？法币一百元，抗战前可买两头牛，到今天连半盒火柴都买不了……”

白崇禧把手一挥说：“别说了。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几天。国民党的失败就在眼前。现在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收拾残局，蒋介石失败了怎么办？”

张治中说：“健生兄，我们不应坐等失败。我想还是与中共讲和好，免得许多弟兄白白送死，也使广大父老乡亲免于战争涂炭。”

白崇禧说：“我同意你的想法。”

两个人商量了许久，最后相约：“今天所谈不得告诉任何人。”

原来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徐蚌战役”（我们称淮海战役），借此扭转局势。他没想到美械装备的中央军那么禁不住解放军打，没几天黄百韬兵团就被歼灭了，击退刘汝明、李延年兵团的增援，又吃掉了黄维兵团。经济上由于货币改革失败，“金圆券”贬值，导致危机四伏。蒋介石认为翁文灏内阁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便想让张治中出面组阁。十一月五日上午，蒋介石已经问过张治中，张治中表示不能担此重任。但蒋介石并没死心，于十二月八日又找张治中谈话。

蒋介石说：“文白兄，翁文灏院长是干不下去了。上个月请你组阁，你不答应。现在我有两个方案。第一案，请孙科出任院长，你出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第二案，假如孙科不干，则由你来组阁。”过了片刻，没等张治中说话，蒋介石又说：“你的态度太明显了，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反对和谈，尤其是反对在不利的形势下和谈。现在最好能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孙科任院长，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你看怎样？”

张治中表示：“我还是原先的意见，不出面组阁，最好连副院长也不担任，出任国防部长更不合适。要和谈，也只能以代表的身份去谈判。”

蒋介石说：“这事你自己考虑，我不勉强你。”

蒋介石很快又找孙科谈话。孙科说：“我组阁可以，但必须组成‘巨头内阁’，这样才能起作用。”

蒋介石问：“何谓巨头内阁？”

孙科说：“所谓巨头，就是包括张治中、邵力子、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陈立夫等。而且非有张治中参加不可。”

蒋介石说：“你可以找张治中谈话，动员他参加。”

孙科果然找张治中商量组阁事宜。张治中提出自己的和平主张。孙科说：“问题不大，我在组阁后的方针问题曾向蒋总统请示过。蒋总统说，‘内阁组成后，方针你们大家研究去。如果大家认为非和不可，我也可以考虑的’。”

张治中总觉得军事形势太坏，时间太急。而孙科既已反苏在前，自己加入内阁未必能发挥多大作用。便说：“我还是不担任实职为好，只挂一个政务委员的虚衔吧。”

孙科在公布内阁名单时发表了一篇谈话，表示要争取“光荣的和平”。孙科还出面请美、苏、英、法出面调停中国内战，虽然被这四国拒绝了，但宁沪间的和谈空气还是逐渐浓厚起来了。

三、劝蒋介石下野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用过晚餐，刚要移步到庭院转转。这时侍卫官通报：“张治中部长来见。”蒋介石把手一摆：“请进。”蒋介石扭头一看，只见张治中身后还有张群、吴忠信二人，心想，“怎么三个人一块来了？”蒋介石把三位亲信谋士请到客厅坐下后，笑吟吟地问：“今天诸位先生有何贵干？”张治中先说：“今天我和岳军兄收到白健生将军的电报。他托我俩把电报转呈总统，后来我俩与礼卿^①先生商量了一下，决定一块来呈送。”

蒋介石问：“健生在电报上谈了些什么？”张治中说：“您先看看

^① 礼卿，吴忠信的字。

电报。”说着便把电报译文递了过去。

蒋介石接过电报，心想，所有的嫡系部队都指望不上了。杜聿明的部队已弹尽粮绝；傅作义被困平津；阎锡山也自命难保。目前唯一有机动力量的、能向共军出击的部队就是白崇禧所辖的桂军了。蒋介石思念至此，对白崇禧还颇有好感。于是慢慢展平电报细细读：

……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尚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历史亦将从此而斩。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

蒋介石读到这里，心里怦怦直跳，心想，“国难见良臣”，白崇禧这有名的“小诸葛”想出什么“锦囊妙计”了呢。于是又往下读：

……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蕘：（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蒋介石读完白崇禧的电报，“啪”的一下摔到桌子上，大骂白崇禧这狗头军师：“这是逼我下野；是落井下石！”然后猛地站起来，背着两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呼呼地喘粗气。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里，蒋介石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会又穿好衣服到院里散步，一会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出神呆坐，不管逮着谁

找个碴就发顿脾气，搞得贴身侍卫不知所措。最后蒋介石歪在沙发上，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呆到天亮。

二十五日晨，蒋介石洗漱完毕，心想今天是圣诞节，无论如何要高高兴兴地过一天。他用过早餐，侍卫递给他热毛巾擦了擦手脸。他让侍卫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音乐，因为战场上绝对传不来好消息。没想收音机刚一打开，播音员用清脆洪亮的声音宣读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四十三名一级战犯，蒋介石名列榜首。蒋介石脸色铁青地喊：“关掉！关掉！”

蒋介石的心跳还没有恢复到正常频率，这时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又来了。张群说：“有份湖北省参议会发来的通电，要急呈。”蒋介石问：“通电谈什么？”张群展开电报就读：“……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一抬右手说：“别念了！这是他们串通好了逼我下野！”

白崇禧的确不只“言和”，而且在“逼宫”“倒蒋”。湖北参议会在他授意下发来通电之后，他还在武汉向新闻界、政界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背后又联合广西、湖南、河南等省搞“五省联盟”，联合通电蒋介石，呼吁“和谈”。

第二天张治中、张群两人又邀了吴忠信，再次晋见蒋介石，劝其下野。吴忠信向来主和，十二月二十四日刚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三个人从“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多方面分析当时局势，详析利害。一连谈了好几天，蒋介石最后才勉强同意。

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来一封电报，要蒋介石“速下决断”，“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进一步逼其从速下野，把权力交给李宗仁。

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邀集李宗仁、孙科、童

冠贤、于右任、张群、张治中、吴忠信、邵力子等二十多人共进晚餐。

宴会毕，蒋介石发表讲话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①张群读完下野文告后，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兄有何意见？”李宗仁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谷正纲、张道藩等人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引起众人强烈争执。蒋介石见此情况，便厉声说道：“我并不要离开，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某一派系。”这时谷正纲等少数死硬顽固分子，落下了悲哀的眼泪。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文告”，为“和谈”定调子。蒋介石认为“和谈”是可以的，但国民党的“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而蒋介石“个人的进退出处”，“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就暴露了蒋介石的内心秘密，他并不想下野，他希望“国民”们挽留他、支持他“不下野”，他愿服从这样的“公意”。但国民们反应冷漠。

一月四日，蒋介石亲自到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他对李宗仁说：“我还是退休为好，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是很愿意上台继任总统的，但他没有浅薄到立即答应下来，仍然极力推辞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第二天，蒋介石又派吴忠信、张群前来劝李宗仁继任总统。李宗仁仍以“局面难当”不肯接受。

这几天蒋介石度日如年。一月五日，他召吴忠信来官邸口授给白崇禧的电报，中心意思是同意白崇禧的和谈倡议，表示自己下

^①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369页。

野。电报稿刚念完，张群进来报告中共对元旦文告的反应。他带来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战犯求和》。蒋介石一听文章标题就气得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不再动弹。过了一会，又对张群说：“念念，我听听到底他们说了些什么。”张群说：“据说这类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蒋介石没好气地说：“管他谁写的呢，念！”

于是张群就逐字逐句地念。当念到：“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那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当张群读到这里时，蒋介石气得脸煞白，猛地站了起来说：“算了！算了！别念了！”

蒋介石在这几天里既苦闷，又矛盾。他所希望的场面——忠于“总裁”的广大党员、热爱“领袖”的广大国民，纷纷要求他不要“引退”，不要“下野”，更不要“退休”，但这种场面始终没有出现。

一月七日，蒋介石获悉杜聿明的部队在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灭。他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上这样写着：

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了，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迫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①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127页。

一月九日，蒋介石接到杜聿明最后发来的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十日晨，杜聿明被俘。

一月十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李宗仁，灰心丧气地对李说：“现在我决心不干了，按宪法程序，由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不干也得干。”李宗仁表情呆板地说：“按宪法，我无可推辞。但我出来讲和，共产党会让我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说：“你先与他们谈谈看，我做你的后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说：

……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

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①

蒋介石从这八项和谈条件看出中国共产党态度是十分明确坚定的,于是他便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于一月十九日下午在黄埔路官邸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出席的有孙科、张群、吴忠信、张治中、陈立夫、吴铁城等。会议决定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最后蒋介石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就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表面征询大家的意见,内心是希望大家挽留他。但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发言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场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这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愤然厉声说:“不必了!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这时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想说些什么。蒋介石却不耐烦地猛然站起来,连声说:“好了,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个方案,下野文告怎样措辞,请大家研究。不过主要意思一定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于是,蒋介石决定二十一日下野。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把中常委召集到黄埔路官邸。他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388—1389页。

低沉的语调宣布自己立即“引退”、李宗仁继任之事，然后宣读了“引退”文告。

会后，张治中找到蒋介石说：“我想不日内即回西北行营。”蒋介石立即制止说：“哪怎么行？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张治中说：“我现在心里十分苦闷，还是先回西北住几天。”蒋介石却严肃地说：“我既然决定下野，马上就要和谈了。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座的人也纷纷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和谈正需要你啊。”

蒋介石为了达到下野后可以在幕后任意操纵，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去负责和谈，与共产党周旋。

蒋介石在宣布下野的当天傍晚就乘飞机到了杭州。第二天又乘飞机抵宁波，再改乘汽车返回溪口。

四、筹备“和谈”一波三折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李宗仁代总统上任执行职务。他宣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李宗仁主政之后，一向主和的张治中在政治舞台上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心人物。他和邵力子、黄绍竑被指定为和谈代表。李宗仁和白崇禧还多次表示欢迎张治中出任行政院长之职，张治中均婉言谢绝了。同时他还将蒋介石下野从酝酿、规劝到实现的全过程的有关情况都向李宗仁、白崇禧二人通报了。

李宗仁上台之后，立即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卿、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望他们为和平做些促进工作。

鉴于李宗仁的积极倡导和平，中共发言人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称：“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关于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关于谈判代表，谈话中说：“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 CC 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另外，还要惩治战争罪犯，李宗仁也不能幸免。

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诚意，特命行政院实行七项措施：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地区，待停火后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刑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能非法逮捕。

因为李宗仁的命令在下达前，既没请示蒋介石，又没有与孙科商量。蒋介石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孙科，要孙科抵制李宗仁。孙科当然听蒋介石的，立即带领内阁要员于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离开南京到了上海，并决定二月四日把行政院迁到广州办公，把李宗仁孤立起来。

蒋介石虽然表面下野，但他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李宗仁主政的一切措施，按照惯例，必须经国民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付诸实施。而中常委还不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所以蒋介石名为“下野”，实则仍然在幕后指挥一切，干预国政，指挥军队。南京政府在蒋介石的控制下，不只没有释放政治犯，特务照样随便捕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判无罪。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容许的”。向南京反动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南京政府不但不重新监禁日本战犯，反而在一月三十一日遵照美国主子麦克阿瑟的命令，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

针对南京政府卖国反动行径，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身份写的声明指出：“日本战争罪犯”、“国内战争罪犯”，“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南京政府放跑这些战犯，怎能证明他们有“和谈诚意”呢？

南京政府对战犯这样仁慈，但对真正主张和平的人士，却十分残酷。上海的特务头子毛森威胁说：“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都要清算，我要准备用手枪对付他！”因此，“邵力子先生常常不敢回家去”。许多好心的朋友劝告张治中注意个人安全，因为死硬派有可能对他下毒手。为了预防不测，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专门送给张治中一件防弹背心。像谷正纲之流更是在公开场合对张治中等主和的人进行攻击。

张治中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李宗仁执政主和很难有所作为，和谈也一时开始不了，便萌生了退志。他在回忆录中说：“从蒋的元旦文告发表后，看到各方面的反应情形，我认为大局已很少挽救的可能，倒不如退保西北，为和平交代作准备，使地方少受糜烂，人民生命财产少受牺牲，才对得起西北人民多年来对我的厚望。”^① 张治中这时想的是全国和谈实现不了，可以保证西北五省实现和谈，使局部地区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摆脱战乱的折磨。

于是张治中在一月底向李宗仁请求先回西北，理由是“就此数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83页。

日等候中共答复之时间,返兰一行,处理公务。如中共答复重开和谈,则亦可直接自兰飞平。”^①李宗仁同意后便立即回到兰州。张治中一到兰州,“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而且打电报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②

李宗仁要想与中共谈,绝少不了张治中这位主要人物。因此李宗仁劝张治中尽快返宁的电报、电话不断。许多朋友也给张治中写信、发电报相劝。邵力子在二月十四日参加“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前,给张治中的电报说:“毁誉得失,在此不计”,盼望张治中早日回宁。程思远应李宗仁的嘱托写给张治中的信中有这样的意思:李之上台主政,惟欲实现和平,而和谈能否成功,惟张是赖,张若不出,如苍生何!张治中在多方“劝慰”情况下,再也抹不开情面了。张治中自己也想:“此时和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同时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使我对当前的和谈仍然有着万一的希望。”^③

张治中经过慎重的考虑后,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在二月二十二日乘飞机回到南京。这天南京天气异常恶劣,能见度只有二百米,云层很低,又加上蒙蒙细雨。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到机场迎接。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才徐徐降下。白崇禧迎上前去握着张治中的手说:“飞机隆隆地在天上盘旋,我就在地上为你祷告,希望老天爷保佑你平安。”说完众人哈哈大笑。

“上海和平代表团”于二月十三日自上海乘飞机,经青岛,于二月十四日下午到达北平。毛泽东在十四日即拍电报给叶剑英并告

① 《新闻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784页。

③ 《张治中回忆录》,第785页。

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等人：对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①

二月二十二日，颜惠庆等与傅作义、邓宝珊到了西柏坡。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向他们表示：中共方面对和谈代表人选和谈判地点允予考虑，三月十五左右可望决定。双方在会谈中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回南京，颜惠庆在机场发表谈话说：“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政府和共产党双方也都希望和平。现在和平之门已开，虽然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和平代表团此行任务已了。今后和谈进行，当由政府 and 共产党双方开会商讨。”^②

五、张治中一到溪口

张治中在二月底回到南京后，李宗仁左右的人常向他发牢骚，说李宗仁是个傀儡，蒋介石名为下野，实则仍然大权在握，不只在幕后指挥，而且把李宗仁的“政府”抽空了；金条、珠宝运到了台湾；精锐部队三十多万人撤到了台湾；许多重武器也运到了台湾。他还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456页。

^②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第24页。

指使孙科把行政院迁到广州办公，实际上架空了李宗仁。李宗仁颁布的命令根本就不能贯彻。比如释放政治犯，程思远为释放张学良亲自到台湾去了一趟都不成，而且在国统区每天还逮捕许多民主人士，制造许多新的政治犯。张治中感到蒋介石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该劝他出国，李宗仁也有这个意思。他认为蒋介石出国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张治中把这个想法向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人一透露，大家都同意。认为蒋出国后李宗仁可以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加速和谈的进程，国家早日太平。

正好吴忠信也想去看望蒋介石，两个人于三月三日乘飞机去了宁波。他俩下了飞机即乘汽车到了溪口。蒋介石专门派蒋经国到溪口接张治中、吴忠信。一九二七年张治中曾到过溪口，那时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不得意而下野，回到溪口故里。转眼二十二年过去了，溪口大变了样。

浙江奉化县境内溪流近百，最有名的是剡溪，剡溪源出四明山余脉横溪岭，剡溪回肠九曲。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汇合于锦溪，这里便是蒋介石的故里溪口村，又名锦溪村。解放前溪口村有近千住户，多半姓蒋。村东有一屏障似的山岭名武岭，亦称武山，是溪口的门户。汽车绕过武岭直接进村开到蒋介石的故居。

蒋氏故居是一座砖瓦木石结构的古老庄园，面溪背山。砖砌的大圆拱门，进院后又有一个半圆拱门。再往里走就是一大间木制厅堂，正面摆着蒋介石祖先的牌位。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到此都要行三鞠躬礼。

蒋经国陪张治中、吴忠信在会客室坐了片刻即被领到蒋氏新居。新居离故居不远是一座枕溪卧流、一楼一底的洋房。房舍不大，但十分考究。当晚张治中、吴忠信住在楼上，随从人员住在楼下。当

天乘汽车赶来的屈武则住在招待所。这天蒋介石不在山下，而是住在山上雪窦寺妙高台。

第二天张治中、吴忠信吃过早饭就上山去雪窦寺会见蒋介石。雪窦山在众峰绝顶，顶上宽阔旷为平地，有百余顷。村落相望，鸡犬相闻，稻麦咸青，恍若世外桃源。四周有九峰环抱。山顶平地有一古刹，因峰而名为雪窦寺。雪窦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主峰下有一石窦，泉水从中喷激而出，其色如雪，故人称“雪窦”，山之得名源于此。雪窦山、雪窦寺乃浙东名山名刹。前人有诗赞曰：“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见鸟飞。”还有“僧居俯瞰万山尖，六月凉飙早送炎。”

雪窦寺前有峭壁千仞，绝壁凌霄，名为千丈岩。寺的左右各有一溪流奔腾倾注锦溪池，穿过一石桥，然后冲至岩口倒泻而下，形成巨瀑。瀑落至岩腰，岩壁有一突出巨石，落瀑激如碎玉飞珠，晶莹四溅，磅礴绮丽景观，实在罕见。宋代王安石写诗赞曰：“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织丝挂，映日还成五色纹。”

千丈岩顶建有一古亭，名“飞雪亭”，是观瀑布的好地方。从飞雪亭沿松林小径前行十来分钟，即到另一山峰，其峰下临深谷，山顶旷如平台，故名曰“妙高峰”或“妙高台”。妙高台有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旁有平房守护，称为墓庐。蒋介石每回溪口，必定居住在这里。

张治中、吴忠信上山后，他们二人在蒋介石的陪同下，向蒋母坟墓鞠躬后就步入客厅。宾主坐下，寒暄之后，蒋介石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说着把报纸递给了张治中、吴忠信二人。原来中外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在正劝蒋出洋云云。蒋介石接着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

逼我亡命就不成！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在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这几句话就把张治中、吴忠信的嘴巴封起来了。他俩只好把话题岔开。张治中心想：这事急不得，住下来再说，于是建议：“总裁，贵乡的山水实在美，十几年前我虽然来过这里，但那时来去匆匆，这次可要好好看看，转转。”

蒋介石站起来，长出了一口气说：“好，到外边走走。”

蒋介石在前，张治中、吴忠信在左右稍微靠后半步，沿着松林间的小道，边走边谈。眼前是青山绿树，耳听不远处有潺潺溪水声，呼吸着清新空气，三人的心情骤然舒畅百倍。蒋介石平和地说：“文白，从此我不再干政，请相信我，也请你转告德邻，我将终老故乡。”张治中和吴忠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下野后回溪口经过杭州时，他随便问浙江省主席陈仪有什么意见。陈仪向后退了半步微微一鞠躬说：“激流勇退，适当其时”。这本是一句不经意的顺水推舟的套话，蒋介石听了却脸色突变，缄默不语。陈仪当晚在楼外楼为蒋接风，蒋却粒米未进，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二月二十七日，蒋命令汤恩伯将陈仪拘押起来。张治中沉思片刻，顾左右而言他：“总裁，这次和谈，中共提了八项条件，第一条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第一名就是蒋介石，张治中心想只有先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才能打消蒋的担心，方便以后的谈话。然后张治中又请示蒋介石对和谈有何指示意见。蒋介石反问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于是张治中便把来前商量好的意见一点一点谈出来。关于军队，双方应按一定比例各自改编；关于划江而治，希望能保持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关于联合政府，双方应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蒋介石对这些意见表示首肯。最后他指示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李德邻现在负

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故乡，绝不再度执政。”

转眼间，天色近午，三个人便返回进餐。下午三个人又在客厅里扯起和谈代表的人选问题。张治中说：“最近许多报纸都有增加张群、吴忠信两位先生为和谈代表的传闻。”吴忠信当即表示不愿干。蒋介石说“不干也好。”张治中也表示“不想参加和谈。”蒋介石说：“这是值得考虑的。不参加也好。恐怕你摆脱不了。”谈到彭昭贤、钟天心已经请辞代表名义，蒋介石说：“于北方籍的立监委员中遴选最好。”

张治中、吴忠信在妙高台住了五天，后来又回到溪口住了三天。这八天里，早晚起居都和蒋介石在一起。白天三个人一起游览山水风光，边走边谈；上午谈、下午谈；吃着饭也谈，甚至晚上三个人围炉也谈。所有重大问题差不多都谈到了。比如：党的问题、外交政策问题、革命的领导方针问题、关于内阁改组问题、关于蒋的出国问题，等等。

有一天，三人同游潭墩山的文昌阁。一九二四年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回乡扫墓，见文昌阁楹柱倾斜，便与其兄商量重修。修成后又建一亭，题名为“乐亭”。蒋介石亲撰《乐亭记》刻于石碑之上，内有“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的句子。当年他以“中流砥柱”自诩，心里颇为得意。今天在此，重读旧作，心里很不是滋味。偏在这时张治中又委婉地向蒋介石提起出国之事：“总裁，我看您到国外休养一段时间，对您的身体会有好处的。”蒋介石不禁大声喊起来：“又来了，为什么总要劝我出国呢？”张治中又紧跟一句：“大家都是为了您好，您为党国太辛苦了。”蒋介石愤怒地说：“文白，我绝不出国，我不想亡命！我可以不做总统，做个老百姓总可以吧？！”张治中见蒋介石真的动了火，只好连声说：“是，是的。”从此，不敢

再提出国一事。

只要不提“出国”，蒋介石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张治中之所以几次三番委婉地劝蒋介石出国，其动机“还是以一本爱护他保持他的晚年信誉作出发点。并没有存过和他决裂的心意。”^①

三月十日，张治中、吴忠信要回南京了，蒋介石一直送他俩到宁波机场，欣然握别。

六、紧锣密鼓准备“和谈”

张治中回到南京后，认为和谈的基本原则已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便积极地投入和谈的准备工作。

张治中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上蒋介石给何应钦的信到杭州劝何组阁。何应钦反复思考，几经踌躇之后终于答应了。不过他附加了一个条件，郑重地对张治中说：“你一定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到了这一步，张治中也痛快地承担下来。何应钦的任命在三月十二日正式公布。

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和谈。他以院长身份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谈方案。出席会议的有邵力子、章士钊、李蒸、贺耀组、翁文灏等。

第一次会议上，何应钦首先致词，然后由张治中汇报去溪口见蒋介石谈话的经过。张治中对中共所提八条做了轮廓的分析，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共所提八条，除第一条我们不能接受之外，其它各条都可以考虑。有的条款还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比如：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等。唯有第一条最困难，中共把惩治战犯列

^①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105页。

为八条之首，并先后三次公布战犯名单。二月五日，又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和平谈判的必备条件’，足见中共之重视。但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估计它将成为和谈中双方交锋的焦点，需详加讨论，预为之计。”第一次会议就对战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次会议，继上次会议展开讨论，并决定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草拟和谈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偏重政治，乙案偏重军事。重点是立即停战，划江而治。这些均作为原则性条款，具体条件则视谈判情况而定。

第三次会议就所拟甲乙方案的条文展开了讨论。

第四次会议时，大家又认为甲乙两个方案没有必要。只用甲案，乙案作为参考。同时考虑到中共方面坚持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态度强硬，恐怕先提对案不合适，因此改为腹案，作为内部掌握之用。此外还考虑到和谈事关重大，而且局势变化急剧，为了适应实际情况，决定请二月份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迁回南京。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结果，写成一个腹案，全文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

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①

到三月二十二日，何应钦认为和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国统区已到了山穷水尽境地，再也拖不起了，而且要求和谈的呼声日甚一日。何应钦于三月二十三日公布了内阁改组名单，二十四日就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成立“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公布了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代表是：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希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792—793页。

望中共早日决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商谈。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通过广播也公布了其和谈代表名单：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齐燕铭为秘书长。特别强调以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代表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四月一日到北平开始和谈。

中共的新闻广播后，国民党各界立即活跃起来，不仅老百姓街谈巷议，各种报纸、杂志纷纷发布消息，刊登评论，做出各种报道和推测。立监委、CC集团还纷纷集会发表演说。

趁大家忙于准备和谈的空隙，张治中还抓紧做了汤恩伯的工作。汤恩伯早年曾任中央军校教官、学生大队长、教育处副处长等职，是张治中的部下。在中原大战前，张保荐汤恩伯在教导师带兵，从此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内一大军事集团的首领。汤恩伯认为能够接近蒋介石，并受重用，全仰仗张治中的提拔、推荐。因此始终认张治中为恩师。

这时汤恩伯任宁沪杭警备总司令，担负京畿卫戍之重任，是国民党军事实权人物。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二日回到溪口，二十五日就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在会上，蒋划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蒋估计白崇禧有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关于战略计划，蒋介石部署说：“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因为李宗仁上了台，所以蒋介石决心放弃南京，并让汤恩伯秘密把江阴要塞的大炮拆卸后运往上海，并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布置完以后问汤恩伯：“听懂了没有？”汤恩伯大声回答：“听懂

了！卑职一定遵命，不成功便成仁！”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最后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能坚持一年，国际形势会发生重大变化，那时他们会全力支援我们。”

就是在蒋介石密令汤恩伯加紧备战的时机，张治中两次秘密到上海汤宅，和汤恩伯长时间交谈。张治中要求汤恩伯停止在上海周围修筑工事，停止征兵、征粮，停止运送金银等物资去台湾。张治中的用意是想以此证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诚意。张治中对汤恩伯说：“你不照我的话去做，你就是破坏和谈。”而汤恩伯对自己的亲信屡次讲：“张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不能不听他的话。可是这些是做不到的事啊。教我如何是好？”其实，汤恩伯的决心早已下定，就是继续效忠蒋介石，他按蒋的旨意扣押了自己的恩师陈仪就是证明。

七、张治中二到溪口

三月二十八日，张治中嘱咐机要秘书余湛邦用工楷把“和谈腹案”及“国防部意见”抄写一份。二十九日，张治中和屈武带上这两份文件乘飞机又去宁波，然后转车去了溪口，向蒋介石再次汇报。

蒋介石看了腹案和“国防部意见”之后虚伪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去北平和谈，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然后留张治中住下。

晚饭后，张治中到吴忠信的住处。刚进门，吴忠信就哈哈大笑说：“文白兄，刚收听完共产党的广播，他们在骂你，质问你既然主张和谈，为什么又到溪口见蒋介石？”张治中苦笑了一下说：“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真是做到家了，我们对共产党来说，简直无秘密可保了。”这次他来溪口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亲自布置要飞机，到了溪口，一切接待由蒋经国安排。就是这样精心保密，共产

党对他的行踪还了如指掌。国民党焉有不垮台的道理？

三十日上午，张治中在告别蒋介石之前，两人又做了一次长时间谈话。午餐后，蒋介石执意要送张治中下山。在溪口镇分手时，蒋介石握着张的手说：“祝你一切顺利。我是愿意和平的，我愿终老故乡。”

从溪口到笕桥机场，蒋经国和屈武同车。他俩早年是同学，无所不谈。蒋经国在机场和屈武分手时，狠狠地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回到南京时，屈武把蒋经国的话告诉了张治中。张治中一听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若早知道这话一定当面质问他，并教训他一顿。”老蒋让张治中“一切小心”，小蒋则说张治中“死无葬身之地”。把这两句话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和居心。

三月三十日，张治中回到南京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没有顾上休息，立即找机要秘书余湛邦口述了一篇新闻稿，分送各报发表。其内容是：蒋介石赞成和谈，主张和平，愿意终老故乡，不再干政。张治中的用意有二，一是为和谈制造良好的气氛；二是对反动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压一下他们的反动气焰，使和谈进行顺利一些。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张治中就和谈问题在立法院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了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时张治中的心情是兴奋的、激动的。

会后，上海《新闻报》的负责人俞树立访问张治中。俞是张治中的老朋友，无话不谈，两个人见面后，没有客套，俞树立先生从皮包里拿出了笔和本子，便直截了当地问：“现在看来，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不知张先生对和谈的前途和当前局势作何估计？”

张治中说：“目前形势的确十分严峻。和谈会有许多困难，不过

我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

俞先生又问：“你看，到了这步田地才谈和，是否迟了些？”

张治中说：“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向总统进言，有口头的，有书面的，都是竭力主张和谈，但均未蒙采纳。去年六月在西安，十一月在南京，又两次向总统痛切陈词，还是未能说服他。总统一再强调说：‘现在我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今天，不是也下野了吗？”张说完两手一摊，长叹了一声。

“先生，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俞树立又问。

张治中说：“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死马当活马治，力争有个好的结果。”张的心情十分沉重。

“您不是到溪口去了吗？到底怎么样？”

“一切方面，一切问题，我和总裁都商谈过了。临别时，总裁一直送我到山下溪口，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里，从此不再干政。”张治中谈到这里，语气有些兴奋，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您对中共估计怎么样？”俞树立问。

“从中共提出的八项基本条件就可见一斑。中共的态度十分坚定，我们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张说到这里脸色又显得十分忧郁。有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各自在想各自的心思，房间里的空气显得特别沉闷，使人有窒息之感。

张治中一方面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的关系太深，他从封建观念出发，觉得在这时如果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陈旧的感恩知遇的伦理观念仍然束缚着他，一时还难以解脱。

三十一日下午四时，代总统李宗仁匆匆嘱咐程思远通知五院院长，国民党留京中央常委到总统府子超楼茶叙，听取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并商议有关和谈问题。

茶会准时开始。李宗仁主持会议，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便请张治中讲话。张治中说：“代总统以和谈代表团即将北上，特派我去溪口请示本党总裁。在两天中，我与总裁谈了两次。总裁一再表示，他已下野，和谈由代总统和何院长主持，他不便参加什么意见。”张治中接着又说：“上海方面少数顽固分子，对我制造种种谣言，横加诬蔑，令人愤慨。”张群笑着插话：“今年是忍耐年，大家都应忍辱负重。”在会上阎锡山、白崇禧也先后发言，他们强烈要求首先签订停战协定。

张治中在这时处在三方面的势力包围之中，一是他作为代表团的团长要与中共和谈，和谈的首要问题就是惩治战犯。而惩治战犯是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所有国民党要员不能接受的。这是他的最大为难处。在国民党内部，他又处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两派势力之间。

蒋介石、李宗仁两个集团有同有异。主张和谈，划江而治是相同的；不同处是蒋介石打算划江而治，得到喘息机会，积蓄力量，然后向中共反扑过来，彻底消灭共产党，恢复蒋家王朝；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是准备联美、联苏、联共，壮大自己的势力取蒋而代之，与共产党平分秋色，各得天下之半。李宗仁曾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该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他交给刘斐的主要任务就是到了北平之后联共压蒋。李宗仁认为只要与中共联合好了，利用苏、美等几方面的势力就可以把蒋介石压垮，挤出中国。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何应钦在他的私人官邸为和谈代表团举

行欢送宴会，出席作陪的有翁文灏、贺耀组、黄少谷等，何应钦首先举杯祝酒说：“祝各位一路平安，和谈顺利。”有的一饮而尽，有的仅抿了一点。何应钦接着说：“这是一趟辛苦差事，我代表党国谢谢诸位了。”翁文灏等也随声附和说：“不易啊，只有文白诸兄敢担此任”，等等。席间没有谈及和谈的具体话题。总之，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八、周恩来怒斥假和谈

四月一日上午，六位代表和顾问驱车来到明故宫机场。伪立法院还特意放假半天让公务人员到机场送行。在南京的党、政、军大员也赶来相送。候机室里众人谈笑风生，气氛相当活跃。邵力子棋兴大发，和一位老友对弈，李宗仁、张治中则站立一旁观棋，不时轻轻说几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

“天王号”座机慢慢滑过来。和谈代表提着箱子，拿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休息室，来到登机的舷梯之前。各位代表纷纷与送行的人握手话别，然后回身登上舷梯、进入机舱。张治中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他站在舷梯顶上用沉重而激动的语调向送行的人们说：“我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和谈成功。”他走进机舱后又回身向送行的人们挥了挥手。机舱门慢慢关上，机轮开始滑动，螺旋桨在加速，转眼间冲到了跑道的尽头，机头往上一仰，“天王号”便腾空而起，飞向蓝天。

当飞机在蓝天白云间平稳飞行时，张治中看着舷窗外的白云飘浮不定，他的心情也似白云一样在起伏。在西安他苦口婆心劝蒋介石言和；在溪口，他推心置腹劝蒋介石出国；甚至数年前他屡写万言上书，极言改革时政的必要；三年前他也会乘飞机到北平调停，现在看来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张治中想到此，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气。

三月下旬，新组阁上任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政务会议时，重新提名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但邵力子先生刚从北平返回南京，深知和谈成功无望，所以坚辞首席代表资格。最后大家又推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他觉得大家的好意难却，只好答应下来。如今他又想，经过两年半的内战，国共两党强弱易势，主客换位了。共产党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的“腹案”和“国防部和谈意见”的。

飞机在云海迅速穿行，越是临近北平，他越是觉得和谈前景的渺茫。他这时想起李宗仁讲的一句话：“那就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张治中这几天的确太累了。他靠在座椅上打了一个盹，听到身后有几个随员在议论：

“你猜，我们代表团到北平，中共方面谁来接？”

“我想起码也会是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

“我们代表团是文白将军率领，离开南京时，李代总统、何行政院长，以及在京的党政要员都到机场送行。再说，上次重庆谈判文白先生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主席，依我看周恩来肯定会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是首席代表，张将军也是首席代表。首席代表接首席代表，理所当然。”

张治中迷迷糊糊听着随员们的议论，心里有些烦，但又不好制止。他想：自己多年来和周恩来就有交往，而且私人情谊还很深。“周恩来肯定会来接我。我俩见面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

张治中正在遐想，“天王号”已飞临北平上空。机舱里马上活跃起来，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玩北平城不知多少次了，但还没有从空中看过北平城的全貌。我建议飞机在北平上空转一两圈，让大

家仔细看看。”

代表们都表示赞成。但飞机刚绕城转了一圈，有的老人已经头晕目眩，身体经受不住了。于是，飞机很快就在西苑机场降落了。

张治中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穿着同样式军装的人。张治中一位也不认识，经介绍才知道来迎接的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规格显然比较低。代表们心中不满，脸色不快。张治中心里也感到纳闷。出机场时，代表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中更感到不快。

汽车把代表团接到六国饭店下榻，门口贴有“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张治中感到气氛不太融洽，有层凉意掠过心头。

晚六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代表，并设晚宴招待他们。在宴席上只是一般的寒暄，和谈的事周恩来一字没提，其它中共代表也只是敬酒劝菜。

四月一日这天，周恩来是从秘书送来的新闻稿上知道张治中在来北平前曾到溪口见蒋介石。南京各报均有报道：“蒋介石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周恩来一看新闻稿就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是蒋介石的欺骗伎俩重演，非常生气地对身边人说：“这是欺骗，十足的欺人之谈！蒋介石怎么会愿意和平？怎么会愿意终老故乡呢？下野求和，只不过是形势对他不利时惯用的伎俩而已。”周恩来说完之后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张文白怎么这么糊涂？不。也许不是糊涂，这说明蒋介石仍在操纵一切，说明南京政府仍听命于溪口。周恩来原打算下午到西苑机场去接张治中的，但他读了新闻稿之后，便决定不去了。

下午，周恩来又得到南京的消息：当天上午在南京发生了流血

惨案。南京有六千多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特务发生了冲突，造成学生二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甚为愤怒：“李宗仁不是表示愿意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吗？怎么又要镇压学生、制造流血事件呢？”

晚宴后，南京代表团的一般随员和工作人员被请到西长安街大戏院观看文娱节目去了。代表们留下来和中共代表采取分头个别谈话的方式交换意见。

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治中、邵力子四个人一起谈话。交谈一开始，周恩来就两眼盯着张治中质问：“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遭到周恩来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开口说话，接着又说：“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完全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万万没有料到周恩来对其去溪口见蒋介石之事反映如此强烈。于是在仓猝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起要去的。既不是蒋先生要我去，也不是李德邻先生派我去的。我所以想起要去见蒋先生，一则想到他虽然下野，但南京政府的实力还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毛先生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先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然后才好来北平和谈。二则，蒋先生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员，其它代表除了章行严先生（章士钊）不是国民党员外，都是国民党员，我们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代表们不好全去，我是首席，自然我一个人去。三则，宁沪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

造多种障碍。我到溪口去见蒋先生，回到南京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也起个威慑作用。”

周恩来听了张治中这番解释并不感到满意，继续说：“不管你怎么说，你去溪口的行动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幕后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乎。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不欢迎的。”

张治中感到反复解释无效，在言语间也动了一点火，说：“周先生未免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蒋先生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这与和谈有什么关系！”

周恩来生气地说：“这件事与和谈大有关系，它使我们怀疑你们搞假和平，影响我们国共和谈。”

张治中提高了声调说：“我受李德邻先生的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

周恩来话锋一转说：“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是实现不了真和平的。今天在南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就是明证。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南京当局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李宗仁不是已经答应以八项和平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码？为什么还要出动军警、特务镇压学生，造成学生伤亡？文白先生，在你率领代表团飞来北平，即将开始和谈时，发生这件惨案，不能不令我们怀疑南京当局的和谈诚意。”

张治中也是刚刚听说此事。这是一件使南京政府代表团十分尴尬的事。张治中知道，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是蒋介石的红人，这家伙也太放肆了！张治中看了看邵力子，邵力子也正凝视着张治中。张治中只好说：“今天南京发生流血事情，我也是刚才听说的。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也是我们和谈代表所不允许的。周先

生、林先生，请容许我们会后与南京电话联系，查明究竟。”

周恩来语气十分严厉地说：“南京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愿意接受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那么，这个政府若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制造流血惨案破坏和平的暴徒特务。”

邵力子也说：“和谈还没开始就制造事端，这太卑鄙无耻了。我也同意严惩元凶主犯，严惩特务暴徒。”

周恩来这时的语气才缓和下来，谈起和谈的具体程序和细节。

九、“骑墙是不行的”

在和谈的日子里，周恩来十分忙碌，全力以赴和张治中谈判。两个人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惩治战犯的问题，张治中在战犯问题上的最大让步是，即使战犯应该受惩，也不必正式提名，而且有贡献者还可撤销。他为此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在这几天中，张治中还给蒋介石发过电报，称“共党言论态度，意在逼降”，并劝蒋“毅然放下一切”。^①张治中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托屈武带回南京由吴忠信转交。张治中在信中分析了蒋出国之利弊。张治中在信中说：

……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

^① 《蒋经国自述》，第243页。

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①

然后他在信中又分析了蒋介石出国的六条好处：“不做反对者之攻击对象”、“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② 蒋经国读了这封信后气愤地说：“完全是替共党说话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注意到了张治中与南京代表团多数成员的态度。两个人研究以后认为在确有胜利的把握下，可以做出某些形式的让步，以利争取国民党内的“主和派”。所以，四月三日、四日连续派回黄启汉、刘仲容去给李宗仁、白崇禧送信。同时于四月四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评论说：

……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800—801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801—803页。

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进，对几方面都有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

这篇评论广播出去，对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震动很大。评论指出他们唯一出路是向人民靠拢，协定签与不签，蒋家王朝注定要灭亡。张治中听了评论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因为签不签字并不完全由他做主。

四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主席早就想和你会见，今天上午有空，咱俩一块去吧。”张治中听了心里特别高兴。他与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分手后还没会过面。这次和谈又有许多问题想当面请教。今天毛泽东特意留出宝贵时间与自己谈话，其心情之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这天，难得的风和日丽，汽车一出城，就看见路两旁的树开始吐绿，地里的小麦苗已有半尺高，微风吹过绿波起伏。农民们在田里送粪的、春播的，一派繁忙景象。农村的土墙上用白石灰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张治中从饭店的大楼里骤然置身于春天的郊野，心里忽然开朗许多，感到浑身轻松。汽车很快就驶入香山公园，沿着盘山道往上爬，转眼就到了双清别墅门口。张治中在周恩来陪同下正拾级而上，毛泽东也出现在大门口了，伸着手往下走，边走边说：“老朋友，我们终于在北平见面了。”说着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毛泽东拉着张治中走进客厅说：“请坐，这几天您和恩来吵够了？”

张治中坐下后赧然一笑说：“争论了一些问题。他说得对，我就听他的。”

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有些就得争一争。俗话说，‘理不辩不明，灯不拨不亮’。有些问题一争论就清楚了。”

张治中说：“的确如此。经过这几天的讨论我就明白了许多道理。”然后张治中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腹案”以及到溪口与蒋介石交谈的问题、个人的看法，大致向毛泽东讲了一遍之后，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交换意见。

两个人首先谈战犯问题。张治中说：“蒋先生已经引退了。政务全部交给德邻先生主持。蒋先生也明确向我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再担负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在‘和平协议’的条文里是否不写进战犯问题。”

毛泽东吸了口烟，笑笑说：“战犯可以宽大处理，条文的措词可以考虑嘛。总之，不要为这个问题纠缠。”

关于组织联合政府。张治中说：“我们如果按照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方案办，成立联合政府时，国民政府应该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说：“新的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或许时间再长一点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管好档案文件，管理好财产，不要散了架子，不要大家都跑了。”

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治中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贵党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重大。”周恩来插话说：“国家是人民的，应该大家共同管，你们也有一份责任。”毛泽东笑笑说：“对嘛。今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管理国家，大家共同合作办事。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家共同合作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全国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过了会毛泽东又问：“文白兄，您对今后建国大计还有什么宝

贵意见？”张治中则直率地谈了自己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的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面倒，亲美，死硬地执行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给国家、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所以，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我主张苏美并重，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以国共团结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加强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的地位很好，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促进美苏在远东合作的关系。以此来保障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毛泽东笑笑说：“骑墙可不行啊。中国不倒向帝国主义就倒向社会主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骑墙是行不通的。文白兄，今天咱先不谈这个问题了。以后有了时间咱俩再扯，好不好？”

然后毛泽东又问了张治中的身体，夫人和子女的情况，对张治中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毛泽东抬手看看表说：“中午了，在这里吃顿便饭吧？”张治中说：“您和恩来先生太忙了，昨天一夜没休息，我不能再打搅你们，来日方长。”

毛泽东站起来说：“既然如此，老朋友我们就不客气了。改天我请您过来吃饭。”

事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文白率直、诚恳，是个好人呐。”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则对邵力子说：“看到了毛泽东，听了他的谈话，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绝非偶然。”

十、“百万雄师过大江”

张治中从四月一日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城。他走在大街上看到

市民的欢快情绪,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和一九四六年三月他来北平“调停”时见到的情况大不一样。张治中从报纸上,广播中了解到国内外局势的飞跃发展和巨大变化。张治中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鲜明对照中,看出了人心的向背,时代的趋向。他对解放军、对共产党的干部、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社会生活,由陌生、好奇、新鲜而逐渐觉得亲近、熟悉,觉得自己也会慢慢地变成新社会中的一员了。

四月十二日,双方商谈已基本结束。十三日早晨,中共方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张治中,并告诉他:“今天晚上在勤政殿讨论协定。”张治中立即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大家看了“和平协定”草案,每个人心里有个不约而同的感觉:“国民党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从具体条文看,这个“协定”和南京方面所希望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相去十万八千里。李宗仁怎么会接受呢?

张治中说:“事已至此,大家还是逐条研究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修正意见。代表团成员怀着强烈的紧迫感、心情沉重地逐条进行了研究讨论。

晚上九点前,双方代表准时赶到中南海勤政殿。勤政殿高大、华贵、幽静。大厅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中间放着一长排条桌,条桌上铺着丝绒台布。两端是首席代表的座位,两旁则分别坐着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会场布置简朴,气氛十分严肃。

会谈没有固定的程序。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谈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周恩来说:“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接受这一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我们相信当这个协定变成正式签订的文件时,对全国人民、对各民主党派、对

一切民主力量，他们听到了，一定会欢欣鼓舞。在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希望我们的希望由于南京代表团的接受而变成现实。”

然后张治中发言，他首先说：“国民政府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到北平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承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我们多次诚恳交换意见，特别承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先生与我们各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我们各位代表同仁感觉很兴奋，很高兴。”紧接着他说，对中共“十二分周到的接待”，“不但感谢，内心还甚觉不安。”然后就协定草案逐条谈了看法，提了四十多处修改意见。最后张治中说，中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建设国家的责任，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①

最后双方同意再开会协商，于十一时五十五分宣布散会。

四月十四日，南京代表团对草案逐条进行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修正案与原草案最大的不同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②

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了周恩来。两个人就各个细节进行很长时间的交谈。四月十五日上午，南京代表又与中共代表分别交换意见。

四月十五日晚七时。周恩来与张治中会面，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他，并定当晚九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816—823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824页。

周恩来说：“文白先生，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说：“这是最后定稿，是不能修改、变动的。”

张治中说：“也好，干脆！”

九时，准时开会。

首先周恩来讲，他说：“我们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凡是对推进和平事业有利的，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利的，都尽量采纳了，应该妥协的都尽量妥协了，才写成这最后定稿。”

然后周恩来又逐条详细谈了修订的理由和经过。最后周恩来以绍兴官话，果断的气势说：“最后我们正式宣布：这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如果本月二十日仍不签字，人民解放军将以强大的攻势打过长江去。”周恩来的宣布，犹如晴天一声霹雳，使在座的国民党代表感到万分震惊，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南京的代表们早就意识到这件事迟早会要到来，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原本不奇怪的事。他们心绪之所以起伏不定，主要是他们意识到随着这件事的到来，中国多年的内战就要结束了。亿万人民将从沉重的灾难中解脱出来，这是值得高兴的。但他们又虑及个人前途，今后生活出路在那里？又捉摸不定。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心里都在敲着鼓。

周恩来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愿意以双方的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字，所以在和平商谈开始我们就表示过：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使得中国早日变成和平的国度”。

周恩来最后说：“我们今天提出来的问题，说一句俗话，是硬邦邦的，也许南京代表团朋友们觉得我们太认真，但是中共朋友都是

这样的。刚才文白先生说我们干脆，我们原则上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早日实现。我的话完了，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张治中沉默了片刻发言了：“《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仁在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

但张治中还是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受：“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做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

“……总理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与羞辱。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的责任，实在都远大得很；我们应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扩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①

会上，其他代表没有新的意见，便在十时二十分散会。南京的代表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勤政殿。

张治中等人回到六国饭店没有休息，连夜开会商量。大家一致认为中共已经做了极大的让步。从全文看，条件高些，但如果真正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834—841页。

了解“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深刻道理，不拘泥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会心悦诚服地接受。

最后大家推举黄绍竑代表、屈武顾问把《国内和平协定》定稿送回南京。黄绍竑是桂系三巨头之一，他将定稿送回南京，便于说服李宗仁、白崇禧；屈武是于右任的女婿，便于说服国民党元老派、五院院长。说到底，张治中等人还是希望南京政府签字，不愿和谈破裂。

四月十六日早晨，西苑机场非常热闹。张治中、邵力子等代表来送黄绍竑、屈武回南京。出人意外的是周恩来等人也来送行，而且还把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也带来了。海竞强是国民党桂系四十六军一八八师师长，在莱芜战役被俘。昨天宣布释放。周恩来向张治中等人说明情况，大家都十分感动。

十六日中午，飞机抵达南京。黄绍竑、屈武立即去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下午四时，李宗仁召开小型会议。出席的只有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黄绍竑、屈武。黄绍竑扫了大家一眼，从众人的神态中可以看出，都希望他带回来的是符合他们愿望的条款。黄绍竑边从皮包里拿“协定”文件边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强调，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最后定稿，签字时限是四月二十日。如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渡江。‘协定’签字后，中共将选定长江上下游十几个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受江南地区。如政府同意二十日前签字，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去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委派我和屈先生将这份最后定案带回南京请示。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字。”

黄绍竑简单地报告了和谈经过，随即将定案的“协定”交李宗

仁、白崇禧等人传阅。这几个人听了他的介绍，又急促地传阅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脸色极为难看，空气十分沉闷。白崇禧忍不住了，他怒气冲冲地对着黄绍竑说：“真为难你了！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这样苛刻的条款我们能接受吗？！”

何应钦则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随便决定，行政院要开会研究讨论，通过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时限还有三天嘛！”

李宗仁、黄旭初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会议不欢而散。

四月十七日，李宗仁派张群把《国内和平协定》送溪口，交蒋介石过目。蒋介石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勃然大怒，拍桌子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立即电示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用国民党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发表声明，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四月十七日晚，桂系集团的要员聚集在傅厚岗开会研究如何对待“协定”。李宗仁说：“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地卸职归田，以谢国人。”

白崇禧为这事已和黄绍竑吵过多次，他早忍耐不住了，说：“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地改革，讲得好听而已！我们迟早是人家碟子里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罢了。张文白怎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我早就讲过，汉曹不两立！”他说完怒气冲冲，扬长而去。这次会也就不了了之。

十九日，行政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协定”。何应钦主持，李宗仁列席。黄绍竑觉得奇怪。会上，阎锡山、黄少谷、吴铁城等人发言逐条批驳《国内和平协定》，反对签字。

中午，黄绍竑跟张治中挂了长途电话，告诉张治中：“详情不便在电话里谈，行政院今明两天会有书面答复。我打算今天下午飞去香港。”张治中不说话，接着他连声：“呵、呵、呵。”两个人都互相明白了其中意思。

四月二十日晚上,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的消息尚未传来。周恩来和中共和谈代表去六国饭店同南京代表恳谈。谈话结束后,张治中送周恩来出来。两人边走边谈,当走到饭店门口时,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依你看,我们渡江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沉思片刻说:“宁、沪、杭地区有四十多万军队,防线也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配合。解放军没有五至七天的时间怕渡不过去。”周恩来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和张治中握手告别。

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张治中等人收到南京拒绝在协定上签字的复电,他们立即抄送中共代表。

早晨七时左右,周恩来给张治中打来电话:“文白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成功了。另据浦口前线报告,南京的国民党政要全跑光了。”张治中在电话里说:“好,好。”他对共产党用兵之神速发自内心的佩服、赞赏。

上午九时许,街上到处有人叫喊“号外!”“号外”刊登的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新华社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于四月二十日午夜开始,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到江阴,在五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防线,在解放军的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立即土崩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经营了二十二年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十一、张治中留居北平

四月二十一日晚些时候,张治中接到李宗仁、何应钦来电:“……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

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遂，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①

张治中与其他代表商量后，让秘书拟好电稿：“请于二十三日派机来平，预定二十四日返京。”电报发出后，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

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这两天就成了代表团和工作人员议论的话题。大家都愿意投向人民的怀抱，留在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在前两天搭国民党的飞机已来北平，邵先生是决心不走了。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去留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林伯渠、李立三等人知道后，一齐出来挽留。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林伯渠与李立三来到六国饭店，恳劝张治中留在北平。

林伯渠说：“目前形势十分紧张，不宜回南京。即便回去，也须住一段，看看形势再说。”

李立三说：“当前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发展，留下来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

张治中说：“如果恢复和谈还可再来。”

林伯渠说：“过去在重庆、南京时，国共谈判破裂后，我们的代表并没有撤退，为恢复和谈仍保持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李立三又说：“退一步说，全面的和谈办不到，但出现局部地区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847页。

的和谈则是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大家留下来有工作可作。”

南京的代表们听了觉得有道理。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他的“复命”理由。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坚持回南京复命，便在二十一日深夜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热情地拉着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兄，自二十日午夜起，我们百万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中路刘邓大军首先从你的老家安庆突破。今天下午五时起，我西路、东路大军也已过江。二十四小时内已过江三十万大军，预定计划已全部实现。二十三日，百万大军可全部过江。南京马上就要解放，你还回去‘复’什么‘命’？”

张治中说：“恩来先生，我是首席代表，和其他代表不同，必须回去。”

周恩来恳切地说：“你无论回到南京、上海还是广州，到哪里去国民党反动派也不会饶你的。国民党的特务也可能对你们下毒手。‘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指张学良。当时劝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出于义气不听）。今天我们再也不能放你回去。不能再出现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的事了。”周恩来的话，恳切、诚挚、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听了十分感动，但他仍然坚持说：“我是国民党员，如果留下来站到共产党这边，人家会说我是投机分子。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而我是他的亲信，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人们一定说我背叛了领袖。”

周恩来针对他的思想坦诚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到今天你还只是对蒋介石个人讲信义、讲忠诚。为什么你不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负责呢？蒋介石这个人值得你对他

这样忠诚吗？”

周恩来的话，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张治中听了怎能不动心。

后来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徐特立等人先后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南京代表，张治中又把自己的苦闷，应回南京“复命”的理由向毛泽东说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爽朗地笑了，说：“老朋友，你这个人啊，和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还没认清他的真面目。一九四五年秋天我就说了，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是一个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家伙。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文白先生，还是不去为好，回去是自投罗网，自踏死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就是极明显的例子。”

四月二十三日，在解放大军逼近南京的情况下，李宗仁在离开南京时，还派了一架飞机直飞北平接代表回上海。飞机到了北平上空，请求西苑机场准予降落。机场指挥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地指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过一两天后再来。”飞机只好返回上海。当晚解放军已进驻南京。

四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方面又在上海派了一架专机来北平接代表回去。周恩来兴冲冲地来到六国饭店，找到张治中对他说：“文白先生，上海方面又派专机来了，我们一起去机场接一下客人吧。”

张治中心想：只来飞机就成了，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来接我们呢？于是问：“谁来了？”

周恩来笑笑说：“你很熟悉，见面就知道了。”

于是两个人一起乘车直奔西苑机场。等了片刻，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飞机徐徐降落了。当机舱的门打开后，从飞机上首先走下来的是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还有他的弟媳、几个孩子和

保姆。孩子们一下飞机就哭着扑到张治中的怀里喊“爸爸”，张治中感动得眼眶也红了，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您真会留客啊。”

原来，在谈判破裂后这几天，周恩来特别指示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设法将张治中的家属送到北平。南京地下党员是在国防部任参谋的沈世猷。当时张家的几个孩子正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沈世猷派人把他们找到，集中送到上海，住在张治中的大儿子张一真家中。当时张一真在香港。二十四日凌晨两点多钟，张治中的好朋友邓士章（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后参加两航起义）按照周恩来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给洪希厚打电话说：“张先生有电报来，让你们全家乘飞机去北平。我们都准备好了。早晨六点前派车接你们。”

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回忆说：“六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来了。我们迅速装上行李，离开了家。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全家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全家这次安全转移，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指派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守在电台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他们要尽快找到我们全家，并把进展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地下党找到我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我们转移。接送车辆如何解决，转移走那条路线，他都一一过问。他还特别指出，飞机不要停在候机楼前，要远离人群，就这样，我们及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①

^① 张一纯：《我所接触到的周恩来》（上），载一九九〇年第四期《北京政协》，第25页。

二十四日早晨，特务头子毛森发现张治中一家乘接代表团的飞机去了北平，马上向汤恩伯报告，并让他赶快派飞机去追。汤恩伯气得大骂起来：“饭桶！一架飞机都看不住，人都飞走了还追什么？”其实，真要空军的飞机拦截完全可以做到，因为青岛还有国民党的空军。汤恩伯不想这样做，他成全了张治中夫妇在北平的团聚。

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京饭店一楼住下。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看望张治中一家，他亲切地对张治中夫妇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张治中夫妇万分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照顾。

后来民主人士谈起这件事时无不赞扬周恩来把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好得不能再好了”。

四月到六月这段时间，张治中思想上最为苦闷，他有许多思想问题不能解决。周恩来经常和他谈心，毛泽东也常来看望他。张治中在思想上渐渐开朗了，胸怀有所宽解。

六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社发了一条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北平被扣详情》。六月二十、二十二日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说张治中在北平策划“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张治中从中悟出国民党的险恶用心。于是写了《对时局的声明》，经周恩来同志亲笔修改，毛泽东审阅批示后，于六月二十六日由新华通讯社发了通稿。

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将此声明刊登在第一版上，同时发表了一篇新华通讯社评论——《评张治中声明》，评论说：“我们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

张治中的声明有如下一些段落：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直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

第六章 肝胆相照参政建国

张治中在《对时局的声明》结尾说：“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自从张治中发表了声明之后，他开始了新的生活，跨入了新的时代。这时，张治中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友谊又加深了一步，达到新的升华。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多次找张治中谈话，希望他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中任职。张治中谦辞说：“过去那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我是负责人之一，如今已经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从你发表声明那天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毛泽东的话对张治中的教育、鼓舞很大。他人已经生活在新社会，跨入了新的时代，就必须和旧时代、旧的东西彻底决裂。他要摒弃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树立新思想、新观念，获得新生，成为新人。从此，张治中又振奋起来，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参政、议政，积极投入了新中国的统一和筹备建设工作。

一、“共产党欢迎你”

俗话说，“安居乐业”，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毛泽东、周恩来在解放初期工作十分繁忙，既忙于指挥解放战争，彻底摧毁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又忙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工作千头万绪，常常废寝忘食，就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惦记着张治中的住所。有次政治局常委散了会，毛泽东叫住周恩来：“恩来同志，张文白先生一家人总住在北京饭店不是个长法哟，饭店虽好，终究不是一个家啊。”

周恩来说：“我已交待办公厅的同志去找房子，不知最近定下来没有。”

张治中一决定留在北平生活，周恩来就交待主管单位为张治中先生解决寓所问题。周恩来想得非常细，对有关同志说：“张文白先生的寓所，一是宽敞；二是交通方便；三是周围环境安静；四是张先生夫妇满意。最后这点是最主要的，你认为宽敞，张先生觉得不宽敞就是不宽敞。因为是张先生住，不是我们住。张先生看一处不满意，看两处，看两处不满意，看第三处。直到张先生满意为止。我们不要嫌麻烦。你要知道，张治中先生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张先生把自己的官邸腾出来让毛主席休息。”这位负责同志忙说：“周副主席，我明白。”

中央办公厅先是安排了方巾巷的一座小洋楼。独门独院，一楼一底。张治中夫妇看过后，认为楼的样式很好看，质量也好。只是房间太小，住不下他一大家子，且上下楼很不方便。表示住在这里有困难。中央管理局陪着看房子的同志说：“张先生，平房怎么样？”张治中征得夫人的同意后，说：“平房也好。北京的四合院很有特

色。”

过了几天，中央管理局的同志又陪着张治中夫妇去看西总布胡同五号的房子。这是一座三进的大院落。是明清遗留下来的古朴典雅的平房。磨砖对缝，青瓦起脊，雕梁画栋。房子的质量很好，外观十分气派。正房宽敞，配房很多。三个院落共三十多间房子。洪希厚夫人看了说：“什么都好，就是高门坎太多，台阶也多，进大门上台下台，进二门又上台阶，进三门还上台阶。我觉得出次门上下这些台阶，迈这些高门坎儿，有点困难。”张治中听了夫人的意见后，对管理局的同志说：“真不好意思，太麻烦你们了，夫人身体欠佳，行走不便，能否再换一处看看。”

后来又看了几处，都不太合适。

周恩来知道后，又对管理局的同志谈：“为人民服务就要不怕麻烦。这不是才看了几处吗？北平的房子那么多，总该有张先生满意的房子。”

后来张治中夫妇相中了东总布胡同十四号一所西式平房。据说这座房子是一个号称“火车头大王”的德国巨商所建。抗战期间是日本交通总裁的私宅。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公馆。房屋是尖屋顶的哥特式建筑。宽敞明亮、富丽堂皇。餐厅很大，能摆四五十桌，舞厅也很大能容百多人翩翩起舞。上下水道，暖气设备、卫生间、浴室都非常讲究。房前有个大草坪和一个小花园，曲径假山，房后是花房。

张治中住在这里非常满意。他刚搬进来不久，经常有老朋友来给他贺新居，探望他。

一天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来看望张治中夫妇。在院子里周恩来就高声说：“文白兄，给你贺喜来了。”

张治中夫妇忙开门迎客：“请进，请进。”

周恩来坐下没说几句闲话就说：“文白兄，毛主席的意思，你还是要参加新政府的工作。”

张治中说：“你和毛主席多次劝我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对于你们的好意，我从内心里十分感激。不过，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还是不从政为好。”

周恩来反问他：“旧社会过来的人要不要革命？”

张治中笑着说：“当然要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不能放弃。”

周恩来说：“共产党是不是欢迎大家都革命？”

张治中说：“共产党当然欢迎大家都革命，革命队伍越壮大、人越多越好。”

周恩来说：“好了。你要革命，共产党欢迎你革命。你为什么不参加新的政权建设呢？”

张治中笑着说：“好吧，我参加就是了。”

周恩来说：“黄炎培先生今年七十一岁了，本来是不打算从政的，但听说新中国的建设非常需要他，他就高兴地答应了。邵力子先生今年六十八岁，也要参加新政府的工作。文白兄，你今年还不到六十岁，怎么能不革命了呢？革命先驱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都是孙先生的信徒，应该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嘛。”

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到夜深才告别出来。张治中夫妇送到大门口，周恩来又说：“文白兄，你记住毛主席说的那句话，‘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从大年初一过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切从头干起。”

张治中高兴地说：“好，我一定从头学起，从头干起。”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以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又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并被推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

员。这三个委员会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我以过去国民党政府干部之一的地位，应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执行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加以推重，还要使我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业。这使我感到惭愧，也使我感到荣幸！”^①

二、和毛泽东讨论国家大事

张治中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心里很受鼓舞，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热情期待和严格要求。从那以后，只要通知他参加的会议他都参加，而且敢于发表意见，心里怎样想，嘴里就怎样说出来。

有一天在座谈会开始前，张治中坐在毛泽东旁边。毛泽东忽然问他：“外边传说我们共产党内有几句口头语你听到没有？”

张治中问：“什么口头语？”

毛泽东说：“有人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张治中说：“这话我倒听说过。”毛泽东又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刘少奇同志前些时到天津主持召开几个工厂的职工会议时说：‘你们将来都是我们的干部，都是建设新中国的好干部。’有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了，找到少奇同志说，‘他们原来在官僚资本主义下工作的人，现在才到我们这边来，马上就变成我们的好干部了。那我们呢？都让他们搞好了。’要照我们这样小气的党员心理，大概是要把人家当作俘虏看待才好。”

张治中心直口快，便问：“主席，您对‘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种说法，采取怎样的态度。”

在座的许多人感到吃惊。毛泽东不过是当笑话讲讲，讲出来当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07页。

然不赞成。你张治中怎么竟然天真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毛泽东并没有生气,笑笑说:“我们党内正在对这部分同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张治中又紧追问一句:“说服了没有?”

毛泽东说:“唔,还要慢慢说服,慢慢教育,没有那么容易嘛。”^①

中共的其他领导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周恩来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党员大会上严肃地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对原则问题一定要争,对非原则问题一定要善于妥协。不能性急,更不能怕麻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②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座谈,听取大家对国家名号和国旗的意见。张治中也被邀请参加。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在座的人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张治中发言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含有‘民主’的意思。加上‘民主’反而重复,念起来也拗口,不如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许多人都同意这个意见。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采用了这个名称。

关于国旗图案的筛选讨论。新政协筹备会几个月前就登报征求图案,一共征集了两千多幅。审查组从中选出三十多种,印发大家参考、讨论。最后又选出大家最满意的三幅,请大家讨论决定。这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30页。

^② 《周恩来传》,第772页。

三幅都是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下面一横杠，或两条横杠、三条横杠。一横杠代表黄河，两横杠者代表长江和黄河；三横杠再加上珠江，都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在分组讨论时，张治中曾举出许多理由表示不同意这些方案，但是没有结果。

过几天就要大会讨论决定了。刚好有一天晚上，毛泽东请了五、六十人吃晚饭。这些客人都是军方代表。张治中刚好与毛泽东同桌。席间张治中间毛泽东：“有一件事我想请问您，如果您不便公开让人知道您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没关系，你说吧。”

张治中说：“您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红五星一条黄河的。你怎样？”

张治中说：“我不同意这个图案。红色的国旗和五星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放一杠，不就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再说，用一横杠代表黄河，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此外他还举了一些别的理由说明那个图案用不得。

过了两天，毛泽东果真又邀请了四、五十人到中南海开座谈会。张治中也被邀在座。他一看来的都是文化人，学者、画家、艺术家，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丘八就只我一人”。^①

毛泽东首先把问题提出来，说明中间一道横杠这种国旗图案的缺点，然后说：“我知道反对这个图案的，在会议代表中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请大家想想。”说到这里，毛泽东把发的参考材料翻出第三十六号给大家看，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问大家：“这个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32页。

怎么样？”

张治中首先表示赞成。大家也说好。只有两三位同志表示异议：“这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不分阶级了，或者就没有后边两个阶级了，那么国旗不是还得改吗？”

张治中一听，这也是个问题。他正在思考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思维敏捷的毛泽东却发言了：“把说明改一下不就解决问题了。不说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就说五颗星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经毛泽东这么一说，与会同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到新政协开会时，很顺利地全数通过。

张治中事后想，本来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赞成的事，也可以顺利通过，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注意少数人的意见，尽力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到呢？除了说明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之外，还表明人民的领袖追求真理的朴实作风。因为有时正确的意见在少数人手里，万万不可忽视。

张治中和毛泽东、周恩来接触越多，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党的领袖更是言行一致的楷模。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讨论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官员的人选时，许多民主人士认为共产党打的天下，共产党一家来坐，合情合理，许多人都不想担任政府的职务。毛泽东、周恩来发现之后，又给大家做工作。毛泽东说：“到现在还有人主张共产党包办一切，我们包办得了吗？我们有那么大的本事吗？”大家听了都轻松地笑了。毛泽东又说：“我在今年四月八日，与张文白先生谈话中就说过，与张澜、李济深、黄炎培等先生也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的民主党派和人士合作，共同管理好我们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不能包办，我们大家合作共同包办。”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上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讲化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里，共产党员只占半数，在政务院三十个单位的负责人中，共产党员只占十七位。各民主党派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这种民主作风，对共产党严格执行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建设国家的方针政策，无不心悦诚服，无不自觉自愿，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四九年从六月到九月，张治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中国的成立筹备工作中去了。他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提建议，提方案，做到了直言不讳，同心同德。

十月一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对中外发表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公告里有这样几句话：“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委员五十六人。”公告已经印好。下午到天安门广场开庆祝成立大会就要宣布发表了，张治中读后觉得有点不妥，正好李立三坐在他的旁边，张治中就问他：“这样措词可有问题？”

李立三一听，感到吃惊，便问：“有什么问题？”

张治中说：“委员五十六人一语太简单了吧？既然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的名字都写上？”

李立三说：“对啊。”

张治中说：“请你提。”

李立三说：“还是你提好。”

张治中想了一下，举手，站起来说：“既然是对中外公布的严肃文告，就应该把五十六个委员的名字都公布出来。”

毛泽东主席一听，认为有道理，便马上同意，说：“把五十六个委员的名字全印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阵容。”大家听了高兴地鼓掌通过了。

三、风雨夜纪念“八·一三”

八月十三日上午，秘书交给周恩来一个华丽的信函，封面上写着：呈送周恩来，下款用毛笔签署了“张文白”三个字。周恩来打开信函，里面是一张红色的请柬：

恩来兄：

为纪念“八·一三”抗战十二周年，今晚七时整在东总布胡同寓所举办小型酒会。敬请
光临

文白

八月十三日晨

同样的请柬，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等都收到了。周恩来知道后，在电话里对这些同志说：“工作再忙，今晚也要出席张治中先生的家宴。”

当时国家还十分困难，西北、西南广大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解放战争仍在进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没召开，新的全国性政权还没建立，财政还十分紧张。所有的党政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小灶每人每月约三百斤小米，中灶才二百斤小米，大灶约一百斤小米。主副食和日常生活费用全包括在内。张治中也不例外。供给的东西和津贴，仅够日用。再要请客，非有积蓄不成。张治中这次酒会是由北京饭店餐厅代办，所需费用完全是张先生自己出。当时他又没有这么多钱，便向傅作义将军借了五百万元（人民币旧币，合新币五百元）。但据张一纯回忆说：“一九四九年到北平后，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一天，父亲要我和张立钧（我父亲的参谋，

也是我的表姐夫)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到了那里,傅先生问我们借多少,我们说借二百五十元。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五百银元交给我们。”^①

这天从午后起就没有一丝风,蝉在闷热的空气中爬在枝头上“吱吱”的鸣叫。午睡起床后,张治中就和家人一起收拾餐厅和客厅。他手拿一块大抹布,不是擦桌子就是擦门窗。不一会他就大汗淋漓,汗把衬衫湿透了。夫人洪希厚劝他休息一下,张治中说:“不妨事,干完再说。”到傍晚,张治中看着收拾妥当的客厅、布置好的餐厅和小型会场,满意地笑了。他这时才脱下汗湿的衣服,到浴室冲了澡,换上干净的礼服,准备迎接客人。

这天来得最早的客人是周恩来。他一进屋就问张治中夫妇在这里住着方便不方便,习惯不习惯,然后又问他俩的身体怎样。

客人们陆续到齐了。大家说说笑笑步入餐厅。只见餐桌中央摆着鲜花。鲜花周围几个冷盘是北京饭店的传统名菜,制作精美,色、形俱佳,一看就知道出自名厨之手。餐桌周边的小碟里放了洒过香水的面巾。周恩来说:“文白兄,这可不是普通家宴,不像你说的‘吃顿便饭’哟。”

张治中说:“为了纪念‘八·一三’抗战,值得。”

周恩来问:“你家的厨师是在哪里请的?”

张治中笑笑说:“我家还用不起这样的名厨。这顿便饭是请北京饭店代做的。”

周恩来惊异地说:“啊哟,那你可破费不少啊。我们每月供给你的津贴有限,你们从南方来,又没有带家私,每月吃穿用开支就不

^① 张一纯:《我所接触到的周恩来》(上),《北京政协》一九九〇年第四期,第26页。

少,从哪里节省下这许多钱?”周恩来与张治中私交甚笃,甚知他生活一贯俭朴,从政几十年廉洁自持,保持操守,对第二个人,周恩来也不会这样刨根问底。张治中对周恩来的过细盘问,更不介意,反而坦然地说:“恩来兄,不怕你见笑,这桌酒席的费用还是昨天从宜生先生那里借来的。”

周恩来说:“那怎么行?”

张治中则说:“那怎么不行。请大家入坐。”说着就一手拉周恩来,一手拉董必武在自己左右坐下来。坐下之后就招呼家人斟酒。

酒会就这样在谈笑中开始了。

张治中首先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首先献给‘八·一三’抗日战争中死难的烈士。”说完把酒洒在地上,所有客人也把酒洒在地上,以此祭奠死难的忠魂。周恩来端起酒杯说:“这第二杯酒我建议献给八年抗日战争中死难的所有烈士。”于是大家又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

周恩来说:“时间过得真快,‘八·一三’转眼已经十二年了。”

张治中接着说:“尽管过了十二年之久,当时的战斗场面,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张治中接着给大家讲了“八·一三”抗战中的两次激战经过。

八月二十日,我抗战国军是用几辆破坦克突破日寇所占杨树浦租界的。这几辆破坦克车正在工厂修理,还没有修好。因为好的坦克在别的前线。杨树浦要冲锋,没有装甲车。张治中就命令从工厂把这几辆破车开出来用。当时带队的连长是个军校毕业生,他说:“总司令,这些坦克太破,敌人火力太猛,我们步兵很难跟上。”张治中则说:“只要坦克车能开动,你的部队就必须跟上,突破敌人防线。不攻入杨树浦就不要回来见我。”结果这位年轻的连长,终于冒着敌人的炮火攻破了防线,突入了杨树浦,占了汇山码头。但这

位连长却没回来见张治中，因为他在冲锋时壮烈牺牲了。张治中回忆到这些事时说：“至今想起来都非常难过。”

张治中还讲了攻克罗店的战斗经过。张治中为了到前沿阵地稳定军心，指挥战斗，便乘汽车从南翔到江湾去。只有十几里路，并不远，但遇到敌机群，这些敌机每三架一组，来往轰炸扫射。敌机临头，张治中就下车躲避，敌机转头，他又乘车前进。由于敌机往返频繁，密度太大，汽车不能再坐了，他就下车步行。中途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下车向张治中敬礼：“总司令，怎么走路不乘车？”张治中没解释一句，要过他的自行车骑着就朝前沿去了。一路上，他一会下车掩护，一会又乘隙前进，走走停停，终于到了江湾叶家花园八十七师师部。这样才把正面军心稳住。张治中观察了敌登陆的阵势之后，决定调十一师、九十八师来增援。当时从其它阵地调这两个师的部队谈何容易，因为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运动。十一师师长彭善在电话里说：“部队被炸得不能抬头，怎么走呢？”张治中回答说：“不能抬头也得走。我能从南翔冒着轰炸走到江湾，难道你们从江湾就不能走到罗店吗？”这两个师终于冒着敌人的炮火，尽管牺牲了一些同志，还是运动到前沿，收复了罗店。稳定了正面，维护了后方的交通，使后面的部队能继续增援。张治中回到总司令部已是后半夜了。

张治中正讲着，大家听得入神。外面忽然狂风大作，雷声隆隆，下起了大雨，不一会电线被大风刮断了。餐厅内骤然漆黑。所幸随行警卫人员都有手电筒，用手电照亮了餐厅，酒会继续进行。

周恩来说：“在这样的风雨之夜回首往年战事，更有一番情趣。”

大家在酒会上无所不谈，夜深，尽兴而散。当大家离开餐厅走到庭院中时，已是风停雨住，天上露出了星星，蝉又在枝头鸣叫起

来。

几天后，张治中收到周恩来一封短信，大意是自我批评，表示歉意，说自己考虑、照顾不周。拨给张治中六千万元（指旧人民币，折合新币六千元），以补贴他们一家的日常开销。

四、为新疆和平解放奔波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

九月十日午后，毛泽东打电话请张治中到中南海商量事情。

张治中在警卫人员引导下来到菊香书屋。周恩来从屋里走出来笑脸相迎。进屋后，毛泽东从里间屋走出来拉住他的手说：“近来很忙，你在‘八·一三’举行家庭酒会我都没抽出时间去，真是有点失礼啊。”

张治中用手指着桌上成堆的文件、待签发的电报、待批报告等说：“您是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那里抽得开身？有恩来兄去我就感激万分。”

毛泽东指了指身边的沙发说：“请坐，咱们老朋友就不客气了。今有一事相商，恩来先说。”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兰州解放后，我们解放大军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你在新疆主政好长时间，和陶峙岳、包尔汉等人相处得不错。可否拍电报给他们，使整个新疆和平解放呢？”

张治中说：“新疆如能和平解放，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早就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没有向你二位说呢？一是与包尔汉、陶峙岳断了联系；二是担心他们不听我的劝告。”

毛泽东笑笑说：“文白先生，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据我们得到的

可靠情报说：只要你给陶峙岳、包尔汉去电报，他们就一定照办。”

张治中特别兴奋地说：“给他们拍电报好说，我这就可以拟稿，只是我不知道他们的电台呼号，这怎么联系呢？”

毛泽东说：“这好办。我们在伊宁已经建立了电台，你把电报稿交给我们，我们发给伊宁，再从伊宁转迪化。”

周恩来说：“伊宁的负责人是邓力群同志，将来你们可以直接联系。”

毛泽东又说：“新疆和平解放后，希望您能在新疆或西北担负一定的工作，因为您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和原来的军政各界相处融洽。”

张治中说：“干什么都可以，我听候您的安排好了。”

张治中从中南海出来之后，毛泽东即拟好给彭德怀的复电，立即拍发至西北野战军。电文称：“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①另外毛泽东在电报里还谈了西北和新疆的人事安排。拟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为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兰州或西安；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为新疆的过渡机关。

张治中回到寓所立即拟好拍给陶峙岳、包尔汉的如下电文：

……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下卷，第569页。

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者多,所贡献者亦大。……兄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申灰平。

当时新疆的局势是个什么状况呢?

自张治中离开新疆后,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密切合作,控制着新疆的政局,等待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初,南京政府有意把新疆的十万大军调往内地打内战。陶峙岳电称:“新疆情形特殊,撤兵一事非内地可比。”“非开拔费充足不能行动。”^①随后陶峙岳拟订了一个军队内调计划,需要大量的汽车、汽油、现洋,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办不到的。于是南京政府也不再让陶峙岳到内地参战了。

新疆的和平解放早就开始酝酿。张治中的好友、南京赴北平和谈代表团顾问屈武,是迪化市市长。张治中多年的老部下刘孟纯是新疆省政府秘书长。这两个人受张治中的影响,早就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屈武在北平参加和谈时,周恩来就单独找他谈过话,了解过新疆的局势,并向他交代了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回到新疆时,

^① 张达钧:《四十年动乱新疆》,香港一九五六年版,第233页。

多做些工作,争取新疆和平解放,使新疆少受损失。北平和谈一破裂,屈武就立即回到迪化,做各方面的工作。

包尔汉当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后,仍然像张治中在新疆那样,执行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方针,对和平起义是赞成的。到了八、九月份,新疆省政府方面,尽管有少数人反对起义,但形不成气候,主和派占据主要地位。

和平起义关键是军队。陶峙岳虽然愿意和平交代,但他知道自己手下三位掌握兵力实权的军长马呈祥、师长叶成、旅长罗恕人是主张把军队开到内地打仗的。陶峙岳表面不反对军队进关东移,实际上强调困难没有行动,待到兰州、西宁先后解放,即使主张军队东移进关的马呈祥等人,也认为新疆的军队往东移到内地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了。八月中旬,陶峙岳以视察为名到南疆去与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密商,两个人都同意和平起义,但觉得目前还不是时候,想等解放军开拔到新疆时再接头。

陶峙岳回到迪化后又反复地与马、罗、叶三人做工作。这三个人看到大势已去便决定留下军队,只身离开新疆。这时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扫除了。

邓力群是共产党派驻新疆三区方面的联络员,当他在九月上旬了解到迪化方面的局势之后,立即报告党中央:新疆“赞成和平的力量政治上军事上现在均已处在优势的地位”,他们同意“和平接受,不作任何抵抗”。此间“所有和张治中亲近的人,都希望和张取得联络,希望张告诉他们在和平上应当怎样做。”^①

毛泽东接到邓力群的电报之后,九月十日才邀张治中谈话。张

^① 蔡锦松:《张治中与新疆和平解放》,《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治中除给包尔汉、陶峙岳合发一电报外，到九月十一日，又单独给陶峙岳发一电报，把想到的起义时应注意的事项列了九条。其中第四条指出“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兄曾加考察并予开导否？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愿负道义上的责任，绝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僥事。”^①

九月十五日，邓力群秘密到达迪化，住在包尔汉家中，先后会见包尔汉和陶峙岳，出示了张治中的电报，两个人没有异议。至此，新疆和平起义的形势已经明朗化。

包尔汉、陶峙岳于九月十七日给张治中复电中说：“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职等在此”，“无时不审慎筹议，并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②

从这些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新疆和平起义已无问题。张治中于九月二十二日回包尔汉一封电报，这电报是由陶峙岳转交的，电文中说：“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闻电亦表嘉许。”“新政协昨已开幕，预定会期八日，治候会毕当秉承毛主席指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582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584页。

示再定赴迪问题。”^①

局势至此,和平起义,水到渠成。陶峙岳于九月二十五日领衔率师、旅长给毛泽东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了电报,表示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宣布起义。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包尔汉主席通过省府紧急会议也立即宣布了起义,并给毛主席发来电报。

张治中在毛泽东那里看到上述两封电报后,心里万分激动和愉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对国家、对新疆人民在责任上、道义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今后的新疆将永远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人民亦将永远享受祖国大家庭的和平、自由、幸福了。”^②

五、“当副手,委屈了”

九月二十一日晚七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致开幕词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587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第588页。

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

张治中听着这激动人心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中国人民百年来受尽了内外反动派的气，从今天起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将真正当家作主，扬眉吐气。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能为任何人所私有。这场革命是彻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大会进行代表发言时，张治中以特邀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他的心怦怦急跳。他曾在各种场合当着各种人，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讲过话，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讲话时这样激动，这样兴奋。他为了准备这个讲话稿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白天又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了多次。

张治中站在讲台上，环视了一下会场，待怦怦跳的心稍微平静下来时，他才激动地说：“今天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日子，就是改革社会转变历史的人民胜利的日子，也是建设新中国创造新时代从此开始的日子。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并且是国民党负责干部中在过去二十二年的执政时期对国家对人民负了多少罪过的一分子，被特别邀请来参加这一盛会，真是惭愧与欣幸交萦，内心充满了矛盾情绪，此时说话，真不知怎么说法才是”，只有“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②

在第一届政治协商全体会议上，张治中当选为中央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十月一日下午三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入夜又在观礼台观看了礼花。他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感受很深。晚上回到家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决心过好后半生，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多做工作，好好为

^①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6—7页。

^② 《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人民服务。

十月十九日，张治中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次日被任命为国防研究小组组长。

十一月中旬，有一天毛泽东又邀张治中到中南海谈话。张治中一进菊香书屋，毛泽东就幽默地说：“老朋友请坐。今天想跟您谈一件事，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笑着坐下说：“现在全国归您领导，您有何吩咐，我听您的，谈不上国共合作啊。”

毛泽东说：“新疆刚刚解放，要办的事情很多。过去你在西北主持工作多年，尤其是处理新疆的民族问题，很有经验，各种措施得当。你在西北，在新疆各族人民中威信还是很高的。现在我们计划在西北五省设一个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出任主席，请您协助彭德怀同志工作。”

张治中说：“您看我行，我就答应下来。西北的群众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希望我去；我也非常想念他们，很想去看看。我可以做彭老总的顾问。”

毛泽东笑着说：“不是做顾问，是做彭德怀的副手。您过去是西北五省的军政长官，现在去当副手，委屈了吧？”

张治中有一瞬间的不自然，转眼间就过去了，坦诚地说：“只要是您交待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干什么都一样，请放心。”

毛泽东说：“最近彭总就要去新疆，请您准备一下，和他一起走一趟好吗？让您辛苦了。”

张治中高兴地接受了新的任务，从中南海出来。

不久，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并决定11月下旬去新疆。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张治中：“晚上总

理去府上拜访。”

周恩来晚七时赶到张治中的寓所。张治中忙迎出来，说：“刚建国，百废待兴，您忙得没有一点休息时间，还来看我，真是不敢当。”

周恩来说：“过两天你就去大西北了，那时尽管有电报、电话联系，但终究没有现在面对面说话方便啊。”

张治中说：“您看我去新疆后还应注意些什么？”

周恩来说：“有许多意见主席已经对您谈了，我也没有新的意见要说。您写的几个材料：《新疆概要的问题》、《新疆的地理、历史与政治沿革》、《伊宁事变与和平协定》、《省府改组与伊方撤退》、《几个问题和意见》，我和主席都看过了，而且认真研究过。有些问题急不得须慢慢来，有些问题慢不得须抓紧做。哪些急，哪些缓，到了那里和德怀同志商量，拿不准的及时请示中央，请示毛主席。”

周恩来与张治中亲如手足般地就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交换意见。直到晚上十点多，值班秘书打来电话，请周恩来马上回中南海，这时他才与张治中告别。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张治中去兰州特调了一架专机，并亲自送到机场。张治中临登机前周恩来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张治中站在机舱门口，向周恩来挥手告别时，周恩来还大声说：“祝您工作顺利。”

张治中从飞机的舷窗往外看，绿色的原野逐渐被黄色的沙丘代替，然后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色沙漠。他知道兰州快到了。他想，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和许多不大熟悉的同志打交道了。飞机逐渐降低了高度，慢慢贴近地面，随着轮子的着地，轻轻颠了几下，然后慢慢滑行到候机室前。

当张治中走下飞机时，立即被前来迎接的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包围起来。

彭德怀紧紧地握着张治中的手，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说：“我们几个人正在开会，机要员告诉我们说你的专机马上就到。我们几个就立即停了会乘车来接你，还怕来晚了。”

张治中说：“都是自己人，派辆车子来就成了。这样兴师动众，多么影响工作。”

贺龙更风趣：“哪里话啊，我们来接你就是工作。”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六、张治中新疆吐真情

张治中在兰州休息了几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彭德怀将军一起飞赴迪化。

新疆和平解放后，面临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最迫切的问题是成立新的省政府和改编起义的十万部队。张治中来新疆就是协助彭德怀做好这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张治中主要是推荐合适的人参加新的政权建设；对起义官兵进行思想教育。而后者更是需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且这两项工作还要同时进行。

张治中与彭德怀一见如故。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坦率健谈。在去迪化的飞机上，两个人并肩而坐，通过舷窗看着机翼下边的山川景物，便由新疆的地理环境、气候谈起，一直谈到新疆的矿产、风土人情、民族习俗等。

张治中说：“我在新疆待了两三年，发现你们湖南老乡在新疆真不少。”

彭德怀说：“是啊，左宗棠是湖南人，据说他当时就带去许多三湘子弟，以后子孙繁衍，就越来越多了。”

张治中说：“左宗棠入新是一八八〇年，距今七十年了。但是他

的遗迹到处可见。由陇东乘汽车经河西走廊到新疆，一路上可见到合抱的老柳树。人称‘左公柳’。他曾驻蹕哈密，当时的房舍虽已倾圮，但柳树还在。每逢夏季，枝繁叶茂，为人遮阳挡雨。这是一种遗爱。可见左宗棠在人民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影响的。”

彭德怀这时只“噢”了一声没再搭话。

张治中继续说：“左宗棠进驻新疆时接近古稀之年。他‘舆榭出关’，决心很大。他是爱国的，是表示以必死的决心收复伊犁、平定南疆。当时清政府无知无能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沙俄占了伊犁，拒不交还，南疆又有叛乱。形势是十分险恶的。但左宗棠冷静沉着，他平定了南疆的叛乱，然后集中兵力北进，决心收复伊犁。沙俄见势头不对，主动退出伊犁，重订条约。”

彭德怀说：“照你说，左宗棠有功于国家了。可是，你别忘了，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

张治中说：“历史上有许多人物，有功又有过。讲到镇压农民起义，岳飞、林则徐也有这个问题。评价历史人物，主要应从政治后果看，分清主次。左宗棠对保全新疆这块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还是有功的。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保卫祖国，抵制李鸿章的错误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

“你说的有些道理。”彭德怀点点头，对这些倒似乎颇感兴趣。

张治中说：“我在新疆的几年，就明确声明，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亲苏的政策，并且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可是积重难返，事与愿违，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我一切都能忍让、妥协、力求宽大，但要分裂祖国那是无法接受的。”说完，他长叹了一口气。

彭德怀说：“这几年你太辛苦了。新疆的问题也极复杂，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彭德怀到这时才表示了一点意见。

沉默了好久之后，张治中问：“我在两个多月前曾和毛主席、周总理谈过新疆问题，并有书面意见，您想必早已看到了吧？”

彭德怀马上点头说：“是的，都读过，讨论过了。”

两个人交谈间，飞机已到了迪化上空。

彭德怀到了迪化，经过与各界人士协商、酝酿，包尔汉仍为省政府主席。其它组成人员，经过两周的协商、讨论，才定下来。每次会议张治中都参加。他积极发表意见，推荐人选。最后定下高锦纯、赛福鼎为副主席；委员有王恩茂、王震、陶峙岳、列斯肯、邓力群等人，秘书长仍由刘孟纯兼任。

张治中在改组省政府期间还抓紧向新疆起义军官做报告，进行思想教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张治中以“怎样改造？”为题向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历时四个小时。他娓娓而谈，进行现身说法，大家反应很好。张治中在报告里首先谈了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过程。他说：“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我特别把自己如何作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

张治中在报告中谈到新疆和平解放的意义和价值时说：

……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对我们全体官兵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就等于从黑暗的深渊走向了光明的大道，从苦恼的环境走向了幸福的前途。再现实地说，解放军是预备开两个兵团到新疆来的，共六个军由东向西，玛纳斯河西岸的民族军自西向东。我们内部怎样？这是大家知道的。在两面作战之下，要死伤多少官兵？牺牲多少人民？毁灭多少财产？糜烂多少地方？就解放军说，从兰州到迪化，两千二百多公里的行军战斗，很快就是冰天雪地，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恐怕少不了流血牺牲。在这种情

形下,我们几万官兵往那里跑?钻进沙漠吗?上天山吗?当然不可能,不可能就是同归于尽。至于人民,更不用说,这次已经和平解放了,还有许多地方发生了不幸事件;如果不是和平解放,牺牲就一定大得多了。我看军队和人民最少避免了五万至十万的死伤。这是多么重大的代价,所以这次和平解放,是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的。比方北平的解放,事前双方都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傅作义将军准备二十万发炮弹来守城,中共军队也准备二十万发炮弹来攻城。大家试想这四十万发炮弹发出去可能招致多少生命的毁灭,多少财产的损失,连北平几百年的文化古物也恐怕保全不了。所以,和平解放不但为地方、为人民打算应如此,为自己、为部属打算亦应如此!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懊悔吗?还有人认为和平解放是不应该的吗?认为应该痛痛快快打一仗的吗?当然不会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人。

十二月十三日,张治中又以“再谈怎样改造”为题作了第二次报告。他在这次报告中谈了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要大家对国民党的失败、民族问题、中苏关系树立新的观念。

张治中的两次报告对稳定新疆起义部队的情绪,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彭德怀非常满意,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把这两个报告整理一下,在报上发表。不只是驻迪化的起义官兵受教育,外地的起义官兵读了也受教育。”

张治中接受了这个意见,整理后先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接着《甘肃日报》、西安《群众日报》、北京《光明日报》等纷纷转载。在公开发表前有些同志不同意,说:“有些内容公开发表不合适,特别是在报告中称‘蒋介石’为‘蒋先生’,更不合时宜。”彭德怀说:“这怕什么,主要是说给党外听的,还主要是让起义官兵看。”后来一些

单位还把这个报告印成小册子，流传全国，成为许多单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学习的材料。

十二月十七日，迪化各界各族人士举行“庆祝新疆省人民政府暨新疆军区成立、欢迎彭德怀、张治中两将军大会”。新的省政府成立，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告别了旧时代，跨入了新时代，真正进入了和平建设新疆的新的历史时期。张治中在庆祝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简短的讲话。他说：“我是热爱新疆各族人民的一个人，今天说了这番话，虽嫌直率，实出至诚，不过聊以答谢新疆人民对我的厚意”，“今后随时随地凡是有利于新疆各族同胞的事业，我一定竭诚从旁赞助”。^①

十二月二十八日，张治中和彭德怀飞回兰州，随即又去了西安。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这一次新疆之行，我感到十分轻松愉快。新疆人民能够有今天，对我来说是如愿以偿了。就是说，我过去未能实现的愿望——安定新疆，建设新疆，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实现了，我感到对祖国、对新疆人民在心理上、情意上算是有了交代，我怎能不感到轻松愉快呢！”^②

七、“有幸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张治中和彭德怀于十二月底返回兰州。正赶上兰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被大家热情的邀请出席大会并讲话。

^① ^②《张治中回忆录》，第647页。

张治中是在这一年的二月底离开兰州回到南京，准备率团赴北平参加和平谈判。十个月过去了，如今他再回到兰州已是人民的天下，跨入了新的时代。所以他在讲话中说：“记得我在离开兰州的前一天，曾在三爱堂邀请兰州文化、教育、农工各界朋友聚会了一次。转眼十个月过去了，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了兰州各界的老朋友，真有隔世之感。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们人的思想观念也要变。我们要一切从头做起。”然后他介绍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盛况。他说新政协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一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体现。他在讲话中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民主作风。这次讲话后来以《重来初话》为题发表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甘肃日报》上。

不久，张治中就到西安工作，参与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

有一次彭德怀找到张治中说：“人民的事业得靠大家来干，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需要许多专门人才，您对西北的情况熟悉，认识人也多，请推荐一些。”张治中同意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他提出了一个推荐名单，有的适合做委员，有的是部级的负责人，另外还推荐了一位副秘书长，一位办公厅副主任。其中有些人出身不好，有的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组织和人事部门的干部对此很有意见。找到彭德怀反映，彭总却直率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不是汉奸、特务，没有血债、民愤，是个人才，我们都可以用嘛！”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才不说话了。

但这些名单拿到会上去讨论，其中有一位因为写过反共文章，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一位“国民党反动派”，不能参加“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更不能当委员。张治中听了很有意见，不高兴地说：“要是算历史老帐，我也是一位国民党反动派嘛。”主持会议的

彭德怀当即表示：“张治中将军长期以来就是国民党民主派。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忘不了张将军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曾经三到延安。张将军推荐的那位先生，不管他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他现在拥护人民政府，我同意。”

张治中与彭德怀在一起工作，心情是无比舒畅的。他感到彭总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体贴他；在工作上处处支持他、信任他。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更是无所不谈。

有一天，张治中去看望彭德怀，只见他一个人正吃午饭，心里觉得奇怪，便问：“您夫人呢？”

彭德怀一边让坐，一边说：“夫人去吃饭了。这是我们的制度。我吃小灶，她吃中灶，所以要分开吃饭。”

张治中有点不以为然地说：“这又何必呢？两份饭菜合在一起吃不就可以吗？”

彭总解释说：“那不行，我们打了二十年的仗，过的是低水平的生活，伙食上有些小差别。这是规定，任何人也不能违犯。”

事后，张治中把这件事讲给知己的朋友听，并且说：“彭总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对待任何问题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非常佩服他。”

解放初期，西北五省的机关、部队，每天吃两顿饭，起义部队的官兵感到很不习惯，张治中特别为此事向彭德怀建议说：“咱们进城后，在开饭时间上还是顺应城里的习惯，改成一天三餐为好。”

彭德怀既没说可以，也没拒绝，只是说：“这牵扯到制度和后勤供应情况，涉及面很大。我们得研究研究。”不久，西北五省就和全国一样，改成一天三顿饭了。

有天晚上，彭德怀到张治中的住处串门。两个人聊起新疆的建设问题。张治中说：“政权是个根本。解放前我也曾满腔热情，想方

设法,要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首先是搞经济建设,我曾经组织过西北民主实业公司和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聘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准备开展工作,无奈国民党政权不让你做,结果事与愿违。”说到这里,张治中喟然长叹,万分感慨。

彭德怀说:“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怎么会让你去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呢?其实,在国统区并非没有人才,但谁能发挥特长?物质基础也不是没有,谁能加以利用?”

张治中接过话茬说:“现在好了。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党有良好的传统与作风,又有大批优秀的干部,看来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

彭德怀解释说:“现在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力量,都是属于民主革命补课,补完了课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

张治中愉快地说:“那好,我们这些人还有幸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离开西北回到北京,很快就赴朝指挥作战。党中央决定由习仲勋主持西北的工作。

张治中到北京开会时,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在西北生活是否习惯,身体可否适应。周恩来说:“今后你可以在北京、西安之间多跑几趟,也可到西北五省之外的省份考察工作。总之,可以机动些,注意休息,别太劳累过度。”

张治中谈了自己的工作感受:“在西北的这段时间,我和西北的党政负责同志,以及其它许多中共朋友都处得很好。我对中共朋友十分敬佩。他们的工作作风,待人态度,革命精神,理论修养,都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这些同志对我十分尊重,在生活上对我照顾

得无微不至。”

周恩来又问：“习仲勋比您小好多，您做他的副手没有意见吧？”

张治中爽朗地笑了，说：“总理放心，我毫无意见。我一定会和他合作得很好。”

周恩来笑笑说：“那我就放心了。”

张治中回到西安，看到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群众日报》上刊登的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写的《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一文，了解到新疆的全体官兵春秋两季垦荒超过百万亩；已收庄稼，折合麦子超过一亿斤；修建水渠共长一百二十余万公尺；积累财富，也从每一官兵十元的预计，提高到二十银元左右。他兴奋极了，立即给王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说：“您那篇文章是很朴实的，但又是极其生动的；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

张治中在信里还提到“指战员的安家问题”。他建议“尽速布置这一工作，发动并组织妇女前往边疆”，现在就“应该着手了。在三五年以后，现在的指战员都将转为工农业的基干人员，而且都可以成家立业”。^①王震将军接到信后给张治中写了复信，并立即在南方数省宣传并动员青年妇女到新疆参加建设。他给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写信，请他“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他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②据统计，仅湖南一省赴新的妇女就有三千多人。张治中为解决这个戍边战士的具体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48—650页。

^② 《三千湘女上天山》，《北京青年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

问题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张治中在西安除处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公务外，还经常回到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有时还到外地视察、作报告、搞调研。一九五三年六一七月，张治中视察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几十个县的生产救灾工作，历时一个半月，行程六千多里。这是张治中在西北工作期间，行程最长，费时最多的一次视察。他所到之处，都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发挥农民的潜力和积极性。还批评一些地方干部不能根据群众需要和实际情况办事，要求他们务必深入基层，改变工作作风，做好工作。

一九五四年九月，大区撤销后，张治中就专职在北京工作了。

八、“他这人专做好事”

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听说毛泽东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就找周恩来和彭真说：“希望你们劝劝毛主席，他还是讲话为好。”后来周总理告诉张治中说：“您的意义我已告诉主席。主席仍然不同意讲话。”

张治中就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信中的措辞稍带质询的意味：“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您是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怎么能不讲话？再说，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能不讲话吗？”

毛泽东看信后，过了两天，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张治中，笑笑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泽东摇摇头，还是表示不能同意。

九月十五日大会开幕，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开会，讲了出席大会

的代表人数、大会的任务之后，毛泽东讲：“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结尾时有力地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①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简短，但十分扼要，非常全面，极有力量，与会代表听了都极为兴奋，受到很大的鼓舞。开幕式过后，主席团利用休息的时间开会，毛泽东走过来笑着对张治中说：“还是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为开幕式我是主席，不能不说几句话，就拿起笔来想写几句，谁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稿了。”张治中听了心里也十分高兴地说：“是我胜利了，也是您胜利了。”张治中想到的是毛主席这个讲话，将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毛主席的伟大胜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闭幕后，张治中提了一个书面建议：常务委员应该每年出去到外地视察。以便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张治中的建议是交给彭真秘书长，转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表示赞同，并且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每年至少有一次到外地视察。”有一天在会议休息室里，大家随便扯起到外地视察的事来，有一位同志说：“这是张治中的建议。”张治中听到后搭话说：“这建议早经毛主席扩大化了。”毛泽东听到后当即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人专做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553—554页。

事，一生做了许多好事。”毛泽东的话是对张治中的高度评价，说明毛泽东非常关心周围的同志，那怕有一点成绩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只要你做过一点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就永远忘不了。毛泽东的话对张治中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督促。

自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了视察制度后，张治中每年都抽时间到外地视察。回到北京还要把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交给中央或地方有关部门负责解决。

一九五五年六月，张治中和人大代表、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人大代表、北京农业大学教务长沈其益同行到安徽视察。他们是五月二十八日到蚌埠，参观了淮河大堤，后又参观了佛子岭水库。六月二日，他们三人就分开了。张治中由副省长陪同参观了霍山、六安、梅山、金寨等地。六月四日到了合肥。

张治中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也非常怀念自己故乡的父老乡亲。张治中在年轻时，曾有一个建设故乡的美丽设想，把黄麓建设成“理想中的乐园”。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烔炀，西至长临，筑成环乡的乡道，再在各村修村道；同时，办一百所民众学校，其它一切按地方自治办理。我曾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多次商量，想把乡师逐渐扩大，成为大学，附设一所中学，若干小学。此外如科学馆、天文台、图书馆、医院等，应有尽有。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可惜我的理想刚生了芽，尚在计划阶段，而战争在烽火漫天中吹起来了。”^①

六月六日，张治中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陪着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他在黄麓、洪家疃停留了四天。他看到洪家疃和十年前大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5页。

不相同,过去衰落、凋零的贫穷景象完全为今天的蓬蓬勃勃发展的兴旺景象所代替。张治中走在街上,三五成群的青年农民亲热地向他围拢过来。他们与张治中随便拉家常。张治中问他们:“现在生活怎样?”他们爽朗地说:“好多了。将来比现在还要好。”这些年轻人充满信心,充满力量;他们有说有笑,是那样乐观向上。张治中记得,解放前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最少也有二三十个,现在走在街上一个也看不见。年轻人都在愉快地劳动,忙于各类农活。该村的调解委员金大妈对张治中说:“全村只两个‘懒汉’,还是最近久居城市失业回来的。”

张治中走到村前,看见他曾挑过塘泥的大水塘,现在蓄了好多水。一位青年人说:“这口大塘,过去老年人不让深挖,怕挖断了龙脉。现在深挖了,而且年年深挖,多挖塘泥作肥料,多蓄水好浇田。如今是庄稼长得好,日子过得旺。”年轻人的话又引起张治中的回忆: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后,他曾回乡住了四十多天,他觉得村子里树少,就提倡植树造林;有些池塘里没鱼,他就提倡养鱼,有的塘干涸了,是由于塘太浅蓄水不多,他就带头下塘,组织大家挖塘泥,挑泥肥田。他还记得自己挽起裤管,脱掉衬衫和大家一起挑塘的场景。村里人笑着喊:“总司令挑塘!”“快来看,总司令挑塘!”又回响在自己的耳际。此时一位白须老者走来,恭敬地说:“总司令好?还想跳下去挑挑塘泥吗?”一句话把张治中逗得开怀大笑,曾希圣却不知其中缘由,只是随着众人大笑而已。

张治中来到黄麓师范学校,心里就更是激动不已。这所学校是他用自己的积蓄办起来的。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中曾说:“不久我就在家乡创办黄麓学校,所有建筑费用及常年开支,直到由省接办,已用十万元以上”。“现有的田地,其收益向

来是补助黄麓学校”。^①这所学校解放后改由县办，校舍已修葺一新。规模比过去大，学生也比过去多了。

张治中走在乡里，在街上碰到的老人都是与自己相差不多的岁数。自己年轻时的“故乡父老”大多已不在世。他只能从记忆中想起当年见他们的情景：“我从小就礼貌甚周。望见长辈来了，远远打招呼，先喊他，所以父老很喜欢我。我始终尊敬父老和长辈，他们对我也情深意厚。”“每次回乡，一定要与父老及长者们谈谈，问候他们，也请他们喝喝酒，吃吃饭。”^②这次回乡他却见不到这些父老乡亲了。他所见到的就是上述新时代的农民，新社会的农村建设者。

曾希圣书记十分热情，把洪家疃的贫雇农、中农、甚至地主、富农也招呼来，还把黄麓乡周围的几个乡的干部也请来开座谈会，请张治中讲话。到的人，比他当年宴请父老乡亲时多得多，场面要大得多，气氛红火得多。这是张治中事先万万想不到的。

大家热烈鼓掌请他讲话，他讲了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还日日夜夜牵挂着广大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他老人家让我们人大代表到农村了解情况，以便改正缺点，做好工作。”“这种情况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没有的。”他又把几天来在安徽省看到的新鲜事和新的感受介绍给众乡亲，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有二十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考察广州和海南岛。众人推荐他这位热心人担任组长。其他十九人有邵子力、王季范、雷洁琼、章乃器等。他们这次视察的重点是教育工作。

^①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106页。

他们在十几天内视察了广州六所高等学校、十六所中等学校、九所小学。他们把发现的问题归纳成十个专题，并举出若干典型事例加以说明。诸如：教学计划杂乱；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课程与教材问题；教学设备与校舍问题；教师福利与工资改革问题；学生生活和课外活动问题；教师、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学校卫生问题；学校经费与学生助学金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上级领导方法的意见等等。

十二月十日，张治中一行离开广州，经开平、恩平、湛江市，于十七日到达海口。他们用了—个多星期的时间在海南岛转了一圈，参观了黎族、苗族的村寨，参观了农场、海港等。最后回到海口。海南行政公署主任王觉召集许多干部举行座谈会，请这些“代表”、“委员”留下宝贵意见。张治中除了谈些一般的感想外，还作了很有见地的发言：

我认为海南地区的建设，第一步应该以台湾为目标。台湾一定要解放，这是没有疑问的。日本人侵占台湾五十年，抗战胜利后我去过。它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地区。如日月潭水力发电，解决岛上大部分工业和照明用电。嘉南大川的水利工程，可以灌溉将近三百万亩土地。大量上等的蔗糖运往海外。台湾人口已经接近一千万。我们回顾海南地区，条件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我们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的海南人民，这是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要达到以台湾为目标是完全可能的。其次，海南虽然比台湾小些，但是可利用的土地要比台湾多。台湾只有西部一些平原，东部都是悬崖峭壁，中部多是高山，全岛山地面积占总面积三分之二，海南不但平地多，山地也不是全部陡峻，还可利用。海南地下富藏已发现

的,就比台湾多,经济作物如橡胶、剑麻、咖啡等都易发展。海南接近大陆,容易得到大陆的支援。

海南建设前途是远大的,我们不好作保守的看法。当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还可能谈不到,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注意到了。……规划可以分期逐步实施,一定要争取超过台湾。相信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海南一定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工业化的地区。^①

张治中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开发海南的设想,并且从地理环境、气候、物产、人口等方面进行阐述,他认为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海南一定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地区”,很有远见卓识。可惜那些年代我们都抓了“阶级斗争”,贻误了开发的大好时机。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张治中参观了北京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所见所闻都使他感到兴奋和愉快,到处都是蓬蓬勃勃大发展的新风气、新景象、新精神。

四月十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万里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的视察报告。张治中又做了长篇发言,整理后作为“视察报告”送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张治中从四个方面,“关于市政建设”、“生产发展概况”、“妇女劳动力的解放”、“工人农民的生活”,肯定了北京工作的成绩。

当张治中谈完成绩后,市里的负责同志都希望张治中等人把看到的缺点也提出来,以备基层改进工作。同时被视察的单位负责同志,也有同样的要求。张治中说:“说实在话,我要想

^① 张治中:《解放后十年来政治活动点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八辑,第31—32页。

求全责备，吹毛求疵，也确实找不出什么大的缺点——我对许多专业都不懂，如同看热闹而高兴，也无从深入研究；不过既然主管同志是这样虚怀若谷，盛意拳拳，我想作为质疑，提出几个小问题，不是作为建议或批评意见。”于是他又谈了四个问题。这里只简略录其两个问题：

第一是决定生产任务问题。当每个工厂和公社给我们做汇报时，都暗示任务较重，但都表示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我相信他们的话是真实的，但有时好像有点勉强。比如农业机械厂，今年第二季度要计划生产六百台联合收割机，每个月二百台。但说到该厂最大的力量时，只能做到一百五十台，经过党、团、工会和群众开过会，提出口号“为日产八台而奋斗”之后，就有可能完成。但我们参观了几个车间，到最后装成部分时，已是下午一点了，看到装成的只有两台……

.....

第四是关于视察中的招待问题。我们每到一个单位，他们那样殷勤招待，盛意实在可感。不过吃饭时菜太多了些，大鱼大肉吃不完，我们内心感到不安。如在福绥境，食堂就不错，我们也想尝一尝，但他们很客气，一定要请我们上馆子……①

另外两个是“附属设备”和“城市住宅分布”问题，就不做摘录了。张治中说是“小问题”，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

① 张治中：《伟大的首都——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八辑，第39—40页。

题说明“高指标”、“浮夸风”仍然没有停止。第四个问题说明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风气还是很盛的。在我国“吃喝”成风，到今天，党中央三令五申仍然煞不住，足见恶习难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张治中在“浮夸风”劲吹的情况下，能实事求是地，有胆识地提出这些问题，是极为可贵的。也只有对党对人民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才能做到这点。

第七章 朝思暮想谋求统一

台湾是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殷切期望。

周恩来在解放后，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奋斗了二十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张治中在周恩来的热情关怀、指导下也为完成这一神圣使命付出了艰辛劳动，做了许多别人做不了的默默无闻的工作。

张治中的一生与国民党、与蒋氏父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他们两个人过从甚笃。即使在张治中转变了立场，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之后，他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尊重的，私下谈话以“蒋先生”称之，公开写文章、讲话尽量避免提及蒋氏。而且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政要和军事将领中，好多人是他的学生、部属和故交好友。所以说，在争取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的工作中，张治中能起到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解放后，周恩来与张治中亲密地来往了二十年，友谊日深。他俩之间的许多佳话就是始终围绕国共两党友好合作、统一祖国大业这条经纬线，错综复杂地交织成的。

一、“准备第三次合作”

解放初期，我们的方针主要是计划用武力解放台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或者局部解放台湾，或者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又起义回到祖国大陆等等。

一九五〇年一月底，张治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率领一个工作小组前往广州秘密从事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小组成员有屈武、李俊龙、李蒸、卢郁文、刘孟纯、余湛邦等。主要工作是通过滞留香港的故旧好友，去做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要的思想工作，劝其率部或个人回归祖国，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

六月初，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筹备召开，张治中由广州返京，一是准备参加政协的会议，一是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在广州几个月的工作情况。

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以张治中个人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长信，劝其放弃反共主张。张治中和蒋介石在公务方面的亲密关系，多为众人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私谊也非一般，世人知道的就不多了。跟随张治中多年的机要参谋张立钧在《回忆往事》中谈了几件众人鲜知的事：

●张治中在四十年代曾为蒋介石父子间矛盾、纠纷进行调解。蒋经国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对宋美龄始终以“玛达姆”（意为夫人）呼之。为此宋美龄甚为不悦，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对蒋经国的作法也极为不满，但又不便明说，只是婉转地、含蓄地说：“对夫人应尊重，像对待生母一样，不要总称呼‘madam’，大家听起来很不习惯。”终因宋美龄太年轻，蒋经国岁数已不小了，蒋介石不好直接命其称“妈妈”。宋美龄仅比蒋

经国大十三岁。蒋介石在抗战时撤到重庆，张治中知道这个情况后，曾劝说过蒋经国数次。当时张治中担任三青团干事会书记，蒋经国是干事。在工作上经常来往。每逢谈完正式工作，张治中总爱说几句：“经国老弟，不要在小事上让老先生生气，你叫她声‘妈妈’又小不了，老先生又高兴，家庭又和睦该多好。”后来蒋经国果然改变了称呼，蒋介石十分高兴，玩笑似地说：“文白有功劳。”

●四十年代，蒋纬国在胡宗南部第一师任职，常回到重庆，一到重庆就找张治中聊天。张治中对其婚事和工作都很关心，曾两次介绍国民党要员的小姐给蒋纬国，终因不合意而未成。

●蒋介石贺张治中五十寿诞。张治中的生日，在家中除少数人知道，多数人不知道，也从未给他祝贺过生日。一九四〇年十月下旬，蒋介石特派他的侍卫官送到张治中官邸一封亲笔信函。内有条幅一帧，是蒋氏亲书：“自强不息”四个大字。上款：“文白吾兄五十诞辰”，下款为“蒋中正 廿九年十月”。另附六千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这个条幅曾在张治中的书房里挂了很长时间。

●张治中可以随时与蒋介石通电话。从四十年代起，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身边有两位专管电话的侍卫官，并有专用号。无论何时，只要拨这个专用号即可与蒋通话。蒋介石如打电话给张治中，也由这两位先生事先通知。张治中身边的人和这两位侍卫关系极好，经常联系，每年春节还要送些礼金，名曰“茶水钱”给他们。

●蒋氏特许张治中可乘坐他的专机“美龄号”和“追云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使用的运输机C46、C47，都是美国的军援物资，设备简陋，安全系数也低，曾多次出事故。张治中在

一九四六年出任西北行辕主任后,由于经常往返南京、兰州间,长距离飞行倍尝其苦。张治中向蒋介石说明此情,蒋氏当即命令其专机组,听张调遣。因为蒋氏的专机,设备完善,性能也好,机组人员素质、技术在国民党中是一流的,乘坐很安全。这种特许,在当时是仅有的。

●一九四九年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居北平。这年冬天,蒋介石到重庆督战失利,退到成都。这时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由甘肃拟飞香港,路过成都时,她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显得很伤感的样子对素我说:“我对不起你父亲!”后来蒋氏逃到台湾,张治中与蒋介石仍然“鱼雁往还从未间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

周恩来考虑到张治中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的特殊关系,让其做蒋氏和其部下的工作,是非常合适的。

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岛,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国解放台湾。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①表达了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

世界进入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一九五四年四—七月,日内瓦会议签订了越南停战协议。国际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随着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第51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我国的经济封锁、遏制政策屡遭失败。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势力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①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出席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时,有位西方记者问:“总理阁下,台湾和平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先生为将军呢?”周恩来笑笑说:“完全可以。”

周恩来在会议上阐释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意见。随后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②

这个声明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和各国政治首脑的注意。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273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第470页。

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八月一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便开始了。

蛰居在美国的李宗仁,看到周恩来的声明和讲话之后,马上写信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信中说:一九五四年秋,他曾去芝加哥访见吴国桢,获知台湾内幕,美蒋矛盾重重,台湾前途难测。他请程思远赶紧起草一份有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文件。程思远很快起草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寄到美国。李宗仁又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经过修改,于八月份在美国发表,一时轰动舆论,世界瞩目。

李宗仁在“建议”中认为台湾问题,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①

到了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局势和台湾内部情况的变化,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②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周恩来在一月三十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

① 《程思远传》,第112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273页。

能性。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①

二、周公将有重托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程思远从广州登上北上的火车。四月，大地回春，万紫千红。程思远心潮起伏，他躺在软卧包厢里，白天晚上都难已入睡。他坐在窗前，看着“换了人间”的祖国大地，他回想着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想着到北京后可能遇到的人和事。

四月二十九日，程思远到了北京，住在刘仲容家里。这天，黄绍竑在政协礼堂开会，散会时，周恩来告诉他：“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黄绍竑十分惊喜，而一旁的李济深也感到意外地高兴。可见程思远“应李济深之邀”来京，李济深并不知底。这里边大有文章。

刘仲容的遗孀张敏华女士回忆：

一天下午，我从北京医院下班回来，见房间里有位中年客人，从当时五十年代社会人们的穿着比较来看，这位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第543页。

客人不像是来自国内的，那时看他身材修长，西装革履，衣着考究，配戴眼镜，目光深邃。这时，仲容就向我介绍，这是他的老朋友程思远先生，从香港回来观光。我和程先生寒暄了几句就认识了。以后有几次我回家来就看见程先生在我家写东西。事后我问仲容，程先生在写什么？仲容说：周总理让他写些材料，好让他在香港做些工作。我记得他写了东西以后，仲容必在晚间去见周总理。^①

五月一日，程思远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观看了盛大的“五一”游行活动。欢乐的游行队伍，盛大的庆祝节日的场面，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五一”过后，每天都有广西故交的宴请。李济深、黄绍竑、蔡廷锴诸人都宴请过了之后。五月六日晚上，张治中先生在家里设便宴招待程思远。张治中在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时，程思远在三青团中央当处长。两个人在一起共事多年，彼此感情很好，久别重逢，更是格外高兴。宴罢临别时，张治中神秘地对程思远说：“明天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出席与你会面。”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刘仲容陪程思远去政协礼堂赴宴。路上，刘仲容对程思远说：“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程思远闻言后心下暗忖：此行莫非周公将有重托？

程思远这种推测，不久就证明是正确的。

① 陈敦德：《归根——李宗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第383页。

酒会十分热闹，人们互相问候，人头攒动。张治中嘱咐程思远：“不要离开我，一会周总理来时，我好介绍你跟他认识。”转眼，周恩来风度翩翩走进会场。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一边扬起左手与在场的人们打招呼，一边径直走到张治中他们这边来。张治中正要起身介绍，周恩来已走到他们身边与程思远握着手说：“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

程思远一听，感到吃惊，他盯着周恩来的有神的两眼只是连声：“啊，啊。”他在记忆的思维中忽然想起那时，他在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当秘书。当时广西组织了一支学生军，由广西出发，经过武汉，开往五战区徐州前线。学生军临时驻在蛇山抱冰堂。白崇禧派程思远请周恩来给学生军做报告。仅仅是短暂的一次接触，周公却记得十分清楚。

周恩来又问程思远：“今年多大岁数了？”

“四十七岁了。”程思远笑笑说。

周恩来说：“身体这样好哇！你还年轻。”

程思远说：“我在海外常常游泳锻炼。”

周恩来问：“这次回来有什么计划安排吗？”

“没有。我听总理的指示。”

周恩来说：“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到东北去，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我们刚刚搞了一点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你可以去看看，多看点东西，到海外讲话的材料就多些。”

程思远说：“这次来得很匆忙，就不准备到外地去了。”

周恩来笑着点点头说：“也好，至少在北京可以转转。”说着用眼扫了一遍身边的刘斐、屈武、刘仲容、余心清等人，然后

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先生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稍尽地主之谊吧。”

这时，他们已成为大厅里引人注目的中心。周恩来说：“现在太忙，过两天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我们好好谈一谈。”说完举起手中盛满了美酒的高脚杯，与程思远碰了一下杯，呷了一口说：“改天再会。”然后就走到其他人的面前。

五月十一日晨，程思远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中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上午十一时左右，程思远在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临近紫光阁，程思远就看见周恩来站在门外的白玉石砌的雕栏旁边在迎候他。程思远紧走几步握住了周恩来的手。

走进宴会厅，使程思远吃惊的是过去和他经常往来的国民党政要几乎都赫然在座。程思远不用人介绍便走上前和李济深、张治中、邵子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屈武、黄绍竑、刘仲容等人一一握手。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也在座。

周恩来热情地对程思远说：“今天你应该多喝一点。今天是我们建国后第三次接见国民党人士，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州同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见面。叶元帅你见过吧？”

程思远点头说：“见过。那还是在一九三九年，我在桂林听他做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我还记得报告的题目是‘积小胜为大胜’。”

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说：“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认识吧？”

程思远说：“认识，龙云先生的儿子。”

周恩来说：“对。我们希望他到海外去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不久即遁到台湾去了。到了台湾也罢，还在广播中骂我们。”说到这里，周恩来双臂相抱于胸前，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爽朗地笑笑，又接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这次程先生来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谈谈。”这时服务员端上刚出锅的两样菜，周恩来说：“咱们边吃边说。”

周恩来在宴席间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在美国发表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周恩来说：“不过有一点我不能同意。台湾不能非军事化，台湾归还祖国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周恩来还批评白崇禧说：“健生这个人很聪明，但颇自负，在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许诺，想当什么‘国防部长’，结果一到台湾，什么也没有了，成了蒋介石的‘摆设’。其精神苦恼是不言自明的。”

宴会后，周恩来又系统地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我国的对美、对台的政策。

周恩来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可以由中美两国政府讨论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许外国干涉。”

周恩来谈到国共关系时说：“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两度合作，并肩作战，那就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也曾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由于尽人皆知的原因没有实现，我们和台湾国民党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合作，一致对外。”

周恩来最后说：“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我都本着‘爱国一

家’的方针，欢迎他们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并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

临告别，周恩来请程思远邀请李宗仁、黄旭初、夏威、张任民等回国看看。

张治中走出宴会厅，对程思远说：“周总理这番话不只是对李德邻等先生的个人邀请，是对海外所有国民党人士的广泛邀请和号召，意义深远啊。”

程思远也说：“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第二天，黄绍竑邀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黄绍竑对程思远说：“你此次来京，得到周总理如此礼遇，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我个人也没有想到啊。”程思远仍然思考着周恩来的嘱托。

周恩来在紫光阁的一席话，为日后李宗仁夫妇和众多海外游子回国敞了大门。

三、“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为了开展对台工作，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童小鹏、罗青长、凌云等人做具体工作。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

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在这里再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安排。”^①

周恩来在一切场合,只要谈到台湾问题总是强调,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曹聚仁,解放后到香港继续办报。他感到我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改变很大。一九五四年八月公布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中还说:“除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就是对蒋介石不得如此。到一九五六年六月,时间过了不到二年,就删掉了“除蒋贼一人而外”。曹聚仁很想知道中共的政策是否能真的兑现。于是他在七月中旬经由广州到了北京。

七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张治中、邵力子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曹先生首先感谢周总理在百忙中抽时间接见他。然后有礼貌地说:“总理十几天前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我认真地拜读后,感到十分兴奋,认为和平解放台湾很有希望,您的讲话,在国内外,尤其是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反响。”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2页。

周恩来点头微笑说：“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台湾当局没有矛盾，意见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是永远不会变的。至于用何种方式解放，使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和国民党是可以商量的。”

曹聚仁笑笑说：“您在报告里说‘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有‘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甚至‘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只要回来，都可以‘既往不咎’。这张支票的票面价值和实际支付的现金价值一样吗？”

周恩来听后开怀大笑，说：“请先生放心，‘和平解放台湾’的支票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中国共产党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曹聚仁又提了一些他关心的问题，因为周恩来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这次谈话就结束了。

从中南海出来，在路上曹聚仁又问张治中：“这次怎么不提‘蒋介石除外’了呢？”

张治中说：“我理解是蒋介石主张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托管’，这还是爱国的。”

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又在百忙中抽时间接见了曹聚仁。张治中、屈武作陪。

曹聚仁首先说：“上次总理给我解答了许多问题，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前些时您接见国民党的有关人士曾提到国共合作，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周恩来说：“在历史上我们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一是北伐战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一次是抗日战争，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愿意在统一祖国和建设祖国的问题上与国民党实现第三次合作。我们共产党是有诚意的。”

曹聚仁说：“假如能第三次合作，当然很好。不过如今国民党的地位在国内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地盘，只有台湾；军队，就那么几十万人。回归祖国，有点受招安的意味。”

周恩来说：“我们说的第三次合作，对台湾绝对不是‘招安’，也不是‘招降’。只要政权统一，祖国统一，其它任何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国民党政要的职位安排都可以商谈妥善解决。”

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两天，七月十九日，周恩来、陈毅在张治中、屈武的陪同下又接见了曹聚仁。

曹聚仁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个人爱瞎想，台湾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对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没有反应，是否担心统一以后，他们将失去一切，原先答应好的条件都不算数。蒋介石是被中共赶到台湾去的，他对中共当然是既恨又怕又怀疑的。”

周恩来笑笑说：“我们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已几十年了，从来不要什么阴谋，不玩什么手段。怎么说就怎么做；说到那就做到那。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今后仍然如此。中共从来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陈毅更直爽：“你可以告诉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从来是说话算数的。”

周恩来又详细地解释了我国政府和党中央有关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地区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全由蒋介石管理；对于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介石的意思予以重用；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处，全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后，也要听蒋介石的意见，而且还要和台湾各界代表协商决定后进行；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

利于两党重新合作。”

陈毅说：“曹先生您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多年，可以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蒋经国或国民党当局。”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把这些信息传出去了。

国内的《团结报》记者王琦不久又围绕台湾问题采访了张治中。两个人有如下问答：

问：你对于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同台湾当局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建议，有什么感想？

答：……我认为这是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殷切、最诚恳的态度，我们相信台湾的绝大多数人是会同意接受的……这个“善因”已经种下，我们从最近国内外的舆论看，影响已经很大。和平解放台湾的正义呼声与行动，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问：您过去曾参加过许多次的和平谈判，您是否可以就个人的体验，谈谈当时和谈的情况。

答：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间，过去有过多次的和谈，我是多数参加过的。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共产党对每次和谈的态度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虚伪的手段与策略。周总理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这话具有深刻的涵义。这等于暗示我们不妨再来第三次合作。因为解放台湾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霸占中国领土，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种表示，不但是对台湾国民党的期望，也是对他们的推重，希望双方和解，希望做第三次合作。

问：您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如何？你对于台湾、香港某些亲美蒋的报纸诬蔑周总理的建议是“和平攻势”，

是“中共荏弱”的表现，您对此有些什么看法？

答：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趋势正在一天天发展。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台湾某些方面认为我们的表示是“和平攻势”，是“中共荏弱”的表现云云，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大家试想，祖国对美国尚且如此强硬，在抗美援朝中，在中美会谈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今天祖国所以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完全是为了避免双方几十万生命的牺牲，为了避免台湾一切公私财产的破坏，为了避免台湾尚有不少建设有用人才的损失，当然也是对国民党表示和解之意。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反对帝国主义，要使美国侵占台湾、控制亚洲的企图失败……

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应如何进行工作，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答：在和平解放台湾的运动中，由于历史的、人事的关系，民革是应该起一定的作用的。过去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如对台湾广播、发表文章或用其它方式对现在台湾的旧好加以说服劝导等，是有了一些影响的。在祖国进一步号召和平解放台湾声中，我们还可以再做更多的工作。根据各人不同的情况，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①

张治中在各种活动中，总是注意配合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这年的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

① 张治中：《答〈团结报〉记者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七辑，第56—57页。

会。在会上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来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一位印度记者问：“贵国政府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

周恩来朗声大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①

四、张治中接受采访，周恩来东兴楼宴客

一九五七年一月，张治中率人大代表一个视察小组从海南岛回到广州，在宾馆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的采访。记者请他谈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张治中便娓娓道来：“台湾是必然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记者又问：“有那些可能性因素呢？”

张治中说：“可能性因素很多。其中一条是在台军政人员去台已七年，时刻想念田园墓庐、故旧亲朋。另外是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最近陈诚又鼓吹‘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性一年’。这是哄人的幻想。他们曾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东事件、匈牙利事件。在这些事件上都有过幻想，但一个个都破灭了。”

记者又问：“妨碍和平解放台湾的不利因素有那些呢？”

张治中回答说：“目前看不利因素有二：一是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控制；二是部分人员对中共的怀疑与恐惧。这两个因素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第646页。

只是暂时的。蒋氏父子都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美蒋矛盾无法彻底解决。蒋氏父子口头上经常‘反共’、‘反攻’，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不说这些怎么能维系人心？蒋氏喊‘反共’，我们没有与蒋为难的必要。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我们照样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我们如同巨人一样屹立于世界，台湾却越来越困难，日益穷途末路。”

二月中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了配合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成立了对台工作委员会，众人推举张治中主持，并邀请各方面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知名人士参与工作，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

“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上海《文汇报》记者访问了张治中，请他谈了对台工作的方针和“台委会”的工作安排。

三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三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大会的主题之一是探讨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发言者意见纷纭，提出了不少问题。张治中是“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会上做了题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的长篇发言。他的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英明，影响巨大”：一、国际反应好，一些担心武力解放台湾会引起世界大战的人放心了；二、在国内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三、海外华侨反应良好；四、台湾军政人员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越来越多。第二部分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新中国日益强盛，吸引力大；二、台湾越来越孤立；三、台湾内部士老兵疲，人心涣散；四、美蒋矛盾日益尖锐。

张治中在报告中最后说：“为什么台湾国民党当局到现在还不愿意谈和呢？因为他们还存在一个幻想，两个顾虑。幻想第

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顾虑美国控制不肯放手，顾虑中共政策有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

蜗居在台湾的蒋介石，身边总是不断传来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他浏览各地的报纸，还不断看到记者采访张治中的报道。台湾的报纸不敢刊登这些消息，但香港、新加坡的报纸经常转载张治中发表的有关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蒋介石读了这些消息的确有些心烦。

有天，蒋介石翻香港出版的《新生晚报》，看到一条炒了多遍的新闻：有位记者问周恩来，“蒋介石要回归中国大陆，将给他怎样的地位。”这位记者传出去是“部长的职位”。第二天周恩来看了报纸纠正说：“不是部长，总要高于部长的地位。”事情过了几个月，这家晚报说“给蒋崇高的地位，还保证他的安全和荣誉。”有家报纸报道，中共总理周恩来答记者问说：“如果蒋介石先生回到祖国，给他部长的地位太低了，那时他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有家报纸在张治中“访谈录”中写道：张治中在民革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还列举过上述周恩来的答记者问作例子。

蒋介石读到这些消息苦笑了一下，心想：一个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军事教官。我当年的部下，今天竟对我封官许愿了。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终于动了心。

一九五七年四月，蒋介石把许孝炎召来台北。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士林官邸秘密接见了她。

蒋介石心里极不平静，话又极难出口，待了会，平静地不动声色说：“近一年来中共发动了强劲的和平攻势，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我们应该派人到北平去摸摸底，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嘛，不宜从台湾派出，可在海外选

择。你看谁合适？”

许孝炎很费了一番脑筋，说出三个人来由蒋介石挑：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您看派谁去为好？”

蒋介石考虑了一会说：“我看让宋宜山去比较合适。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在一九四九年被俘，现在仍被关押在战犯改造所。如果宋宜山在大陆的行动被发现，就说是回国探亲。”

许孝炎说：“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另外，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是湖南人，陈赓也是湖南人，据说是一个乡。也便于以同乡名义接触这些人。”

蒋介石说：“中共的高层干部湖南人很多，另外，中共军队的高级指挥人员中黄埔军校出身的也不少。总之，宋宜山去大陆，便利条件很多。”

于是就决定派遣宋宜山回大陆摸中共的底牌。宋宜山是英国留学生，也是黄埔毕业生，逃往台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处长。

四月下旬，宋宜山先到的香港，联系好之后即到广州，乘火车北上。

宋宜山一到北京，就受到老友章士钊、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的热情接待。当天晚上，这两位老朋友就在宋宜山下榻的宾馆设宴招待他。宴席间，唐生明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强调‘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这话绝对可靠。”

章士钊也说：“我们国共两党应该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受美国人的气，不能受制于外国人。”

晚宴罢，临分手时，唐生明告诉宋宜山：“明天周总理在东兴楼宴请你，总理会告诉你一切。”

章士钊说：“明天我还有点别的事就不作陪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东兴楼饭庄。出席作陪的还有李维汉、张治中、屈武等人。

周恩来说：“你回到国内，可以到各地走走，看看各地的变化。也可到功德林探视你弟弟宋希濂。他这几年思想很有进步，你可以通过他了解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在功德林改造学习的其他国民党人士，你愿探视谁都可以。”

李维汉说：“去年周总理说，这次国共合作，和平解放台湾不是招降。我们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周恩来说：“和平统一后，台湾省可以实行高度的自治，成立自治区也可以。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先生领导。我们共产党不派干部去台湾干预任何事情。”

说话间，服务人员来到会客室轻轻对周恩来的秘书说：“饭已备好了。”周恩来站起来说：“咱们边吃边谈。”说着把大家让到餐厅里。

宴席间，周总理又说：“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可以派人来北京参加全国的政务领导，各个部门都可以安排台湾的官员任职。前提条件是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如何谈判，具体事宜您可以与你们的湖南老乡李维汉谈。”

宴会后，周恩来有事先走了，李维汉和宋宜山等人又在会客室谈了会。李维汉说：“国共两党的对等谈判可以先在香港进行。您回去可向蒋先生汇报，如能实现，我将率团前往。”

宋宜山也表示：“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宋宜山在各地参观了近两周，又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视了多年不见的弟弟宋希濂。

五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他把与周恩来、李维汉的谈话内容，以及到各地参观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份一万五千字的报告。结尾处客观地评价了共产党的政策和自己的认识：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先生过去所提“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宋宜山把报告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拿到报告后，立即伏案细读。蒋介石越看越气，没有读完就把报告摔到一边，气呼呼地说：“半个月就被赤化了，竟然把共产党吹得那么好！”转身吩咐侍卫官：“告诉宋宜山别回台湾了，他就住在香港吧。每月的薪饷如数寄给他就是了。”

刚要起步的和谈又停下来了。

五、“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

一九五八年，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企图达到“划峡而治”的目的。这时蒋介石坚持“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经常出动军队，对我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蒋介石把台湾的三分之一的兵力调到沿海一带。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把中国大陆与台、澎、金、马联系起来，维持中国的内战状态，利用美蒋的矛盾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一天之内就向金门、马祖等小岛发射炮弹上万发。有的外电报道当天发射了十万发，有的说五万发，连续四十多天发射四十余万发炮弹。总

之，成吨的钢铁从金门、马祖的上空倾泻下来。

八月的一天，香港记者曹聚仁又来北京摸我们的情况。毛泽东接见了，并与他谈话，告诉他：“我们炮击金门，是在支持蒋先生抵制美帝国主义。”曹聚仁有些莫名其妙。毛泽东耐心地分析了台湾的形势，指出了美国想托管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曹聚仁说：“我明白了。”毛泽东说：“明白了就好，请把这个意思转告台湾当局。”曹聚仁回到香港，立即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

据蒋介石的内侍翁元口述的回忆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里说：“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那天恰巧是礼拜天，一大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样，在老先生（指蒋介石——引者注）办公室把惯常的公务做完，然后就到隔邻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找王叔铭总长的幕僚翁显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兴头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电，上面赫然写着金门爆发了大规模的炮战，金门在前一晚上竟然被共军轰击了几十万发炮弹。翁显梁马上打电话，向总长王叔铭报告，然后王总长再向老先生报告。”^①

这些侍卫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感到吃惊。因为前几天蒋介石刚视察过金门，而且二十三日当天“国防部部长”俞大维刚好到金门视察防务。据说俞大维正在用望远镜观察大陆沿海情况，成万发炮弹便从头上砸下来，受了重伤，几乎送命。他们真不清楚，是中共的谍报高度准确，还是偶然巧合。总之，一个晚上打十几万发炮弹，不只金门从来未有，就是整个国共战史，世界战争史也是闻所未闻的。

^①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49页。

为什么说炮击金门是对蒋介石的支持呢？周恩来总理早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曾说：“不仅新中国不承认‘两个中国’，就是现在蒋介石也不承认‘两个中国’。为什么蒋介石不承认呢？因为蒋介石如果承认台湾是独立小国，那么，他要代表全中国的幻想就破灭了。跟随他从大陆去的军队和其它人员也就要散伙了，只会剩下一小撮他的追随者。美国就可能随便找另一个人替代他，或是胡适、李宗仁，或是其他人。……美国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把它拖下水。如果新中国默认了‘两个中国’，美国政府就可以对蒋介石说：‘新中国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如果那时蒋介石还不接受，美国就要换掉蒋介石。”

周恩来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说：“我们必须粉碎美国政府的阴谋，不能上他们的当。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同蒋介石的代表或同蒋介石本人坐在一起会谈，或者是他派人到北京来，或者是我们派人到台湾去。这些事都好商量。但是美国决心要制造‘两个中国’，对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让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不干，说金门、马祖是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他不但不撤军，反而大大加强其防务。美国施加的压力越大，越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到祖国这边来。这种情况是非常微妙的。”

微妙的情况，需要微妙的策略。炮击金门、马祖后，周恩来多次与民主人士座谈“炮击金门”是一场政治战。章士钊明白了这一举措的策略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

炮击金门后不久，毛泽东接见章士钊，请他给蒋介石写封信，转告我们的意图。章士钊与毛泽东的私人友谊很好。一九二〇年在上海时曾资助过毛泽东两万银元。一九四九年，他又是

南京和谈代表之一。他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中有许多老朋友，而且来往较多。章士钊把写好的信交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对其中一些话十分欣赏，比如：“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谈到我们和台湾的关系时说：“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毛泽东认为“南天”的“天”不太恰当，建议改成“南云”。章士钊很高兴地改过。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美国，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的。”

十月六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然后说下令停止炮击一周，目的是让国民党充足“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命令：“福建前线我军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命令说：“再停两星期”，“观察敌方动态”，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收复台、澎、金、马，“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毛泽东把“炮击”和“停火”的目的告诉了所有的人。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第三篇文告：《再告台湾同胞书》。文告说：“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目的是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毛泽东在三篇文告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不要插手。中国人自己的事，什么都可以谈，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国共两党间的事很好办。中国人要一致对外，把美国赶出去。

随后，章士钊到了香港，通过故交好友把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达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人。当时拟有两个方案：一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蒋介石对此漠然置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民革召开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学习《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件，大家自然谈到台湾和蒋介石的问题。张治中在会上针对大家的讨论根据周恩来历次谈话的精神又做了长篇发言。其中有两段：

为什么我们不反蒋了呢？为的是利用蒋抵美。我们现在不采取“联美压蒋”，相反地是要“联蒋抵美”。为什么？因

为有蒋介石在台湾，台湾还是中国的。蒋介石反对“托管台湾”，反对“两个中国”，如果蒋介石走了，台湾将会落到什么人手上？各位可以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中体会到。台湾在蒋介石手上还是在中国人手上，如不在蒋介石手上，前途就很难预料了。现在美国人正在处心积虑地要把蒋介石除掉，要找一个便于控制操纵的人来代替他，以达到美国的阴谋企图。蒋介石是明白这点的，所以美蒋之间必然存在极大的矛盾。

.....

我认为，如果说台湾一定马上回归祖国，那是太轻率的说法，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但如果说台湾一定不会回归，蒋介石绝对不会回来，那也未免太悲观。

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民革的同志说过：“蒋如回来，你们就砍我的头！”周总理满脸笑容地和这位同志说：“你的话讲得很辩证。蒋如不回来，你的话就灵了；假使蒋回来，也没有人会要求砍你的头（哄笑），因为蒋回来了，并不砍蒋的头，还能砍你的头吗？（笑声）。①

这话虽是周恩来开玩笑似的幽默说的，但还是有深意的：蒋介石也许不会回来，但不能完全否定蒋介石会回来的可能性。

六、局促东隅，不归何待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再告台湾同胞书》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八辑，第7—11页。

中说：“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再炮击金门。

十一月二日晨，周恩来接毛泽东秘书转来电话说：“建议明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①

周恩来立即拟了广播稿《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明日，十一月三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此稿正式播出时，又在“明日”前加写：“今日十一月二号，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②即使是一个广播稿，周恩来都非常认真、细致地起草、修正。这是对自己的同胞的高度负责精神。

十一月三日，近两万发炮弹砸在金门、大担等大小岛屿上。刘白羽在《万炮震金门》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近两万发炮弹震动了金门。当然震动的不只是金门，震动的是全世界，对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来说是绞索拉得更紧了”，“炮声从中午到下午，从下午到初夜，一直在海面上轰隆隆地响着……”

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说：“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台湾当局对保卫金门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相信美国不会妨碍国民党军队采取报复行动的。”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对美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187页，注1。

②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187页。

国记者发表谈话，他表示：反对从金、马等沿海岛屿撤军；台湾坚决反对减少外岛驻军，台湾没有接受停火的义务。

以上谈话，都是针对美国政府说的，足见美蒋矛盾在加深。炮击金门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说：“美国不准备为金门而同我们打仗，并严格约束它的海空军不要侵入我沿海三海里到十二海里的海域和其上空。现在美国只是想如何劝蒋军从金、马撤走，不使自己的兵力陷在这个地区。我们还是认为，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美国继续干涉，有极大好处。可以教育各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美国想从金门、马祖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我们要美国从台湾撤军。这样，我们要紧张时，对金门、马祖打一下；要和缓时，松它一下。”

这就是金门、马祖我们打而不取的真正意图。既可以牵制美国，教育人民；又可以教训蒋介石集团，利用美蒋矛盾；还能促使蒋介石坚定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使他脱离大陆的天然联系。取下金门、马祖垂手可得，但那会把蒋介石集团推向美国一方，不利于“一个中国”的战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述，正确认识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举办大规模报告会，请周恩来总理做了题为《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的斗争形势和中国人民的反帝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台湾海峡地区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周恩来又进一步形象地分析了我们对金门、马祖打而不取的意义。他说：美国占据了台

湾,实际上是把一条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了,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美国现在的政策是摆脱困境,我们不让它脱身,拖住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不怕美帝国主义,而且双手紧紧拉住了套在美国脖颈上的绞索。华尔街的老板们脖颈上套一根绞索当然不大体面,不过绞索既然是自己套上的,那绞索勒紧的滋味,也就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尝吧。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为了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他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毛泽东实际上为实现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进而和平统一祖国指明了方向。

一九六〇年春天,台湾进行“总统”改选。毛泽东指示说:“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这实力派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当蒋介石想第三次连任“总统”时,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章士钊等人捎过话去,表示支持蒋介石,赞成他连任“总统”,促使他们内部团结。

张治中在民革中央座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时,曾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台湾掌握统治权力的是蒋介石、陈诚、蒋经国这三个人。如果把他们三个人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话,蒋介石这一角在上,蒋经国和陈诚这两角在下,都是蒋所领导的,而陈诚和蒋经国又有矛盾。但是我们已经表示态度了,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不要互相摩擦斗争,以致中了美国人的诡计。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有某些迹象可以看出,例如陈诚组阁时把蒋经国也罗致为政务委员。现在蒋经国和陈诚的关系已经好多了。”“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陈诚、蒋经国两人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蒋的领导。”“陈诚、蒋经国之于蒋,一是多年部属,一是父子关系,俩人

都是以蒋为中心的。”^①

六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根据历年来毛泽东有关台湾问题的指示,概括归纳出我党的对台政策,后经毛泽东审定,即后来对台工作的“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四目: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当时台湾每年有八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八亿美元我们可以给);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周恩来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和政策。

一九六二年,有一次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看到国内经济出现暂时困难,而轻举妄动。并希望他们在信中把对台工作的“一纲四目”传达过去。之后,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给蒋经国、陈诚写了信;傅作义给张群写了信。

后来张治中又单独给蒋介石、蒋经国写过信。有一次周恩来看了张治中给蒋介石的信后,归纳了四句诗加上:“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周恩来还请人转告台湾方面:张治中、傅作义的信虽是个人给朋友写的,但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一九六五年三日,陈诚病故。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书。按一般惯例,国民党党政要员的遗嘱都要讲“反共八股”：“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的遗嘱关于这两方面一字没提。而且在陈诚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八辑,第11—12页。

临终前，还通过有关渠道捎信给周恩来、张治中，要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的。

周恩来在政协的民主人士会议上讲了这件事，他说：这是我们近四五年来对台湾不断通气、传话、传信的结果，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有影响的。

七、效力祖国统一，期盼台湾回归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周恩来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门谈了战犯的特赦问题。对于国内战犯，周恩来说：“考虑到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六年了，国内人民现已过上了和平生活，他们的罪行已经成为历史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监狱生活的改造，因此也采取‘一个不杀’的政策。杀他们是容易的，但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被杀的，增加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符。”周恩来又针对“马上全部释放”和“逐步释放”两种意见说：“按前一种办法处理很简单，但工作不完满，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步地来做好。国内战犯释放后，第一步要在当地先集中他们去参观，允许亲友访问他们。等他们对国内情况有了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①

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战犯的管理和改造工作，把国民党战犯中的二百多名高级将领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们可以与

^①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上卷，第557页。

家属自由通信,还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战犯的改造采取了多种方式。比如:读书、学习文件、讨论、到外地参观、劳动等等。

周恩来为了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过程,还特意委托张治中、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民主人士到功德林去做战犯的说服、开导工作,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到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战争罪犯处理问题》的发言,介绍了在押人员的改造情况。张治中听了周总理和罗瑞卿的讲话,认为自己做这些战犯的思想工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治中通过有关部门在战犯名单中挑出四十名和自己关系较多、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如:杜聿明、宋希濂、康泽、李仙洲、范汉杰等。从五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张治中到功德林分批,或单人,或两三个人会见在押战犯。张治中对这项工作极为认真,他是把开导战犯当作对台工作的一部分认真对待的。每次晤谈均在三个小时以上,先由战犯叙述改造经过,心中感受,表示态度,不少人谈起认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也有的心存顾虑、怀疑。张治中则耐心地分析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介绍建国后的辉煌成就,宣扬中共政策,希望他们努力改造,争取宽大处理。

张治中第一次到功德林管理所,首先找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家树、韩浚、周振强等人。他们几个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张治中与他们有师生之谊,又有长官部属关系。他们过去不是在战场上一起战斗,就是在军事会议上共同磋商问题。没想到师生分别多年之后,在战犯管教所见了面。这些人自尊心很强,当年他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几十万大军,今天却成了战争罪犯被关押起来。初见面时,这些人极不自然,感到内疚、惭愧,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

大家坐定之后,张治中像在过去黄埔军校对学生讲话那样,态

度热情、语调和气，侃侃谈来：

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交代了处理你们几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地教育改造。让你们有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不咎既往，一律宽大处理。

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行各业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宏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①

^① 《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32页。

张治中在畅谈之际,用目光注视着杜聿明,和善地询问杜聿明的想法。杜聿明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杜聿明还向张治中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说:“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

在座者相继发言,对共产党政策的伟大,表示口服心服。都愿好好学习,转变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杜聿明、宋希濂等十名战犯,获得特赦。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这十名特赦的国民党军官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部主任,在座的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人都聆听过周恩来的教诲。他们坐在客厅里等待周总理时,都深感内疚。他们悔恨自己毕业后走上了与共产党为敌的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他们思考着,见了老师该说些什么呢?喜悦、幸福、羞愧、自责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片刻,周恩来总理、陈毅、习仲勋副总理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人来了。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示意大家就座,然后就和大家随便攀谈起来。他最先认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叫了一声“曾扩情”。此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在周恩来主持工作的政治部内任少校科员,共同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后来曾扩情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在四十年代末的决战中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身份被俘。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周恩来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和容颜,使他激动不已。周恩来笑着说:“我在黄埔军校时,

年龄还不到三十岁,有很多学生的年龄比我大,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曾扩情答道:“我那时已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被接见的人再也不感到紧张了。

周恩来走到杜聿明面前握着他的手指着陕西籍的习仲勋说:“他是你的老乡嘛。”继而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杜聿明说:“我今年五十五岁,身体不错。”周恩来说:“你还年轻,还可以为祖国做不少事情哩。”杜聿明很愧疚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有负老师的期望。”周恩来诚恳地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导好,使你走上另外一条路。”

周恩来又询问宋希濂:“看上去你身体不错,不到五十岁吧?”宋希濂说:“感谢老师的关怀,我今年五十二岁,身体很好,我的后半生还能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周恩来又问:“你的家庭有谁?”宋希濂说:“我的妻子一九四九年就病故了。五个子女有的在美国,有的在香港。国内还有妹妹及其他亲属。”周恩来关心地说:“国外的可以先联系,国内的可尽快见见面。你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可以一步步做安排。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可以找统战部的徐冰副部长,他负责安排你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周恩来走到原国民党中将警备司令陈长捷面前时,他神情有些紧张。原来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时,陈长捷拒绝起义,固守孤城,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巷战被俘,因此自感羞愧。周恩来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真诚地安慰他说:“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的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

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介绍家庭情况说:“妻子冯莉娟迫于生活,在去年与我离婚了。”周总理立即追问:“她又再

婚了吗？”郑庭笈说：“还没有。”周恩来立即转向在座的其他人说：“你们动员他俩赶快复婚。”不久，郑庭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与原配妻子冯莉娟又破镜重圆了。

轮到原国民党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向周总理介绍家庭情况时，他说：“妻子没有去台湾，在原籍芷江一个被服厂当工人，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周恩来点头称赞并且说：“过些时，可以把家属接来北京。”

周恩来一个个询问了他们的年龄、家庭、身体等情况后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有原则的，是说话算数的。我们是根据人民的利益、民族利益来释放你们的。”接着周恩来详细、系统地谈了四个问题：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溥仪、杜聿明等人尊称这次讲话为“四训”讲话。

周恩来讲到要站稳民族立场，很自然地谈到了蒋介石：“民族立场是第一条，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论罪恶不能调和，但在民族问题上，他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这里指的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件事。当时美国国务院为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多次提出通过联合国把台湾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因为蒋介石不同意，英、法两国也不支持，美国的托管阴谋才未实现。“蒋介石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的。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周恩来最擅长把事实、哲理和政治统一起來。当谈及民族主义也有革命性的一面时，周恩来有意识地举了蒋介石的例子，在这位反动人物身上找出三件事：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平定广州商团叛

乱；二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三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他起草并向军事委员递交了《军政意见书》，要求认真对付英帝国主义。周恩来谈完这些例子后说：“这些不能不说是革命的行动。但后来他又走向反动了。”

周恩来举这些例子是有深意的。这十一位特赦人员，有十位是蒋介石的旧部。他们追随蒋介石打内战，沦为战犯。但他们也有东征、北伐的光荣一页。抗日战争时在疆场上也与侵略者拼杀过。他们心想：“周总理还记得这些，别人也会记得。”

在座的有人提出想和台湾的亲友通信，借此劝导他们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些贡献。周恩来表示：“个人写信靠得住。但希望从缓，不要太急。对他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做长、慢慢做，才有利。”

周恩来最后谈到他们的前途时说：“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你们做得好，狱中人会感到更有希望。他们改造得好，也可以分批释放，这对社会有好处。允许你们互相来往，既要勉励自己，也要勉励狱中的人。”周恩来特别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

这次会见，一直谈到很晚。当周恩来发现没有准备晚餐时，很抱歉地说：“以后再说吧。”他一直把这十一位客人送到客厅门外。当知道曾扩情等四人是要与他辞行时，又一一与他们握手，并叮嘱说：“你们一定要回家过年，骨肉团聚。”

转眼到了一九六〇年十月。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正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恩来请张治中以黄埔军校教育长身份，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并嘱咐有家属的也要偕同参加。周恩来为此还亲自给陈赓挂电话，要他一定偕夫人同来。

十月十九日上午，大家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到了颐和园。参加

这次聚会的有：张治中夫妇、邵力子夫妇、陈赓夫妇、郑洞国夫妇、侯镜如夫妇、周嘉彬夫妇、唐生明夫妇、屈武、黄维、李奇中、覃异之、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等。周恩来、邓颖超准时出席，平杰三、童小鹏也莅临主持。

周恩来非常关心杜聿明等六人在红星公社的锻炼，询问得十分仔细。杜聿明等把生活、劳动等方面的情况向周总理做了详细的汇报。周恩来很满意，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文白先生在颐和园休息，趁这个机会请张先生邀请大家到这里见面。大家工作得很好，我很早就想和你们谈谈。”

邓颖超也热情地说：“我和黄埔没有关系，但我对黄埔军校的同学是非常关心的。今天能和大家见面我也十分高兴。总理工作很忙，整天无暇休息，常常是早出晚归，连我也很少和他见面。”周恩来再次勉励杜聿明等六人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标兵。你们被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是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起抹掉了。当然，人的思想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

会餐完毕，稍事休息。周恩来兴致勃勃地问工作人员：“大家聚会不易，要留个纪念，在哪里拍几张照片好呢？”工作人员引导周总理和大家来到昆明湖北岸的牌楼前，以万寿山为背景，拍了几张集体照。周总理又对杜聿明等六人说：“我单独和你们六个人照张相吧。”又叫工作人员选好位置，让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分别站在他的左右照了一张相。周恩来便和邵力子、张治中等回介寿堂休息，众人便在园中自由活动。邓颖超游兴未尽，看到杜聿明在给别人照相，便走过去说：“我的技术不好，我给你们照几张吧。”于是她选了几处曲栏、拱桥的风景，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一九六一年二月，杜聿明、宋希濂、溥杰等七人被任命为政协文史专员。一九六四年，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一九七八年，杜聿明又被选为第五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杜聿明、宋希濂、杨伯涛等人都是虔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念念不忘，经常萦绕心中。他们认为，为台湾回归祖国做出贡献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杜聿明自一九六〇年起，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做了不少工作。他几乎每年都写文章，搞讲话录音，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台湾师友。在多次和国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参观的人士座谈中，他都要寄语台湾师长，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

八、“拜托拜托”

一九六四年冬，张治中因为脑血管剧烈痉挛引起突发中风。他自此体力大减，经常卧床，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即使出席会议也很少发言。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张治中自知身体不行了，便口授遗嘱，其中有一段：“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解放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①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二十七辑，第223至224页。

原国民党党政要员，临终前无不怀念台湾的故旧亲朋，无不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全国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更是日夜思念着台湾同胞和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党中央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得到全国人民、海外侨胞的拥护，甚至台湾党政高层领导也不反对。十多年来有许多非常机密的往来函件。“文化大革命”动乱得最厉害时，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妥善保管好了这些文件。当时国民党当局还怕这些机密在“文革”中泄露出去。后来得知没有泄露，他们才放了心。

“四人帮”为了破坏党中央的统战工作和统战政策，唆使不懂历史、不懂政策的年轻“红卫兵”到奉化溪口去捣毁蒋介石母亲和他的夫人（蒋经国生母）的坟墓。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要童小鹏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要他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又让浙江省委把破坏的坟墓修好，将修好后的照片送北京。周恩来看后才放了心，并把这些照片交给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尼克松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就开始使台湾由原来的国际斗争转化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毛泽东这时又指示“促蒋和谈。”对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注意搜集有关情报，把尼克松访华的有关情况，通过有关渠道捎话给蒋介石，周恩来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对台工作，除了对台湾的上层之外，还着重于台湾民间。周恩来说：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周恩来多次接见从美国、日本、台湾回来的同胞，耐心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对台胞总是说：“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我们的工作是为后人开辟一条道路，不能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胞时，一直谈了五六个小时。有位青年问：“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周恩来总理说：“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我可能看不到，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体重由原来一百三十多斤下降到几十斤。不但没有力气下床行走，连手握笔管的力气也没有了。这天，他在病床上看大字版的“参考消息”，发现上面有篇文章是介绍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局势及蒋经国经历的。周恩来十分重视，他用颤抖的手拿起毛笔在上面做了如下批示：

请罗青长、嘉东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彻底……

周恩来

九月四日

还没写完，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放下了笔。钱嘉东是周恩来身边最后一个秘书。蔡省三是蒋经国的旧部，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后来被特赦，于一九七五年去了香港。周恩来休息了片刻又再次拿起笔，在落款处歪歪扭扭写了“托托托”三字。^① 钱嘉东拿到“参考消息”，对批示看了又看，心里又激动，又难过。这时周恩来的手已不能完全听他的指挥了，字也显得歪歪扭扭，可看出落笔时手在极度发抖。^② 周恩来可能是想在自己的名字之后写上“拜托拜托”，却

^① 《世纪伟人周恩来》，第129页。

^② 《周恩来传》（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下，第1186页影印插图。

写了“托托托”。生命,在这时对周恩来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他要把祖国的统一大业“拜托”给后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的体温高达 38.7°C ,吊着输液瓶且不能动弹时,他还找来罗青长谈台湾和平统一的工作。他说:“我请你来就是要想谈一下台湾的问题,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谈着谈着,周恩来的声音低得听不见了,眼睛合上了。罗青长急忙劝周恩来休息一会儿,可是周恩来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前些时,张学良先生患眼疾,几乎失明,不知近来怎样?你们一定要关注张学良。”后来说到蒋介石死后台湾的局势,不知道蒋经国会怎样,嘱咐罗青长:“要深入细微地研究台湾问题。”病魔又折磨得周恩来慢慢合上眼睛,过了片刻,他强睁开眼睛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这以后,周恩来就昏迷过去了,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台湾同胞,仍然关心着未竟的统一事业。

周恩来把祖国统一的大业和谋略托付给了后人,他却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间。

侨居美国的宋希濂一九八五年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表达了后人的想法:“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宋希濂于一九八〇年到美国,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就与其他黄埔校友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其宗旨是:海外侨胞不分党派,不分政治立场,同心协力,为完成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

救中国”的遗愿,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早日统一,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四年,宋希濂又和黄埔校友组建了“黄埔同学会”。该会的宣言最末两句是:“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宋希濂在他“自述”的《鹰犬将军》一书的结尾写道:“在我生命的余年,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所有结识的朋友,即使政治观点不同,也必力言国家统一强大的重要性。我是多么渴望早日结束这个分裂的局面啊!万一在我活着的日子,祖国的统一尚未验现,我一定要嘱托我的子女:台湾回归祖国日,家祭勿忘告乃翁。”^①

杜聿明在他的晚年也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事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杜聿明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纪念淮海战役三十周年写了一篇题为《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在文章最后他说:“台湾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九亿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载入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希望台湾旧友和台湾同胞一道,为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而共同努力。”^②

一九八〇年二月,杜聿明发表了《纪念二二八寄语台友》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两次历史性合作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事实证明,在两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从不计较党派或个人的恩仇,而是忠心耿耿为国家与民族,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的。现在正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时候了。”“台湾已有爱国卓识之士提出统一祖国的意见”,“我们诚恳地希望”“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

^① 宋希濂:《鹰犬将军》,第389页。

^② 《杜聿明将军》,第192页。

朋友”，“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我们敦促台湾当局，认清世界形势，顺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民意愿，勇于正视现实，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争取作中华民族统一的功臣，而不作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①

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对周恩来的教诲铭记不忘。第一批被特赦的杨伯涛，把当年记录周恩来讲话的本子像珍宝一样保存在身边，每逢遇到困难和挫折，就拿出来读读，常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了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十九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后来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经常对台进行广播谈话，劝导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争取台湾的工作很有帮助。

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台政策，经过实践检验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日益发挥它的政策威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做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并建议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① 《杜聿明将军》，第193—195页。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的对台政策。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

一九九五年春节茶话会上，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对台方针的八项主张。这是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最新的方针政策，对加速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必将发生重大作用。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经验，将为台湾回归祖国提供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

七月一日凌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在成立庆典上国家主席江泽民讲话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继续推进祖国的统一，确保澳门顺利回归，并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七月一日晚上，江泽民主席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又说：“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深切怀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他为解决香港问题，推进祖国的完全统一，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一定把香港的事情办好，把实现祖国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的事情办好。”可以告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是“香港终于回到祖

国怀抱,澳门也即将回归,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前景在望”。

周恩来临终前拜托后人完成的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圆满实现。

第八章 友谊长驻情结如故

张治中将军终生为国内和平、统一奔走，代表国民党政府参加多次谈判。因此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王震等的友谊尤其诚笃。解放初期，党内许多负责同志还不认识张治中，毛泽东向同志们介绍时往往说：“他就是三到延安的张治中将军，是我们的好朋友。”周恩来往往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张治中先生，是我们党的好朋友，老朋友了。”这些话，张治中听了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朋友，是“我们”、“我们党”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好朋友”；不是刚结识的新朋友，是“老朋友”。这些话不只说明了他们友谊之深，还对张治中在政治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和信任。所以，张治中留住北京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愉快地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并能坦诚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一、关于“兄弟”的辩解

一九四九年四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北平谈判。四月十五日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对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改之点做了详细的说明后，

客气地问：“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张治中觉得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周恩来再三强调“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于是张治中就只谈感想：

……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出了很好的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觉得光荣。

……

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的一个句古话，就是“兄友弟恭”，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这话有封建意味。在中国旧伦理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哥哥的友爱弟弟，做弟弟的才能恭敬哥哥。

我们今天的情形,正好如此……^①

在座的南京代表团成员都觉得张治中说得入情入理,恰到好处。没想到张治中发言完毕后,周恩来站起来客气地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二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838—839页。

以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①

在座的南京代表听了周恩来的补充发言，无不豁然。多年搅不清的问题，今天明白了。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阶级社会里，人群是有阶级性的，在一个革命营垒里，在一个阶级里是兄弟，革命和反革命就不能称“兄弟”，是你死我活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张治中心里想，与周恩来谈判，不只是交涉国家大事，不是简单地争执、辩论，是受教育、广见识。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想到这里，并不觉得周恩来的发言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反而有一种受益后的喜悦心情。当周恩来有礼貌地问他：“文白先生还有什么意见？”他这时才猛然意识到不是在客厅里与周恩来谈心，而是在严肃的谈判桌前，商定《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张治中马上表示：“没有意见了。”

周恩来和张治中走出勤政殿，两个人由远而慢慢靠近。周恩来最后有力地握住了张治中的手说：“我等着南京的消息。”张治中轻轻地说：“我马上派人去南京。”他在习习微风中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心情复杂地匆匆坐进汽车，回到了六国饭店。

庸俗的、无原则吹捧换不来真挚的友谊，同样，终日吃吃喝喝，醉生梦死，在牌桌苦战通宵也不算纯洁的友情。只有在事业上在人生道路上有了共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有了共同的理想，这样，在生活情趣上才能有共同的语言，才能长久地的维系其友情。这种友情有矛盾，有争执，有分歧，但他们经过商讨、切磋会在新的认识上达到新的统一。

建国不久，一九五〇年六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到十月中下旬，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841—842页。

美国的军队已逼近鸭绿江边,并不断轰炸我国东北各地。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约了郭沫若、章伯钧、张治中等人去谈朝鲜战争问题。周恩来先概括地介绍了情况,指出美国的目的是消灭亚洲的人民解放运动,最终是包围中国、孤立中国、扼杀新中国。对于朝鲜的严重事态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周恩来谈了很多,宗旨是支持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然后征求大家对两个问题的意见:一、对支援朝鲜这一问题有什么意见?第二、如果决定支援,用什么方式为好?

大家都主张用军事力量支援朝鲜。

张治中做了系统的发言。他主张用军事行动支援朝鲜人民,在思想上要做好美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挑战,甚至有可能扩大到世界战争的准备。张治中说:“就新中国的情况说,应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争取和平。但目前形势已发展到不能再从一国的观点来看问题,要从几十亿人民的团结和全世界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问题。”“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穷光蛋,没有纽约,没有重工业,战争破坏没有了不起的可怕。如果能从现在出发把世界问题做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中国就是忍受十年八年的痛苦,换取我们子孙万代前途的幸福,也是应该的。”“我们看远,看世界全局,那么我们现在的作法是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的。”^①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邀集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就抗美援朝问题座谈七个小时之久。发言的人很多,其中有人说要慎重考虑;有的问苏联持什么态度;但绝大多数表示赞成军事支援。张治

^① 张治中:《我对抗美援朝的过激意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七辑第48页。

中又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话。大致是前天在周总理座谈会上的意见。一句话，“立即以军事支援朝鲜，虽会引起战争长期化，扩大化而不必多所顾虑，同时也要准备接受相当混乱的局面，甚至也需要作一定时期内最坏的打算。”^①

过了几天，张治中根据自己的两次发言，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想法，诸如：有人认为“中国刚解放，百孔千疮，万端待理，现在自顾不暇，怎能下井救人呢”？有人说，“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技术都落后，怎么能打得过天字第一号的美帝国主义呢？”甚至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搞糟了，中国又要大乱了”，等等，写了一篇题为《我对当前世界形势发展的看法》的文章。文章的宗旨是：“美帝在朝鲜的侵略及其正在发展的阴谋，对新中国是极大的威胁和灾祸，中国必须本救人自救之旨，以实力支援朝鲜人民，虽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战争也在所不惜”。^②

张治中写好这篇文章之后，想直接送到报社去发表。但他又转念一想：这篇文章的立论和措词是否正确、妥当？一旦发表出去影响是很大的。为慎重起见，最好先请周恩来总理看看。

周恩来看完文章之后便邀张治中谈话，一见面就笑着说：“文白兄，你这个将军怎么这样激烈啊！”张治中也笑着说：“激烈吗？我还没意识到。”

周恩来说：“你在文章中说，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即使接受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挑战，那怕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这太激烈了！别的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① 张治中：《我对抗美援朝的过激意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七辑，第49页。

② 同上第50页。

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会引起误会的。”

张治中说：“你提醒这点很重要，我写这篇文章只是谈个人的认识，没想到国际上会把这看成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说话。今后我可得处处谨慎些。”

周恩来又说：“我本来想替你修改一下再发表，但你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的，没办法修改，除非从新再写。——或者，可以不发表吧。”

张治中听了周恩来的话，心想：既然容易引起误会，又不好修改，便说：“那就不必发表了。”

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张治中在政治上却获益匪浅。自此后，张治中遇事则常找周恩来商量，对周恩来更加敬重。他常对身边的人说：“周总理政策水平高，对问题看得全面，想得周到。”从此，张治中不管是写文章、讲话，或在小范围发表意见，他都要认真考虑一下，自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自己讲的、做的，政策上允许不允许，有无不良影响。

二、张治中家里的常客

解放初期，到张治中家作客的中共领导人很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常来看望张治中。毛泽东给张治中送来了一大摞政治书籍。张治中着重学习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林伯渠重点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说：“这本书很好，我们在延安学了很久。尤其是干部，更要好好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张治中说：“改天我让秘书到外边找找。”林伯渠则说：“不用到外边找了，我家里就有，明后天我让人送来。”过了两天，林伯渠果然让秘书送来了此书。

毛泽东除了送书，来了还问张治中在北方生活得是否习惯，饮食上是否适应：“你的家属来时匆匆，生活日用品缺少什么，可以告诉我，告诉恩来都成。老朋友，不要客气。”张治中非常感激毛泽东的关怀。

一九五二年八月，张治中由西安回北京开会。毛泽东知道了，亲自到张治中家拜访、垂问：“在西北生活还习惯嘛？”

张治中说：“过去在兰州住过很长时间，现在住西安，更没问题。”

毛泽东又问：“工作环境还行吗？和其他干部相处如何？”

张治中说：“在工作上他们对我十分尊重，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些请主席放心。”

然后张治中把西北各省的建设情况，向毛泽东详细地做了汇报了。他谈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在王震将军、陶峙岳将军指挥下，在冰雪未消的大荒原上，挖开冰雪、找出黄土、搭起帐篷、安起炉灶、砍柴烧火、化雪做饭、采伐木料、修建房舍，无数新村就这样很快在草原上建立起来了。第一年就开垦荒地七十余万亩。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地笑起来。两个人亲切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大约在一九五〇年冬，毛泽东收到山东翻身农民种植的四棵大白菜。毛泽东转赠张治中一棵。张夫人一称，足有二十七八斤。舍不得吃，便找来一个大花盆，培上黄土栽好，摆在客厅里。春节过后，菜心里抽出新的芽，含苞待秀，约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每逢这时，张治中夫妇总是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

在张治中家的常客中，周恩来来的次数最多。有时事先打个电话，有时不打电话，周恩来出门办事，路过东城，汽车就拐到总布胡同张治中家，随便聊一会儿会就走。

张治中长周恩来八岁，他从来不以老大哥自居；周恩来身为—

国总理，也从来没官架子。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如今也有六十多岁了，他对笔者谈到周总理和他爸爸聊天时非常有趣；他们有时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在沙发上，一面品茶，一面谈工作；有时则非常随便，张治中谈累了就仰在沙发上，脱了鞋，两只脚放在沙发前的小圆墩子上。张治中也不觉得失礼，周总理也不见怪。有时总理觉得热了，就解开胸前的扣子，敞开怀，两手插腰，在屋里走来走去地谈话，甚至谈着谈着搬起小圆墩坐在张治中面前，两个人对面交谈。

有一天，周恩来兴冲冲地坐汽车来到张治中家，他手里提着一个多层饭盒走到院里，没进屋就说：“文白先生，今天请您尝尝我的手艺。”原因是有一次周恩来在张家吃饭，夸奖治中的烹调技术不错，但话锋一转说：“不过你没有我做的好。”在旁的张夫人洪希厚则说：“找一天我们尝尝总理的手艺。”今天周恩来亲自送来了自己做的鱼和豆腐。张治中在饭桌上，边吃边夸奖说：“的确不错，希望能经常吃到。”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生活、健康十分关心。在战争年代，张治中落下了腿部神经疼的毛病。解放后，曾经一度加重。张治中走路感到困难，思想压力很大。周恩来知道后，亲自把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带到张治中家，为张治中治疗。后来傅连璋又请了三位专家，其中两位是苏联专家，长期为张治中诊治。周恩来出国访问，常带回一些专治腿病的特效药，送给张治中服用。邓颖超也常以虎骨胶、燕窝相送。

有一次，专家建议，进行几个疗程的注射治疗。为了打针方便，决定派一位护士住在张治中家里。洪希厚只相信过去给张治中治疗的谭守仁大夫，反对护士打针，非要谭大夫亲自打针才放心。为这样的小事，张治中和夫人还闹了点意见。周恩来知道了，特意来

到张家做洪希厚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先了解张治中的腿病有无好转,进一步询问治疗情况。最后才对洪希厚说:“洪大姐,张大哥的腿这样不好,行走不便,您又上了岁数,照顾也有困难。我看派个护士住在家中,服侍、注射、服药,各方面都会方便,也减轻你的负担。那个小伙子干护理已多年,技术很好,是我们军委派来的。大姐,您尽管放心好了。”

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洪希厚终于同意派护士住在家里,对新换的大夫也信任了。

有一年,安徽的一个黄梅戏剧团来京汇报演出。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是安徽人,又特别喜欢家乡的戏剧,便请张治中全家看戏。

这天晚饭,张治中全家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吃的饭。晚饭后,大家分别乘坐汽车去政务院礼堂观剧。开车时,周恩来非让张治中的车走在前面;张治中几经谦让,周恩来的车就是不动。眼看开戏的时间到了,张治中只好客气地说:“尊敬不如从命了,我们走在前头了。”

从中南海西花厅到礼堂的路上,有一个岔路口,张治中的汽车往岔路上一插,把周恩来的汽车就让到了前面。这时张治中的汽车才倒回来往前走。待张治中的汽车到了礼堂门口,周恩来的汽车早已开走了。张治中的汽车刚停稳,周恩来却从台阶上走下来为张治中拉开车门。张治中忙歉然而幽默地说:“劳您的大驾开车门,岂不折杀我也!”两个人便说说笑笑走进礼堂观戏。

礼堂的前面,给他们留着一排空位子。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子让到里边,便和张治中坐在一起看戏。这时张治中才发现邓颖超不在周恩来身边,忙问身边的小儿子张一纯:“周伯母呢?”张一纯便站起来赶紧在剧场里寻找。他看见邓颖超一个人坐在后边较远的地方看戏。张治中对儿子说:“快去把周伯母请来,这里给她留了位

子嘛。”周恩来一把拉住张一纯的胳膊说：“不要去叫她了，叫她也不会来的。我们看戏从不坐在一起，就让她在后边看吧。”张治中听后，也只好作罢。在他的记忆中，周恩来在任何公开场合都未带过夫人。他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给张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提到出门看戏、乘车，张治中的机要参谋张立钧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九四九年五月间，张治中刚留在北平，没有什么事，终日在家休息，他感慨地对人说：“至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悠闲的休息过。”洪希厚跟他开玩笑说：“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么一个休息机会。”于是，张治中白天去游逛北平的名胜古迹，晚上去听四大名旦的戏。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戏全部听过之后，几乎每天晚上到东安市场或前门外大栅栏听大鼓。

解放初期，张治中与黄炎培先生合用一辆车。当时张治中是“无官一身轻”，经常是白天、晚上都要出门，由于用车不便，便经常乘人力车外出，对此，主管保卫的同志十分为难。周恩来从秘书何谦处知道此事后，马上指示管理局：“张治中先生可以破格用车，不要受限制。”于是张治中就有了专车。

一九五四年一个星期天，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全家在北海公园游玩。那时张一纯加入青年团已经一年多了，是个大小伙子了。他们玩到高兴的时候，张一纯忽然跑到周总理面前说：“周伯伯，我入了团。”

洪希厚说：“入了团就入了团呗，看把你美的，这点小事还值得向总理汇报。”

周恩来却没把这当成小事，认真地对张一纯说：“好，值得高兴。”然后又问：“在班上做没做社会工作。”

张一纯说：“我当了团干部，在班里还是学习委员。”

周恩来像对待成人一样对张一纯说：“你当了团干部，应该注意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团结班上所有的干部一道搞好工作。你不是团小组长吗？你不要怕其他班干部、团员超过你。人家超过你了，你要高兴。”

张一纯回忆起这件事时对笔者说，“周总理说的几句话，多少年来我都牢牢记着，它是我工作和待人接物的准则。”

一九五六年，张一纯入了党。这年国庆节，他随爸爸张治中到天安门城楼看焰火。他看到了周总理，独自甩开爸爸，来到周总理面前说：“伯伯，我告诉您个好消息。”

周恩来又认真地问，“什么好消息？”

张一纯说：“我加入了共产党。”

周恩来说：“噢，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于是他把张一纯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说：“从我们党内的角度来讲，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你们家取得了胜利。但你不要骄傲，你要更加尊重你的父亲。你父亲早年在黄埔军校时，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没有同意，主要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内，比加入共产党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张一纯当时对父亲的历史并不太清楚，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父亲曾申请过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他所敬爱的周恩来伯伯告诉的。从此，他对父亲张治中将军有了新的认识，也更加敬重了

周恩来每次到张治中家都要同他家的服务员握手问好。有一次他同张治中谈完事之后，把张一纯叫到身边问：“你们家那位在重庆给毛主席洗过衣服的奶妈现在在哪里？”

张一纯说：“还在我们家。”

周恩来说：“我想见见她。”

张治中马上让人把奶妈请出来。周恩来看到这位上了岁数的老妇人，忙站起来和她握手，热情地说：“在重庆的四十多天里麻烦

您老人家了。”周恩来请她坐下，又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问她：“现在解放了，情况好转了，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吗？”

奶妈想了想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有个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到现在没有下落。”

周恩来问：“在哪儿参加的？大约什么时间？”

奶妈说：“是皖南事变前在安徽参军的，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周恩来马上叫秘书进来，让他详细地记录了奶妈儿子的姓名，年龄，并对秘书说：“认真查一查，把结果尽快告诉我。”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说“张先生家奶妈的儿子找到了。现在解放军某部任排长。周总理特别关照，要征求奶妈的意见，是让他转业，还是继续在解放军做职业军官？”

奶妈知道消息后，又激动又高兴，十分感谢周总理的关心与帮助。奶妈说：“让儿子复员回家种地吧。”当时张一纯还执意劝奶妈说：“让他在解放军里做职业军官多好啊。”可奶妈舍不得家里的几亩地，坚持让儿子回家。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对奶妈说：“好，尊重您的意见，那就让他回家务农吧。”不久，她的儿子就复员回乡了。

三、“不能夸大到如此地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成为我们党的方针。这个时期国内思想空前活跃。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统

战部致函张治中，请他“就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关问题、意见、批评和建议，政协或民主党派的活动或工作经验等问题写一篇文章”，送《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发表。张治中对统战工作有些见闻、也有些想法和意见。张治中搜集了不少材料，经过认真思考，终于写成一篇文章。因为拖了一段时间，过了交稿日期。说话就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三月，全国政协要开会。于是，张治中就想把这篇文章作为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稿。

在会议召开前，张治中又把这篇文章送给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过目，并附有一封短信说：“不知道这样立论是否合适，我感到没有把握。为慎重起见，特意把这篇稿子送请您审阅。”李维汉看完文章后，在回信中说：“我赞成先生在政协会上去讲。中央统战部在同民主党派关系上是有过缺点错误的，不要把它说成都是正确的。”

张治中在三月份召开的政协二届三次会上，就按文章的内容发了言。三月九日，又以《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文章中说：“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呢？当然应该努力的方面很多，而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他首先列举了非党人士在建国后得到的6大好处，然后谈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在有职有权有责方面，有些地方有职无权，有职无事，分工不明；在对统战工作的认识与执行方面，越往下层，问题就比较多，甚至有些中共党员干部连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都不知道；在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合作方面，有的党员态度生硬，与非党人士有隔膜。张治中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单方面的，非党人士也有责任。在文章结尾处，张治中写道：“党与非党关系一定能逐渐搞好的，也就是党员与非党人士一定能逐渐亲密地、和谐地合作共事，来为建

设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努力。”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鼓励大家向党员提意见，提倡大鸣大放。从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共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十三次。张治中只参加了四次，而且没有发言。原因是他常有病，没能出席会议，没有发言是由于“没有什么意见”。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突变，反击右派的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张治中在“大鸣大放”期间，既无言论也无行动，他仍然受到了出乎他的意料的冲击。原因有三：一是他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曾被西方通讯社和台湾广播各取所需的作了报道。这就被人引为口实，认为是政治立场问题；二是他平时的言论，被别有用心者加以歪曲、夸张；三是他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是消极的。有人给他贴大字报，有人当面指责他。张治中因此情绪更加波动，甚至一度称病住院了。

张治中对突如其来的反右派斗争，精神是毫无准备的。开始时，他凭自己直觉，曾当众多次坦然直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又是这样大，谁能出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反右斗争是毛泽东批准，并亲自领导的。张治中说没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岂不是否定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存在。张治中这些有针对性的讲话，当然容易引起过激群众的不满。

反右斗争后来越发猛烈，如火如荼。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上剑拔弩张，疾言厉色，极端粗暴。群众斗争的场面，人们的过激言行，是张治中没有想到更没有见过的，这就深深刺激了他的神经。有一天他和沈钧儒、陈叔通、李济深、黄炎培、邵力子等人一起开会，讨论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张治中越说越激动，越发激愤地说：

“反右派斗争应着重摆事实讲道理，报纸、电台也是这样宣传的嘛。情绪激昂一点也可以理解，但拍桌子破口大骂是不是好？以势压人，人怎么会服气？！而且影响也极为不好。”

在那场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敢于直言不讳地说出上面两段话的人不多，从而也可看出张治中性格直爽，襟怀坦荡。然而就是这些直话却招来几乎灭顶之灾。

开始，有一些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说：“张治中对反右派斗争不积极！”继而说，“张治中对反右斗争有抵触情绪。”没过多久，又发展了一步，有人在大字报上公然说：“张治中在民革散布了一些右派言论，应予以批判。”张治中看了大字报十分生气。

张治中曾被迫在批判黄绍竑的大会上发言，没想到发言后又被积极分子们指责为：“像大学教授讲课一样，一点火气也没有”，“发言没有力量，没有触及实质问题”，“张治中的发言破坏了会场气氛”等等，这些指责很伤张治中的感情。

尤其使张治中伤心的是，他曾在民革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我党成员发展太少，不足以担负作为统战成员之一的任务。巩固与发展的组织路线是对的，但不能只注重巩固，而忘了发展。”后来民革中央贴出批判大字报说“张治中主张发展民革成员七八万”。这无中生有的指责，使张治中大为震惊，也十分生气。他事后对自己的秘书说：“即使添油加醋，也不能夸大到此地步，达到如此程度啊！”

反右运动进入中期，一些积极分子又把矛头对准张治中发表在三月九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那篇文章。他们断章取义，任意歪曲，说这是一篇大毒草，号召、鼓动大家起来揭发批判。

紧接着有人出来贴大字报说：“民革中央早就被人夺了权。”暗

示是张治中和邵力子两个人“合伙”干的。于是民革的群众哗然，各个战斗队四出活动，查档案，翻资料，一心要揪出特大右派，弄得满城风雨。

七月的一天，民革中央开会批判陈铭枢。张治中也出席了会议。许多人的发言是翻旧账，揭老底，火力十分猛烈。张治中的发言只是谈从旧政权过来的人，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些感想。他的发言与别人的发言相比，显得软弱无力，格格不入。张治中自我检讨说：民革被批判的几个人，“都是时常见面的朋友”，“怎能抹下脸来斗争他们？这是我的温情主义。”^①

从此，民革中央的反右斗争的批判会议，张治中能避开就避开不出席会议，即使非出席不可，也只是人坐在那里，心神不定，绝不发言。张治中的好朋友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他表示对民革中央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②

你想沉默，但斗争不让你沉默。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夜之间，民革机关大院便贴满了大字报。主要是“揭发、批判”邵力子的。其中夹杂着许多有关张治中的。有人蓄意要把邵力子打成右派，然后再顺藤摸瓜，把邵力子、张治中捆在一起批判，继而把张治中也打成右派。这时有人写信向统战部反映，很快毛泽东、周恩来便知道了张治中的处境。毛泽东批评一些人：“不要头脑发热了！”“张治中是我们的好朋友嘛，他曾三到延安，怎么能忘了历史。”周恩来则说：“不要胜利冲昏头脑，不辨是非。”于是，民革中央大院里再也没有张治中、邵力子的大字报了。

^① 《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8页。

过了几天，周恩来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到西花厅谈话，听取他俩对反右斗争的意见。张治中、邵力子两人还是谈了对运动的看法，但对民革中央反右斗争一字没提。

这年八月某一天，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见到了张治中，亲切地对他说：“我很挂念你，听说有人给你贴了许多大字报。”没有等张回话，毛泽东又继续说：“也有人给我写大字报。”张治中一听，吃惊地问：“谁给您贴大字报啊？”毛泽东乐呵呵地说：“是湖南湘潭东山中学，他们寄来大字报一叠。主要是说，韶山中学要求题字，我给写了。他们要求题字，我没有写。这是偏心。我只好给他们也题了字，承认不对。”这是毛泽东有意对张治中做宽慰地解释工作，希望他对大字报的事不必介意，挂在心里。

一九五八年四月，民革中央开展整风学习。张治中结合学习写下了《自我检查书》，对解放后九年来的工作、思想，作了系统的回忆与自我批评。五月三日，张治中将一九五〇年写成的《六十岁总结》和《自我检查书》，送请毛泽东同志审阅，希望得到指教。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的第四部分“今后怎样”中写道：“对国家人民方面，我愿意竭智尽忠，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而服务。我愿意尽到人民一分子的力量，使新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我愿以过去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真诚来拥护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达到世界大同，向着这一遥远的目标一步一步地走去。我不管今后是站在政府地位或人民立场，都应该保持这志愿和信仰以终其一生，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或动摇。”在个人品德、修养上，张治中写道：“假使我的品质还有可取的地方，我应该谨慎保持。我觉得，我还相当的注重‘心地光明，态度谦和，言论正大，行动笃实’的守则，今后还要特别注重动机。如果动机不纯洁，就很容易在行动上发生错误，甚至造成罪恶。”“过去我是无所贪，无所求，更无所

争,今后当然更应该无所贪、无所求、无所争。”^①

五月二十二日,张治中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大的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②

这封信是毛泽东进一步对张治中的安慰。这一封信足可以使张治中紧张、不安的心情复归于平静。

不久,张治中见了毛泽东,便问:“主席,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是指哪些方面?”毛泽东说:“你在《六十岁总结》里不说对阶级斗争观点尚感模糊不清吗?”张治中解释说:“那是指解放初期;以后经过学习就搞清楚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张治中随从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在去马鞍山的火车上,毛泽东又提起这件事。当时毛泽东与罗瑞卿、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张治中正闲聊。毛泽东忽然笑着对罗、曾

^①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第112—113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1页。

二人说：“我曾说他的世界观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他说已经解决了。”继而转脸面对张治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中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可是在今年春天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搞清楚了吗？”张治中解释说：“那篇《六十岁总结》说的是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八年这一时期。那时我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一九四九年起，我在北京住了几个月，从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多著作，我已初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了。所以才能把过去的缺点、错误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这番解释，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紧接毛泽东又说：“您在《六十岁总结》中说，你‘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我就从来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农户的半数，我才有点高兴；可到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我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张治中听了解释说：“您说在一九五五年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搁到您肩上来了，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过去反动统治下，尔虞我诈，贪污腐败，反动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我一直在苦闷中生活。但到了一九四九年，我眼看由于您和党的英明领导，党员干部的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都有办法，我就如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自然感到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高兴和舒服了。”

张治中这样一解释，毛泽东微微点着头笑了。

四、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不管家乡是贫瘠的山区、穷乡僻壤，还是在风光如画、四通八达、繁华的城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家乡是美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孩不嫌母丑，人不怪家贫。”

张治中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解放前，随着他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就不断把自己的积蓄投入故乡办学校，还打算把家乡建设成一个模范乡。解放后，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间，他以“人大代表”的资格，第一次到外地视察就视察了自己的故乡——安徽。他在安徽省党政负责人的陪同下，回到巢县洪家疃，他看到乡亲们生活得到改善，心情十分愉快。他在座谈会上鼓励乡亲们努力生产。回到北京后，从一九五七年一月起，张治中决定在五年内，向黄麓乡每年捐款二千元，支援故乡的建设，聊表他和老伴洪希厚对故乡父老、子弟的一点心意。他和故乡的党政领导还经常书信往来，了解家乡的建设情况。

张治中不只自己视察了安徽省，他还动员毛泽东去视察安徽省。建国后，毛泽东去了许多省、市，却迟迟未去安徽。张治中为了争取毛泽东到安徽去视察，便经常向他介绍安徽的情况。有一次他问毛泽东：“您已去过许多省份了，为什么还不到我们安徽去？”毛泽东笑而不答。有一次毛泽东刚由外地回到北京，张治中一见面就问：“主席，这次去安徽没有？”毛泽东幽默地说：“还没去，欠债吧，记下这一笔账。”

以后张治中见了毛泽东总爱说安徽这好、那好的。比如，说黄山如何美，希望能去游览；安徽巢县的棉花如何高产，最好去看看。

张治中非常欣赏自己的家乡戏——庐剧和泗洲戏。他和李克农、余心清策划剧团来京汇报演出，除了宴请文化界知名人士外，还特别怂恿毛泽东亲临观看，并上台接见演员。张治中事后津津乐道，深为故乡争得荣誉而感到光荣。

因为在毛泽东面前，张治中提到的“我们安徽”太多了。毛泽东曾温和地批评他：“看来，你这个人乡土观念太重。”

一九五八年九月下旬，毛泽东视察长江南北各地，曾希圣、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到武汉。九月十四日，曾希圣由武汉乘飞机先回合肥布置工作。张治中送曾希圣去机场，在路上他们两人商量如何欢迎毛主席到安徽视察。

张治中说：“毛主席是第一次去安徽，广大群众都想看到主席的风采。我们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旁，请主席站在敞篷车上从街上经过，这样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毛主席，满足大家的愿望。”

曾希圣说：“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允许当地负责人接送。主席这次去安徽肯定对全省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是个最大的鼓舞。能夹道欢迎，最好了。”

张治中说：“让我和主席去讲，试试看。”

曾希圣说：“好吧，听你的信，主席能答应最好。”说完就登机走了。

吃晚饭时，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是第一次去安徽，安徽人民非常渴望见到您。您到合肥时，让人们站在街道两旁瞻仰瞻仰可以吧？您不反对这样做吧？”旁边一位同志则说：“您是说要夹道欢迎吧？”张治中说：“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边吃饭，边说：“我已经受过你们很多次批评了，说我没有到过安徽。希圣同志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我去安徽，你们怎

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治中高兴地说：“主席您准许了？”

毛泽东再不作声，只是吃饭。

九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一行要离合肥去马鞍山。据张恺帆副省长说，原定组织十五万人，夹道迎送毛泽东主席。但安徽人民非常热情，连郊区的农民知道了也自发地赶到合肥市欢迎毛主席。从毛泽东驻地到合肥火车站，大约十几里地，人们密密麻麻，冒着小雨站在街道两旁。估计有三十万人之多，超过了合肥市人口的一半。

毛泽东由曾希圣陪同，站在第一部敞篷车上，第二部车上是张治中、罗瑞卿、黄岩省长、张恺帆副省长。当毛泽东的车一出现在群众面前，立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绝于耳。群众热情地挥动手中的花束、彩带，雨水合着激动的泪水，不停地从脸上流过。锣鼓声、鞭炮声、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人群蹦着、跳着、喊着。载着毛泽东、曾希圣和张治中、罗瑞卿的两部汽车就这样在人海的浪潮中徐徐前进。

毛泽东的车进了车站，许多人又跟进了站台，拥到车厢边，欢呼跳跃，以致使毛泽东坐下来又站起来，不停地挥手向欢送的群众致意。火车在欢呼声中一声长鸣，开出了合肥车站，合肥市街上的群众还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

事后罗瑞卿对张治中说：“毛主席到外边视察，都是轻车简从，连当地负责同志也不许接送，广大群众更不允许欢迎了。这真是破例。”张治中为这种破例十分高兴，他引以为荣，认为是为安徽争来了骄傲。

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一行返回北京路经天津，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上火车看望毛泽东，对此，张治中在日记上有这

样一段记载：

……林书记汇报了钢铁生产情形，主席很注意地听着。我插嘴问：“河北铁矿贮藏量多少？”林答：“已经查出来的就有×××亿吨。”主席对我说：“比你们安徽多。”我顺口说：“是啊，安徽已查出来的只有××亿吨。”我忽然意识到主席这话是有含意的。在某次谈话中，主席曾和我说：“你这个人乡土观念重得很。”他刚才点出“你们”二字，大概还是意识到我有乡土观念吧？^①

周恩来同志也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但他把对家乡的爱深深埋在心底里。周恩来从一九一〇年春天离开淮安，一生再也没有回去过。对于周恩来一生没有回过家，毛泽东有段时间很纳闷，甚至许多老朋友如张治中等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开韶山，开始了革命生涯，一别三十二年，一九五九年才回到故乡韶山。他对故乡的巨大变化，对故园、对亲友的无限怀念、感慨，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当时周恩来正在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一九六四年三月，周恩来回国后，便读到这首诗，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不回家的决心更加坚定。

一九六四年的一次会议休息间隙，毛泽东问周恩来：“你从小

^① 《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第71—72页。

离家，已近五五年了，现在有了条件，为什么不回家看一看？”周恩来是怎样回答的呢？在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的第二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披露出来。他说：“我的家属绝大多数都是封建关系。毛主席问我：你怎么不回家看一看，我说：一回家，封建势力到处找你，当然我就推绝。你就是推绝了，他出去就说周总理见了我，他瞎吹一顿，你避讳还避不赢。我何必到那个农村呢？我不如到别的农村蹲点好一点。现在不是回避本省本县吗？我就是回避。我不是怕他影响，我就是怕他假借我的名义。我出了淮安县到现在已经五五年了，我就是说不回去，顶多将来坐飞机从空中看看，据说那个地方的面貌改变了。”^①

周恩来把对家乡热爱的感情深深埋在心底，只求某个时候坐飞机从空中看上一眼就满足了。在会上张治中不解地问：“勤俭建国与你回家乡看看有什么关系？”张治中认为周恩来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太没必要了。但周恩来决不让步：“我这一点是坚持的。因为我是封建家庭。”周恩来在家庭问题上的原则性就是这样强。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张治中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界观方面的差距。

周恩来虽然拒绝了回乡。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人之常情”却依然留在心里，他每次碰到淮安人时，总是充满思乡之情和浓浓的爱意。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群众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他一一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恰好问到一位同志是淮安人。周恩来深情地说：“哦！你也是淮安的，”接着问他：“家在哪个庄上。”“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回去过没有？”“解放后淮安有什么变化？”最后周恩来说：“我十二岁时离开淮安就再也没有回去

^① 《世纪伟人周恩来》，第361—362页。

过，我是‘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啊。”

这一“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风趣语言，正是周恩来一生无私献身革命，献身人民的写照。

周恩来也并非没有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家族、亲属，不是不管，他们在经济上有了困难也给予一定帮助，为国家分担一些负担。他不是排斥人之常情，而是站在更高的境界来处理、对待人之常情。

五、在史无前例的风暴中

一九六六年春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修改、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全国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斗黑帮”的浪潮。

八月份，“红卫兵”在北京进行所谓的“扫四旧”。王府井大街的霓虹灯在一个下午就被砸了个精光。然后开始了“抄家”；有的人被剃成光头、挂上大牌子、头戴纸帽子，被批斗、游街等等。

这些消息传到了北戴河，正在疗养的张治中知道后，立即心神不定，疑虑重重。

不久，中央统战部派专人到北戴河召集一批未返京的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红卫兵”是保护毛泽东主席的“红色卫兵”，是最听毛泽东主席的话的“革命小将”。统战部希望大家正确对待革命运动，正

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红卫兵”。

张治中对毛泽东十分尊重，十分爱戴，他听了文件的传达也就放心了。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张治中在电视中看到转播的实况。他看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四条巨幅标语，用特大的气球挂在天安门城楼前。千百万群众手拿“红色语录”，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张治中既为广大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之情所感动，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胸中翻滚。

八月二十八日，张治中和家属乘专车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谁知到家刚两个小时，张治中便接到通知：“红卫兵要到你家里破四旧！”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宋庆龄、李宗仁、程潜、邵力子、刘斐等人。张治中这时心里敲起鼓来，感到有人在幕后操纵“红卫兵”，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干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旋即，“红卫兵”就来到了张治中家，他们气势汹汹，一进门就吆五喝六，咄咄逼人。所谓“破四旧”，实质是打砸抢，抄家。他们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把衣服、杂物、书籍，撒得满屋子都是。保险箱、保险柜也要一一翻检一番。最后砸碎一只小花瓶，拿走一把切西瓜的小片刀和一把张治中的小佩剑。

这些“革命小将”临离开张治中家指责说：“你们这里没有一点革命气氛。没有毛主席像，没有毛主席语录。”

“应该把封、资、修的字画、国画全部自动撤下去。我们下次再来，还是这样就不客气了！”

“应该赶快挂上毛主席的画像。”

这些人吵吵嚷嚷，前呼后拥，呼啸而去。

因为张治中听了文件传达,早就有了精神准备,始终不动声色,安详地躺在帆布椅子上看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过了多会,张治中若有所思地对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件事若干年之后,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批评。

“红卫兵”走后,张治中身边的工作人员自动上街,到新华书店买了许多“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画像。把客厅、书房里的字画、国画取下来,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各个房间,都张贴了许多“毛主席语录”。

机要秘书余湛邦无意中,在张治中坐椅的对面墙上贴了一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张治中问:“这段话出在那里?”

秘书回答:“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张治中又问:“你有什么看法?”

秘书思忖了一下说:“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

张治中听了,脸上的表情极不好看,只是长叹了一口气,从此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到这时,张治中则不想再随便说话、议论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治中由于脾气耿直,对党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无比尊重,对周恩来极其信任,他还敢于提出意见,谈自己的看法。比如,当他知道民革中央的会议室里把所有的沙发和软座的椅子,都撤换成硬板椅子或条凳之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用这种办法,对七老八十的民主人士进行变相体罚。他立

即给周恩来写了信,反映了这个情况。不久,会议室的沙发、软椅又重新布置好了。

到了“红八月”时,张治中在报纸上、在电视里看到各种群众集会的场面,看到周恩来都穿上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指挥“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时,张治中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是观察、沉默、思考。

八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三十日,先后有五批“红卫兵”到张治家中抄家。第一批抄过家不久,第二批红卫兵又来了。有一个“红卫兵”头头,身穿绿军装,腰扎皮带,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过去是干什么的?”

张治中已是久病之人,身体十分虚弱,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他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从靠背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

八月二十九日夜,北大红卫兵抄了章士钊的家并批斗了他。章士钊老人当晚给毛泽东写了信,第二天送出。毛泽东阅后,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批件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了三条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移到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开列了一份应予以保护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沙千里、李宗仁等。

九月一日,又指示三〇一医院准备接受张治中、章士钊、李宗仁等人住院。

张治中的秘书,在“红卫兵”来张家抄家之后,也往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反映了情况,周恩来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讲了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只知道有个张治中将军,却不知道张治

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的老朋友了。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进行谈判时，他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主席，谈判结束后张将军又亲自护送毛主席返回延安。这样一位革命朋友家里，你们就可以不必去扫‘四旧’了。”

几乎是同时，毛泽东在一个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张治中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民主党派人士。我们要和红卫兵小将讲清楚，在共产党以前就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张治中先生是支持我们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

不久，张治中先生被秘密送进了三〇一医院被保护起来。张治中家居住的地方附近还有几位民主人士，北京卫戍区在这里派驻了一个营部、一个连。在张治中家住着一位班长、一个副班长和一个小战士。这个连的战士，臂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时刻保护着这些民主人士，防止“红卫兵”们再来抄家、揪斗、出现不测。因为在“红八月”中“红色风暴”的冲击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越来越厉害。有的民主人士被揪斗，被罚跪，挨了皮鞭，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张治中仍然被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毛泽东走到张治中身边，笑着问：“红卫兵到你家里去过没有？”

张治中回答说：“去过了。”

毛泽东感到吃惊地说：“啊？你又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去了？”

张治中只是笑笑，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张治中回到家里，对家里人曾多次提及此事：“毛主席对我们还是很关心的。”

一九六六年秋天，毛泽东每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上都是彩旗飘扬。“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心

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口号声震天。张治中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画面，听着不绝于耳的歌声、欢呼声，总是连连摇头。心里在想，你过去总是讲要反对个人崇拜，防止搞个人崇拜，怎么现在自己也搞起这个来了。

有一次看电视转播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实况。当画面上出现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紧随其后，周恩来却拉开一定的距离，谦逊地走在后边时，张治中的秘书大胆地问张治中：“张先生，林彪是您的学生，他比周总理怎么样？”张治中摇头而笑：“那没法比。”这个问题问得也怪，是问林彪与周恩来相比，其政治地位怎么样呢？还是两个人的道德、品质、威望怎么样呢？都不清楚。张治中回答得也很妙，不管那方面，都没法比，不是一个“档次”。

一九六七年春天后，江青、康生等人在全国掀起掀“叛徒”的高潮。还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份，张治中经过艰苦工作，在新疆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一百三十一人。并责成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带上一排军警和医护人员，分乘八辆大汽车，护送这批共产党员，安全回到延安。这一百三十一人中有：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杨之华、秦化龙、林林等人。这一百三十一人，在掀“叛徒”的高潮中，被康生、江青诬陷为叛徒集团。对他们立案侦查、批斗迫害，有的被捕入狱，毒打刑讯，无所不用其极。

康生甚至散布流言说：“马明方这些叛徒和张治中互相勾结，隐瞒真相潜伏下来”。“这些叛徒是一批定时炸弹，必须挖掘出来。”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前往桂园拜访张治中。因为张治中在二十七日与周恩来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后，将立即飞赴新疆，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

盛世才逮捕、关押，至今情况不清，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重庆谈判重要内容之一，而且也写入了《双十协定》。您到新疆后，务必把他们设法放出来。但新疆情况复杂，回内地又路途遥远，请您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到延安。”

张治中说：“我到新疆后先了解一下这些人的情况和下落。”

周恩来说：“对，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的人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还在不在人世。听说这些同志处境很坏，生活很不好，也请您先为他们改善一下生活。这里面还有杨之华，你是认识的，可以先和她联系一下，了解些情况。”

邓颖超对洪希厚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务必请你们多多帮忙。”

张治中说：“我一定尽力去办，请你们放心。”

周恩来说：“改善这些人的生活，以及释放后回内地，都需经费。你是否带一些现款去。”

张治中则说：“钱不必带了。这点事还办得到。”

张治中到新疆后，立即派屈武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到监狱里去探视他们，并指示有关人员改善他们的生活，并发电报给蒋介石，说明这些人是盛世才扣押的，为了改进两党关系，表示和平诚意，应全部释放这些政治犯。起初蒋介石表示犹豫，几经电报往返说明，蒋介石最后才同意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这批共产党员分乘六辆大汽车，另两辆汽车是军警和医护人员。这批被释人员，六月六日从迪化出发，十日见报。出发前张治中向周恩来发了电报，通报了情况。张治中还电告兰州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告知他们这是经蒋介石同意释放的中共人员，请放行通过，并妥善接待。

这批被释放人员，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跋涉，于七月十一日到达延安。七月十二日，朱德总司令拍电报给张治中，表示感谢。这期间，周恩来数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这批被释人员的行踪。

这批共产党员，从被释放到安全回到延安，都是在党中央的组织、指挥、关怀下进行的。康生是清楚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却颠倒黑白，加以诬陷，足见其为人之卑鄙。

在这时，不断有人找到张治中了解、调查这批被释放人员的情况。张治中感到吃惊和气愤，明明这些人是自己亲自经手释放的，怎么到了今天竟成了叛徒。于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证明这批党员是他受中共委托，无条件释放的。信中说：“他们为党为国努力，贡献不少。他们由于在党中央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受尽艰苦，历尽煎熬，终于脱离虎口，胜利归来，这是值得敬佩和庆幸的。经得起残酷考验的不是几人，几十人，而是一百三十多人啊！”

在危难之际，张治中敢于申张正义，不怕邪恶势力的迫害、报复的大无畏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指示，将张治中先生写的有关证明材料，全部转交审查专案组，为新疆冤狱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证据。一九七五年，“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

在揪叛徒最猖狂的时候，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在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集会上大义凛然地讲话说：“马明方等同志的出狱回延安，党中央早就做了结论。张治中释放马明方这批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党员，并派人护送回延安，是应我党请托而尽力办的。张治中将军做了许多努力，费了许多周折才办成。他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来还特意派人代表他到三〇一医院看望张治中，表示慰问之意，当了解到张治中的情况一切都还好，才放下心来。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张治中拖着久病之身，让保卫人员用轮椅把他推到天安门城楼上。这时张治中已经十分衰弱了。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健步向他走过来，便热情地打招呼，并语意双关地说：“主席，您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噢。”后来又对毛泽东说：“主席，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不是说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吗？”在那种场合，那种时候，敢于当着毛泽东的面提出这样的问题，进行这样的婉转批评，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话，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看了看张治中，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这是两位老朋友，首次“话不投机”，也是最后一次“话不投机。”

六、晚年的友情

解放后，张治中看到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心情也极为舒畅。他曾自撰一幅对联：“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并请他的好朋友陕西书法家寇遐老先生，用隶书写成，装裱后挂在书房里。这是他心境的实际写照。

六十年代初，张治中又让秘书余湛邦书写了“思想开阔，心情舒畅”八个大字的横幅，装裱后挂在客厅里。

这些字画和条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勒令取下。张治中将军临终前一年，即一九六八年又让家人找出来，重新悬挂在墙上。

一九六四年五月下旬，张治中自感身体、精力大不如以前，他便挤出时间，决定最后一次回安徽老家看看，访问了皖中、淮北的

一些工厂、公社和文教单位，途中写成《回乡访问记》日记一册。

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全国人大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张治中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继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年冬季，张治中急病突发，经检查是中风，由脑血管剧烈痉挛引起。痊愈后，体力大降，经常卧床。除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外，终日在家，或卧床休息，或在庭院间散步。即使出席会议也是一言不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张治中到广东从化温泉做最后一次疗养。

张治中有位好朋友赵寿山，两人经常在一起对弈、聊天。后来赵寿山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是患了食道癌，且已到晚期。张治中亲自到医院探视多次，并宽慰他正确对待生死。回到家中嘱秘书余湛邦写了一条幅，上书：“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装裱后，送给赵寿山先生。条幅上的话，既是书赠友人的，也是他自己晚年的处世哲学和生死观。

一九六六年九月，张治中被送进三〇一医院被保护起来。每当他从报刊上看到周恩来忙于国务活动，还终日接见各地的群众代表，处理各地两派斗争的棘手问题，张治中就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是否支持得住。后来张治中托熟人带给周恩来一张便条。他只写了简短的几句话，殷切地希望周恩来保重身体。周恩来阅后，十分感动，自己想亲身到三〇一医院看看张治中及其他老朋友，可是他又难以脱身，只好派罗青长代他前去慰问张治中。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凌晨，李宗仁因患十二指肠癌及肺炎去世。二月一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在百忙中来了。他在休息室时，首先同坐在轮椅上的张

治中打招呼，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希望多多保重。”他也只能说上这么一两句话，因为还有许多老朋友注视着他、等着他，也想说上几句话。周恩来只好松开张治中紧握着的手，走到章士钊面前。没想到这两位老朋友的握别竟成了最后诀别。

自此以后，张治中的病日益加重。一进四月，病情显著恶化。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毛泽东早忘记了那次“不投机”的谈话，而牢牢记着多年的友情。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张治中自知病已不起，不久人世，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秘书余湛邦笔录，全文如下：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八十，自无遗憾。

特别是，我的后半世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眼看着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确实是没有遗憾的。

我过去常同一些老朋友说：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就自然“思想开阔，心情舒畅”，“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了。我现在仍然这样看法。

不过，在政治上我还是想说两件事：

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解放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其次,从一九二四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我就一贯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超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不过今天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在一小撮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之下,倒行逆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无数先烈所艰难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全部变色的危险,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苏两国友好联盟关系,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不能不使人痛心的。当然,伟大的苏共、伟大的苏联人民,是终于要起来推翻那一小撮苏修集团的统治的,但是,我是看不到了。

我已不久于人世,我别无他念,我但说: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张治中(亲签)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①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张治中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延至六日下午,终因病重,非药石所能挽救,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九岁。

当时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想搞一个告别仪式,请示统战部。统战部当时的负责人说:“别搞什么仪式了,看望一下家属吧。”后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觉得不妥,便把这事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在报告上批了三个字:“我参加。”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二十七辑,第223—224页。

周恩来还点名让黄永胜和几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参加。

四月九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周恩来准时到了革命公墓礼堂，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郭沫若、赛福鼎、章士钊、傅作义、卢汉、刘文辉、刘斐、罗青长、丁江、傅学文等生平友好数十人。

周恩来一看出席告别仪式的人不多，很不高兴，他问在场的有关人员：“有些人，比如陶峙岳、董其武等等，为什么不通知？”他的意思是，来得及的，能补救的，马上去通知。

在那样的时代，能举行告别仪式，国家总理和一些知名人士能出席告别仪式，张治中将军去世后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可知足地长眠于九泉了。

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把张治中的家属和秘书以及统战部、国管局的一些有关人员留下来。问了两件事：

“张治中将军生前阅读的一些绝密文件，怎么处理的？”

余湛邦说：“全部文件已由有关部门全部接管，没有丢失、散佚。”

周恩来听后放心了，他又对洪希厚说：“你今后生活有什么困难就找丁江同志。”当时丁江是中央统战部的军代表，周恩来把他叫过来给张治中的家属做了介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周恩来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卧在病榻上，想起了老朋友张治中的家属。他把童小鹏叫到身边说：“你把我积蓄中的一笔钱带上，去看看张治中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们。可以叫上赵茂峰、赵炜两人与你一起去。”

赵茂峰是周恩来的秘书，赵炜是邓颖超的秘书，童小鹏当天就和妻子紫非及赵茂峰、赵炜夫妇去张家探望。童小鹏到了张家，问了洪希厚的起居情况之后说：“我们是周总理派来的，总理在病床

上还一直惦记着你们一家人。他指示我们,从他的积蓄中拨出一笔款送给你们。他担心你们生活有困难。我们今天是来送这笔款的。”

洪希厚夫人和孩子们非常感谢周总理的关怀,但一再表示不能收下这些钱。童小鹏等说:“这是周总理的决定,你们必须收下,否则我们就没有完成任务。”

一九九〇年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回忆说:“后来,我们家的生活过得比较好,就是靠着周总理送的这笔款。”

一九八三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准备出版《张治中回忆录》,邓颖超亲自执笔为之作序。她在序言中说:“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白先生‘三到延安’,已成为历史佳话”。“一九四五年冬,文白先生奉命入疆。恩来同志和我在他临行之前,同往重庆上清寺桂园,面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监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文白先生慨然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白先生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对我党直言不讳,肝胆相照。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文白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代代中国人民所纪念。”

一九八九年春节,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在京的子女:张素我、张一纯等到家里做客。邓颖超又提起当年她和周恩来结婚,被张治中灌醉的事:“你们的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一九二五年,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宪兵团团长。他把恩来灌醉了,他自己一点也没有。他还爱讲笑话,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他自己却不笑。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一九九〇年，纪念张治中诞辰一百周年时，张治中的长子张一真和妻子从海外回来，邓颖超还亲自接见。张治中的故乡——安徽省隆重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专程去了安徽，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对他说，不久前，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来过安徽。他对省里的领导同志讲：“周总理生前一再对我说，张治中将军对人民的贡献，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不仅不能忘记他本人，对他的后代我们也一定要关心。我们做统战工作的，不能忘记老朋友。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家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胜利了，执政了，绝不能忘记他们。”

张一纯听了这些话，心里特别激动。

张一纯现在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当他对笔者谈起这些往事时，深情地说：“我每每想起周总理对我父亲的敬重，对我们家庭的关怀，对我成长的教导。我就加倍努力工作，把统战工作做深、做细、做透。周总理的言行，将激励我终生。”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七日

完稿于青年湖畔寓所

后 记

该书从酝酿到完稿历时一年多。该书的写作过程是学习周恩来、张治中两位政治家的高贵品质的过程,也是我提高思想认识的过程。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经历越曲折坎坷。张治中先生一生都记着他母亲告诉他的“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格言。他到老年写回忆录时说:“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他体会到一个人只有“尝尽酸辛,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所以张治中特意请于右任先生把这句话写成匾额,挂在他故乡先人墓地的墓庐内,希望他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与遗教。”我们从周恩来与张治中的一生交往中,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朋友们读过拙作,能有所收益,也就达到了我写作此书的愿望。

在写该书的过程中,我曾走访了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张素我、小儿子张一纯、机要参谋张立钧、机要秘书余湛邦诸位先生。他们为该书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全国政协的王合中,华文出版社的高建中、时立平诸位同志,也为该书的写作与修改提出过许多指导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有些细节采用了文学描写的笔法,特此说明。

作 者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定稿于

青年湖畔不夜斋